

毛泽东传

竹内实 著
韩凤琴 译

1949年，美国的亚洲研究家欧文·拉铁摩尔说：“亚洲已不可救药。”进而他还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过去外国人投资比有实力的本国人投资还安全。经历过内战、外国侵略、内战再起这一二十年间的今日中国，已不可救药。”这些话即使在那十几年后的现在讲也不过时。

整个亚洲这里暂且不提。关于“已不可救药”的“中国”我们的关心是进行各种各样的探索，其中之一就是研究毛泽东。这是不能否定的事实。毛泽东并非代表中国的全部，但在考虑当今中国时，无视毛泽东恐怕是不行的。

毛泽东生于 1893 年 12 月 26 日。不到一年便爆发了日清战争〔1〕，七年后，由于在山东省的一个角落掀起了秘密结社运动，即所谓的义和团事变，引起了清朝的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迁出首都北京向外疏散这一骚乱。可以说当时正处于清王朝崩溃、时代将发生剧变的前夜。企图利用君主立宪制以求更新清朝的康有为 正值 36 岁 精力充沛 后来推翻清朝 被尊为“国父”的孙文 28 岁 作为启蒙思想家的梁启超 21 岁 鲁迅当时是 13 岁 还在读私塾。开创新中国道路的朝气蓬勃的能量处于沸腾之前。

毛泽东出生的时期 充满了那种风云 人心被转折时期的激烈交替所震撼。但不是说他立即直接融入那种空气之中。他首先被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的家运逐渐上升的农家空气所包围。他出生时，父亲毛顺生约有一町步〔2〕的土地 每年可以存上 25

〔1〕 中日甲午战争——译注

〔2〕 约合 9,918 平方米——译注

担稻米。不久两个弟弟出生，在二弟出生前后，祖父去世，这时家里有五口人，在中国，是个稍显凄凉的家庭。祖父去世时，父亲又买进大约四五反〔1〕的土地。父亲不打算增加更多的土地，而是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猪的经纪人，还搞运输。家里雇了一个长工，到冬天捣米时，再临时雇一个人。从6岁起，父亲就让长子毛泽东干农活，恐怕不能说这是父亲特别严厉吧。家里好像还放债。要是自己边劳动，边雇用他人进行剥削的话，在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划分上应该叫做“富农”。虽然不是像地主那样当作彻底打倒的对象，但属于应该警惕的阶层。井冈山时期的中共，把富农和地主等同看待，采取彻底消灭政策，但是后来又转为缓和政策，最近又采取了严厉态度。

根据最近的报道，在北京的红卫兵贴出的传单里，有人攻击毛泽东的阶级出身是富农。毛泽东本人也曾说过，父亲从贫农上升到中农，然后又上升到富农。

父亲似乎是个很懂得致富之道的人。他不大量买进农民一般都想要的土地，只是不断增加其土地使用权，他的资本终于达到两三千元，在拥有三百多户人家的韶山冲，被看作是大财主。不知是出于年轻时成为房屋负债的牺牲品而被迫当兵时的见闻，还是出于作为经纪人与城里商人打交道时获得的知识，他一定选择了不通过土地，而是通过货币达到致富之路。在这点上，他的见识比普通农民略高一筹。他节俭，吝惜给雇工吃肉，连鸡蛋都不给泽东吃。禁止妻子的慈善行为，拒绝与家庭成员的信仰同一步调的他的人物形象，与其说是农民，莫如说像是被商业和货币的世界夺去灵魂的人。如果中国的历史走稍微不同的道路，他大概会像日本的第一代财阀那样，作为让逸闻包围的人物

〔1〕一反约等于992平方米——译注

而被描述。可惜的是，他在 1920 年去世。成为革命家的儿子，想要彻底否定自己的“资本主义道路”肯定他连做梦都没想到。

像夏洛克那样吝啬的父亲，送泽东进私塾也是为了培养他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于是父亲把不久让泽东去湘潭县城的米店当学徒的计划放在心上。之所以反对儿子不认真读经书，而去看像《盛世危言》那类介绍外国最新知识的书籍，倒不是想让儿子成为“圣人”，而是因为在一次诉讼案中巧妙引用经书的对手使他败诉。因此，对于他来说，经书倒是更实际的读物，与事业的利害得失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对这样的父亲再三表示出反抗。他在追忆对父亲的反抗时，诙谐地说：“在我们家里，辩证法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既反抗私塾的顽固教师，又讨厌回家，因此也曾离家出走过，后来他把那件事叫‘胜利的罢课’。有一件事他记得特别清楚：

“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1〕。

然而，把毛泽东的这种反抗立刻与后来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是不合适的。那种反抗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恐怕与革命家毛

〔1〕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宇佐美诚次郎译 筑摩书房出版

泽东有联系，但正如他承认的那样，是在虽节省但平日里过着丰衣足食生活的条件下对父亲的反抗。而且，这归根结底是由父亲的坏脾气惹起的理所当然的抗拒。它与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中的贫农主人公及其一家对地主怀有的反抗心性质不同，又与鲁迅所处环境的阴湿性冷淡培育的反抗心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得天独厚的反抗心，若是父亲的态度变得温和，毛泽东也会勤奋、忠实地做好让做的事情的。

尽管他憎恶父亲，但是，父亲惹起全家人反感的严厉、节俭、勤奋、实干、执着的上进心和对空洞理论的不关心，与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宽大胸怀、对穷人的同情心一起，好像被毛泽东继承下来许多。

毛泽东接触社会，是在不久后因长沙饥荒引起的暴动事件之时。在那之前，包围他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家庭，在家中，支配者父亲是一个“党”，与其相对的“反对党”是泽东和母亲、弟弟，有时还有雇工。另一个世界是旧中国传奇小说的世界，如果用书籍的名字来说，有《岳飞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中国有句谚语：“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他是那样地爱读，后来来到湘潭县的邻县县城湘乡的一所东山小学读书时，他的像样行李就只有《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两本书。在家庭这个世界里的立场，正如他自己用简单的示意图表示的那样，是“反对党”。而书籍世界的全景画又是什么呢？那是在他称作“造反故事”里的男人当中，男子汉们聚集起来打倒当权者或统治者的故事的世界。虽然反复出现一治一乱，但和平与战争，都由优秀的英雄豪杰的智谋和武力操纵着。世界是一个舞台，在那里演出的戏剧是依据非凡的个人的深谋远虑写出梗概，天意也只有通过他们才得以实现。恐怕他想起的就是这样的世界形象，有一半如同幻想。有一天他发现在这些故

事和小说里没有种田的农民。据说后来他用“两年时间”埋头研究，这也表明这个世界强烈地支配着他的头脑。

他上东山小学读书是 16 岁。在这之前，也许可以说他的脑海里充满了对幻想式英雄的崇拜。不过，由于 14~15 岁时读了《盛世危言》，他年幼的头脑里打开了通向西方的窗户。这本书介绍了西方的机械文明与民主政治，强烈刺激了毛泽东想学习的欲望，成为他下决心上东山小学的契机。

毛泽东预先把钱借给了亲戚家的一位老人，向用难听的话骂人的父亲提出，如果儿子去上学，就必须雇那位老人做长工，并阻止其反对。他已经听到一些人因长沙饥荒而发生暴动被处死的事，对这种处罚感到愤慨。第二年，县里又闹粮荒，父亲准备运往县城的大米被贫民抢劫，即使这样，毛泽东也没有同情气坏了的父亲。他读了诉说中国面临解体危机的小册子后，时刻不忘中国的命运和人民的责任。

可以认为在东山小学第一次接触到‘近代教育’的毛泽东，已经萌发了一种使命感。但是作为小学生他的年龄有些过大。他讲了不少关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里的英雄豪杰的故事，博得孩子们的尊敬，但另一方面他又接触到新的报刊文章，很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一年后去了长沙，也是很自然的。在东山小学给他留下印象的，是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教员，他喜欢听这位教员讲的有关日本的话题。他学会了日本歌《黄海之战》而且一直没有忘。从歌名推测这是关于甲午战争的歌，但似乎他感到这首歌表现了与俄国作战取得胜利的日本人的自豪。从《世界英雄豪杰传》这本书里他读到了拿破仑、叶卡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

虽然到了长沙，但是他的生活还没有走上正轨。在湘乡中学读了半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革命军，不久又入长沙第一

中学，半年后又上了实业学校，可是在上实业学校之前，又相继到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办了入学手续。在实业学校呆了一个月，在省立第一中学读了半年，又退学，制定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去湖南省立图书馆。在那里，他学习了世界历史、世界地图，读了《原富》和《物种起源》、希腊神话等，对世界地图非常感兴趣。后来考入湖南第四师范，该校又合并到第一师范，在这所学校里，他读了五年，直到毕业。

他的这种不稳定生活，恐怕是受到了 1911 年辛亥革命的影响。大清帝国崩溃，中华民国成立了。但是，它的内容还有待于人们来创造。与新的国家一样，个人也在探索生存之路。尤其是在毛泽东这个年龄，大概更是如此。尽管这样，他看了广告后，还是接连不断地改变计划，这种态度令人感到他急于实现自己的理想。当然，甚至可以认为不是过于自信了吗？虽然未必指望父亲寄生活补贴，但在当时的长沙，无法一下子解决自立、读书和寻找社会上的前进道路。

革命军（学生军）解散后，支撑当时无处可去的他的不正是在天心阁上体验的一种灵感吗？

……有一天，他郁郁沉思，在街头散步时，来到天心阁前，忽然想起，登到楼上。屹立在城墙上的七层天心阁，在长沙是第一高层建筑物，从那儿远眺非常美。西有湖南省首屈一指的大河湘江流过，对面岳麓山高高耸立，山后又是连绵不断的山脉。放眼市街，它宛如巨大的研钵。当俯瞰重叠的屋顶时，他突然感到自己是处在多么高的境地啊！今后，对于那污浊的社会，也一定要超然处之。……

记录这种体验的是萧瑜（旭东）萧瑜《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高桥正译，弘文堂出版）。萧瑜在东山小学与毛泽东相识，成为朋友，又在第一师范重逢。他们有时一起不带钱去徒步旅行。

也许由于旅行中的寂寞，毛泽东才偶然谈起这种体验。据说毛泽东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 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 其乐无穷；与人奋斗 其乐无穷。”那第一项认识 大概就是从这时起逐渐形成的。

离开革命军后，在下一个目标尚未确定的空白时期、虚脱时期，他将得到的一种灵感禁不住告诉朋友，从这一点看，那种灵感对于他来说，恐怕是一种深刻的体验吧。

他好像喜欢将一种神秘感向自己的周围显露，据说向那种神秘感的倾斜自当时起就已存在。从照片中看到的天心阁还不能说有多么高。正因为如此，他在这个建筑物上察觉到自己的“很高的境地”是一件有趣的事。

第一师范的校舍在当时的长沙是最现代的。因为是寄宿制度，不仅免交伙食费和学费，还支付学习用品和制服。对于家里不再寄生活费的毛泽东来说，肯定是座难得的学校。入学考试很严格，应考资格仅限于湖南省 63 个县各县内前 20 名的学生，其中 初试合格者每县取 5 人 进而 在 500 名初试合格者中 只有 100 人可以入学。由于教员的薪水高，所以有能力的教授很多。

给毛泽东印象最深的是杨昌济，后来他与杨的女儿开慧结婚了。不过，据萧瑜称，杨昌济给学生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尽管在此之前他很有名气。

“大家自然十分好奇，都想一睹风采为快。开始上课了，我们见他远远走来，步履徐缓，当他走进教室时，我们看到他约摸五十来岁，皮肤黧黑，眼睛小而深陷，说话不灵便。他只是照着讲义念，既不重复，也不讲解，也不让我们讨论。一个小时过去了 人人大失所望。”（萧瑜《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学生们的不满情绪很高 甚至想罢课 但萧瑜以慎重论阻止

了。杨昌济的讲义别具一格，如果仔细阅读讲义，就会感到受益匪浅。经过两个月左右，学生们才了解杨先生的真正价值。不到一年，他被誉为“第一师范的孔夫子。”

毛泽东回忆说，杨昌济“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毛泽东概括杨昌济的思想的话语，不正是原本的毛泽东的思想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杨昌济的教诲就是通过毛泽东这个学生在当今中国发挥作用的。

最近，中国的《哲学研究》杂志分类整理了工农兵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体会，出版了《工农兵谈共产主义道德》专集（1966年1月号）。它的第一项是这样写的：

“听毛主席的话，树立‘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紧接引用符号‘ ’后面的部分，其实是毛泽东的话（《纪念白求恩》）。

不久，每个星期天，萧瑜和另外两名学生一同拜访杨先生家，互相传阅笔记，商讨各种问题，吃过午饭后再返回宿舍。比萧低三届的毛泽东，也可以听杨昌济讲课，也能访问杨昌济了。他写了一篇《心之力》的论文，杨先生给他105分。

《体育之研究》这篇论文，署名二十八画生，刊登在北京公开发行的提倡新思想的杂志《新青年》（3卷2期，1917年4月号）上，这也是由于杨昌济推荐的结果。

《体育之研究》是可以看出后来的毛泽东的思想的原型的重要文章。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自觉的能动性”的概念被放在中心位置上，被认为是这个词的来源的用语表现在这篇《体育之研究》中。

“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

“学校之设备 教师之教训 乃外的客观的也 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的。夫内断于心，百体从令，……苟自之不振，虽使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亦犹之乎不能受益也。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原文系文语体 加重点为引用者所加）

从上述引文的脉络中，大体可以想象出毛泽东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使用“主观”这个词的。业已丢失的文章《心之力》是同样的意思。假如认为杨昌济极力推崇这个的话，那么可以说这里也有从杨昌济身上流传的思想作为毛泽东的思想扎了根的部分。

所谓“主观”在现代日语中并不是很好的意思。“你的意见很主观”。与此相反，按照今天的常识，认为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它是“客观”的真理 所以它是科学的 伟大的。毛泽东重视“主观”强调“自觉”不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了吗？

如果从杨昌济继承康德和中国宋代哲学的系谱来讲，大概可以说他的哲学是把基础放在观念论上。本来，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思想界里并没有把唯物论和观念论的区别作为最大的争论点进行论争。毛泽东也把当时的自己叫做“理想主义者”。然而，马克思主义可以只夸耀客观性吗？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附录，佐野文夫译 岩波文库出版）

只引用马克思的上述文章，就因此说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正统派的争论，我不感兴趣。马克思有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有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与其只举出一部分的相似

形，参加繁琐的争论，远不如从毛泽东或马克思那里引出东西留给我们的多。

恩格斯这样说过：

“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 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可以认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1938年执笔）中提及的关于“自觉的能动性”的见解与上述恩格斯的说法十分吻合。《论持久战》一文在《毛泽东选集》出版时做了修订，修订前的文章在窥视他的思想方面是很难舍弃的。现将修订前后的文章对照如下：

新版(《毛泽东选集》所收,1952年3月)	旧版(译报时论丛刊,1939年4月)
<p>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同左</p> <p>做就必须先有思想，有道理，有意见，有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与方能做得好。</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同左</p>

我觉得旧版好像更鲜明地表示出毛泽东的思想轮廓。关于

客观事实，由于在其他的段落里提到，这里无需论及。毛泽东在这里想说的，并非是主体确立以外的什么东西。自己不热情、不自觉地、不发奋，能干什么呢？历史能改变吗？战争能胜利吗？毛泽东提出了这些问题。即使在紧接这个的下一节里，旧版也比《选集》更加强调这种“自觉的能动性”在战争中具有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然，强调这种“主观”、“自觉”或者“自觉的能动性”，有时反而也带来失败。恩格斯对旧唯物论批判说：“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可以认为这种批判仅限于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的“自觉的能动性”，只作为最终的东西来提倡，还适用于放弃超出上述范围的思想方面研究的状况。

虽然，在某种场合，感到下决心实行是如何的重要。可是对于具有孤注一掷、激发一大勇猛精神，下决心实行的经验的人来说，毛泽东的话也一定会引起真挚的共鸣。虽说如此，如果这从“上面”强加给个人的话，有可能成为奴隶的道德。事实上，历史经常充满这种“观念的冲动力”，不希望出现的相反方面的讽刺。

在第一师范，还有一位叫徐特立的老师。在发生要求设立国会的请愿运动时，曾砍断手指写血书，以朴素和热情赢得学生的尊敬。他在 1928 年入党，还参加了“长征”。

在朋友里，可以举出蔡和森、陈昌、郭亮、向警予、罗学瓚、夏曦、张昆弟、何叔衡这些人的名字。他们全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员，到 1930 年前后，都为中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毛泽东和这些朋友一起，又到湘江游泳，又去爬岳麓山。冷水浴、日光浴自不必说，遇见下雨，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进行雨浴。春风吹来的时候，同样做风浴，在已经下霜的日子，在户外露天睡觉，到

11 月份，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就是他们的“体育”。他们讨论对于青年来说的大问题——人的本性、社会的本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另外，据说在他当时的笔记本里，用工整的字体写着屈原的《离骚》。一定是古代楚国诗人的爱国的忧愤激发了他的正义感。“楚有三户亦亡秦”。他重新认识继承楚国传统的湖南省，唤起了作为湖南省人的觉悟。

“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

这样的传单贴到各个学校，成立了新民学会这一组织。该组织正式成立是在 1918 年 4 月。当年他满 24 岁。同年夏天，他从第一师范毕业。

以后他的社会活动十分活跃。他致力于不久开始的赴法留学运动，以半工半读为宗旨，他送走了徐特立和蔡和森一家等三十多人，为此，他去了北京，不久又返回长沙，为与正在那时的五四运动相呼应，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以此为中心，又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作为它的基层组织“救国十人团”这个以 10 人为单位的小组，发展到 400 多个，进而成立了它的联合会。……编辑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杂志《湘江评论》的工作也落在他身上，他在百忙中还挥笔写作。其中，特别是《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各地的报纸都做了转载。不久，又开始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在他的倡导下，长沙的中学生 1.3 万多人参加了罢课。为了这个运动，他作为学联代表再度进京，后来返回长沙后便创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文化书社（书店）等，为了休闲，还组织了星期日周乐会。他与巴黎的蔡和森通信，出版该通信集《新民学会通信集》。1921 年 6 月，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他与何叔衡一起，作为湖南省代表于 7 月 1 日参加

该党的正式创立。这时他满 27 岁。

应该说在这几年间，毛泽东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

后来，他对新民学会创办前后自己的思想状况做了如下叙述：

“在这个时候 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斯诺《西行漫记》）

通过报刊上接触的文章，作为他崇拜的人物，梁启超和康有为被抛弃，胡适和陈独秀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说，初到北京时，他赞成的是无政府主义。在报刊文章上认识的人物，自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他的面前走过，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大家都不理我”。然而 担任新闻学会的讲师和师范学校的恩师，并转到北京大学来的杨昌济，却高度评价他，杨的女儿开慧和在小屋里共同生活的朋友们在他的周围。冬季古都的美景给在南方长大的他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喜悦。总之“，用我们的话来说 我正在找寻出路。”（斯诺《西行漫记》）另外，他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回到长沙时，他主张湖南省与北京分离。恐怕他是想实行美国式的“联省自治”即中国的各省分别独立，尔后再联合。他赞成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他的团体要求实行男女平权和议会政府。总而言之，他的思想处在资产阶级民主的纲领影响下。同时，已经萌发对俄国革命的憧憬。尽管是稍后的事情，在 1920 年，新民学会举行了示威游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

另一方面 与各种政治见解不同 在他的内心正形成一种信

念。这就是发现了群众。只要没有群众运动的力量，任何政治目标都无法实现。这种信念，对于在杨昌济的影响下努力完成个人人格（包括肉体的锻炼）的他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转变，是作为政治家向前迈进了一步。

按照毛泽东自己所说的，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关于俄国革命的书。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心中，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那是 1920 年初的事。到了夏天，就连他本人也承认，自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年冬天，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自我感觉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毛泽东新的人生开始了。

毛泽东的这种思想经历，在瞬息万变上，正好与他上第一师范以前的状态十分相似。即使粗略地列举，那就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如果上第一师范以前的摸索有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成立）的影响，那么后来的摸索也并非不能说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影响。以前的动摇，国内事件是其原因，而后来是世界史转折时期的动摇。国际上的思想变动，也波及到渺小的中国湖南省的一个青年。这同时也说明中国已被纳入世界史中。中国不是与人类的命运无关，而是站在必须与其他民族和个人承担共同责任的位置上。青年毛泽东经过各种探索，最后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被马克思主义所抓住。不久，通过中国的变革和动向，对世界政治具有意义。

尽管如此，思想的振幅很大。当从一种思想转变到下一种思想时，完全没有与旧思想诀别的苦闷。对于毛泽东来说，那种思想本身恐怕不是最终目标吧。如果思想成为最终的目标，那不是作为学说的思想，而应该是包括自己和中国的革命家们全

部实践过程的思想。

另外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本身 尽管是从过去的思想水平上前进了一步，但似乎并没有完全抛弃过去的思想。 1939 年 9 月，再次访问延安的斯诺，对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理解方法，看得出有些困惑。据斯诺讲 毛泽东说“希特勒是斯大林的囊中物”。还说了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协定 是想先发制人 阻止张伯伦建立反苏联盟，斯大林此举比张伯伦开的支票更有吸引力。斯诺写道：

“这一席话说得振振有词 毛似乎很欣赏斯大林在捉弄这总是带伞的人（指张伯伦）”（《中共杂记》小野田耕三郎都留信夫合译 未来社出版）

如果再细说斯诺的这种印象的话，那么可以推断尽管毛泽东有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觉悟，但并没有抛弃利用智者们的权谋术数编造有关世界的剧情这一“三国演义”式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是继续投影到现在的他身上吗？

192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从事湖南省的工作。今天 在长沙的清水塘 当时他的家被当作革命纪念馆保留着。1921 年冬到 1923 年春 他与妻子杨开慧住在这里 比他年轻 12 岁的刘少奇也住在这里。毛泽东是党委书记 他家兼作委员会的办事处。最初似乎是忠实执行党的路线的地方领导人，而党本身也处于开创初期。读了安源煤矿工人的回忆录才看出李立三和刘少奇也工作得很出色。尤其是刘少奇的大胆的领导人风度在工人中很有威望。

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合作后 毛泽东还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在上海和广州 可以说身处党官僚的位置 但一看位于广州的被复原了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便会感觉他的生活极为俭朴。即使在当时接触过他的人的印象中，也留下这种痕迹：他不讲究仪

表，因此受到城里长大的知识分子干部的轻视。他曾结识柳亚子，一起吟诵诗词。柳亚子在不久以后写诗把孙文和毛泽东相提并论，一齐赞扬。据说着迷麻将好像也是这个时候。也许是由于湖南口音的缘故，他对与党内官僚的交往，也有时感到厌烦。他对农村工作很积极。

毛泽东根据自己在农村“见到”的事实，确信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是农民，中国革命必须从农民的自身变革开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执笔）是其第一声。他由于发表这篇文章，既得到赞同，也受到压力。与过去曾受到积极影响的陈独秀，发生了对立，并被卷入党内斗争的旋涡之中。但是，他一接到党的命令，就领导了当年秋天的农民起义。然而，起义失败后，他毫不留恋党中央的主导权之争和理论斗争，率领不满千人的兵力，上了井冈山。如果说他造了党中央的反并不过分的话，那么也可以说他从革命实践的立场开始对中国革命展开革命性的批判。就像模仿《水浒传》实际去做的他的行为，成为党中央谴责的目标。大概因为在莫斯科学到的革命的教科书里，没有一行记载着那样的革命吧。翌年，在南昌起义的朱德、陈毅、彭德怀等汇合，兵力约达一万人，与他们共同行动到中途的周恩来，去了上海，郭沫若流亡日本。由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的工人，自不必说，在全国，共产党员被逮捕和镇压。从共产国际派来的鲍罗廷，终于离开武汉，横穿戈壁沙漠，返回苏联。毛泽东在上井冈山的途中，相继出现红军的逃亡和变节，“还不逃吗？”这句话成为早晚的寒暄语了。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井冈山到底有多大呢？它的范围相当于日本的伊豆半岛那么大，比天城山还要高四、五百米的群山连绵起伏，形成天然要塞，但是从辽阔的中国大陆来看，它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个小岛。

从中国的辽阔程度来说，井冈山是面积狭小的高原盆地；但从革命遭到绝望性的失败来说，如同在黑夜中点起了小小煤油灯。在这里，他自主地挖到并正在深挖中国革命的矿脉。

这已经不是上师范前的那种空想式的试行错误。空想式的试行错误自然在党中央方面。把共产国际，也就是说，把斯大林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产生了那样的结果。这是他们越相信革命的正统派越难避免发生的喜剧或悲剧。党的最高责任人或实力派陈独秀、向忠发、李立三、秦邦宪（博古）、陈绍禹（王明）、瞿秋白和张闻天等人，相继掌握党的主导权，又相继被打倒。最终，上海的党中央转移到瑞金。由于违背实情的冒险主义的指导，革命的基础遭到极大破坏。一种说法认为，故意安排停止来自以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生活补贴”，让党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的是毛泽东。

然而，在中共，唯有毛泽东是正确的吗？井冈山本身未能维持两年。上井冈山后的第四年，创立了以江西省瑞金为首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任主席，但可以说在第三个年头崩溃了。虽说责任在于毛泽东以外的革命路线的介入，但即使是毛泽东，也怀疑瑞金能否再坚持五年、十年。

假定他是正确的，大概就在于这样一点：在中国政治的特殊情况（因军阀割据造成国家分裂状态和因军阀相互战争形成内乱状态）下获得了开拓革命根据地这一地理上的现实性，但又并非把它看作是固定不变的，制定出流动性的游击战术。革命根据地这一不动的事物和游击战这一流动的事物，自然是矛盾的，但他没有忽视在这种矛盾交叉在一起的地方出现残余物和扬弃矛盾的东西。

如果不借助后世的历史的判断力，用同时代的肉眼去观察的话，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只是中国农民自发的，成为不堪忍受

地主和官僚的剥削与压迫，固守在山寨里的匪贼的成百上千的事例之一。毛泽东敢于借助这种传统的形式，热心干作为培育革命主体的组织者和教育者的工作。严格审查入党资格和举行入党宣誓 由被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在军队内建立党组织 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和比喻，制定出提高士兵觉悟和道德的纪律。从大的方面讲 将革命路线定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上 不言而喻，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他的意图是提高革命主体——红军的素质和壮大队伍，其成果是革命的主体得到革命性的发展，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实践的正确性得到了证明。

被毛泽东断了军粮后撤回到瑞金的党中央 在 1932 年 8 月的宁都会议上 立即对他进行报复 给他扣上“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他在 10 月以后 脱离了对红军的指挥 专心从事苏维埃政府的工作 这可能与此有关。但在党中央内部 并没有出现决定性的对立，向因自己的实践引来的批评后退一步，大概是采取与陈独秀对立时相同的处世态度。也可以认为共产国际的权威袒护撤回到上海的一帮人。然而，他遭到这种“冷遇”的结果 自然是在全党、全军面前展示出党内的两条路线 对于革命来说 当然带来了不幸的损失 但对于他来说 应该说是幸运的。放弃瑞金后 踏上“长征”的路途 在红军将士中 不满和不安情绪逐渐加深，共产国际直系派不得不向毛泽东等土著派交还一切权力。

在贵州省遵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确立了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这依然需要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的张国焘和共产国际的正式承认，但是毛泽东突破了这个。在 1934 年 10 月开始、翌年 10 月到达陕西省的“长征”中 他不仅经受住肉体的考验 而且克服了政治上的困难。在 1936 年 2 月他创作的诗词《沁园春》里 充满着他经受这种考验与困难 注视中国革命新

局面展开的气魄。当时他满 42 岁。

若是让张国焘和国民党派系的人来讲，这首词有帝王思想。据他说 童年 在长沙图书馆埋头读书以前“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 我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因此，即使帝王思想被窥视，也许并非不可思议。然而，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是用自己的知识、思想和政治技能，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公式化的积极的理想，它与个人式的消极的理想（憧憬隐居）是表里一致的，但是，唯有建“功”立“业”即统一天下 才是生活在人世上的人们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目标。这有当权者用来为自己辩护的一面，但恐怕需要考虑帝王思想本身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占有一定位置。

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也带有相当强的统治者的哲学侧面。上井冈山以来，他不仅抵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而且作为统治者，必须通过建立根据地或解放区实现对人民负责。

自 1937 年 1 月进入延安以来到 1947 年 3 月撤出为止的 9 年间，他的声望扩大到全中国，这也是对作为统治者的人格和才能的期望之声。他通过发表《论持久战》（1938 年 5 月至 6 月的讲演），预见性地分析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阶段，而且预见完全正确。这个时期他的功绩，首先应该举出的是开展整风运动，这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党员群众的联系。这场运动，既提高了组织的效率，又从道德上净化了党员的思想灵魂。像中国这样的儒教影响根深蒂固的情况 党员是通过培养“圣人”的“德”取得群众的信任，即成为政治性的行动。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把国民党卷进去，并取得了成功，这不单纯是因为政策的正确。

然而，整风运动也是批判王明的运动。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长期呆在莫斯科的王明，把他的理论作为礼物带回中

国。毛泽东通过批判教条主义这一口号，预防党在理论上的失败，把对王明的党内斗争穿插在整风运动中。通过发表《实践论》、《矛盾论》（1937年7、8月的讲演）展开自己思考的“原理”。1945年4—6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可以说是整风运动的总结，毛泽东在全党正式排除了莫斯科的权威，完全掌握了中国共产党。联想起17年前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的情况，应该说这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是划时代的事件。

但是，这里也有缺陷。把党内斗争作为道德问题来解决的整风方法，模糊了政治与伦理的界线，在党内，允许人格主义式的领导，说得不好听，是允许家长式的领导，带来了削弱党内民主的倾向。作为运动，一定的伦理由上面强制贯彻，有时会流于形式，滋生伪善。整风运动，自延安以后反复开展过几次，但主要以知识分子、艺术家、文学家为对象，他们被定为“反党”引起了他们的反抗。恐怕也不能说全都是他们个人的责任。

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虽然没有像瑞金时代那样自称国家，但事实上是一个国家。在这里，共产党员确实是支配者、当政者，他们的政治是把明天的中国放在心上。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未来的橱窗，是构成未来一部分的实体。站在那个顶点上的，是中央政治局，是毛泽东。

由于与国民党建立第二次合作，延安脱离了战线，所以困难重重，但是他把窑洞当作书房，埋头写书。可以说这是一种稳定的生活。他白天睡觉，夜里工作，是出了名的。他大概也成了固守孤独的蚕茧了。史沫特莱对1938年的毛泽东的印象做了如下记录：

“他那副阴暗而难以测度的面孔呈长型，额头宽而高，嘴是富于女性美的嘴。他也许还具有别的什么品质，但无疑是个审

美家。我确实对他身上的女性气质和那阴暗的环境产生过反感。……

“我最初在他身上强烈地感觉到那种阴森气质，后来证明，是一种精神上的卓尔不群。少数和他很熟的人喜爱他，但是他的精神内向，使他落落寡合。”

第二年，再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斯诺，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印象：

“1939年9月23日我看到毛住在一座‘现代化’的三居室的窑洞里。这所‘公寓’位于延安几华里之外的黄土岗上。我再一次注意到他那不寻常的安详，好像什么事情也不会使他烦恼。他日见宽宏大量。……

“毛的健康状况有好转，体重增加了。我问他喜欢过戎马生活还是爱坐办公室，他说他酷爱戎马生活，说他的肠胃在打长沙的战争期间（1927年—引用者）比在别的时候都要好……（斯诺《中共杂记》）

斯诺再次见到毛泽东时，他已经和江青结婚了。以前，当斯诺第一次与他见面，询问他的前半生时，在一旁热心听着的贺子珍〔1〕此时已经与毛泽东离婚，到了苏联。

江青，原来在上海是电影演员，艺名叫蓝苹。当时在上海与她见过面的人写道：“在她那身材修长的楚楚姿态里，显得有点厉害。”“以蓝苹为首的十几位女性，是国民党妇女救国会的干部。因此，敦促我谴责日本的侵略政策，为日中妇女的和平共同努力。”（西清子《被称作‘爱人’的妻子们》载《妇女公论》，1966年11月号）

在当时的集体题词上，她这样写道：

〔1〕原文为贺士贞，有误，下同——译者注

“请回国后转告中国电影工作者和中国观众 要求日本
的电影制作者不要拍摄伤害邻国、侮辱中国的电影。蓝苹，1937
年5月7日。。”

虽说是国民党的妇女救国会，但未必支持蒋介石。共产党
是非法的。当时，上海的电影界（在最近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
否定的评价），进步的和左翼的作品不少，由田汉作词、聂耳作
曲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暂定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那
些作品之一《风云儿女》的主题歌 它风靡全国。

蓝苹演出的电影是《狼山喋血记》（1936年11月完成）和《王
老五》（1937年上半年制作），在《狼山喋血记》里 她扮演猎
人的妻子。开始怕狼，甚至不让丈夫夜里外出，但是当儿子被狼
咬死后 她终于奋起 拿着棍棒 加入村民灭狼的行列。不言而喻，
狼暗示日本帝国主义，蓝苹演了人物的觉醒过程，据说得到了
好评。《王老五》似乎是卓别林电影的中国版 流浪汉王老五 因
为想抓卖国贼，反而被当作了卖国贼。她扮演令王老五神魂颠
倒的轻佻的缝纫女工。其后，她又演了集锦影片中的《中华儿
女》（1939年完成），担任的角色是遭到日军侮辱的农妇。扮
演奋起参加抗日游击队的她的丈夫的，是现在上海海燕电影制
片厂的赵丹。《中华儿女》是由重庆的国民党宣传部直属的电
影公司制作的。国民党虽然成立了电影公司，但自己不会拍电
影。雇佣上海的电影人制作，自然可以拍成这样的电影。大概
蓝苹在拍了这部电影之后便去了延安。

1937年9月 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后 进步的知识分子、学
生和艺术家陆续奔赴延安。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
学院为青年男女敞开大门。她作为那其中的学生，据说热心听
毛泽东讲课，经常提问，并把誊清的笔记送给毛泽东看，还帮
助他写书。

毛泽东说 14 岁时，按照父亲的命令，不得已有过一次封建式的婚姻，但从来没有和她同居过。1920 年与杨开慧结婚是理想的爱情故事，曾轰动一时，但她在 1930 年被军阀杀害。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后，她留在长沙，被逮捕，据说她要是公开发表启事与毛泽东离婚，即可保命，但是她拒绝了，为丈夫和革命而牺牲了。那一年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一起“长征”。听说贺子珍原来是老师，在“长征”途中，因遭轰炸，弹片飞溅，造成身体多处受伤。

1937 年访问延安的尼姆·韦尔斯，以女性的敏感，报道了在延安出现流行离婚的苗头，她又以敏锐的观察力指出，妇女才是真正的当权者。

“我到了延安，发现一件离奇的事：红军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不得不去对付三十名妇女的专政。通常，在妇女很稀罕的地方，她们总是执掌大权的。……作为苏维埃上层领导人的亲密伴侣和多年的老战友，她们又在宝座后面更确切地说是在政治局幕后，执掌着传统的大权。这几位女共产党人并不各自为政，而是一致行事，因此她们的权力就越发有分量了；无论对待大小问题，她们都是志同道合的集体。红军中只有真正有胆略的勇士才敢在大小问题上冒犯这个集体。”（《人民中国的黎明》浅野雄三翻译，新兴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有女儿和儿子，女儿在北京大学学历史。“作为技师的儿子，在地方工作，不太出名。”（斯诺《今日中国》松冈洋子翻译，筑摩书房出版）。他与杨开慧生有两个儿子，其中之一是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毛泽东没有让做特别报道。陈列在军事博物馆里的一张照片中，有一块墓碑，上面写着“毛岸英之墓”，这大概是在朝鲜。我在参观这座博物馆时（1960 年），既没有讲解员特别给予介绍，也没有特别说明的标示。它只不过作

为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的诸多照片中的一张挂在墙上而已。

与贺子珍生的儿子，据说由她（贺子珍）带到苏联去了。斯诺所说的作为技师的儿子，是指杨开慧留下的另一个儿子，还是指贺子珍的儿子，不得而知。我们无需进一步查询。

得到理想的佳人后，毛泽东似乎渐渐变得非常慈爱，而且胖了起来。在井冈山萌发的思想成熟了，并作为文字记录下来，也是这个时期。今天作为“老三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学习的《纪念白求恩》（1939年12月）《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愚公移山》（1949年6月）这三篇文章都是在延安写成的。可以说这是作为统治者完成的时期。

在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那个月，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用骨肉相残形容并不过分。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云消雾散，所以延安的人们对暗杀深表担心。然而，由于毛泽东响应了蒋介石的邀请，因此在全国民众面前显示出对和平的诚意。

这次谈判的结果，并没有带来和平。尽管美国借“调停”之名援助了国民党，但历时四年的内战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1月开进北京城接着占领南京和上海解放了中国本土。同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宣言，他就任国家主席。当时年满55岁。

就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承认了中国，翌年2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有效期为20年）。中国与苏联的蜜月开始了，毛泽东在共产主义阵营内取得了仅次于斯大林的权威。带有“毛泽东、斯大林”的叠句的歌在中国（苏联情况不知道）广为传唱。

斯大林也许是欢迎毛泽东的胜利吧。新中国刚刚成立，毛

泽东就去了苏联，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旅行。他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庆祝斯大林七十岁寿辰的大会上致辞祝贺，但似乎没有听说在莫斯科滞留期间，斯大林围绕着他的生日正式致辞答谢。友好条约的签订，花费三个月时间，苏联给予中国的贷款是 3 亿美元（计息），这与苏联从日本战败后的东北（满洲）运走高达 20 亿美元的设施相比，实在是个小数目。

斯大林优先考虑苏联的利益，作为对日本的防波堤，依靠蒋介石。1936 年，在西安发生了张学良监禁蒋介石的事件。张学良相信延安的“抗日”主张是正确的，于是发动了政变。当延安全城一片欢腾时，突然收到斯大林的电报，指示释放蒋介石。宋庆龄对斯诺讲“毛泽东知道莫斯科来了命令要释放蒋介石时，勃然大怒，捶胸顿足大骂一通。因为当时他们计划要公开审判蒋介石并着手组织西北抗日自卫政府。”（斯诺《中共杂记》）

美国的政治家和国民党的要人，都毫无顾忌地公开说，即使进入 1945 年，斯大林“也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像蒋介石那样有能力，不认为他们能统一中国”（迈纳特《北京与莫斯科》，河原田健雄翻译 时事通信社出版）

他（指斯大林——译注）进而邀请中共代表去莫斯科就战后的处理问题提出如下忠告：

——中共对国民党的武力抗争没有前途。最好解散共产党军队，参加蒋介石政权。

而且，另一方面，同蒋介石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确地讲苏联给予中国的援助是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

斯大林错误地评价了中国革命。或许应该说他错误地评价了毛泽东吧。在与蒋介石签订的条约中他得到的权益（那是帝俄时代的权益，因而应该说的不平等的），由于毛泽东不屈不挠的交涉（因为毛在莫斯科滞留三个月）不得不撤回时，他自然是

以后悔的心情得知此事的。例如，蒋承认的中国长春铁路（旧“满铁”）的权益是到 1975 年而毛泽东成功地在 1952 年彻底中止这项权益。

朝鲜战争给建国不久的中国带来了重大牺牲，但是如果斯大林想起这件事的话，似乎不能断定他对有可能超过自己的毛泽东对中国没有牵制的意图。中国把志愿军派到朝鲜，被联合国正式地打上“侵略者”的烙印。苏联不直接介入朝鲜战争，与在中国撤军后仍继续驻扎在朝鲜的美国在联合国中分享议席。中国否定联合国的意义，似乎有根深蒂固的东西。

是否介入朝鲜战争的问题，即使在中共首脑内部也有争论。据说下决心积极介入有毛泽东的决断。因而，不能把一切都归于斯大林的责任。但是，也不能说毛的决断只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利益做出的。即使看一下在 1953 年斯大林去世时他发表的文章，也找不到带有讽刺的语调。

尽管有来自斯大林的种种冷遇，但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却采取了这样的态度，这是为什么？如果研究一下建国后中国国内的政治，就可以看出中国是在全面模仿苏联。举一个小例子，中国在现用的发音表里使用了罗马字，最初就是接受苏联派遣的学术顾问的建议。毛泽东指示要采用民族形式，即按照中国习惯创作新文字。这是把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著名规定“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形式是民族的”机械地运用到语言文字领域。关于以农业合作化为主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说以苏联为教科书的意识相当牢固地占据了毛泽东的意识。

不用说，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对于建国后基础不巩固的中国来说，向国内外显示与苏联的友好互助是有利的。可以认为，把自己看作是马列主义者的毛泽东的使命感也在那里发挥了作用。而且，其使命感与毛泽东自身的传统式教养相结合，即使是

马列主义的真理，似乎也与从世界最高处流出的秩序意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对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没有表示坦率的赞同，这可能是因为在现实中背叛将至的警惕在起作用，毛泽东的秩序意识不能允许那种秩序的紊乱。这表现在体制性秩序的固定化即对于党内党中央领导机关的最年轻的人，一直是林彪对于国内将中国共产党和党员的威信摆在上位，批评只允许在不伤害这种威信的范围内进行。

苏联批判斯大林以后，由于采取了和平共处政策和自由化政策对于毛泽东来说苏联作为教科书已经不适当了。在以前效仿苏联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中，进而从中国传统的共同体意识中取出人民公社来被迫进行嫁接这反而给农业生产造成了混乱。这不也是由于抛弃以前的教科书，想自己重新写这种焦虑造成的吗？

中国与苏联的边界，是从海参崴到帕米尔高原，连绵不断，长达 1.2 万公里。1919 年 7 月，苏联废除了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如果归还根据这个条约所获得权益的宣言依然有效，那么中国应该要求的事项尚未解决。因为沿海州等相当于英国三倍的广大地域，苏联至今未还。

以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和百姓用肉眼可以看到的事实为根据制定政策是毛泽东的政治特色。土地革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与国民党的内战全部贯穿着这种现实主义。的确美帝国主义是在近邻进行侵略。然而针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在中国百姓面前进行实物展示教育就方便得多。从中国的百姓和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可以说是民族主义性质的精神风貌来看，提出足以唤起全中国人民热情的政治目标与中国共产党的势力扩大密切相关。1963 年 7 月以后与苏联公开论战也是因为有这

种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这是由于有通过论战的公开可以增强这种基础的预见。由 1965 年 11 月批判历史剧开始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 1966 年 5 月改组北京市委 8 月红卫兵登场,逐渐呈现出严峻的形势。恐怕不应忽视其前提有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

然而,那种情况不是民族主义由过去的弱国民族主义向大国民族主义的倾斜吗?我的这种担心是杞人忧天吗?毛泽东对中国的总体把握是站在“虽是大国,但是弱国”这一认识上的。如果说大国民族主义即使暴露出来也并非不可思议的话,那么不过如此。中国的革命家把弱小民族的痛苦看作是自己的痛苦,有一种切肤之感,尤其是中苏对立后,虽然攻击了苏联大国主义式的妄自尊大,但似乎偏离了周边各国和各民族民众的感觉。然而,如何与其对应,这应由各个国家的民众自主选择,这件事由中国革命的历程本身显示了出来。

关于中国百姓心中的毛泽东,斯诺做了如下概括:

“之所以认为他伟大,不仅因为他是党的领袖,而且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完全纯粹的意义上,他是教员、政治家、战略家、哲学家、桂冠诗人、民族英雄、家长,他还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者的全部。对于中国人来说,毛泽东是集孔子、老子、卢梭、马克思和释迦牟尼之大成的人物。”(斯诺《今日中国》)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让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类型自我发展到最大极限的人。想象他深夜闷坐在摆放着中国直线式家具的书斋里,独自一人孤独地冥想思索的情景,觉得好像与他最相称。诚然,他干过革命,打过仗。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与政治斗争和革命并非无缘。他之所以屡次批判知识分子,恐怕正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对容易犯的弊病和隐微的抵抗很敏感的缘故。难道他不会让自己在老庄式超越的世界

里游学吗？虽然在他的诗词里可以窥视到那种心境的一端，不过他始终不想打乱实践者的姿态。那里有他的乐天主义。

青年时代经常锻炼身体 体格健壮 他比常人稍稍宽大的肩膀 给人以猛虎之感。不过 他有一种即使在什么地方有伤也不轻易向人显示的自尊心。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史沫特莱所说的暗淡的虚无主义和中国传统上的虚无主义的联系。

1965 年 1 月，与斯诺见面的毛泽东说，他准备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这是归‘天’的意思。在出席红卫兵集会的毛泽东的脸上 看不到从那番话容易联想到的消极的影子。当然 他毕竟是人，似乎感到将自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未竟事业顺利地移交给下一代青年这种由意志、执着和兴奋构成的辉煌和少许疲劳感。

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倡学习的毛思想，某个部分砍掉了他原来思想中充沛魅力的调和式的内容，以否定的形式做了解释。从中国报纸上可以看到的对他的赞颂之词迅速膨胀。大概他已经发现自己的虚像在逐渐地超越自我、否定自我和渐渐扩大的自我矛盾吧。为了中国和中国革命，容许那种情况，对于他说 也许就是在做归‘天’的准备。

毛泽东的生涯

—— 调动八亿人民的魅力源泉

竹内 实 著
韩凤琴 译

目 录

前 言	(37)
序 章 改写中国历史的人物	(40)
第一章 湖南农民之子 (从出生至 16 岁)	(44)
1. 父与子	(44)
2. 慈母	(57)
第二章 青年毛泽东 (16 岁至 25 岁)	(64)
1. 去长沙	(64)
2. 立志当小学教员	(74)
3. 体育之研究	(80)
4. 教导毛泽东的人	(84)
5. 浪漫的青年	(88)
第三章 独立寒秋 (26 岁至 33 岁)	(99)
1. 新的生活	(99)
2. 独立寒秋	(108)
第四章 《三国志》与共产国际 (34 岁至 41 岁)	(113)
1. 把军队变成学校	(113)
2. 在井冈山	(119)
3. 失意的时代	(125)
4. 《三国志》与共产国际	(130)

第五章 作为中国革命的舵手(41岁至82岁)	(139)
1.“长征”	(140)
2. 延安	(150)
3. 孤独的革命家	(160)
末 章 平凡而伟大的教师	(171)

前 言

毛泽东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文学家和教育家等多方面的巨人。要理解他，当然要综合性地深入思考这些方面。而在这本书里，虽然涉及这些方面，但主要是对活生生的人物，即毛泽东是怎样走过他的人生历程的，尽可能的追寻探索。

我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的名字，似乎是在战败的第三年，从中国东北，当时叫“满洲”撤离的母亲口中得知的。

我出生在中国山东省，少年时代的后半时间是在中国东北，用战前的话讲，是在“满洲”度过的。战争期间来到日本。因此，我们是数年后的重逢。在说了一些话后，母亲不作声，她边模仿中国人夸奖别人时的动作（攥紧拳头，竖起大拇指）边说：“中国人讲今后是毛的天下啦。”

母亲在中国长期生活中学到的汉语自然不够标准。她交谈的对手，仅限于卖菜的、卖面包的、修鞋的、马车夫、附近饺子馆里的人等，没有身分高贵的和有教养的人。

将那种预言讲给母亲听的，大概也是那样说话的人。而且，那也不只是一个人吧。

在中国长期生活中，母亲似乎掌握了理解中国的法则，那就是中国将依百姓的预言发展，在百姓的街谈巷议中隐藏着卓越

的智慧。我也受到了那种影响。

如果说一定会那样，恐怕有点过分，但我和母亲都认为大概是那样，因为普通百姓都那么说。

在那两年后，中国诞生了新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通俗地说就是成了毛——毛泽东的天下。

我想果然如此。

后来，我又有机会教汉语，写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学和中国方面的文章。

回顾起来，在那当中关于毛泽东的内容有相当大的比重。不过，我对毛泽东理解得怎样（是否理解到将预言讲给母亲听的普通中国百姓那种程度呢？）有时感到很难为情。

不言而喻，中国不是只有毛泽东的中国。即使是我，如果未听到普通百姓对毛泽东的评价，也不会这样关心。

事看两面，这是孔子的教诲。如今已为全世界所认识的毛泽东如果没有普通中国百姓作基础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没有毛泽东，也不可能中国百姓今天的生活。

我不认为这本书写完了毛泽东的全部，也不认为写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把这本书作为我写毛泽东的正本。就算是在有限的篇幅里倾注我对中国和生活在中国的人们的无限感慨。

如果读者对中国，对生活在中国的历史和乡土里的人们给予更进一步的关心，那将是作者的最大快乐。

1972年6月5日

竹内实

关于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虽反复报道过，但每次都是误报，

唯有这次是真的。我很悲痛。

仔细想来，通过毛泽东的文章，我学到很多有关中国，有关革命，有关人的知识。而且，我是以最差的形式学的。1960年我与他握手时，他的手掌又温暖又柔软。

令人悲痛的逝世，成为我修订旧版本错误，充实最后一章“末章”和改写的机会。不过，我的心情很悲痛。

1976年9月9日

另外，关于这本书里毛泽东的词，引用了《毛泽东的诗与人生》（与武田泰淳合著 文艺春秋出版）中的译文。

序 章 改写中国历史的人物

中国这一历史舞台

中国是一个世界。

从北向西,大兴安岭、阴山山脉、阿尔泰山脉、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等巨大丛山,一个接一个隆起,形成自然的屏障,东和南,面向黄海、东海、南海,成为亚洲围墙中的一部分。从地形上看,是自身形成的地域。大约在五千年前,黄河文明出现了,拥有悠久的历史,它作为一个世界,形成了自我。

以这里为舞台,历史反复出现一治一乱(天下太平的时代与乱世的时代,统一与分裂,妥协与抗争,建设与破坏)。

在历史上登场的主人公,除汉族以外,还夹杂着满族、蒙古族和至今属于少数民族的人们,丰富多彩。对汉族来说的异民族所建立的王朝,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的全部或一部分,也被吸收同化在中国文明的长河之中。

元朝,14世纪的异族王朝,毅然扩大中国,使其同欧洲连在一起。不过,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例外,中国一直是作为一个世界自给自足。丝绸之路从公元前2世纪末到公元10世纪初,连

接东西方 把中国与东方、印度的文明连接起来 使中国文明变得丰富多彩。尽管如此 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 中国使自己固有的学术、思想和艺术得到了发展。

反复出现的王朝的兴亡 向人们灌输一种观念 即作为持续性的一个世界的中国与在这块地域上人为建立的国家有区别。

而且，它又从另一方面在默默中保证生活在这块地域上的人们 无论是谁 都有建立新国家、开创新王朝的权利。

在中国不存在神圣得连一个手指都不准碰的情况。即使有，那也是掌握权力的人为了维持权力而制造出来的。

在这种意义上 出生在中国的婴儿 与父母的地位和财产无关 是平等的。任何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随着长大成人 他们当中某个人 以中国为舞台 精力充沛地大显身手。

中国辽阔广大。

今天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总面积仅次于苏联和加拿大，是世界第三大国。即使把以狭长著称的日本同中国比较，也不成比例事。如果把中国当作 100 那么日本就是 3.88 是 26 张榻榻咪和一张榻榻咪之差。

在这个广阔地域，大肆活动的人们的规模没有不大的道理。他们希望通过建立新国家，在历史上留名；通过在历史上留名，希望自己永垂不朽。对于认为人是平等的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可怕的，只是担心在历史上如何书写。

历史——作为被书写的历史，是他们最终的审判者。在这种意义上 无论什么样的粗暴人 都应该具有历史的眼光。并不是说在眼前展开的抗争和暗斗只要取胜就行。

那么 对于他们来说 历史的眼光是指什么呢？

按大义名分来说 那是指统一天下。

中国的广阔程度，从能把整个欧洲装进这个地域里也可以知道。

然而，欧洲分成几个国家，固定化了。中国也反复发生分裂，但分裂不久又走向统一。分裂的各个政权提倡中国是一个，中国必须是一个。也就是说，无论是分裂、内乱，还是王朝的兴亡，都把中国是一个世界作为前提才成为可能。

既然是世界，就必须一切能自给自足，但事实上，中国有皇帝、乞丐、圣人、恶党、豪杰、英雄、美女、淫妇、盗贼、隐士……各种各样的人。思想学术的流派，倾向完全相反的人，也都彼此强调自己。在政治世界里，革命与反革命，哪一方都有。中国历史的有趣，恐怕来源于中国史就是世界史这一点。

中国是个大国。然而，进入近代以后，虽说是大国，但却是个弱国。那也是对自给自足过于感到自满的弊病的表现。当西方各国和日本等，用资本主义、宗教和大炮让紧闭的中国门户打开时，中国被迫认识到在自己世界的外面，还有另一个大的、包围中国的世界。

毛泽东的登场

在为虽是大国但却是弱国这种自我矛盾而苦恼的同时，中国不得不从近代走向现代。

在充满那种苦恼的中国的中部——湖南省的偏僻乡村里，出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后来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名字的毛泽东。

那一年，日本的年号是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翌年8月，

日清战争〔1〕爆发。新兴国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打败了作为‘睡狮’而令人畏惧的衰老大国清国，继而在日俄战争中又战胜了俄国，跃居亚洲强国的地位。与此相反，败给小国日本的清国，内外受辱，本来与民众中绝对多数的汉族不同的异民族清朝满洲人逐渐被高涨的革命浪潮所打倒。而且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诞生在中国大陆上。……在这种历史的大转折即将开始的前夜，这个男孩毛泽东诞生了。

他长大以后，便以日军为对手进行战斗。这并非是对甲午战争的报复。因为对于汉族来说，甲午战争的失败只不过是满洲人的失败。但是毛泽东把中国引向胜利，把同日本约 50 年间的关系转换成全新的关系。他进而领导新的革命运动，建立起新国家。

若从这种局面回顾，他的诞生就是历史的第一页。他逢生新时代，与此同时，他又开辟了新时代。从世界的人口比例来看，据说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他改变了那些人的命运。

当然，无论是谁对当时这个男孩的将来都无法预测。他的父母在他要改写中国历史的征兆虽有一点儿但尚未显示出来的时候，相继去世。他们在临终时，如果能回想起儿子——长子，那就是对他和家里不亲近表示不满。不过，大概在推测他能成为小学教员这一点上又得到了满足。

历史似乎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然而，作为一个活人，不得不根据当时、当地的迷惑和判断开辟自己的道路。究竟这个湖南农民的儿子作为一个人，他是如何迷惑、彷徨的？下面将做一些探索。

〔1〕 中日甲午战争——译者

第一章 湖南农民之子

(从出生至 16 岁)

毛泽东的幼年时期和少年时期是在旧中国度过的。生在农民家庭的他，从严厉和勤劳的父亲那里学得劳动习惯和上进心；从非常慈祥的母亲那里，学得慈悲心和忍耐。在少年毛泽东身上萌发的正义感，逐渐变成对父亲的抗拒，在通过随便读书了解世界之后，怀有必须拯救中国的理想，那尚属幼稚的东西。

当他幼年时期结束时，世界已进入 20 世纪。自那前后开始，中国的国运逐渐下降，一部分知识分子想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把清朝变为君主立宪国实现中国的近代化但这失败了高呼打倒清朝的孙文等人的革命，取得了成功。在当时的革命中，毛泽东只能扮演作为没赶上的少年的角色。在中国北方，毛泽东 7 岁时，发生了义和团事件，外国军队出兵了，但在湖南省农村，还没有外国人的身影。他依然是个真正的农民之子。

1. 父与子

无名字孩子的诞生

详细地说，毛泽东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七都韶山冲。

在湖南省 自古以来就有诗中吟咏的风光明媚的洞庭湖 而湖南省这个名称是后来才有的。在贯穿省内流入洞庭湖的三条大河中 最长的是湘江 水源发自近邻广西省。从洞庭湖沿湘江逆流而上 有省会长沙 再溯航有湘潭。现在 在长沙和湘潭之间 开通了铁路 而当时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如后来讲到的那样，九百多吨的轮船可开到湘潭。湘潭作为物资的集散地很繁荣 现在是个有大约 20 万人口的城市。

从湘潭走陆路向西北大约 45 公里有座叫韶山的山。虽然不那么高 但树木郁郁葱葱 枝繁叶茂 山上风景很美。传说古代圣人、作为中国理想的君主被称颂的舜 曾来过此地。因为把舜时的音乐叫韶乐，所以它就成了山的名字。山下有沿韶山山麓转弯 缓慢流淌的小河 面朝这条小河的村落叫韶山冲。按照湖南省的特色，韶山冲的农户也不集中，散居大约 5 公里范围内。其中一座瓦房的人家，就是毛泽东出生的家。

村里人的姓 大多数姓毛、孙、李、邹、彭、郭。面对小池塘、背靠后山的房子 也是将一座房子从正当中分成两半 住着毛家和邹家。

光绪十九年——1893 年（明治二十六年）——阴历癸巳 11 月 19 日——阳历 12 月 26 日，毛泽东出生在这座房子里。

对毛泽东幼年时的事 不大清楚。按照旧中国的习惯 孩子出生后不马上起名儿。脸黑，就叫黑儿；因体重有 7 斤（4.2 公斤）就叫七斤。据说为了不让恶魔发现孩子出生 毛泽东的乳名叫什么 没有外传。正式起名儿是上私塾时 学名经常由私塾先生给起。然而 谁叫泽东 这也没有传播。一般情况下 其他人不叫那个人的姓名 而叫字 字是自己起的。毛泽东的字叫润芝，也写润之。是什么时候起的？这也没有传出来。

毛泽东的父亲叫毛顺生，母亲叫文其美〔1〕。在中国，女子即使结了婚，也还姓原姓。父母的性格，正如传统上的说法“严父、慈母”那样，一个是严格，一个是慈爱。

毛家的先祖就没有传下来家谱，这表明他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一次也没有当过大地主。从母亲的娘家后来有人在国民党当了官和毛泽东的表哥比他先上小学这一点推测，母亲的娘家比毛家的境况要好。

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听说工农红军“长征”到达了我国西北部陕北，埃德加·斯诺便从遥远的北京去采访。斯诺在几年前作为旅行者从美国来到中国，由于被中国的魅力所吸引，他没有回国，以记者的身份开展工作。通过他的采访，才从毛泽东本人的口中弄清楚过去曾作为谜和被谣传笼罩着的成长过程。其中关于父亲，毛泽东这样讲道：

“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当时毛顺生入伍的军队，是被雇佣的一种外人部队。清朝的满洲人害怕汉人掌握武器，因此没编入军队。但这个时候汉人的部队驻扎在靠近边界的各地。而且，贫苦农民如果想迅速捞到钱，当兵领取薪水是个捷径。然而，那不是受世人尊敬的职业。

不管怎样，从先去当兵，外出挣钱这点出发的毛顺生，即使看到他后来攒钱的情况，也觉得他确实是一个具有湖南人气质的强健的男子汉。

〔1〕 应为文七妹。见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以下同——译者

养育毛泽东的湖南风土

正如在日本说县民性一样，在中国，关于各省人的气质也有各种议论。像山西人会赚钱啦，四川人善社交啦，据说当与打官司的对方住在同一间屋子时，早晚相处很好，可以一起吃饭。从大的方面分 正如南船北马 南方乘船 北方骑马 的说法那样，长江以北和以南 气候风土、生活方式、饮食、人的性格都不同。语言更不一样，虽是同一国人，有时甚至要带翻译或用英语沟通。

大体上，感到北方人身材魁梧，豪放强健；而南方人是中等身材 温和明朗。湖南人 自然属于南方人 但在中国人中间 说湖南人“不信邪”被称为骡子。所谓“不信邪”是湖南人的口头禅 遇到困难 若是其他地方的人似乎灰心时 他们就这样说 加油 大概相当于日语的“拼了！”而且 即使失败 也引以为荣地说“是自己干的”。虽然未获成功 但认为那只是力量不足 方法不当所致。那种不知挫折的努力的状态，大概被说成像骡子一样。公驴和母马交配成的骡子，一旦表现出反抗，无论怎么打，他都不服从人的命令，直到最后。这种不屈的性格才是湖南人的特点。

顽强的实干家湖南人，在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缺乏通融性。有的商主不愿雇用不会说恭维话的湖南人。据说不是现在，在人力车是湖南省省厅所在地长沙的主要交通工具时，客人要想催促人力车夫快点跑，车夫便会放下车把 瞪着客人说：“想快，你自己拉车！”总而言之 这就是所谓实际家、实干家 因过于正直而变成顽固，以致自己吃亏的类型。

擅长经商的父亲

从少年时代一直是勤奋的人，能度过别人想放弃的那种难关的毛泽东身上，大概也能看到湖南人气质。但是父亲毛顺生，确实是纯粹的湖南人气质的所有者。

“拼了！”几次喊叫。由于像骡子那样干活的缘故，在儿子泽东 10 岁时，毛顺生已拥有大约一町步〔1〕的土地。后来，他又买足大约四、五反步〔2〕的土地。湖南省一年能产三次稻子。毛顺生一年就收 84 担大米，也就是说，能收约 5 吨大米。五口人之家消费 35 担，剩下的 49 担，约 3 吨大米卖出。假设用现在我们吃的大米的价格换算，那大约为 6 万日元。

当时，在产米地区的湖南省的乡下，即使米再便宜些，也并不是把能供养七口人的大米用于消费，而是用于聚财，按照当时水平，毛顺生已进入相当富裕的行列。而且，毛顺生聚财的才能也是得天独厚的。

中国农民的梦想，一般是拥有自己的土地，并且不断增加，使自己成为地主，而毛顺生不同。他在成为一町四、五反土地的所有者后，就不再买土地，而是做起米和猪的经纪人。或许这在买进土地之前就已经着手了。早晨很早起床，地里的活让长子泽东和雇工去干，自己把从附近农民手中收购来的大米和猪运到湘潭或宁乡的城里去卖。

大概是离开故乡去当兵时的见闻使他看到了外界。他知道比起种地、收租来，不断地投资、回收资本、提高周转率的方法是聚财的捷径。而且，他还从事金融活动。在人口众多、耕地不足

〔1〕 日本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约合 9920 平方米——译者

〔2〕 日本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译者

的中国农村 地主按年度合同出租土地 在出租时 要求交保证金和先交地租。毛顺生为手头紧的农民垫付 收取利息。

这样 毛顺生的资本 在旧中国 所谓资本 只是指作为周转资金的现金 根据毛泽东对斯诺所讲的“增加到了两三千元”，“这笔财产在那个 小村子里已被认为是笔大财了”。听说他晚年留了胡子 大概是那个时候的事吧 当时 胡须是地位和财产的象征。

毛顺生的这种聚财法，不同于专门剥削佃农和长工的纯粹的地主 也许他没有成为当地农民怨恨的目标。

贫农的袭击

然而，遇到灾荒时，情况就不同了。只要把米运到城里，自然能卖出比平时高得多的价钱，这是一种投机行为，会引起没有米的贫农的怨恨。

在湖南一带，一遇到灾荒 就会发生“吃大户”。

所谓“吃大户”就是“吃有钱人” 贫民成群地涌入有钱人的农家去抢米，一般米是保存的糙米，所以要在那家捣成白米，用那家的大锅烧饭吃，而且，再涌入下一家。饥荒时，这作为一种穷人的权利得到承认，受害的那些人家，只好听天由命。

毛泽东亲口讲了他家受害情况：

“(某年)青黄不接的时候 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作‘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加重点为引用者所加）

毛泽东对斯诺说 当时没有同情父亲 可是“又觉得村民们的的方法也不对”。

看了毛泽东的谈话和文章，有时会被他的十分正直所打动，这种感想也来源于他坦率的谈话方式。当他向斯诺谈起这种回忆时，他非常像个革命家，虽然当时他可以以一颗童心说全面支持农民，但他没有那样做。

不过，从这种坦率的谈话方式里，反而可以感觉到他当时从这个事件受到了冲击。他虽然未能支持农民的掠夺行为，但他理解这样一点：即农民的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将会发挥多么大的能量啊！而且，从像少年似的正义感出发，决心不把自己摆在成为农民怨恨对象的位置上。

但是，当时的他所考虑的，恐怕是走相互妥协与和解之路。这再进一步转变，进入到促使那种能量爆发的方面，那还是很久以后的事。

在私塾里接受的《论语》和《孟子》

他从6岁起就开始干农活。与其说是开始干，莫如说是被父亲逼着干的。而且，一到8岁就上了私塾。

当时的教育机构是私塾。每月交纳学费，讲课的内容只是学习和背诵“经书”——《论语》和《孟子》等圣人的书，或面向儿童，罗列姓氏的《百家姓》和便于容易背诵的、宣讲道德规范的三字一句的《三字经》等。一旦背不下来，就用竹板片打手心。

13岁时，他离开私塾，白天干体力活，晚上帮父亲记帐。一到夏天，父亲就把饭桌拿到院子里，在月光下，教泽东和泽民两兄弟打算盘。同时，父亲要求必须能用两只手打算盘。这在中国，一般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儿童经常被看作是大人，想不到儿童的世界。

尽管如此，也不能认为少年毛泽东对被套上这种框框感到满足。有传说他曾对私塾的老师表示过反抗。然而另一方面，

主动回应那种大人的要求也是儿童表现自我价值的方法。

看来毛顺生的生活似乎很讲实际利益。每月初一、十五，他都按照中国的习惯，拿出鱼（咸鱼干）和鸡蛋给雇工吃。不过别人家里还拿出肉。可是家里人连鸡蛋都不给。顺生曾在私塾读过一两年，程度只是能记帐。送长子去私塾，目的是帮自己的忙，让孩子好好念“经书”在他讲是很少见的，然而他并不是让孩子成为“圣人”，只是出于在打官司时由于对方引用了圣人的话，致使自己不得不失败这种痛苦经历。

而且，他像是急性子，经常打儿子。

毛泽东离开私塾，一直在家，大概忍受不了父亲的这种暴政，他发现了有效的抵抗方法，那就是引用“经书”同父亲争辩这一有力的论理方法。

“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

毛泽东引用“父慈子孝”这句话（这出自《礼记》中的礼运篇）因为“父慈”写在“子孝”前面，所以父亲首先应该仁慈。

“他指摘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对父亲的反抗

父亲嘴碎，有一天因此失败了。父亲在设酒席宴请许多客人时，当着客人面说儿子“又馋又懒”，按照注重面子的中国传统习惯，这是特别应该慎重的行为。即使对方是长工，如果受到那种侮辱的长工反过来骂主人时，社会上的人们还是护着长工。毛顺生认为反正是自己儿子，也许是无意中说出来的。

毛泽东很气愤，他反驳说，自己从幼年时起就像大人一样干

活 为什么说我“懒”？ 我又不吃肉、鱼和鸡蛋 为什么说我“馋”？ 说完就跑出家门。因受到讽刺而自杀的例子也不少。在弱者（尤其是妇女 彻底受到虐待的中国 作为弱者对强者的抗议 就是自杀。母亲很担心。“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起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

毛泽东家的前面有池塘，在池塘的正中央有一条小道。毛泽东站在小道上，说如果父亲再走近一步，他就往两边的池塘里跳，以死了结。实际上，父亲相当气愤，看那个架式，估计要挨打。于是“开始讲和”毛泽东后来十分幽默地说 父亲提出用旧中国的认错方法——双膝跪下，上半身前倾，让前额碰到地面，即叩头作为条件。“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 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

——客人回去了，他被母亲带回家里。父亲横躺在屋里的床上。母亲拉着他，一进屋，就说给父亲跪下！不过，他只跪下了一条腿。母亲用手使劲按住他的肩，让他双膝跪下。……

大概父亲在众多客人面前被儿子羞辱的冲击很大。也许是母亲体谅他的心情，让泽东再跪下一条腿，以此表示失败。

从这件事毛泽东得出一个教训。他悟出，如果自己反抗，父亲就软下来；可是如果温顺驯服，反而打骂更厉害，与父亲发生冲突，自然成了自己的选择。

从重“孝”这一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来说，毛泽东对斯诺讲的心里话，一般旧中国的上层人物是不讲的。

因此，听说在台湾的研究家中，有人以毛泽东自己的话为证据，认为这种“对父母不孝者”以成为山贼和叛逆者度过一生。还有，听说在欧洲出版的毛泽东传中，有分析认为由于少年时期毛泽东受到父亲严厉的惩罚，所以形成了后来的叛逆性格。

然而，在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中，孩子挨父亲打，同时又得到

母亲安慰，因此不会走向反面。在毛泽东对斯诺讲的回忆里，显露出他充满幽默的怀念。就是说，毛泽东按照当时中国人的一般观念，接受极普通的抚养方式，如果说由于受到父亲的这种管教，使他成为革命家，那么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度过与毛泽东同样的人生。

连名字都不知道的第一个妻子

在毛泽东 25 岁，从第一师范毕业的第二年，即 1919 年，母亲文七妹去世。有一张照片是，毛泽东左胳膊上带着黑纱，照片上还有父亲、伯父和弟弟毛泽覃。那个黑纱恐怕就是为母亲奔丧的标志，弟弟毛泽民没有照。这大概是母亲去世不久，弟弟泽覃依靠哥哥去长沙时的照片，父亲和伯父是送泽覃时顺便照的。

可能是因为母亲去世很悲伤的缘故吧，毛泽东的脸歪扭着。由于妻子先走了，也许是心理作用，毛顺生显出很颓丧的样子。

在第二年的 1 月，毛顺生也去世了。死因是霍乱，时年 50 岁。母亲去世时，毛泽东写了《祭母文》表示哀悼，但父亲去世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悲伤。

在毛顺生临终的病床前，不是会有长子泽东的媳妇、现在连她姓名都没流传下来的女性吗？

毛顺生在长子 14 岁时按照当时的一般想法给他娶了一个妙龄有点过了的 20 岁的女子。关于她的情况，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讲：“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不认为是结婚的对象。

按照旧中国的习惯，把幼女、少女当作卖身钱买卖，作为女佣人使用后，如果儿子长大了，就娶为妻，这叫童养媳。从毛泽东当时的年龄和那个女子年龄太大这一点来看，可以推断这个媳妇不是童养媳。从结婚仪式的第二天起，她就下地干活了。

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的第二年，在长沙发生了讨厌父母

包办婚姻的新娘在花轿里自杀的事件。他立刻在长沙的报纸《大公报》上发表反对封建婚姻的文章。

当时中国的年青一代、学生们有不少人被封建式的婚姻所束缚，很苦恼，然而那又转化成为从自身出发寻求新的思想和社会的巨大能量。毛泽东也是受到过旧礼教的创伤，因此寻求新事物的年青一代之一。

通过父亲了解农民

毛泽东对斯诺谈起父亲的事时，说父亲当初是“中农”，后来变成了“富农”。“中农”啦，“富农”啦，这是中国共产党把农民分类时的用语，如果是一个错误的话，那是因为它影响到土地的分配和社会的权利，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把它用在实际的父亲身上讲给你听，深感毛泽东的幽默。

毛泽东没有说，但是如果在父亲把土地买回来前就采用这种分类的话，父亲就会成为“贫农”。而且，如果晚年自己不劳动的话，这就是“地主”。大概再活 10 年，他肯定会那样。

在父亲的一生中，大致经历了中国农民的各个阶级。逐渐变得富裕起来的父亲，对毛泽东会没有影响吗？

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奉父之命去催促借款时，由于那个农民太穷了，他就脱下自己穿着的上衣给农民留下，像这类故事有一些传闻。就是说，与其说是被同情，莫如说是属于同情别的人。几代人一直受虐待的农民，没有那种对地主和社会所怀有的怨恨和复仇心。

再有，由于他没有生在一直是残酷剥削农民的大地主家庭，他可以不受那种因为生在那样的家庭，在唤起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中容易产生的罪恶意识所折磨。也没有染上贪图安逸和兴趣的生活态度。不过，他对农村十分了解。

大概由于这种经历，毛泽东后来能够客观地看待农民和农民出身的士兵的缺点，虽然同情，但又能不放任自流而加以批评。

兄弟三人离家之后，毛家变得怎样了呢？因为在中国，父母的财产由兄弟均分继承，所以现金可能由负责记帐的泽民带到长沙，作为兄弟三人的革命活动资金。房子和土地，大概由照片上的伯父保管。在大家族主义的中国，这是最普遍的做法。如果毛氏兄弟转业回农村时，永远保留着一条可以作为农民来生活的道路。

从父亲那里学到的对体力劳动的信念

毛泽东作为长子，感到对家庭有一种责任感。他勤劳、忠实地做父亲交给的工作。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对父亲的聚财方法产生疑问，开始不接受父亲对自己的要求。尤其是封建式包办婚姻，成为他离家的弹跳力。

然而，从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东西也很多。招致家人不满的严厉；并非来自宗教式禁欲的节俭；贯穿整个人生的勤奋、实践能力；强烈的进取心，但不关心空洞的理论以及兴趣爱好和收集艺术品等。这些使毛泽东的体格高大健壮，同时形成了毛泽东性格的核心。

特别是父亲，以他干活的样子作示范，用申斥和殴打让他养成体力劳动的习惯，给毛泽东灌输了一个无条件的信念。那就是人应该干体力劳动；如果干体力劳动，就一定会有收获；体力劳动决不辜负人类这些信念。这正是他抗拒并反抗过的父亲留给他的最大遗产。

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43岁时，毛泽东在陕西省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后来，讲义被整理成小册子，起名《实践

论》。虽然是以苏联的哲学教科书为材料，但贯穿在整个文章的，是对体力劳动的乐观信仰。

只要努力 只要从现实中学习 即使失败 遭挫折 最后也一定会成功。胜利，这是他当时的根本思想，并且后来也没有变。这种思想，在那些有过自己的勤奋被辜负了的经验的人头脑里，大概不可能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人越劳动越会被其劳动成果所异化，而毛泽东没有在工厂劳动过，也就没有引出这种思维方式的经验。而且，恩格斯从那里考察历史中的人，指出由人的行为产生的实际结果与不主动或主动的结果截然不同这一思维方式 更与毛泽东无缘。

另外，在指挥红军时所看到的，以及后来作为解放军的军事原则被记载当中，从“……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工作方法）”这类毛泽东对连续的体力劳动的赞美方式里，似乎感到他憎恶那种什么都不干的作风，向我们传播了父亲让他记帐，让他下地干活的做法。

作为长子的责任感

可以认为，少年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长子。中国的儿童若是小大人的话，他是小父亲，自然指挥弟弟，他把两个弟弟引进革命运动中。

另外，这种家长式支配也波及到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国，他努力从道德上提高党员和民众的水平，把克服社会和整个世界的缺陷作为自己的责任。

幼少年时代的他 大概具有后来表现出的那种性格的萌芽。而且，常常难以忍受与年龄不符的束缚，反复与父亲爆发冲突。当时 他拼命地顶撞父亲。正因为如此 他经常回忆起父亲。

2. 慈母

继承母亲的性格

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娘家，住在湘乡县四都唐家坵。虽然不在同一个县，但韶山冲所属的七都和这个四都离得很近，按照旧中国的结婚习俗，若有人来提亲，父母赞成，遵照父母之命就可以出嫁。作为农家主妇 她生儿育女、做饭、劈柴、纺线、裁衣、洗涮……干所有家务事。听说人们常谈论她内助的功劳。在中国 当称赞家庭主妇时 就说“贤妻良母”。她正是适合这句话的女性。

据毛泽东少年时代的朋友、诗人萧三说，毛泽东非常想念母亲。他对母亲，总是很温和，照顾很周到。而且说母亲的一切美德都给毛泽东以很大影响。

关于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有一些他慈悲为怀行善事的传说。听说当秋收晒稻子时，突然下起雨来。毛泽东不顾自家的稻子被淋，去帮助佃户家收稻子。父亲训斥他，他回答说，那家人很穷，还要交地租，损失一点儿可不得了，而我家没有太大关系。还有一些类似的传说。

关于所谓伟人的幼少年时代，经常也听到这样的传说，但他的这种行为是受到母亲的影响，似乎是事实。

关于母亲 毛泽东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 为人慷慨厚道 随时愿意接济别人。”穷人在荒年来讨饭时 她常常给他们饭吃。然而，由于丈夫毛顺生不赞成施舍，所以如果丈夫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即使背着她施舍，恐怕最终还会被发觉。毛泽东说：“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受虐待的中国女性想出这种策略：夫妻一吵架，就跑到屋外，这时邻居们聚拢而来，像是支持她似的，大声骂她的丈夫。这里的口角恐怕也是那种吧。韶山冲的农民住得很分散，但至少邻居邹家的人，定会跑到院里来，形成公平的舆论。

母亲表现的“中国人的做法”

对文七妹来说，这种慈善行为是属于宗教性的。毛顺生之所以反对施舍，一般认为，虽然是他吝啬，但主要还是因为他反对那种信仰，因此在这件事上，温和的文七妹不让步，以至发生口角。而且，毛顺生没有信仰，并非因为反对宗教，大概是因为那与实际利益无关。

据说文七妹很虔诚地信“佛”，在毛泽东对斯诺讲时，翻译只不过译成通俗易懂的“佛”。在旧中国，一般群众，特别是妇女，与其说拜释迦牟尼，不如说是拜观音菩萨、道教的神、玉皇大帝和去土地庙烧香拜神什么的。譬如拜娘娘这种神等，是很普通的。

一般认为，文七妹的信佛，也是像大发慈悲、积德、不说别人坏话这类与道教相混合的民间性行为。虽然她不懂佛教中的哪宗哪派这种严格的教义，但在虔诚这一点上，对孩子们有影响。

孩子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很难过。毛泽东 9 岁时，曾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父亲不信佛的问题，有好几次和母亲一起想开导他信佛，但失败了。后来，他在催收款途中，遇到一只老虎。老虎慌忙逃跑了，但毛顺生想这不是神佛的保佑吗？于是有时也烧些香。多亏神佛才出现了这种奇迹，如果不感谢神佛，今后还将受到更大的惩罚，这就是一般民众的信仰。毛顺生也许是被妻子和儿子唬吓的。

有勤劳致富能力的毛顺生和勤俭持家的文七妹夫妇，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是令人羡慕的结合。不过，在固执并且注重实际

利益的毛顺生的支配下，不知她是否幸福。

后来，毛泽东举出统治封建中国的四种权力：（一）国家；（二）宗族——大家族制下面的家长统治；（三）神——民间的迷信信仰。此外，听说女性还要受（四）男子——夫权的统治。文七妹的确是处于夫权的统治下。

毛泽东伴随着成长，越发支持母亲。因此，在毛家开始展开一种斗争。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

但是，这种斗争除了毛泽东的反抗偶尔爆发外，似乎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展开。在那个“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如此使用政治用语，与前述相同，是毛泽东的幽默，似乎是规戒儿子。

“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对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就是说，即使挨父亲打骂，也永远不许噘嘴和顶撞。虽说如此，也并不是支持丈夫。从毛泽东的话里可以看出，她用她掌握的忍耐横暴的夫权的方法规劝儿子，告诉他们“那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我更想听她（是个劳动者，但又是没文化的农家主妇）所考虑的“中国人的做法”，但遗憾的是，毛泽东关于母亲的话题没有再往下讲。

这恐怕应该说是消极抵抗吧。所谓消极抵抗，若从她的性格来推断，可以认为是相当长的时间的冷静忍耐，而支撑它的，是由天性和信仰所建立起来的慈悲的观念。那里没有在长期忍耐之后伺机给对方以打击的报复心。

母亲的训戒对毛泽东的影响，可以从他在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和继而在长沙的驻省湘乡中学的生活态度里看出。

离家并接触激烈动荡的社会

毛泽东在 16 岁时，进入东山高等小学堂。进入母亲娘家湘乡县小学校的表哥向他讲了那里的生活。按照父亲的命令，打算去湘潭米店当学徒的毛泽东，改变了主意。他想如果上小学，就能接触到《盛世危言》一书中介绍的新的文明，于是变得迫不及待了。

离开私塾后毛泽东读了《盛世危言》他深深地被这本书所吸引。介绍西方的这本书，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书中指出中国的弱点是没有铁路、电话、电信、议会。他读了这本书后又想学习了并且讨厌农活了。虽然毛泽东在私塾里从藏在“经书”下面看得入迷的通俗读物《隋唐演义》、《岳飞传》、《水浒传》、《三国志》（指《三国志演义》）和《西游记》等书里吸取很多教训但在《盛世危言》这本书里却呈现出与那些书完全不同的新世界。

被《盛世危言》震撼的毛泽东在入小学堂之前曾与父亲吵架，离家出走。他住在已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或毛家族中的一位只身老“秀才”的私塾里埋头读书。大概因为他们那里没有多少可读的书，所以毛泽东又回家了。

在离家又回家期间，毛泽东碰上一些印象深刻的外界事件。虽然不是出于自己的愿望，但“结婚”也是这一不稳定时期的一件事。

首先，在长沙城内发生了几千人的暴动事件，强烈地刺激了这个年幼少年的灵魂。

1906 年（明治三十九年）毛泽东 13 岁受饥荒折磨、对清朝官吏的高压态度十分气愤的民众，火烧衙门，赶走中央派来的地方官吏巡抚。由长沙逃到农村来的米商们，从老“秀才”的私塾门外通过。清政府开始镇压，被逮捕的许多领导人，被斩首示

众，他们的头挂在旗杆上。对于这种处刑，毛泽东非常气愤。

其次，是韶山冲的小学教师给他的影响。从“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这种当时的流行思想出发，这位教师反对佛教，劝告人们把寺庙改成学校。

比这些事件更甚的，也许是读了一本政治小册子几乎决定了他的一生。

书名为《论中国被列强分割的危险》的小册子，谈到日本占领朝鲜和台湾；中国丧失现在的越南和缅甸（当时这些地区归属大清帝国）。小册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始终记得开头的一句：“呜呼 中国其将亡矣！”开始意识到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大概可以说少年毛泽东正在立志。虽然这种外界的事情令他心动，但之所以即便是暂时的，他也想要见习米店的生意，或许是因为在两年前被确定为他的媳妇的女人来到他家，为他长期离家出走提供了方便。

然而，现在他的决心很坚定。

起初父亲反对。直到在那不久，他事先暗中托付亲戚给父亲做工作，说离开私塾，如果通过几级科举这种国家考试，就可以当官。当了官，就可以得到地位、财产和名誉。然而，从这座小学堂——也就是小学校 即使毕业了 也不具备上述社会发展过程。由于亲戚劝导说“学校”可以增强赚钱的本领，所以毛顺生才勉强寄出 1400 个铜板 作为 5 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

带乡下样儿的年长新生

在这所小学校里 他的年龄比其他儿童大很多。而且 穿着确实带乡下样儿。进而，他听说入学资格之一是湘乡人，在得知并非那种情况之前，他一直谎称自己是湘乡人。

湘乡县又分上里、中里、下里。孩子们在小学学校里 按照各

自的出生地 成立小团体 彼此势不两立 得知毛泽东是湘潭人，不让加入任何小团体 他很孤立。后来他回忆说：“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尽管如此 他在这个集体宿舍里呆了一年。

随后他上了长沙的中学，那是为湘乡人办的。他所住的宿舍 是湘乡人的联络机关“湘乡会馆”。说“我”时，一般人叫“我”〔WOU〕而湘乡人的发音是“我”〔NGa〕。作为湘潭人的毛泽东，由于不会发这个音，所以很快被辨认出来。他一边在那种环境下生活，一边上中学读书。而且 在这种环境中 他没有生气或和谁吵架这种形迹。非但如此 还得到两位朋友 并且后来一直在交往。

这两个人是萧瑜和萧三两兄弟，哥哥现在在南美的蒙得维的亚 弟弟在北京。虽然思想立场不同 但这两个兄弟后来都写了毛泽东的传记。

倘若再进一步看一下其后毛泽东的政治处境，则会发现有一个应该说是这位母亲遗传的消极抵抗的忍耐期间。这就是 35 岁以后在江西苏区从事活动的一段时期，50 岁初为回避国共内战与蒋介石谈判的时期，65 岁以后到 70 岁初 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段时期。

但是 在这种政治环境中 忍耐的性格即便发生变化也是迫不得已。那种忍耐，既不受复仇心所支配，也不受慈悲心所支配 这已经很清楚。这不正是他在接受母亲的训戒“中国人的做法”里进而又“嫁接”了什么吗？

然而，也不能说母亲的怜悯心重的性格完全不存在于毛泽东的政治生活中。他对俘虏、值勤战士或对士兵、农民所给予的怜悯之心也有一些传说。一般认为这有塑造领袖形象的一面，但即便他本身有追求政治效果的考虑，也不能全面否定流露在那当中的自然的感情。

毛泽东出生时，祖父还在世。大概在祖父的堂兄什么人中，有一位在“科举”的第一阶段合格，具有“秀才”称号的毛麓钟。这位乡村“秀才”，既经常办私塾，又被大地主家雇用为家庭教师。一段时间毛泽东跟着他学习了古典。在毛泽东的亲戚中，有学问的就是毛麓钟那样的人。这又说明在毛泽东家族中，至少有三代是彻头彻尾的农民。祖父又能抱另一个孙子了。他就是 1897 年出生，比泽东小 4 岁的泽民。

弟弟毛泽民，与哥哥相比，似乎更顺从父亲。他小学一毕业，就在家帮父亲干活。

后来，比泽民小 8 岁的最小弟弟泽覃出生了。毛泽东只有这两个弟弟。此外，堂妹毛泽建在她父母去世后，也被接来，由毛泽东的母亲抚养，毛泽东叫她“妹妹”。

第二章 青年毛泽东

(16 岁至 25 岁)

少年时期结束时 毛泽东总算脱离了农村 能够接触中国和世界的一部分。

辛亥革命告诉他新时代开始了，但是应该如何在那个时代中生活，他还心中无数。总算升入师范学校，将未来的目标定为小学教员，在这个时期表现明显的狂热的浪漫主义，同他在这个时期结束时确立的使命感合为一体，从师范学校一毕业，就开始热心从事青年运动和驱逐军阀运动。其最终目标尚不明确，支撑他的，若再重复一下的话，就是狂热的浪漫主义。然而另一方面，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哲学原型。

中国反复爆发军阀内战，新的共和国的基础还不稳固。但是，五四运动的巨浪已把新思想和新人才送上舞台。毛泽东也成了受到这种巨浪冲洗的青年一代之中。

1. 去长沙

在小学堂学到的日本歌

1910 年(明治四十三年)已是 16 岁的毛泽东上了湘乡县立

东山高等小学堂。有生以来第一次到离家 25 公里以外的地方，这意味着他迈出了新的人生第一步。

在当时的中国，能上小学念书唯有那些幸运的孩子。旨在推广新文化、由地方实力派发起而设立的这所小学校，与私塾不同，开设了体操、图画、音乐、算术、理科等这些新颖的课程。特意从日本聘请日本教师通过翻译讲授这些课程。

他住进集体宿舍。熟知《三国志》和《水浒传》里的英雄们的他，立刻成了班上的红人。有时，他还对历史教师说的那类书上写的都是虚构的这一点很气愤，抓住不放。在学科当中，他擅长作文。

在这所小学堂，毛泽东第一次知道日本这个国家。那时，中国的小学生对日本的印象是战胜大国俄国的国家。

在东山小学堂，有一位剪掉辫子、戴假辫子的教师。所谓辫子，就是剃掉头部周围的头发，将中间部分留得很长，像现在的女人发辫那样编起来。这是满洲人的风俗，是灭掉明朝的清朝强制汉人的措施。

到了这个时候，具有反对清朝思想的知识分子，去日本留学时等，下决心剪掉它。但其中也有人让公寓的女服务员用假发打扮一番。可是，一回到中国，如果没有辫子，就认为具有革命思想，遭到冷眼，在国内的保守空气中，会被作为奇怪的人来对待，不得已还要戴假发。

这位教师也怕因为没有辫子而不被学生喜欢（毛泽东当时还留着辫子）喜欢听教师讲日本的情况。那位教师教音乐和英语，教了一首名叫《黄海之战》的日本歌。

毛泽东对斯诺讲：

“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动人的歌词：

麻雀歌唱，
夜莺跳舞，
春天里绿色的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
杨柳叶绿，
展现一幅新图画。”

大概这是一首原谱另填词新的歌，原歌是《勇敢的水兵》。另填的新的汉语歌词，虽然不能准确理解，但从斯诺的译词来估计，觉得可以用《勇敢的水兵》这首歌的曲子来唱。日俄战争时，并没有黄海之战，对这件事斯诺和毛泽东都没有察觉，不由得令人发笑。而日清战争初期，在位于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黄海则有海战。当时，遭清国军舰的炮弹而负伤的日本水兵，祈祷敌人清国军舰沉没而后身亡，这个故事变成了《勇敢的水兵》的歌词。如果原封不动用这首歌词，感到不合适，所以教师就把这个作为日本战胜俄国时的歌曲教了。

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即使在延安的八路军中间，也曾经同样唱过另填新词的日本歌。《我喜欢军人》和军歌《步兵的本领》的曲子被重新填了歌词，流行起来。

总之，似乎毛泽东喜欢这首歌。“我当时从这首歌里了解到并且感觉到日本的美，也感觉到一些日本的骄傲和强大。”

而且毛泽东在对斯诺讲述这段回忆时，正是 1936 年（昭和十一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这个傀儡国家的第 4 年，也是进而又把手伸到绥远省和河北省之时，所以他没有忘记加上下面的话：“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日本。”

第一次去城市长沙

在小学堂读了一年后，他想去长沙。在长沙，有湘乡县开办的中学——湘乡中学。

作为小学生，他的年龄太大，“经书”又比其他孩子读得好，所以小学堂的老师也赞成他上中学。尽管如此，因为这所中学是为湘乡人办的，可能会被拒绝入学，他提心吊胆地去了长沙。当时也许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自那以后便开始了十年的长沙生活。

毛泽东虽然没有讲，但是长沙对于他来说是第一个城市，又是当时可以接触到外国文明的为数不多的大城市。他必定感到一切都很新鲜。而且，在湘乡，他与使自己的梦想展翅飞翔的日本的关系相当密切。

长沙从毛泽东离家六年前的 1904 年（明治三十七年）7 月开始，变成允许外国船只停泊的通商港口，到那年年底的半年时间里，在长沙有 35 艘英国船、38 艘日本船、45 艘中国船入港。预见到这种情况，在日本，涉泽荣一、安田善次郎、大仓喜八郎等财阀于两年前得到政府的补助，成立了湖南轮船公司，并在长沙的湘江江岸建起公司的码头。湘江丸、沅江丸（均是 930 吨）从长沙成为通商港口的四个月前就开通了汉口至湘潭之间的定期航线。还有人作为中国学校的教师被聘用，从遥远的日本前来赴任。

好像与这种形势相呼应似的，当时在日本出版了名为《湖南》这一 700 多页的大书（安井正太郎编著，博文馆，明治三十八出版）。这本书是在发生饥荒暴动的前一年出版的，当时毛泽东还在故乡干农活。可以认为他不久后来到了长沙映入眼帘的景色，与这本书里所介绍的仿佛没有变化。

“长沙府约有 50 万人口 是湖南省的首府 也是公布政令的地方，巡抚以下的大官驻在这里，是物资商品的大集散地。长沙府距岳州约 150 里 位于湘江东岸 江边约 2 里半处有市街。市街为长方形，周围约 15 里，用砖筑的城墙围着。城墙上大约每隔 20 间房屋那么远的距离，就有一哨位，并配有旧式大炮。城墙装有 8 扇门 每天从点灯时分起到日出为止，大门紧闭，城内与城外禁止通行。唯有大西门，自长沙成为通商港后，船舶出入变得频繁起来。因此，根据特殊需要 晚上 10 点关门。

市街规模大 很繁华。这里没有受到长发贼之乱（指太平天国）损害。最繁华的是……（以下省略街名）……等，盐商、茶店、货币兑换商、书店、绸缎庄、妇女用品杂货店、伞店、银工艺品店、鞋店等很多。道路只有两三间房子那么宽，十分狭窄 由于两层楼的房子很少 与其他城市的街道相比 空气流通好 光线不暗。道路都铺有石板，下面设有下水道。街上 有抬轿子的 有挑担子的 有推小车的 还有卖鱼和鸟肉的摊位，留声机的店铺等。摩肩接踵，车水马龙 非常热闹 大体上是清洁的 无臭味。城外不如城里繁华 户数约是城里的八分之一。河岸上桅杆林立。（原文是文言文）

对日本的关心弥漫湖南

湖南省原本排外激烈 当感觉到时代变了时 就一转变成热心于引进新的文明制度。长沙设有大小三十余所“学校”，如前所述，日本教师也不少。赴日留学生也比其他省多，公费、自费加在一起 当时 明治三十八年前后 已达 600 人。这种潮流 与

日清战争以后中国的一般潮流并非无缘。

由于日本在日清战争中战胜了清国，所以以前说日本是小国，在模仿中国文化的庸俗见解崩溃了，想获取关于新兴日本的知识，想学习使日本弃旧图新的明治维新这种关心迅速高涨。

因此许多中国人赴日留学，在日本只要学习半年左右就给予毕业证书的学校乱立。关于日本方面的知识，就通过这些留学生迅速传到中国。

不过，他们把日本作为窗口学习新的文明和西方文明，但对日本本身给予关心的是少数。另外，当时的日本人方面，几乎也都把战败国家——清国和向日本寻求起死回生道路的民族——汉民族混淆了。而且，由于偏见和蔑视，把难得的民众相识的机会反而变成了促使他们抱有排日情绪而回国。

然而，毛泽东当时生活在长沙还不错。以长沙为中心，湖南省对日本非常关心，气候风土也很相似，据说把湖南省称为“小日本”，说“像鹿儿岛”。演讲时，还有的知识分子把西乡隆盛引作例证。

卷入辛亥革命的旋涡中

毛泽东好不容易上了中学，但他的学生生活只持续三、四个月。新学年在八、九月开学，但不久爆发革命，他参加了革命军。

1911年——是在中国成为最后一个年号的宣统三年，而且，在日本，也是明治在翌年宣告结束的明治四十四年——10月10日夜，驻守在湖北省武昌的“新军”——采用西洋式武器装备和编制的军队，发生叛乱。起初是40个人左右，但参加者陆续增加，到次日上午，完全占领武昌。

叛军虽然计划进攻中国各地，最后占领全中国，但没有那个必要。大部分地方给以呼应，各省宣布独立，统一天下已成定

局。1912年1月1日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孙文被推戴为临时大总统，首都是南京。取 1911 年的天干地支，当时的革命称为“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之后，隶属于起义军的革命家来到毛泽东的中学，经校长允许后，进行激烈的演说。当时长沙尚有清朝的地方长官——巡抚在，正在实施戒严令，所以演说会场充满紧张气氛。那位革命家的演说一结束，几个学生兴奋得跳了起来，表示支持演说。

四、五天后，毛泽东决心去武昌，参加革命军。他动员同班同学，筹措旅费，找到几名同行者。然而，当他去驻扎在长沙郊外的新军的朋友家借雨鞋时，门卫士兵不让他进军营。这里也开始造反了。

毛泽东立刻返回城里。城门紧闭，但没上锁。他决定站在城里的高处，观看不久即将开始的革命场面。

新军从小吴门入城。一齐射击后，一支部队去兵工厂，剩下的人把巡抚的官署作为目标。卫兵没有抵抗，不久，官署升起了大白旗。“汉”这个字，被用浓墨大大地写在旗的正中央。毛泽东不知道这个字是投降的巡抚被士兵们硬逼着写的。

在他远眺的过程中，各学校、官署、商店相继挂起了大小的白旗。一回到中学，看到校门上也挂起了白旗，有几名士兵旁立。下午，湖南省的秘密结社哥老会的两名首领被推举为湖南的都督和副都督。

——所谓革命，果然就是这么容易吗？

萧三在记录了毛泽东眺望的景色之后，加上了这句话。也许是在毛泽东对他讲了之后又用一句话描述了当时的感想。

因为清朝并非被推翻 所以援助武汉（武昌、汉口、汉阳这三座城市隔着长江，挨得很近，是统称）的活动在长沙开始。学生

们组织学生军，但毛泽东未参加，而是入伍参加了正规军。后来他解释说学生军基础不牢，可能他当时打算成为一名真正的为革命献身的军人。

军饷每月 7 元，其中伙食费用去 2 元 剩下的饷银 用来买报纸，贪读不厌。一字不漏地读报习惯，就是从上湘乡中学时开始的，渐渐不能自拔。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很久，即使在作战中骑在马背上，也没有停止读报。他还要用军饷的一部分去买水。因为学生出身的他，认为与其他士兵一样去挑水是不体面的。

当时，一般社会上的人 所谓‘识字的’‘懂文字的人’都是了不起的人。因此，中学生的社会地位非常高。学生之所以组织学生军，也是认为自己与工农出身的士兵不同这样一种特权意识的表现。因水质好而出名的井，在长沙有两三处，士兵们可以到城外的名叫白沙井的井里去打水。毛泽东与没有文化的士兵的关系也很亲密 而地痞出身的士兵 同他相比 逊人一等。

对未来犹豫的青年

孙文的临时政府很弱。清朝实力人物袁世凯，出马让宣统皇帝退位。作为补偿，从孙文手中夺得大总统地位。南京政府解散。毛泽东离开军队。他以为“革命已经结束”。……湖南新当选不久的正副都督也被暗杀，由反动的家伙代替。

像是劝说自己不能再犹豫似的，直到确定自己当教师最合适为止 他在离开军队一年半的时间里 继续看广告，一直在动摇 警察学校、制造肥皂的学校、法律学校、商业学校……。一读到能带来辉煌前途的新设学校的广告 他立刻就交报名费 登上自己的名字。实际上 他上了两所学校。后来 他对斯诺讲：“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

以后 他决定在图书馆自学自修 并制定了计划。据说毛泽

东曾对萧三讲述过当时自己贪婪读书的情况 他说：“一到了图书馆 就像牛进了菜园。”

不久，他决定上师范学校。可以认为不交宿舍的膳宿费和学费这一点 即使不是最大的理由 也是相当重要的。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想从事赚钱的职业，对于他这一点表示厌烦的父亲，不再给他寄钱。把能够提供最需要的膳宿说成最适合自己，这大概是为自我选择找理由吧。

神秘的体验

毛泽东在这个不稳定时期，经历了神秘的体验。在离开军队后的某一天，他一面充满忧虑，一面漫步在长沙城里时，来到了耸立在靠近南门的城墙上的天心阁前。他登了上去。看到了流经城墙外的湘江，在它的对面，岳麓山高高耸立。在与岳麓山相连的山脉尽头，看到中国五座名山之一的南岳。放眼市街，俯瞰重叠的屋脊时，他突然产生一种灵感：现在自己处于多么高的境地呀！

环绕长沙市街的城墙，如果放在平面图上，好像有几个“匚”字形的突出部分，与南京和北京的直线墙面不同，显得奇形怪状。城墙很高，城里的繁华景象从外面简直看不到。如今在照片上看到的当时的天心阁，位于城墙的东南或东北角，在城墙上进而又加了一个高的基础层，成为两层楼阁。正下方是郊外荒凉的原野，在埋着死者棺材的坟头起伏之间，立有标记性的碑石。其背景，仅仅是一片辽阔的天空。天心阁的屋檐，没有漏掉中国南方建筑物的特色，仿佛要刺破天空似的，向上翘着。

站在天心阁的最高处，毛泽东感到自己的位置比所有人都高，即使这样想，也未必是夸大妄想。或许在屋檐下，挂一钟形的铃，被顺着岳麓山吹下来，经湘江过来的风吹响，那恐怕更使

他年轻的灵魂飞翔。关于在高高的楼阁上所听到的风铃的音色美的程度，明治三十六至三十七年曾在中国旅行的歌手佐佐木信纲在镇江的金山寺有亲身体验。

“一进入堂内 奇怪 实在奇怪 在云彩上可以听到无法形容的清脆高雅的音乐。当好奇地穿过殿堂走在石阶上时，的确像是天上在奏音乐似的，传来微妙的声音。与人演奏乐器的声音相比，更为高雅。奇怪地往上一看，在那个高塔上面，屋檐角处挂着钟形的铃，随风飘动，发出悦耳的声音。穿过几座殿堂、几道长廊，来到塔前，请守塔人把门打开，爬到塔上。顺着一层一层，螺旋式的台阶向上爬，越往上，天上的声音越近。感觉身体宛如一步一步地靠近天。有一种自己的身体离开尘世升到云彩之上的心境。……用眼俯瞰这种美丽的风景，耳朵里听到微妙的音乐。我已经陶醉了 想永远永远地呆在这里。”

狂热感情的萌芽

可以认为毛泽东被这种灵感所打动，与过去沉湎于他内部的他的另一个侧面自从来到长沙之后表现出来的东西不无关系。

在参军之前所在的湘乡中学，他用剪刀把自己的已认为是清朝的象征着辫子剪掉。这与在东山小学堂时，内心轻蔑没有辫子的教师有很大变化。他不仅自己剪掉辫子，还到处追赶虽然一起约定要剪但没有剪的十几名同班同学，把他们的辫子剪掉。从一直以母亲遗传的冷静的忍耐力呆到东山小学堂为止的他来看，这是难以想象的变化。

他拿着剪刀袭击同班同学时，既不是因为他谴责那些同学没有守约的不讲道义行为，也不是因为有留辫子被侮辱的记忆。而想剪掉。那是一种狂热感情驱使他采取行动。当然，作为那种感情的基础，可能是政治性小册子和来到长沙后第一次读到的报纸。那是民族革命派的报纸。由于报道了为革命以身殉职的人们的壮烈牺牲，使他受到影响。在他看来，剪辫子是欢迎革命的表现，是政治行为。

他来到长沙之后，活动范围扩大了。这既可以说“辛亥革命”的大浪潮震撼了他，也可以说按照当时社会的一般看法，十七、八岁这个年龄被看成大人，他有这么大伸缩性并不奇怪。但是，这里恐怕还有摆脱严厉的父亲和摆脱表示父亲支配的“婚姻”的解放感吧。

2. 立志当小学教员

走上通往教师之路

1960年，我和野间宏等人一起访问中国时，由于中国方面的好意，见到了毛泽东。当时，在他一个半小时（因为要加上翻译时间，实际时间是它的一半）的谈话中，涉及到自己的人生经历，他是这样讲的：

“……包括我们在内，也是逐步觉悟起来的。我自己也是如此，在中学读书时并不知道马列主义。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那一套，是封建主义，接着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的先验论、二元论……。”

就是说，进入第一师范后他的第二阶段开始。

“我当时一则没有钱进大学，二则也读不下去了。我读的师

范学校 是准备当教员的。”

而且 他又说：

“那时一心想当教员 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员。”

当时，他和我握手时，我感到他的手很柔软，手掌就像软糖似的。而且，直到今天，在他的书斋里，依然充满着埋头读书的那种氛围。

湖南农民的儿子——毛泽东，现在已经成为立志当小学教员的青年。

1913年（大正二年）春，毛泽东上了刚开办不久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几个月后，该校被合并到第一师范，他与秋季开学的该校学生一起学习。因此，毛泽东等来自第四师范的插班生在校时间比规定的五年时间多几个月。加之，毛泽东在 1920年（大正九年）到 1922年冬任该校附属小学主事（校长）又担任师范部的中国文学讲师，所以他与第一师范的关系，几乎保持九年时间。

勤奋的学生

湖南省的师范教育始于 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其后不久创立的是第一师范的前身，同样，在衡阳、常德也相继创立的是第二、第三师范。

第一师范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工资也高，一有空缺，教师就会从上海和安徽省不请自来。要说学生，不仅住宿不花钱，就连学习用品和制服也是免费发放，所以该校是长沙首屈一指的富人学校。直到现在还保留着的学校建筑物，依然很时髦。可以说当时作为地方的名校是名副其实的。

正因为如此 入学考试很严格 从整个湖南省的 63个县中，只限于前 20名的学生能参加考试。通过初试，各县大约取 5名

左右，有五百人接受两次考试，其中只有百人获准入学。

毛泽东在回忆当时的第一师范时还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著有《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的李锐，访问了第一师范的老师和毛泽东的同班同学，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当时的毛泽东具有热情、顽强的求学精神，这在他的几个特点中最为明显。

据说毛泽东起床很早。洗脸和沐浴之后，就在自习室学习，下课后就泡在报纸阅览室或图书馆里。第一师范的学生很用功，特别是毛泽东很用功，即使和朋友交谈，也都是关于读后感和对一些问题的议论。最初的两三个学期，即使到了星期天，也只是到附近的山和河边散散步，很少上街，上街时，就去有很多旧书店的玉泉街和府正街买书。

他的这种非常认真的生活态度，似乎一直没变，保持到毕业。他在学校的活动——“人物互选”中，在毕业的前一年获得最高分。这是一种人缘投票，在投票时，作为评价的标准，要同时记人事先标示的项目，一人可投三票，获得五票以上者即可当选。

这时，在全校 400 名学生中，有 34 人当选，得票最多的毛泽东，受到好评的项目有品格、自治、文学、表达、才能、胆识等六项，但其他当选者最多是四项。前四项属于德育，临机应变的机智和处理事物的精细程度这种才能属于智育；冒险精神和非常事态的警备中表现出来的胆识属于体育，在这种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中受到好评的，唯有毛泽东。应该说他是出类拔萃的人才。

“人物互选”之后，他担任了自治会的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长，

在毕业之前的半年时间里 他精力充沛 工作活跃。

三次成为开除的对象

他并非是那种从“人物互选”中很容易想象出的所谓模范生型。

对不感兴趣的课他缺席 即使上课 也把别的书藏在教科书下看。这惹怒了严格执行规章的学校当局，他三次成为开除的对象。每逢那时，总有为他辩护的老师。一次是他交白卷的数学老师 作为担保人 使他免于除名。这位老师甚至把放假不打算回家的毛泽东留在家里住宿。但是尽管如此，毛泽东在那段时间里也没有学数学。当时他认为 如果有一两门课得满分 即一百分 即使其他课是零分 平均分也能达到 60分 可以升级也就行了。

毛泽东不擅长自然科学的课程，喜欢社会科学。他擅长的课是中国文学和历史，而且很有作文才能。

作文的才能

第一师范除执行教育部（相当于日本的文部省）制定的教育方针以外，还提出独自の方针。以民主主义（当时称作“民本主义”）为基础 开展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以及职业训练，这虽然不那么少见，但在具体规定里，让“国文”与各学科相结合，成为中心课程这项规定对后来的毛泽东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影响。

这里所说的“国文”就是作文。所谓教养 就是对古典的读解力和读书量，认为那表现在作文中。在旧中国，作为长期实行的官方考试的“科举”归根结底也是作文的考试。

在第一师范，每周搞一次作文竞赛。全校约有 20 个班 各

班向教授会提出本班的最优秀作文，再由教授会将这些杰作汇集成三编或五编，贴在展览室里。毛泽东的作文经常被贴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他经常与一位绰号叫“胡子”的“国文”教师发生冲突。姓袁的那位教师瞧不起毛泽东的作文，说是“记者的文章”。

毛泽东在故乡时，以及在去长沙时所读的介绍新文明和新思想的著作和报刊上的文章，确实都是那种文体，因此袁先生说的也对。而且，毛泽东曾十分尊敬主张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实行改革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所以他的文体模仿不断吸收像明治维新以后在日语中出现的“哲学”、“卫生”等新词的记者梁启超是可以想象的。

那些文章易读，且具煽动性，在议论时事问题上很方便，但文章本身味道不浓，当想熟读玩味时，却感不足。再有，如果不是那种轻快而又热情的作文，要想入选每周的作文竞赛，那可可能是很难的。

胡子袁先生，看不起梁启超，加之对毛泽东在作文结尾处写上日期很生气，有时给撕了扔掉。毛泽东也不示弱，与他争论。然而，接受袁先生的指摘，学习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文章的毛泽东，确实掌握了继承正规的仿古文系统文章的写作能力。

即使作为政治家，这在尊重文章的中国社会，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中国的民众，最终不尊重不会自己做文章的当权者。当然，模仿韩愈的仿古文的文章，民众不懂。不过，那表现在文章的骨骼里，又根据情况适当地使用仿古文的表现方法，即使用白话文来写，文体也会紧凑有趣。

围绕人物评价的争论

第一师范的作文竞赛，似乎经常出题目，根据题目让学生写

作。一次，毛泽东借朋友的作文练习看，他反对朋友写在那上面的一文的意见。

朋友的那篇作文，写的是评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范仲淹作为一大文士很出名，他的名作《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被后人当作格言引用，而这篇《严先生祠堂记》也得到很高评价。所谓“严先生”是指名叫严光的学者，在他过去的老朋友当上具有无与伦比的权势的皇帝（后汉的光武帝）请他进京城当宰相，予以协助时，他拒绝了。后来，他隐居到浙江省风光明媚的富春江（即钱塘江）的上游，专心钓鱼。因为被称为高尚人士，所以到了宋代，当祭祀他的祠堂落成时，范仲淹写了由来记，刻在那里的石碑上。碑文中，范仲淹称赞严光人格高尚，同时也赞赏让他干自己想干的事的皇帝（后汉的光武帝）的大度。

然而，依毛泽东朋友的说法，皇帝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只不过是让他帮忙，严光也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纯洁高尚，如果打算拒绝，为什么还要进京城与皇帝同床共寝呢？毛泽东反对这种看法。他说严光应该当宰相，而且举出前汉的高祖继位时朋友张良当宰相的例子。

毛泽东与朋友的争论很激烈，最后因为朋友生气，争论才停止。毛泽东从这时开始就阐述人不应隐居，应参政这一见解，耐人寻味。

严光是公元一世纪的人，张良是公元前三至二世纪的人。

关于那么早以前的人物，在 20 世纪初，无名的师范学校的学生认真地开展争论，这件事在中国并不少见。中国人（应该说是出生在中国的人）经常被评价、被判定他的一生行为是否正确。无论是历史、还是文章，都把对人物的评价作为最大的题目来写。

文章在中国的位置

毛泽东同他朋友的争论虽然停止了，但是这个故事在中国被称为名文，它表明了一种意见，而且后人不仅“鉴赏”其名文，还参加争论。就是说，所谓名文，就是指所主张的意见永远有生命力。因此，作文很重要。

1936年，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讲述如下：

“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制的。……但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的基础工具了。”

后来被毛泽东指名为接班人的林彪，那时是抗日红军大学，后为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长。由于这所学校是培养军队和行政部门的干部的所谓“进修所”，因此这里即使奖励读书和作文，大概也是实用性的。不过，毛泽东的这封信使人感到否定传统的革命也是传统的产物。

3. 体育之研究

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

他学习用功，对体育也很热心。

首先，他设计了以太极拳的姿势为基础的“六段运动”，或在第一师范的宽阔的围墙下练，或在不眠之夜跑到院子里练。

他一年之中不间断地进行冷水浴，特别是在毕业前的两年间，他拉20多个同班同学入伙，每天早晨聚到井边，赤身裸体，相互泼水，摩擦全身。再有，叫做雨浴、风浴、雪浴，就是在秋季和冬季，如果下雨、下雪，或刮寒风时，上半身裸露，在学校的后

山上跑步，用干布擦身。

特别出名的是游泳。

新中国成立后 他还经常在长江里游泳 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也常去湘江和附近的南湖港游泳，他被选为自治会的总务时 游泳部的成员达 80 余人。湘江里有大的中州，一到暑假 毛泽东和他的伙伴就露宿在岳麓山下 当夕阳西下时 在湘江游泳后 在中州的砂子上 边休息边讨论人生问题和天下大事。

毛泽东还知道在日本常有球类比赛，所以他在学友会上也积极地提出开展球类活动——足球和篮球。中国的青少年，不知什么原因 喜欢打篮球 而且很强。毛泽东自然担负起篮球的普及任务。除球类比赛外，游泳和郊游也把日本作为参考。当时乒乓球似乎尚未普及。

此外 还搞爬山和露宿。在 23 岁的暑假里，他和萧瑜进行了一次乞丐旅行。他们发誓不带分文，靠给农村的商店和地主挥毫写字获得的谢礼坚持旅行。或住在乡村的旅馆里，或露宿，这种旅行虽然辛苦 但好像很愉快。

毛泽东和他的伙伴在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

他们的这种体育活动，是被当时的学生认可的唯一的娱乐活动 另一方面也是继承了传统的思维方法 即被授与重大使命的人 首先要接受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锻炼。在“经书”之一《孟子》中所看到的“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将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弗乱其所为，……”这句话表现了这种思维方法。这肯定是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边高高兴兴地游玩边念叨着这句话。

也把日本武士道放在心上

1917年（大正六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体育之研究》被认为是他亲自实践体育活动的总结。这篇文章，表现出也可以说是他的哲学原型的年青时代的思想。

首先，他写道：“国力衰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

也就是说，对他来讲，无论是冷水浴，还是游泳，都不仅仅是为了增进他个人的健康，而是要在应该让整个民族提高体质，以此增强国力这一理想之下进行。《孟子》所说的“天之将降大任”中的“大任”可以认为他已经同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了。而且在讲述民族的体质时，他似乎把日本当作样板之一。文中出现的“武风”这句话，具体讲，是指活跃地开展体育活动的风气。在这篇文章中，还讲到日本的柔道及其创始者嘉纳治五郎，说“日本则有武士道，近且因吾国之绪余，造成柔术，觥觥乎可观已？”从中可以理解为他把在日本广泛流传的“武士道”放在心上了。

说到毛泽东和日本的关系，在1917年（大正六年）3月，他23岁时，曾给宫崎滔天发过信。滔天是助孙文的革命运动一臂之力的人，为参加孙文的同志即长沙出身的革命家黄兴的葬礼，他千里迢迢从日本来到长沙。因此，毛泽东称赞那种友情，期望他到第一师范来讲演。当时与毛泽东联名发出信的萧植蕃，就是在本书中常出现的名字萧三当时的名字。

“动”比“静”好

我想把话题再转到《体育之研究》上。

这篇文章显示出毛泽东平时非常关心日本，最重要的是写出了一生不变的他独特的哲学。

他首先把“静”和“动”做比较。所谓“静”就是不活动身体的锻炼法，即所谓“静坐”。就是静静地坐着，让心静下来，注重自己的内心。宋代的儒家，在长沙讲过课的朱熹，注重“敬”，而陆象山注重“静”。这是哲学的观念，同时不是以这个“静坐”为线索。因此，继承宋代的儒学流派的第一师范的杨昌济先生，提倡这个，并且在同班同学中也有人实行。另外，甚至还有一种主张，说比起体操等容易受伤来，这个方法好。然而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动”比“静”好，敢于对恩师提出异议。

为什么呢？——“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

把健康锻炼的各种方法分为“静”和“动”，也是很独特的。他认为由于天地是动的，所以应该采取“动”的锻炼方法。这种判断也是有变化的。然而，作为引出这种判断的前提“天地”，也就是说，自然与人有密切关系，这种想法并非离奇。毛泽东进而又说：“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他以“动物”这个词作为证据，费尽心血想把“动”和人，进而和用中国传统思想所说的“道”联系起来，说：“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在这样讲了之后，他下结论说：“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

毛泽东之所以将“动”与哲学如此地联系在一起，其中之一大概是来自中国古代教育的训戒，即人应该静，让身体动是下贱之人。对“动”的社会偏见是那么的严重。如前所述，就连他自己当兵时，也未能自己打水、挑水。

总之，认为这种“动”不仅与肉体，进而还应该与人们的精神联系起来，这正是毛泽东想说的。

“主观能动性”的哲学

他当时把精神叫作“主观”。“动其主观”就是说：“促其自

觉'是开展体育最重要的事。

在《体育之研究》中他这样说：

“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

另外又说：

“学校之设备，教师之教训，乃外的、客观的也；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的。夫内断于心，百体从令，……苟自之不振，虽使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亦犹之乎不能受益也。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

这里所说的“动其主观”、“内断”、“自振”、“自动”到后来用毛泽东的说法，就是被称为“自觉的能动性”、“主观能动性”。用日语简而言之就是“有干劲”、“无干劲”的“干劲”。

为不发生误解，想做些补充。用体育运动的话讲，毛泽东在提出方案时，反对磨磨蹭蹭，只在形式上搞运动。让他说就是春夏秋冬，不分晴雨，猛烈勇敢地，少而集中地进行。那就是这种“自觉的能动性”、“主观能动性”。所以不是五分钟热度式的只顾眼前不管将来的那种“干劲”。

毛泽东写《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是 23 岁，使用表示自己名字的笔划的“二十八画生”这个笔名。他喜欢体育，喜欢运动，是怀着一种理想，那作为个人来讲，是健全精神，作为民族来讲，是增强体质，活跃民族风气，并非争记录和胜负。这似乎又表明并不是他所说的运动神经发达，无论什么样的比赛，都得第一的那种类型。

4. 教导毛泽东的人

与终身之师杨昌济相遇

毛泽东具有在《体育之研究》中表达的思想，是受到第一师

范教师杨昌济的很大影响。毛泽东作为“印象最深的教员”给斯诺举出了杨昌济的名字，又说：“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确实，他是那样的人物，是被称为‘第一师范的孔子’，那样的人格高尚的人。”

杨昌济是长沙人，曾在日本留学 6 年，在英国留学 4 年。他经常谈到康德、斯宾塞、卢梭等，但不想脱离中国宋代的儒学传统。宋代的儒学，也称“理学”。他把宇宙万物分为“理”和“气”，归结为“理”在先，“气”在后。而且说，所谓“理”是超越时间和空间而存在的，它贯穿于天地万物之中。把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理”指精神方面的形而上的东西，而“气”指物质方面的形而下的东西。并且，“气”是变化的，而“理”是不变化。因此，“理”的本质是“静”。前面讲到杨昌济提倡静坐法，这来自他信仰的哲学。宋代的儒教否定人的欲望，把一切欲望看作是“恶”。

杨昌济讲课时所用的课本之一是摘录《论语》，他一方面解说《论语》的意思，一方面教授杨昌济感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例如，他在解释《论语》子罕篇的这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时，这样讲道：“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之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也就是说，作为个人来讲，具有很强的意志和热情总是重要的。

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自觉的能动性”、“主观能动性”的原型。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撰写了《心之力》这篇文章，受到杨昌济先生的赏识，得到 105 分。这篇文章现在遗失了，但与在《体育之研究》中所强调的大概没什么变化。

关于杨昌济，毛泽东后来还回忆说：“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而且，毛泽东还在纪念一位抗日战争期间从加拿大不远万里来

到中国，担任八路军战士的治疗任务，后被细菌感染而牺牲的白求恩医生的文章中这样说：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是杨昌济的教导，原汁原味。

体贴入微的杨夫人亲手做菜

毛泽东受杨先生的影响，不仅仅通过上课。杨昌济每逢周日，都邀请几个学生到家中聊天。毛泽东也是拜访先生家的一伙人之一。由于杨昌济的夫人擅长烹饪，对于住在学校宿舍里吃粗茶淡饭的学生来说，不仅能和先生交谈，还能吃上难得的午餐。

杨先生有一儿一女。哥哥的学习成绩不太好，而妹妹美丽又聪明。杨先生的这个女儿开慧，后来与毛泽东结婚了。她的存在，自然引起年轻学生的注意。不过，按照当时的习惯，她深居内室，很少露面。

杨昌济在第一师范任教六年之后，被北京大学聘为伦理学教授，转到北京，于1920年（大正九年）去世。杨昌济的弟子萧瑜推断，在严寒的北京洗冷水浴可能是他早逝的原因。杨昌济在长沙，每天早晨坚持冷水浴，到北京之后仍继续坚持。这是到北京后不久受到杨先生关照的萧瑜亲眼见到的。杨先生说：“人必须每天做一件艰苦的事来磨炼自己的意志”。听说还劝萧瑜冷水浴。

在第一师范的教师中，除杨昌济外，还有一位以俭朴的生活

态度赢得学生尊敬的徐特立。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火攻教会事件成为导火线,法国、英国、美国等军舰曾沿长沙逆流而上,在鄱阳湖进行示威。徐特立对此表示愤慨,向弟子们发表演说,并砍断自己的一节手指,发誓要雪耻,他就是这样一位热血汉。

他后来参加了毛泽东等人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回国后不久,于1927年(昭和二年)5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长征”到达延安。直到1968年去世,始终忠于党。

在船山学社获得的‘实践优先’的思想

毛泽东还经常去听开设在长沙市内的船山学社每周日举办的公开讲座。

船山学社是因为敬慕17世纪的学者、湖南省衡阳人的王夫之的人格和学说于1914年(大正三年)而创办的。王夫之在明朝被清朝灭亡之后,固守在衡山的山中进行抵抗。取他晚年隐居的石船山的名字,被称为船山先生。

关于知识优先,还是实践优先的问题,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引起争论,而他的学说认为实践优先,这一点对毛泽东有影响。按照王船山的学说,在实践中可以得到知识。这是毛泽东后来(据说1937年在抗日军政大学讲课)在《实践论》这篇文章中阐明的基本思想。

船山学社出版的《船山学报》杂志,刊登有长沙学者刘人熙的公开讲课记录,那里面写有许多忧虑中国在外国的侵略下陷入亡国危机的语言。而且,分析中国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心与道德之堕落”并强调“这是由于禁止进行独立之国家、独立之教育;禁止进行独立之教育、独立之学术;禁止进行独立之学术、独立之精神使然”。创办、维持船山学社的是湖南省的文人和儒学者,有骨气的人很多,他们在袁世凯称帝时公然声明反

对。成为核心的刘人熙 也因是谭嗣同的老师而著名。

谭嗣同与康有为、梁启超一起搞改革运动。这是让清朝在君主制度下保留 颁布宪法 谋求中国的近代化的运动 尽管如此，还是被西太后等保守派镇压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流亡日本，虽然他也被劝告流亡，但他说“中国尚无为改革而流血的人”自己选择了死。杨昌济也尊敬谭嗣同。大概毛泽东边听刘人熙演讲边怀念谭嗣同吧。

毛泽东毕业后，离开学校宿舍便住在这里，1921 年开设湖南自修大学。那一直继续到 1923 年。

船山学社的建筑物现在还挂着毛泽东解放后挥笔写下的“船山学社”的匾额。

作为夜校的教师

这样看来，大概可以说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是在长沙的热心教育的优秀教师们创造的氛围中培养的。他在这种氛围下，不知疲倦地吸收了应该吸收的东西。据说他常对人讲，“学问”二字正如字面所表示的那样，不但要学，而且要问。

毛泽东不但吸取知识，也为给与付出了汗水。毛泽东在《夜学日志》中写道，在第一师范的校舍里，作为自治会的事业开办了夜校。学校附近的工人简直“如嗷嗷待哺也”。他在夜校，除教历史外，好像专门担任宣传、运营这类校务工作。

5. 浪漫的青年

一天一顿饭

可以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生活充实。按日本的学生生活

讲，他兼文艺部和运动部的热心活动家于一身，而且还开展自治会活动。

然而，也不能说这五年多的时间他的学生生活平安无事。他在校期间，发生三次军阀士兵占领学校建筑物，妨碍正常教学的事件。

当时的中国，名义上实施共和政体，但实际上是军阀群雄割据。从孙文手中夺走大总统地位的袁世凯，也是军阀之一。军阀率领的军队，原来是清朝建立的，但清朝被推翻后，军队的长官和高级军官将其士兵和武器据为己有，同时又从驻地的当地商人和农民那里索取税金以肥私囊。

由于军队的长官和高级军官原来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所以他们与其他有实力的大地主勾结起来，根据其实力，统治一定的地区，就像建立一个国家。不过，在那里法律被无视，与其说是国家，不如说如同日本封建时代的领主。

而且，因为他们相互间有利害冲突，所以反复打仗。清朝时，作为君主的皇帝只是一个人，可是到了中华民国，反而在各地出现了像“皇帝”一样的军阀，中国自然变成了分裂国家。

注视中国的市场和资源的诸国，分别成为军阀的靠山，供给他们资金和武器，因此军阀也为了各自资助者的利益而打仗。民众因战火房子被烧，被夺去生命，有时男人突然被抓去当兵。战争一爆发，无论是胜还是败，都要闯进民宅，掠夺和施暴。军阀是当时中国的万恶之源。

由于第一师范位于铁路旁，建筑物也很大，因此在湖南省，军阀之间的战争一爆发，士兵们总是随意就住进去。因为在第一师范的教师和学生中有人反对军阀和北京的军阀政府，所以军阀方面似乎有以占据校舍来显示威力这种想法。

时局一紧张，省里拨给的经费就到不了，严重的时候，学生

宿舍的伙食只能一天一顿，甚至还有一顿也吃不上的日子。另外，教师的工资，或只够车费的程度，或一点儿都不发。尽管如此，唯有上课还一如既往地继续进行，这在当时的学校日志上有所记载。

赶走军阀的策略

毛泽东因为父亲曾在清朝时代当过兵，自己在清朝被推翻后也曾参加过军，所以对士兵的实情很同情，但他对这种军阀的军队肯定反对。

有一次，由于毛泽东的策略和指挥，还赶走过军阀的残兵。

那是在他毕业前一年的 11 月，在军阀混战中失败的一支部队逃到长沙，由于对长沙城内的情况不了解，因此在第一师范南侧的河畔徘徊。当时，毛泽东作为自治会总务，兼任学生志愿军（在第一师范自 1916 年起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把学生编成像军队一样，称其为学生志愿军的指挥，因为军阀战争爆发，所以学生志愿军轮流在学校周围巡逻。不过，志愿军的武器只有若干支军事训练用的木枪。

毛泽东与附近的警察派出所联系，带着几名配有真枪的警官登上后山约高 300 米的妙高峰。不久，军阀的残兵靠近，在他的号令下，山里的警官开枪，持木枪的同学们也边放爆竹（几十个连在一起的花炮）边冲残兵愤怒地高喊：打了胜仗的军阀就在城里哪！缴枪不杀！然后，派军使与惊慌的他们交涉，缴还武器。他们立即答应。那天夜里，让他们在校园里露宿，次日，长沙的商人联合团体拿出钱来给残兵，让他们解散。听说在这场“战斗”中，胆小的教职员和学生埋伏在校舍后面学生宿舍的院子里，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

不过，毛泽东对军阀行使实力仅仅是这个时候。毛泽东专

门组织警备队，自己当队长，保卫学校和市内。但是，在翌年 4 月大部分校舍终于被军阀占领，那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他 6 月毕业后。

当时的军阀是张敬汤。这个张敬汤，是军阀四兄弟中的老小，这四个人依照中国古代圣人尧、舜、禹、汤的顺序起名，十分傲慢。占领学校的是小弟，而整个湖南省被长兄张敬尧统治，他当时任都督。湖南民众骂张敬尧是“张毒”。毕业后的毛泽东，不久便对他们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驱逐运动。

令人充满梦想的俄国十月革命

1917 年（大正六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那年正好是毛泽东毕业的前一年。

寒假回到家里的毛泽东，一天晚上从二楼下来，叫住叔母。

“有好消息！”

他脸上露出从未有过的笑容。

“什么，捡到宝贝啦？”

将双手上举的毛泽东，一句一句地说：

“啊！这比宝贝还好。太好了！俄国共产啦。我们也要向俄国学习，干革命，搞共产！”

“共产，这倒是个好话题，可是要杀很多人吧！”

“杀！必须杀！变成共产就好啦！那样，国家就不胡来了，你们妇女也就自由了，婚姻问题也不胡来了。”

“提到婚姻问题，是什么呀？”

“连那种事都不知道？女人和男人的事就是婚姻问题。”

听的人大声笑起来。在那儿的堂姐说：

“完全变了个人！净想那些不正经的事。”

“这是不正经的事吗？不是，我们不光考虑这个。你说得完

全对 我们要敢做！”

说完 毛泽东大声笑了起来 然后上了二楼。

——听说这些话是当时成为谈话对象的叔母讲给她女儿的 这时 好像亲戚同住在老家。

俄国十月革命大概使年轻的他在脑海中充满着梦想吧。

那时 曾有这种事 在长沙乘人力车的他 在让车夫拉了一会儿后 就硬要车夫上车 他自己拉着车跑起来。据说是想接触“工人”。

新民学会的创立

毛泽东在从留下很多回忆的第一师范毕业前，向长沙市内的各学校贴出广告：

邀请具有爱国热情的青年朋友与我通信联系！征求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志士为同道！

这则广告是毛泽东草拟的 与《体育之所究》一样 署名“二十八画生”。会的名称 取自‘经书’的《书经》和《大学》 定为“新民学会”。其意思是抛弃旧的恶，培养新的善。从中可以看出不仅自己那样做，而且想引导民众也那样做的气魄。

新民学会的新会员，按照全体一致通过的原则受到严格选择。从70人发展到80人，后来增加到百人以上。其中许多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党内比毛泽东还先崭露头角的蔡和森和在江西苏区工作十分活跃的何叔衡等为代表，都倒在了革命途中。当时的成员至今还健在的 亲眼看到新中国的成立 并依旧很活跃的 有毛泽东、李维汉 使用了“罗迈”这个笔名，萧三以及李富春的夫人蔡畅等。

新民学会的会员，每周或半月集会讨论一次。禁欲式的他们，性的问题不用说，关于日常生活方面的话题也完全不涉及。不久，开始着手社会运动。毛泽东最初亲自抓的，就是赴法留学运动，那是以半工半读为宗旨的运动。

到北京去

作为这场留学运动的发起人，他去了北京。

在北京，他起初在杨昌济先生家食宿，不久就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租了房子，这儿在打工单位北京大学以北，离大学很近，仅隔一条马路。八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夜里每逢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虽然在北京的生活很苦，但他好像充满了希望，很快乐。

能看到树挂的北京冬季景色，使在南方长大的他感到很稀奇，并引起了他的文学兴趣。

他对斯诺讲：

“在公园里 在故宫的庭院里 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上悬挂着晶莹的水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毛泽东为了挣生活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主要负责登记来报刊阅览室的人的姓名。与过去把文章登在《新青年》的时候一样，这份工作是杨昌济先生给介绍的。

喜欢读《新青年》的毛泽东 虽然认出了一些执笔者 很兴奋，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并没想和这个湖南口音很重的青年交

谈。可是他没有灰心，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在大学旁听。后来，认识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治活动中常见面的谭平山和张国焘等。尤其是与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发展对立关系，达到把工农红军分成两半的程度。

可以认为，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方面，李大钊的文章和受他直接指导的启发作用相当大。当时他比毛泽东大 5 岁，正值 30 岁。在留学日本和在北京进行政治活动中，成为《新青年》杂志编委不久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长继而成为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听说李大钊的墓被移到对革命运动有特殊贡献的人的墓地，即革命公墓，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个谜。

李大钊 11 岁，按祖父之命，与同村的农村姑娘结婚了。听说直到 1927 年他被军阀杀害，还一直爱着她，由此可以看出他的人品。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因是封建包办婚姻，所以都抛弃了他们的对象。

在毛泽东来到北京前后，李大钊发表了赞扬十月革命的见解。登在《新青年》上的那些文章，毛泽东自然也看过。李大钊指出：“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思想作为毛泽东在第二年撰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的基本立场得到应用。

组织才能的发挥

毛泽东热心推动赴法留学运动，但是他没有去。由于他很热心 同伴们坚信他也去法国 当船离港时 大家都很惊讶。

毛泽东不留学的理由，说是自己在中国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工作要做。由此可以看出他具有一种无论是多么亲密的朋友做的事，都不与其妥协，朝着自己的目标继续向前走的性格。而

且对于他来说 中国是一切的开始 又是结束这种想法表现在此次行动中。进而自认为自己是与此相适合的人，显然他的使命感已经确立。

毛泽东在上海送走赴法的朋友之后 回到长沙。不久 学生于 5 月 4 日在北京举行了示威游行，火烧与日本合作的政治家曹汝霖的住宅。对于以前日本作为最后通牒的恐吓，让中国承认特权的二十一条要求 在中国 反对和愤怒的呼声很高。学生们把承认二十一条的日期作为“国耻纪念日”每年举行活动。

眼看在巴黎和会上 日本对中国的特权并没有被取消 依旧在继续，处于讲和条约要被签订似的那样一种形势，那一年的“国耻纪念日”的游行示威自然爆发 让日本归还从德国手中掠夺的青岛 取消二十一条 不买日货这类口号遍及全国。由于中国的工业刚刚起步，被进入中国市场的便宜的日本商品所压倒，因此抵制日货的口号也受到中国的工业资本家和商人的欢迎，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全民支持。

毛泽东观察到这种新的形势 组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 进而又以此为中心，组织了统一战线式的湖南各界联合会。毛泽东的组织才能 不仅表现在这种上层组织 还表现在十人为一组的救国十人团这类下层组织上。在一个半月里，该组织发展到 400 个以上。进而 作为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杂志 创办《湘江评论》。该杂志采用对开型 是周刊 创刊号印刷 2000 份 当日售空 虽然又增印 2000 份 依然不够。毛泽东以署名或不署名的形式撰写每期的文章和报道。

创办《湘江评论》

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 毛泽东这样写道：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

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 官僚不要怕 军阀不要怕 资本家不要怕。”

像这样重复很多的文章，如果译成日语，就显得既罗唆又繁琐。然而，如果用“四声”这种带有音乐式语调的汉语发音来读排比句的话，有一种动人的力量。

我曾经看过拍摄延安时代的毛泽东的新闻电影。因为是无声电影，所以不清楚说的什么话，但是可以看到毛泽东如果短短地说了一句什么话，就用右手做出表示的姿势。汉字，与夹杂着平假名的日语不同，字数少也行，是适合于演讲的语言。比比划划，配合得很好。因此，反复进行同样的表现，既可以使听者容易懂 同时作为文章来说 又与韵律很协调。

关于在这篇创刊宣言中提到的民众联合这一问题，毛泽东以《民众的大联合》为题 撰文连载于下一期到第三期。

据毛泽东讲，世界历史上的改革和反抗，都要采取联合的手段。无论是贵族，还是资本家，都搞联合，国际间也搞联合。与此相对，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中，由于民众大联合而取得了胜利。

因此，中国的民众现在也应该实现大联合，其基础在于小联合。毛泽东号召“诸君！”，在民众之中的各自的群体里实现联合。当时 他号召的对象是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说这些人应该首先有各自的联合，工人进而又分成铁路、矿山、电报、电话、造船、航运、五金、纺织、电车、人力车、建筑等。就是说，他曾考虑建立今天所说的工会组织。

而且，要说为什么一定要建立这种组织，毛泽东说那是因为我们“觉醒”了。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 谁说 我们不干 谁干？”

就是说 毛泽东在这里强烈地震撼读者的“自觉的能动性”、“主观能动性”。而且，毛泽东说时代在变。即使从已经成立的全国教育界联合会、全国报界联合会、国民外交协会、全国学生联合会来看，也说明民众大联合的征兆已充分表现出来。也有人说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因为中华民族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没有练习能力的机会。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

这样讲了之后，毛泽东接着说：

“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 光华灿烂的世界 就在前面！”

与克鲁泡特金产生共鸣

由于军阀张敬尧的压迫，《湘江评论》只出五期 便不得不停刊。张敬尧对毛泽东等人开展的抑制日货的游行示威横加镇压。毛泽东在当年 12 月召开的学生联合会的会议上，提议在湖南全省开展驱逐张敬尧的罢课运动。在长沙，包括一部分小学校在内，有一万三千多名中学生参加了罢课。进而，毛泽东为了向内阁请愿，再次去北京。这个运动成功了，翌年 6 月 军阀张敬尧被赶出湖南省，其小弟张敬汤不久被杀，人头被示众。

至此，毛泽东反军阀斗争总算取得了一个胜利。

尽管如此，如果考虑后来作为革命家度过的人生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期间反军阀没采取什么直接的报复行动，要说奇怪，倒也确实奇怪。

评价这个时期的毛泽东 与其说他是马克思主义 不如说他是无政府主义；与其说他是马克思，不如说他是克鲁泡特金更好一些。毛泽东说，贵族资本家，只要他洗心革面参加劳动，也不

必杀他。另外，他还说，民众应该联合起来对当权者开展“忠告运动”，进行“无血革命”，不必搞无效的“炸弹革命”、“流血革命”。这时的毛泽东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由此大概可以看出他具有英雄豪杰的气概。浪漫青年的形象浮现出来。

第三章 独立寒秋

(26 岁至 33 岁)

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积极开展社会活动。在那当中，参加创立中国共产党，他政治活动的大目标就定在此。立志救国的少年，如今已成为从事作为共产国际世界革命一环的中国革命的壮年马克思主义者了。然而，他在这个组织中，还不过是湖南省这个地方的热心活动家，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方针，自己的见解还不成熟。

在个人生活方面，已成家。

中国以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为分水岭，掀开了现代史的一页。在朝鲜，独立运动兴起；在日本，工人运动日趋活跃。关注亚洲这种新动向的共产国际，想依靠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促使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涨，那取得很大进展，但由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革命不得不暂时遭受挫折。

1. 新的生活

决心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1919年(大正八年)2月毛泽东为了向国会请愿驱逐军阀

到了北京。第二次到达北京，住在北长街一个叫福祐寺的喇嘛庙里。想不到北长街这条细长的街道与他现在在北京的住地中南海遥遥相对，中间只隔着中海。流过紫禁城周围的护城河水，沿着寺庙的东墙下流过，从寺庙处可以看到高高的城墙。他把一台油印机放在没有一点火气的空荡荡的大殿的香案上，印了一些反军阀的标语和他创立的平民通信社揭露军阀罪行的通信。另外，他在香案上读关于俄国革命的书，当时他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译成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即《共产党宣言》以及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他把自己的立场定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上。当时他 26 岁。后来他对斯诺讲：“从此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不过 确定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 并非说他对中国革命就全能理解了。而且，也并非说他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引导他走上了既正确又不徒劳的革命道路。到八年后上井冈山为止，他虽然在革命运动中很热心，但只能说那是暗中摸索。

毛泽东离开北京返回途中来到上海，1920 年 4 月 他见到了当时被说成“北李(李大钊)南陈(独秀)”的陈独秀。

陈独秀 曾和李大钊一起 在《新青年》杂志上十分活跃 在 1919 年 5 月 4 日的学生示威游行后，辞去北京大学文学部长职务，自己发行杂志。后来，因散发共产主义的传单而被捕，释放后 转到上海 负责《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继续开展活动。当时他 41 岁。

因负责新民学会的联络工作，毛泽东在上海呆了一段时间。生活费靠送洗过的衣服来维持，但好不容易挣来的钱都花在电车费上。

回到长沙的毛泽东，开始从事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

他暗中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专卖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叫作文化书社的书店，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在长沙市内举行了示威游行。就在这一年的5月，中国是在上海，日本是在东京，分别刚刚庆祝了第一个五一节。

他与到达巴黎的蔡和森互通长信，12月，他给蔡和森写信，赞成俄国十月革命的做法——暴力革命和组建共产党。

翌年7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大会是在上海举行。也许是陈独秀为出席会议之事作了联系，毛泽东为参加这次会议，与何叔衡一起来到上海。据说何叔衡不怎么了解马克思主义，被发起人厌恶，找个借口给打发回去了。因此作为湖南省代表只有毛泽东出席了大会。他被吩咐做记录。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他作为其中一员开始了新生活。

引人注目的恋爱和结婚

对于27岁的毛泽东来说，1920年（大正九年）也是他在个人生活方面开始新生活的一年。他与杨开慧结婚了。如前所述，杨开慧是杨昌济的女儿，1919年其父在北京去世，便回到长沙。据说长沙的青年男女把他们二人的结婚称为“理想的罗曼史”曾轰动一时。她个头不高，皮肤很白，眼窝凹陷。听说是典型的湖南女性相貌。

因为是学者的女儿，喜欢读古典文学作品，同时还学习绘画。她写一手好字。毛泽东对斯诺说，1918年在北京在杨昌济的家里寄居一段时间时与她恋爱了。

不过也听人说毛泽东曾与作为杨昌济在长沙最优秀的女学生，在杨的日记中提到的三个人姓名中的一个陶斯咏有过一段恋爱关系。由于新民学会允许女子入会，她也作为会员很活跃，与毛泽东一起从事文化书社的经营，经常看到两个人畅谈

的身影。然而她对毛泽东说，她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共产主义产生共鸣。相互了解对方思想立场的不同的二人，相互决定走各自的道路。她去上海开办私立学校，1930年去世。

杨开慧从北京回来，转学到长沙女校，与当时的新主张产生共鸣，因剪短发，受到退学处分。于是进入与第一师范一起最先实行男女混校的岳云中学。她与毛泽东的母亲一样，是“贤妻良母”型，性格温柔，不搞政治活动。

毛泽东在长沙门外清水塘与她组成家庭。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即校长，被世人看来是他的职业，但他的家也是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的秘密办事处。在谋求建立长沙的泥瓦匠、木匠、人力车夫的工会同时，也关注相邻的江西省安源的煤矿，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补习学校。

毛泽东还去安源煤矿开展工作（当时的装束是穿一件叫长衫的中国长服，拿一把破伞），弟弟泽民，还有李立三和刘少奇，也都从事这项工作。当后来毛泽东上井冈山时，这里的工人成了工农红军有力的一翼。

毛泽东的组织能力，一步一步取得了成绩，1922年9月组织了包括安源煤矿、萍乡铁路工人在内的1.7万人的大罢工。而且取得了胜利。

与此同时，他开始被当时统治湖南省的军阀赵恒惕所憎恶。赵恒惕有时公开，有时秘密地镇压毛泽东。军队曾三次包围清水塘的自宅，七次下达逮捕令，还提出悬赏金5万元。每当出现险情，总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于是毛泽东便从容逃走。不过，也有时在武装警察来到家门前之后才发现，他就拉着杨开慧的手，从房后的菜地里逃走。

与杨开慧生有三个男孩：1922年生的岸英；1923年生的岸青；1927年生的岸龙。

美女般容貌的革命家

1923年(大正十二年)12月,毛泽东为了避开赵恒惕的逮捕令去了上海在党中央工作。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遴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建立了协定的结果。而且,这个协定也是共产国际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共产国际,作为世界规模的单一的共产党,在各国设有支部。成立时间不长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经费方面还是在革命方针方面都需要共产国际的援助与指导。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代表的协商体,由于据点设在莫斯科,实际上共产国际是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意志行事的。它又在列宁,继而斯大林的指导下。进而还听说苏联操纵着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下达了与国民党合作 为了合作 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样的指示。即所谓“国共合作”。

当时以崭露头角的文学家而出名的郭沫若,会见了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时的 30 岁的毛泽东。

据几年后郭沫若提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是,毛泽东的容貌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赞扬为汉王朝兴起而尽力的张良的评论相适合。

那是这样说的:

“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 至见其图 状貌如妇人好女。”

而且 郭沫若见到时 毛泽东把头发分向两边 目光谦虚而专注 脸的皮肤白嫩 说话声音低 缓慢又滔滔不绝。对耳背的郭沫若来说 有三成听不清。……

打麻将取乐的受孤立日子

从此以后，毛泽东在国民党内热心、积极地工作着。当时，因赴法留学运动而去法国的小组已回国，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内很活跃，提倡应该重视阶级斗争这一原则理论。他们指责毛泽东为国民党干得有些过劲儿，毛泽东在 1924 年 12 月以养病为借口回到湖南老家。毛泽东没有出席翌年 1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再次当选中央委员。7 月从长沙来到广州的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编辑国民党的机关杂志，翌年 1 月，任代理宣传部长，兼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在中国共产党内遭白眼、而在国民党内热心工作的毛泽东的态度，也并非不令人感到奇怪。听说他当时经常和作家茅盾（在新中国任文化部长那样的职务）打麻将。这大概是一种逃避吧。

当时的广州，给人感觉是革命运动的圣地。在苏联强有力的援助下，成立了军校，培养革命军的骨干。作为孙文忠实的弟子、率领军事代表团去过莫斯科的蒋介石，担任军校校长，共产党派遣的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般认为如果依靠这支革命力量彻底打垮北方的军阀势力的话，中国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在国民党内也有反对国共合作的势力。他们首先禁止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部的部长。毛泽东也离开了宣传部的工作。尽管如此，在 1926 年 10 月以前，他一直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

国共合作在形式上维持着，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于 1926 年 6 月自广州出发开始北上。所谓“北伐”开始了。

与妻杨开慧的诀别

“北伐”取得进展，蒋介石进驻上海，1927年（昭和二年）4月，他突然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会的干部。这就是四一二政变。

不但在上海，而且在各地，开始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当时，毛泽东带着杨开慧和三个孩子，担任武昌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不能呆在一起了。在一起容易被敌人发现。这不仅是个人的生命问题，而且是会不会给革命带来损失的问题。”

毛泽东那样说后，让杨开慧和三个孩子去杨开慧母亲那里。

“为革命要做被迫离家的准备！一定想办法联系。……”

毛泽东就是这样说的，然而这成了他与杨开慧的诀别。

表面看来，毛泽东在为国民党工作，但他在那些活动中，慢慢地关注起农民来。在中国人口中占压倒多数的是农民。如果不把他们发动起来，中国革命不会胜利。为了发动农民，就应该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而且，首先应该巩固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他的革命程序定型了。

然而，国民党的有实力的政治家和军人，有不少是在农村拥有很多土地的地主，所以他们反对这样的革命程序。毛泽东认为，在国共合作破裂的当时，应当将这一程序付诸实施。

但是，共产国际的想法与此相反。认为革命的关键是工人，首先应该把他们发动起来，工人住在城市，应该依靠红军占领城市。……

如果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话，共产国际是正确的；但如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自然应该说毛泽东还是有的放矢的。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是应该教条式地忠实，还是应该现实性地忠实？中国共产党必须选择其中一条道路。毛泽东毅然选择了

后者。

在中国革命遭遇挫折 被推向悲惨状态时 毛泽东反倒抓住了由此引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契机。不过，那也是将握党的实权的人转到了敌人一边。在革命运动中 他很孤独。

在革命中牺牲的妻子和弟弟

弟弟泽民和泽覃走上与哥哥相同的道路，这可能是从各个方面支持他的活动吧。

首先是毛泽民，在哥哥担任湖南省党委会的负责人后，他就离开家，在哥哥身旁从事秘密活动。据还记得当时的他的人讲，他宛如小商人的类型。后来，他在上海，是党中央出版部的负责人 在上海、武汉、长沙等地经营书店 为普及中共的出版物 显示出非凡的才能，由此可以认为他活用了父亲教授的商业知识。

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后，毛泽民就亲手创办国立银行 按日本的说法 成为国立银行的总裁。在“长征”中，作为银行总裁的任务，他手提装着银币的袋子先出发，负责为部队采购粮食，租借房子和设营工作。在延安，曾任国民经济发展部长，不久同陈潭秋、林基路一起被派往新疆。当时，掌握新疆实权的督办盛世才，为了接受苏联的援助，向中国共产党寻找人材。

毛泽民在新疆历任财政厅、民政厅长，但被转向国民党的盛世才投入监狱、枪杀。留下孤儿兄弟二人由毛泽东收养，抚育成人，哥哥毛远新，现在是辽宁省委副书记，妹妹毛软新取母亲的姓 改叫王海容 从北京外语学院毕业后 进入外交部 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造反派十分活跃，1971 年参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第一个代表团。

从毛泽民的经历看，他与哥哥不同，不擅长群众性的革命运

动 但小心谨慎 擅长处理财务关系。

小弟泽覃也去了长沙。他是家运最好时的孩子，比起两个哥哥，似乎娇惯一些，小学毕业后，在家闲呆了两年。1919年（大正八年）大概是依靠从北京回到长沙的毛泽东吧 他去了长沙 经中学预备学校后升入中学。中学毕业后 帮助忙于党的活动的长兄 负责学生运动 将中共机关杂志《向导》分发到长沙各中学。

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后 他也去了井冈山 毛泽东与朱德取得联系时 他是联络员之一。而且 第一个接触的人 是解放后历任上海市长、外交部长的陈毅（1972年1月去世）从这时起 两个人成了亲密朋友。一起承担了重要任务。

毛泽覃在长兄毛泽东与贺子珍〔1〕结婚的第二年 与比姐姐漂亮得多的妹妹贺懿结婚。他因病未能参加“长征”，1935年（昭和十年）在江西省瑞金以东与国民党军的战斗中战死。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华东地区负责人的陈毅，不忘与毛泽覃的友情，让贺懿和贺子珍一起住在风光明媚的杭州，让她们安度晚年。贺子珍在延安同毛泽东离婚 贺懿在毛泽覃死后 再婚 其对方转向国民党后不久死去。如果说是不幸的话，那么这姐妹俩就是不幸的姐妹。

毛泽覃与前妻 与贺懿结婚之前的妻子 之间生有一子 叫毛楚雄 在 1945年国共内战时战死。

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在长沙郊外隐居一段时间，但在 1930年，被当时湖南省长——军阀何键逮捕。这时，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 毛泽民与毛泽覃的妻子 毛泽东的长子岸英也一起被捕。何键把杨开慧，同共产党员毛泽建一起枪杀了。听说何

〔1〕原文是贺士贞 有误，下同——译者

键对杨开慧讲 如果说出党员的名单 发表与毛泽东的“离婚声明”就可释放 但是她拒绝了。

杨开慧留下来的毛泽东的三个儿子，一种说法是被送到了瑞金。不过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这些孩子们不久被送到上海，委托表面上假装是酒店的党的秘密机关妥善照顾。那个地方遭到镇压，只有三儿子岸龙被秘密党员发现，岸英和岸青在 1937 年成为流浪儿 捡烟头儿 卖报。

柳直荀这位老同志，与杨开慧在同一年也是被何键杀害的，〔1〕。他的妻子李淑一在新中国成立后，将她写的词〔2〕寄给毛泽东。其目的是缅怀死后二十多年难以忘怀的丈夫。该词吟咏成“兰闺索寞翻身早，……”。“兰闺”是指女性的寝室。收到这首词的毛泽东，也作了一首词回赠。该首词加进了相互的妻子和丈夫的名字 吟咏起来是“我失骄杨君失柳，……”。

对于这些人来说，革命是与难以忘怀的每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提到革命时 人们的容貌就历历在目。然而 那对于幸存者来说，恐怕依然是件痛苦的事吧。

2. 独立寒秋

充满朝气和热情的诗

有一首诗叫《沁园春》，这是毛泽东自己回顾青年时代在长

〔1〕 此处有误。据有关资料称 杨开慧是在 1930 年 11 月在湖南省长沙市板仓被何键杀害；而柳直荀是在 1932 年 9 月在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嘴，牺牲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屠刀下——译者

〔2〕 1933 年为纪念柳直荀写的一首《菩萨蛮·惊梦》——译者

沙的生活所作的诗。再细分的话，这首诗属于“词”。它由长短不一的句子组成，本来是合着音乐吟咏的，在规定的曲子里，将歌词进行各种各样的改换，在这个过程中，歌已经过时，变成只创作歌词了。

歌词无论怎样创作，基础的曲子都是原型（即词牌——译者）据说其数量总共有 2300 余种。而且，字数也从 14 个字到 240 个字，有各种各样，但词牌本身分别有详细的规则。虽说作诗，但也不能随意作。假如选择 2300 余种词牌中的某一种，那就必须符合这种词牌所具有的规则，填进汉字。因此，有图解这种词牌规则的“词谱”，初学者要依靠词谱选择文字。由于它很像镶嵌填补，因此也称“填词”。毛泽东似乎是在上第一师范期间学会了“填词”这种消遣。

听说毛泽东在延安编了自己的诗集，共收入 70 余篇，给它起的题目叫《风沙集》。不过在 1963 年出版的、1964 年 1 月在全国同时发售的《毛主席诗词》仅收 37 首。这本诗集的开卷第一篇是《沁园春》。了解了他的生活后再读，确实有一种意犹未尽之感，的确表现出当时毛泽东的意气风发。

沁园春·长沙

一九二五年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沁园春〕是表示词牌的标题，这正如后面所述，因为事先已确定，所以在表现内容方面不太方便。因此，又加个〔长沙〕这一副题，这个副题本可有可无。1925 年是创作时间。

所谓〔独〕是与后面出现的〔百舸〕对应而言，是指不是和朋

友一起。如前所述，〔湘江〕是流经长沙街旁 最后注入洞庭湖的河流。河水以清澈而著名。

在湘江的正中央有相当大的中洲 称〔橘子洲〕。〔万山〕是多层重叠的山峰。这里是指岳麓山。如果从橘子洲来说，那就是与长沙街相对。在岳麓山上，有许多枫树，形成红叶后，从山脚到山顶，红叶层层叠叠。〔百舸〕是指许多大船。在江上比速度叫〔争流〕。

——我今天没有跟朋友一起，而是孤身一人在寒冷的秋天站在湘江的中洲橘子洲。眼前的湘江不停地向北流去。当举目眺望岳麓山的绵亘山峰时，那重山中叠叠枫林如同燃烧着的火一般，红叶染红了一切。江面上呈艳绿色，好多只大船在竞相航走。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空中飞〔鹰〕和水中游〔鱼〕都是自由的存在。在被收入中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里的诗中有“鸢飞戾天 鱼跃于渊”这样一句。这里在希望像自由的飞鸢、鱼跃一样培养人材这个意义上被引以为例。〔浅底〕是说由于水清澈 就像手能伸到河底一样 显得很近。〔霜天〕是说古代曾认为霜是从天上降下的。

〔寥廓〕是指广远空阔，无边无际。湖南省在古代称为楚。在楚国诗人屈原的诗中有一句是“下峥嵘而无地兮 上寥廓而无天”有一种说法 把这个“无天”解释成穿过天空 来到它的上面这种意思。也就是说，就像在天的上面，有空虚而广大的“寥廓”是指整个宇宙。

〔苍茫〕是中国大地夕阳西下的景色。那是一种失去了光亮

的暗淡，且又是蓝黑色的色彩。整个大地充满了那种色彩，看不清远方。〔沉浮〕是指王朝和权力者的兴亡。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不断，有时得势，有时失败。

——再向高处那晴朗的天空望去，鹰在空中像发射出去的子弹一样高速飞翔着，俯瞰江水，清澈透底，鱼儿在水中游着，宛如在空中飞翔一般。啊！一切生物都在这霜后的凛然秋天，无拘无束地发挥着全部力量，自由地发展自己的生命。

仰望开阔广漠的天空，自己好像到了古代诗人说的天上天，感到悲哀和叹息。不知不觉中，落日的余晖已把大地变成暮色，景色也渐渐暗淡了。我面向大地发问，在这片土地上，历代王朝兴亡，而主宰历史胜败的人究竟是谁呢？

以上是这首词的前阙，以下是后阙。前阙和后阙，几乎是对应的，《沁园春》的词牌，是后阙比前阙少一行，字数也有若干不同。

来带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百侣〕是指第一师范的学友和新民学会的会员等。〔峥嵘〕是山峰险峻、耸立的姿态，这里指的是苦难的岁月堆积如山。

〔同学〕是同门弟子。〔风华〕是外部的姿态和内部的才能。

——许多朋友曾相聚一起来橘子洲游玩，当眷恋过去回首往事时，那是不寻常的岁月。当时同学们正处少年时，青春年华，风采和才能正盛，像勤奋学习的青年一样，意气风发地努力读书和锻炼身体，做事不受任何约束。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江山〕是天下的意思，〔指点〕是指示评论。〔激扬〕是击恶扬善。〔文字〕是文章。〔万户侯〕是拥有一万户人家居住领地的诸侯，这里指军阀。〔粪土〕是骂人，说成像粪土一样。所谓粪土，是腐烂的土。指朽木不可雕的意思。〔到中流……〕是说在公元3~4世纪前半期，晋的武将祖逖，为了夺回被敌占领的土地，在渡江时，当来到河中央，一面用桨拍打水面，一面发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发表评论中国的形势，抨击军阀和鼓舞人民的文章。眼中无军阀等，视他们为尘垢。当年的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吗？我们在这条江里划船的时候，离开岸边到江中央，仿效古代的爱国者用桨击水，誓为祖国的未来尽力。急流的波涛汹涌，飞速直下的船也被迫暂停航行。

这首《沁园春》的词，使我们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人面对中国的历史和大地毛泽东的姿态，这是一部充满感情的杰作。

关于诗或者词，在旧中国有“诗讖”的说法。是指诗中的不经意的话预言了以后的事情。

被收入毛泽东的诗集中，放在首篇的这首词的第一句是“独立寒秋”。这一句不正是成为他的“诗讖”吗？这里的“独”似乎被认为是他不久与最亲爱的妻子和儿子诀别，失去妻子的命运。

不，这一句是一贯自立的人的自画像。对于即将到来的冬天，他大概不会低头吧。

第四章 《三国志》与共产国际

(34 岁至 41 岁)

毛泽东遭挫折，失败了，但在现实中，反倒开始走上自己相信的革命道路。不过，他的实践被当作异端受到中国共产党内当权者的排斥。这个时期的他，处于不得志和失意的境地。

一个时期，他从党中央所在地上海来到遥远的井冈山上，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工农红军实行再教育。他品尝到权力的滋味。正因为如此，遭排斥使他蒙受屈辱，他时常病倒。

他从井冈山开始创立的苏区，在这个时期结束时被迫放弃。

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日本，乘中国国内打内战之机，在那里建立傀儡国家“满洲国”。然而，日本的侵略反而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为使中国的社会形势出现新局面做了准备。在欧洲法西斯主义抬头 战争危机逐渐迫近。

1. 把军队变成学校

仅有千人的工农革命军

1927 年(昭和二年)7 月 国共分裂后,34 岁的毛泽东 虽然

遵从新制定的共产国际方针，但依他看来，还是不充分。按照新方针攻打长沙失败后，他没等党中央发出新的指示，就说服周围的人，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第二次新生活从此开始。这确实是新生活。对于革命运动，他作为活生生的人，在这里是站在直接负有责任的立场上。据说当时，他首先实行的是把军队变成学校。

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前，对军队进行了改编。因为是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进行的，后来被称作“三湾改编”。当时兵力很少，只有不足千人。把它编成两个营，一般是由三个营编成一个团，取名为第一团。而且，气宇轩昂的他，进而又增添了作为军队最大的编制上的名称。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

他让士兵列队，大声宣布：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成立了，自己担任主席（称作议长）这支工农红军置于党的领导下。

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对于讨厌军队、不想干革命的士兵发给 5 元路费，让他们回家。虽说是工农革命军，但既有旧军阀的士兵，还有受军阀的士兵欺负的农民和工人。想离开工农革命军的人，盯着手心里闪闪发光的 5 枚银元，一定会重新领悟到这支军队与军阀的军队不同。

当时的中国有句谚语：“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这是指正如质量差的铁才打钉一样，社会上被人讨厌的人才去当兵。像这样的军阀士兵是令人讨厌的。但那不是士兵的罪过。中国的社会产生了军阀，产生了不当军阀的士兵就生活不下去的阶层。

首先，与中国的人口比，耕地不足，天灾不断。得不到土地，在自己的村子里住不下去的农民，在中国社会中大量存在。一部分农民变成日工、挑夫等卖苦力的体力劳动者和木工、泥瓦

匠、铁匠、弹棉花等的所谓手工业劳动者。也有成为被称作精通武术的人和魔术师的艺人。不过，他们一没有工作就失业。他们被称作“游民”。

若用图来说明，中国传统的社会是由以下三个阶层组成：

官僚（军阀）

一般民众（不是官僚的人民）

游民

清朝灭亡之前，在官僚的上面有皇帝，按照一般的想法，皇帝另当别论，普通人是以官僚或非官僚来分类的。不是官僚的人们被称为“老百姓”。这是指一般民众。而且，“游民”被排除在“老百姓”之外，是社会之外的人。

“游民”只有乞讨，但是当乞讨都不行时，女的便去当娼妓，男的则不得不去当兵（军阀的）或当强盗（土匪、马贼）。

毛泽东曾这样分析道：“游民”分为士兵、土匪、盗贼、乞丐、娼妓，虽有社会贵贱之别，但他们都是“人”，在具备眼、耳、鼻、舌、皮肤这五官和手足这一点上，全都一样。正如人们所说的，士兵靠战争，土匪靠掠夺，盗贼靠偷盗，乞丐靠乞讨，娼妓靠献媚，虽然各自手段不同，但在靠此来生活这一点上不变。他们是生活最不稳定的人群。

普通人创建的强大军队

在工农红军里，游民出身的人未必很多，受到以前革命运动影响的贫农和工人（煤矿工人、挑夫等卖苦力者）是主体，但是在从国民党倒戈过来的人中，也有游民出身者。他们虽然占据毛泽东上的井冈山，并进行蠢动，但说起来也只是游民出身的土匪。

毛泽东首先着手的是把被世人比喻为只能打钉的铁的人们

培养成能承担革命重任的人材。这是为了革命，但也是革命本身——人类革命的任务。

毛泽东把军队变成学校，不外乎着手人的革命。不过，在那里所教的，都是极为平常的事。快上井冈山时，他在山脚的村庄的路上向士兵公布“三大纪律”。那只有三条像“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样简单的事情。后来，当红军转移到不种红薯的地方时，又配合当地情况做了修正。再后来，又提出了“八项注意”。现在在人民解放军中是这样规定的：

三大纪律——

1. 一切行动听指挥。
2.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3. 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

1. 说话要和气。
2. 买卖要公平。
3. 借东西要还。
4. 损坏东西要赔。
5. 不打人骂人。
6. 不损坏庄稼。
7. 不调戏妇女。
8. 不虐待俘虏。

过去日本军队公布了《军人勅谕》让士兵背诵。虽然是名文，但过于长，记忆力差的人很苦恼。仅挑出其中五条在早晚点名时念诵。这正如“一、军人应以尽忠节为本分”所说的那样，是罗列道德的项目。敬礼等也很繁琐。然而，根据我在军队生活

的经验，我想毛泽东确定的那种在二十四小时的行动中表现出来的、与军队以外的一般生活共同的这种平凡的道德是不会让他们一开始就记住的。

毛泽东进而又建立起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情况的制度。

在驻扎有红军的村落，当红军一出发，后面便留下检查班，一户一户地访问村里的每一家，向村子里的人打听借的东西还了没有？损坏的东西赔偿了没有？买东西付钱了没有？由于检查形成了制度，红军士兵不容分说都掌握了这些规定。

不仅有检查班在军队中成立的“士兵委员会”（士兵的自治组织）也检查士兵的生活改善情况和纪律执行情况。它还可以监督处罚军官。自下而上的检查，对于上级来说，不必害怕。虽说是军官，军官这个头衔没有什么特别的，而班长、排长等却有与之相当的地位，也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种简单而又易记的规则制定方法，我想是毛泽东有效运用了在第一师范时代开办夜校教没有文化的工人时的经验吧。然而，他作为领导人的才能，并非仅表现在公布这些规定上，应该说表现在严格执行检查上。而且，可以认为这些事情表明毛泽东把提高人的素质的目标，不是定在能做较难的事情上，而是放在平时总是严格做一些对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容易的事情上。

毛泽东要求红军士兵的，是平凡的人一般都能做到的。学习掌握了能以平常心进行作战的方法的士兵，不是变成了真正的强人吗？

指挥官以身作则

为了不过于美化这种情况，应该将破坏“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时受到严惩的情况作以记载。

在 40 年代写的短篇小说里，讲述有一个参加红军不久的少年由于害怕，错把农民当敌人给开枪打死，因此不得被处决。就在要执行的瞬间，从团团包围的村民中，跳出一个是被害者亲人的老太婆，她抱住队长的腿拼命给求情，队长和村民商量，最后终于免于处决。……或许这个队长从一开始就没想把少年士兵处死。但是，为了解决出了人命这件事，以便让其亲人和村里人接受，也许考虑只有执行红军的纪律。总之，我认为这部短篇小说所描写的并不是个别现象。

解放以后，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资本家的偷税和将次品上缴国家等的罪行，曾作为社会运动予以追究。当时，在国家机关，与这些资本家相勾结的职员也被追究。曾经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在天津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受贿罪行之后杀头的报道。是党员，又没有老实坦白罪行的，似乎是受到严惩的理由。并非说经常是这种情况，但有时若无悔改之意，恐怕就采取“杀一儆百”的形式了。

另外，即便是红军的士兵，也是在中国的社会中长大的。红军的力量之所以壮大，也是因为从国民党军倒戈过来的人，倘若考虑到这些，应该说即便这样的纪律未能立即渗透，也是不得已的。据担任当时红军某营党代表的人的回忆录说，在原先是国民党士兵的红军里，与“逃兵应该枪毙”这种主张和把铁拳制裁士兵看作是当然的这样一种风气相反，过于自由放任，即便士兵赌博也不禁止，甚至有的军官还让胜者请客。

俘虏敌兵时或袭击地主的家时，肯定有人将没收的金钱和物品放进自己的腰包。如果不是那样，“三大纪律”的第三条恐怕就没有必要了。

毛泽东进而在 1929 年（昭和四年）12 月的古田会议上，做了

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报告 并经会议通过。据此，派到红军中的党代表改称为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的任务是教育士兵，每月一次或两次检查士兵的思想情况。在政治委员的领导下，党员士兵成为核心，将部队的日常生活和军事行动向前推进一步。

这时，毛泽东总结出七条关于管理教育军队方面的方法。从内容上看，与其说这是普通士兵遵守的规则，不如说是政治委员和团长、营长等指挥官、党员士兵应该遵守的，作为领导者的心得体会吧。

一、要深入群众 大众化。

二、要经常关心、照顾士兵。

三、要以身作则。

四、做到让士兵自己教育自己，走群众路线。

五、说服教育比惩罚更重要。

六、宣传鼓动比命令更重要。反对命令主义。

七、要赏罚分明，该赏则赏，该罚则罚。偏重哪方都不好。让群众自己提建议，党予以承认的做法最好。

2. 在井冈山

与土匪结拜把兄弟

井冈山，是指位于江西省和湖南省交界处的罗霄山脉的一部分。南北长 45 公里 东西长 40 公里 方圆 275 公里 比较大的村庄有 5 个 中心是位于井冈山主峰的万洋山（也称望洋山，高度为 1850 米 北面山脚下的小盆地式的小村 名叫茨坪。由于村庄各有一口井 所以村庄的名字也就大井、小井、上井、中

井、下井这样叫起来。每个村庄有几十户人家，小井和茨坪有十几家小商店 卖日用品。

上井冈山的路只有三条 即从山脚下的宁冈、永新和遂川进入。而且 由于是弯弯曲曲的山道 尖石子很多 步行十分困难，所以自古以来，土匪以此作为根据地，经常出没。举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明代的朱宸濠。他在南昌造反失败后，便逃到井冈山，但最终被王阳明平定。

当时 统治井冈山的王佐 率领六、七十名部下 带着 60 支步枪，袭击小贩和有钱的人。由于他与宁冈县的地主袁文才串通一气，所以其他的地主不能讨伐他。王佐和袁文才二人，是中国的秘密结社哥老会的头目。秘密结社的人，虽然干坏事，但注重约定。关于秘密结社 毛泽东以前说过：“如引导得法 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毛泽东以两支手枪作为见面礼去见宁冈的袁文才，经他介绍，又见到井冈山上的王佐。不知毛泽东是如何施展的口才，二人举行宴会，表示欢迎之意，与毛泽东结拜为把兄弟。

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 是执行党的命令的。”但实际上，他们对毛泽东等人似乎逐渐起了疑心。由于那种矛盾爆发，在毛泽东离开井冈山之后，二人被留守的彭德怀杀死。

井冈山是个坚固的要地 可是粮食不足，一遭敌人封锁 物资的交易便不能进行，日用品方面也不充裕。因此，毛泽东占领靠湖南省一侧的山脚下的城镇茶陵，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埋头阅读文学和历史的生活

所谓“苏维埃”是指清除与过去的国民党政府有联系的官吏和职员之后，经群众选举出的委员会。大村有十几名委员，小

村有三、四名委员，他们不放弃自己本职工作，处理村和部落里行政上的事务。由于民兵也是在它的领导下，自然也兼任警察。虽说是选举，但农民不识字，代替投票的，是召开大会，举手提名，让候选人冲后站着，把豆放进搁在自己推荐的候选人脚根下的茶碗里。

农民们不知道那个苏维埃就是指效仿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的制度，把汉语的借用字“苏维埃”信以为是一个姓苏的人来了，带来了政治。如果意译，也有时说成工农政府或人民委员会。村的上级机关区委员会成立时，有时由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派来的人加入到委员会中，而村和乡的委员会，由于是当地人当委员，因此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自治组织。而且，因为在村和乡里还有共产党的支部，结果，苏维埃的渠道和党的渠道同时并存，自然，苏维埃地区的政治发挥了作用。地主、国民党的官吏和反动分子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苏维埃进而在它的周围，成立了工会、农会、赤卫队、妇女会、青年团、少年团等群众团体和群众的自卫组织。在这些群众团体和自卫组织的保护下，苏维埃（也就是说是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群众的权力）开展了没收附近的大地主的土地，将其分配给农民的活动。苏维埃不仅在茶陵，而且相继在各地成立。起到接生婆作用的是工农红军。

然而另一方面，也曾经发生了遭国民党正规军的攻击而失败的红军团长，企图投降国民党军，率部下逃走的事件。当时毛泽东立即采取行动，追赶 15 公里，把部队带回。农民在分到土地后，说苏维埃会议太多，有些厌烦。

据某红军干部回忆说，毛泽东在井冈山呆了几个月，未能向外部出击。另外，还有别的红军干部回忆说，毛泽东只要有时间，就埋头看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当然，只有读那些能得到手

的书。大概是地主袁文才家中的书吧。他从《封神榜》这个出现不少民间信仰的神仙的小说中举例向士兵开玩笑说：稍微模仿一下，腾云驾雾如何？这些神的名字深深印在中国民众的脑子里，士兵们很吃惊。写这个回忆的笔者写道：毛委员（当时对毛泽东的称呼）也叫毛司令，激励大家，要积极地壮大革命力量！

与朱德会师

3月的一天，毛泽东在王佐的家里喝酒。袁文才也在场。正在那时，卖刺绣的小贩来了，他看到毛泽东正在喝酒（他认识毛泽东）就对站在门口的卫兵说：

“毛司令可以在这样的地方喝酒吗？现在朱德的红军正在山脚下闹得天翻地覆，听说正在斗地主、分田地哪？可是，……”

从卫兵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毛泽东，纵身跳起问道：

“在说什么？”

卫兵又重复一遍，毛泽东嘴里念叨道：“太好了！太好了！”毛泽东冲着呆若木鸡的袁和王解释说，朱德是红军的领导人，是亲密的朋友，他如果到这儿来，我们的力量就壮大了。

朱德是四川省仪陇县人，比毛泽东大七岁。辛亥革命时，站在革命一边，在云南省昆明起义，后来，被卷入军阀的势力争斗中，还成为鸦片中毒患者。不久，振作起精神，去欧洲留学，在柏林见到周恩来，经他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回国后，朱德被任命为在武汉新成立的军官学校校长。不久，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关系破裂，与仍继续保持合作关系的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也终于决裂，因此，中国共产党发出秘密指令，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朱德、刘伯承、贺龙等，于1927年（昭和二年）8月1日在南昌举行起义。

起义军向南方进攻，朱德与陈毅、林彪一起，沿江西省与广

东省的交界处进入湖南省南部，在那儿建立了革命政权。毛泽东听到朱德等的传闻，就是在这个时候。

朱德欢迎毛泽东派来的使者 决定会师。担任向导的 是毛泽覃。

1928年5月4日，在耒市南方的草原上，召开庆祝会师大会。改编毛泽东的部队与朱德的部队 定名“红四军”分成三个师。然而实际上 那只有三个团。“红四军”的军长是朱德 党代表是毛泽东。

从此以后 二人组成搭档 被称为“朱毛”但毛泽东作为权力的保持者 比朱德职位高。二人会师时 朱德41岁 毛泽东34岁。作为一起走上革命道路的同志，年龄的差异没有形成障碍，但是意气风发的毛泽东的做法也曾引起过朱德的不满。关于军事行动 毛泽东与朱德、陈毅进行了商量 但处理问题时 经常是不用红四军党委会、边区特别委员会等的名义召开会议，而是独断专行。

朱德有时冲着龚楚抱怨——毛泽东同志和我好像有隔阂。事前不商量，直到行动之前才通知。不给自己研究情况、考虑问题的时间。现在，各县送来的情报，首先是他过目。他想搞个人独裁 自己倒没什么关系 但不给准备的时间 很难办。

龚楚是和朱德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当时他是第二十九团的党代表。后来，他脱离了红军，在他的回忆录里，恐怕含有几分真实吧。

与贺子珍结婚，杨开慧之死

毛泽东也进驻永新县城，宣布永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此时，他与贺子珍相识并结婚。

据龚楚的记录称 贺子珍当时 18岁 是永新中学的学生 担

任青年团书记职务，永新县建立了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组织，她的妹妹也是青年团员，哥哥是共产党员。父亲是小地主，在永新的街上开书店。

在红军占领永新的那一天，贺子珍作为青年团书记来慰问红军。她与四个同伴一起挑来蔬菜、猪肉，她活泼可爱，说话有条理，口齿流利，眼睛炯炯有神，给人一种甜蜜的感觉。

自那以后数日，到附近村子里去工作后回来的龚楚，走访毛泽东的住处时，他不在。在向值班的卫兵打听永新的各种情况时，卫兵说，毛主席那里有个漂亮的女同志。龚楚从卫兵口中进而又听到了详细的情况。得知所谓那个漂亮的女同志，就是龚楚也曾和她见过一次面的贺子珍。

毛泽东来到永新时，属于永新的党团组织的人都来见他。其中有贺子珍，这自不必说，毛泽东尽管与美貌活泼的她初次见面，但话很投机。当晚，作为礼物，她拿来两只鸡、两瓶酒。毛泽东挽留了她，一起吃晚饭，二人谈得很起劲。次日晚，毛泽东召集永新的党团员开会，在讨论苏维埃运动与青年团的发展问题时，在出席者中，她的发言最多，而且出色。会议在夜里 11 时结束之后，毛泽东让她留下，又谈了很长时间。次日晨，她早早就来了。而且，当天晚上她没打算回去。……

第二天，毛泽东洗完脸后，充满了喜悦，对卫兵说：我与贺同志相爱了。已经从同志的爱变成夫妻的爱了。这是我们的革命斗争、共同生活的开始。……

卫兵向龚楚大致这样讲了之后，又加了一句：当时贺同志站在主席旁边腼腆地笑着。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爱情故事，似乎在红军中广泛地传播开。因受到国民党军反击暂时撤退的红军再次开始作战时，毛泽东担任攻打永新县的指挥。关于这件事，据传有不少人一语道破

说，毛泽东虽然冒着危险但也不想离开永新的原因是贺子珍讨厌上井冈山。作为新婚不久的毛同志，大概不能不顾及妻子的意见吧。

然而不知毛泽东是否知道这种传闻 他出色地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回了永新县城。

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是在 1928 年（昭和三年）6 月，他是 34 岁，杨开慧还活着。虽说如此，没有迹象表明他受到周围的指责。毛泽东也没有辩解的样子。大概是以坦率的行动代替一切辩解吧。从已经提到的“北伐”的时候起，在革命军中就有了这样的结婚方式 正如相互把对方称作‘爱人’的新词诞生一样 在革命运动中，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见。

在与朱德会师的 11 月 当时是 28 岁便担任国民党军的副团长的彭德怀，率领部下起义，在井冈山会师。毛泽东委托他留守，自己率部队反复向福建省进攻。

翌年（1929 年）在福建省西部各地 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通过土地革命 大约 80 万人分到了土地。

翌年（1930 年）发生了上述的富田事件。事件后 红军队伍反而扩大到 1931 年 兵力已达 10 万人。

1931 年 11 月 以那些苏区为基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

3. 失意的时代

填词，排解怀才不遇之痛苦

在井冈山和瑞金时期，毛泽东填有 10 首词。实际上做的比这还多，但因战争和土地革命等太忙，恐怕也有失散的时候。我们来研读 10 首词中的一首。

采桑子·重阳

1929 年 10 月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采桑子〕是这首词的词牌。由前后两段构成。〔重阳〕是菊的节日。在中国把奇数定为阴，把偶数定为阳，而这一天是 9 月 9 日，自然应该称为重阳日。在菊花节里，全家人去郊外爬山，还要喝漂起菊花的酒，据说这样就可以避邪。

〔人生易老〕一般把 40 岁称作初老。毛泽东填这首词时，虚岁是 37 岁。〔天难老〕是说天与人不同。天无心，无情，所以不上年纪。尽管人们依恋时光，但季节依然不断变化。因此，天是无情的。这一句，大概是联想起唐代九世纪初很活跃的诗人李贺的诗中的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吧。〔岁岁〕在唐代，七世纪后半期的诗人刘廷芝的著名的诗里写着“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战地〕在填这首词时，估计毛泽东正在寻邬。〔分外〕格外非常。

——不具有感情的天，不知衰老，但人的生命是容易老的。每年一次的重阳节，今年又来了。今年的重阳节是在临近敌人的土地上迎来的，但菊花比例年都放出更加浓郁的芳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劲〕力量充沛。〔寥廓〕已在《沁园春》处做了说明。〔江天〕江上的天空。〔万里〕一望无际。

——一年一度的秋风劲吹着，是与春天的景色完全不同的风景。在我看来 比起春天 眼前的景色更为迷人。看 流动的大江上晴空万里 广阔无边 地上不是也能清楚地看到万里之外霜天的秋姿吗？

这首词吟咏了古代诗人经常吟咏的“老”和“重阳”但这里所表现的境地还是毛泽东本身。虽然并非没有感伤，但使人感到他作为一位革命者，一面观赏自然，一面陷入思索。

即使在井冈山到瑞金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停止作喜欢的词。同国民党军作战是很严酷的，而且党内的斗争也很艰难。大概是因为这个的缘故吧 他经常生病 但填这样的词 使得心情舒畅，没有停止思索革命的前途。由于他具有这种宽阔的胸怀 不是才能经受得住党内外的严峻情况吗 实际上 这个时期的他在党内是不走运的。

遭冷遇的毛泽东

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同时还成为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如果套用在其他国家，就是处于兼任国家元首和内阁总理大臣的地位。这是 1931 年 11 月的事，他不久将迈入 38 岁。即使从年龄上来说 他也早就获得了很高的地位。

不过 此时他的地位 作为党内序列 比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项英要低。项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为常委)而毛泽东被排除中央政治局。1927 年 11 月，被迫辞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上井冈山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这个中央政治局，受共产国际支配，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进入这个中央政治局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中 有不少人去过俄国留学 在那里学习了理论和革命运动的实际（李立三和周恩来是法国留学

生出身)

进入 1930 年 陈绍禹 (笔名是王明 王明的叫法更出名) 秦邦宪 (笔名是博古) 张闻天这一群留学生一起回国 他们由于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掌握了中国共产党的实权。

王明等人的绰号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足以显示出他们理论水平之高，但遗憾的是，他们对中国的情况几乎不了解。而且 如被称为留苏派那样 形成派阀 对于反对者 任意给以处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政治局的人事，是由共产国际掌握，明白事理的党员，虽然愤慨，但对深受共产国际信任的留苏派无能为力。一部分党员曾因受到镇压，产生绝望，并离开了党。另外，因留苏派的错误方针，被逮捕、被杀害的人也不少。

毛泽东上井冈山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负责人相继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 (陈绍禹) 秦邦宪 但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给毛泽东以热情的鼓励和支持。

在仔细阅读俄语文献的他们看来，毛泽东简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知 他由于过多地读了中国的古代小说《水浒传》 所以只能认为他是与社会渣滓即旧式的造反者结拜，固守山寨。他们给毛泽东扣帽子，说他是主张枪杆子出一切的“枪杆子至上主义者”。这也意味着与军阀一样。

不过，这些最高权力者大概内心中对现实里正在开辟苏区的毛泽东怀有一种嫉妒吧。在富田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毛泽东坚决行使权力的态度，使那种嫉妒转变为不安。进而又认为，连一次苏联也没去过的人是不允许拥有很大势力的，即使这样想也并非不可思议。

因此 传出小笑话说 正当王明想削减毛泽东的权力去投奔江西苏区时，被毛泽东监禁，尔后慌慌张张地逃回上海。恐怕二

者的对立已不能遮人耳目。

与反对派共处的日子

不久，国民党的镇压日趋严厉，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的地下指挥部也变得危险起来。他们逃往的目的地只有江西省毛泽东开创的苏区。

中央政治局首先在瑞金设立苏区中央局，以便在这里直接对分散在各地的苏区进行指挥。因此，江西苏区的党的机关被废除，毛泽东也丧失了在那里掌握的权限。这时，在中央政治局，周恩来得势，他首先掌握了整个红军的指挥权。从此以后，毛泽东从红军的领导系列逐渐被排除。这是 1931 年（昭和六年）1 月的事。

在翌年（1932 年）8 月的宁都会议上，留苏派对毛泽东的排斥更加厉害。在这次会议上，他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的帽子。

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谈到这个时候的事情时说：“从一九三二年十月起，直到长征西北开始，我本人几乎用全部时间处理苏维埃政府工作，军事指挥工作交给了朱德和其他的人。”

所谓将军事指挥工作交给其他的人，只不过是毛泽东的婉转说法，实际上是权力被剥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即使是非党员也能干，所以对于毛泽东来说，这种处置是屈辱的事件。他不久就病了。在福建省的长汀（汀州）住了四个月的医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是瑞金，中央政府是在距瑞金七八公里的叶坪。村里仅有 40 多户人家，村民都姓谢。这个家族的祖先的庙被充作中央政府的办事处。庙的正面有一栋房子，宽 10 米，进深 20 米，用板子隔开，建成七个约 4 平方米的小屋。这是中央政府各部——用现在的日本来说，相当于省——的办

公室。

毛泽东的住处就在这旁边，是两层楼，楼下是村里人住，楼上除毛泽东外，还有朱德和周恩来。楼的后面，有一棵巨大的古老的楠树，据说已有几百年树龄，其中一根枝条垂落到地面。听说毛泽东经常靠在这根树枝上看书。

他们在这样的办事处和宿舍里是如何开展党内斗争的呢？非难、辩解、支持、反对、朝夕见面，而且胜败渐趋定局。毛泽东得的是疟疾，住了四个月医院，也算是脱离这狭窄的环境。

4. 《三国志》与共产国际

在毛泽东身上发挥作用的中国传统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红军大学的教科书，书中极力强调曾与自己对立的反对派（就是周恩来等人）的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是如何的错误。

这本著作译成日文，用每页 400 字的稿纸约有 180 页，还收入红军与国民党军的配置图（这个配置图，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没有收进去）。这是一部让人感到在困难情况下写得相当好的力作。

毛泽东经常引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也引作例证，并特意加上“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它载于《孙子》的谋攻篇。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另外，在《孙子》军事篇中写道：朝、昼、夜，人的气力逐渐减

弱“，朝气锐 昼气惰 暮气归”因此 要在其弱的时候攻击“，避其锐气 击其惰归”毛泽东只引用了后半部分。

毛泽东决不是受《孙子》所说的朝、昼、夜所束缚 关键是把敌人疲惫气衰时要攻击，充满气力时要回避战斗作为教导，大概认为只要读《孙子》就行了。

上井冈山不久，由于红军士兵文盲多，毛泽东制定出如下可以背诵的秘诀。用汉语讲 仅十六个字 即：

“ 敌进我退，
敌据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这个“ 据 ”后来改为“ 驻 ”但意思并没怎么变。从第一行到第二行、第三行 以至第四行 这十六个字也成为红军作战的顺序。想想看 这也是日本侵略中国大陆 最后不得不败退的日中战争的过程本身。

表现在这十六字诀中的军事思想的根本，是基于前面提到的《孙子》的“ 避其锐气 击其惰归 ”。

《孙子》一书比毛泽东讲的更有味道。但是 对于文盲的士兵们来说 由于毛泽东制定的十六字诀反复使用“ 敌 ”与“ 我 ”所以文章好理解。而且，只要记住这几个字，以后仅观敌人的做法，立刻就知道自己该如何做。

在工农红军中发挥作用的《孙子》兵法

如下所述 毛泽东归纳出鲁庄公受教于曹刿的战术 首先提出“ 相信人民 ”而《孙子》的开卷第一页所讲的 无非也是这种思

想。

《孙子》的第一章取名为“计篇”举出在战争开始前应该检查考虑的项目 就是说 提出了五个胜利的条件 即道、天、地、将、法五个（道是政治 天是气候 地是地形 将是领导者的能力，法是军队的制度）其中第一项的道 就是这个“相信人民”。其状态是人民与国王燃烧着同样的理想，生死与共，没有丝毫的怀疑。

“道者 令民与上同意 可与之死 可与之生 而不畏危也。”

毛泽东说，在红军退却阶段，如果得不到下列几个条件，是不能转入反攻的 第一 举出“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应用《孙子》的“示形”战术和经常用比敌人多的兵力作战的用兵术等。所谓“示形”战术 就是所谓的佯动作战 做出让部队转移的样子，引起敌人注意，趁机从完全意外的方向发起攻击的战术。用比敌人多的兵力作战的用兵术，是毛泽东的铁的规则，敌人即使多 要让它分散 小部队处于孤立状态 而我方则集中兵力 在局部地区作战中，以数倍的兵力压倒敌人，毛泽东经常这样做。

在 1958 年（昭和三十三年）的某次会议上，毛泽东这样说：

——有个人说“《孙子》中没有马克思主义”。当问到“你看过《孙子》吗？”那个人还没有看。不看就主观断定是不妥的。

在那次会议上，林彪也出席了。林彪在毛泽东发言时插话说：“《孙子》里 既有唯物论 又有辩证法。”

毛泽东之所以细读玩味《孙子》并非只是因为《孙子》是中国的古典，这可以从毛泽东的讲话及接受那个讲话的林彪的讲话中看出。

不过，尽管如此，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率领工农红军作战时采用与《孙子》相同的战术呢？可以认为应该称之为中

国式的传统依然在那里发挥着作用。

中国的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开头便说，不能不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进而还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当时，在毛泽东周围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战争，这一点没有变，只要利用中国的反动势力方面的军事教科书就行了；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是革命战争，只要按照已经取得胜利的苏联的革命战争的做法和列宁、斯大林的教导去做就行了。

对此，毛泽东反驳道：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另外，对于说 1926 年至 1927 年的“北伐”战争的经验是最好的这种意见，他反驳说现在所处的情况与当时不同。毛泽东在那里所说的，似乎要如实地反映现实，是指不许打败仗。

在《孙子》计篇的末尾，引出预测战争胜败的话题。在这章里，除举出前面提到的五项胜利条件外，又提出七个战术。关于这些，说在先祖的庙堂之上，用算木这种计算用的小角棒来计算，如果算木多了，可以预测为胜，如果少，可以预测为败。民众的支持，也作为一份算木计算在内。

而且，那既不多于一份算木，也不少于一份算木。在这种现实的想法里，也许就没有空想了。不过，也没有产生自暴自弃和夸大妄想的余地。对于士兵和民众来说，也不会白流血。我所说的中国式的情况之一，就是那个意思。

《孙子》的结论是：不战而胜为好，隐瞒态势，无形为好，这也

是与《老子》共同的思想。虽然作为军事学的书籍来说是意外的想法，但深感中国传统思想的魅力。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成军队样子的军队 这些似乎很弱 但决非如此 如果注意看看周围 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找到证据。

学习诸葛孔明的宣传鼓动法

不仅《孙子》，《三国志》也是毛泽东喜欢读的书。

在本书第四章 1 中 举出了作为领导人的七条心得体会 在第六条中说：“宣传鼓动比命令更重要。反对命令主义。”宣传，是指平时的教育 鼓动 是指战斗开始前的激励演说。

为了让他们理解这些条款的意思 毛泽东曾引出《三国志》的‘激将法’作为例证。

所谓‘激将法’就是刺激将军 让其激昂的方法 就是说 为了让其有认真干的兴致，不断地刺激人们的自尊心的做法。在《三国志》中 诸葛孔明对老将黄忠就使用这种方法。为与敌人的名将夏侯渊打仗 黄忠想出阵 孔明对他说：“对于你有些勉强。让别人替你吧！”黄忠奋然回答道 有到 80 岁还能吃一斗饭和十斤肉 守卫边境 让敌人畏惧的廉颇将军（战国时代的名将）的例子。况且 鄙人还不到 70，一定要拿夏侯渊的人头来见我。尽管如此，诸葛孔明与他发生争论，结果是好不容易让黄忠出阵。黄忠果然取得了胜利。其实 黄忠已年迈 身体也很弱 但孔明为了让他振奋，故意说了多余的话。

听说毛泽东讲了这段话之后，又这样说：

因为我们士兵的阶级觉悟高，我们不需要使用“激将法”。然而 诸葛孔明巧妙地进行宣传鼓动这一点 值得我们学习。不是光下达命令 要通过宣传鼓动 提高士兵的阶级觉悟 焕发出革命英雄主义 如果讲清道理和任务 士兵就会排除万难 勇往

直前。

这是相当出色的讲话技巧，其本身就是宣传鼓动的演说样板。

毛策略的宝库与中国的战史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又引用《水浒传》作为例证。这也是他少年时代喜欢读的小说，不仅是他，《水浒传》与《三国志》相并列都是中国民众喜欢读的书。他们认为《三国志》好像就是那样，即使不读书，通过戏剧和大人们讲的故事也能清楚地了解每个人的姓名和性格。

在那个《水浒传》中有这样的场面：梁山泊的 108 名英雄之一的林冲，在尚未加入梁山泊之前，与叫作洪教头的武艺人比试棍术。

洪教头见到作为罪人被发配到流放地途中的林冲，一开始就轻蔑地连声喊叫：“喂，过来！”同时挥起棍棒过来逼近林冲，林冲往后一退。洪教头紧追一步，刚刚挥起棍棒，看清他步伐紊乱的林冲，自下而上的踢起，洪教头翻了个筋斗。就在那一刹那，他用自己的棍子重重地打了自己的迎面骨，于是扔掉棍棒，摔倒在地。

依据毛泽东的说法，在江西省苏区，主张对攻到阵地附近的国民党军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在文章中称“军事冒险主义，没提个人名字”）就是洪教头那样的蠢人。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人民的信任最重要

毛泽东说 当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 不能迅速击破对手时 应该有计划地采取战略退却 他举出《水浒传》的事例 进而又举出春秋时代 公元前 8 世纪到 5 世纪 鲁国与齐国作战时 鲁庄公用曹刿这个人作参谋 取得胜利的例子。这个故事 是历史的记录 即使作为文学来讲 也可在优秀的《春秋左氏传》中见到。

其实 在最初发表的文章中 毛泽东把林冲的对手的名字搞错了。因此可以推测 毛泽东在执笔时 可能《水浒传》没在手头 是凭记忆举的例子。不过 关于《春秋左氏传》 他是原封不动地引用了原文。恐怕在“长征”的艰难过程中 他也是时刻不离地带在身上边走边读吧。

鲁国的庄公因曹刿献策而取得胜利的情况，《春秋左氏传》是这样讲的：

春 齐师伐我 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 又何闲焉？”刿曰：“肉食者鄙 未能远谋。”乃入见 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 弗敢专也 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 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 弗敢加也 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 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 虽不能察 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 可以一战。”战 则请从 公与之乘。

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 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 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 勇气也，一鼓作气 再而衰 三而竭。彼竭我盈 故克

之。夫大国 难测也 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 望其旗靡 故逐之。”

作为弱国抵抗强国的情况，毛泽东选取了鲁国的庄公之战。而且 作为教训 引出以下几点：（一）战争之前 需要政治上的准备 所谓政治上的准备 就是取得人民的信任；（二）为转入反攻 需要有利的阵地；（三）同样 要开始反攻 应该选择有利的时机——敌人勇气殆尽 我军勇气十足时；（四）追击应该在敌人混乱时开始。进而 从中国战史中，一举出活用这些原则取得胜利的实例。那就是：

——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

败给《三国志》的共产国际的策略

毛泽东进而又举出了遭到拿破仑入侵的俄国，使亲自把莫斯科变成废墟的拿破仑败退的例子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把德国引诱到巴黎郊外，最后取得胜利的法国的例子。拿破仑以后的例子 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被删去 在连续不断举出的这些事例里，不仅看出被认为爱读历史的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读书倾向，而且表现出毛泽东在分析江西苏区的战争时的灵活想法。

一面转战江西、福建，还要一面迎击面临的国民党大军，这时，在毛泽东的脑海里，可能不断地浮现出这种国内外的战史，特别是中国的战史吧。这可以从《春秋左氏传》到引出活生生的教训里想象出。他从现在的立场出发，不断地重温古典。

毛泽东说庄公和曹刿依靠“有利的阵地”转入反攻，但地名叫长勺的那个地方作为阵地是否有利，实际上在《春秋左氏传》

中并没有记载。可是，依照毛泽东的原则一整理，觉得也许是那样。

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是由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当时的党中央实施的而在被实施的中国有《三国志》、《水浒传》和《孙子》。

共产国际的策略和《孙子》的策略哪一个对中国革命战争（在当时的苏区真正有用呢？

据毛泽东讲，《孙子》有用。排斥毛泽东的人采取了与毛泽东相反的策略。指导其策略的，据说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名叫李德的德国人。结果如何呢？这在今天已成历史事实。

共产国际轻蔑《三国志》可是在拥有《三国志》的中国共产国际不是失败了吗？在开始长征时，即使毛泽东忽然那样想，似乎也并不奇怪。他即使没那样想，那么读了概括苏区经验，对此做出是非评价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人，恐怕也会深深地发出那样的感慨吧。

第五章 作为中国革命的舵手

(41 岁到 82 岁)

51 岁时，毛泽东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与国民党的内战中取得胜利。56 岁时，他建立新国家，作为与斯大林并肩的人物，确立了自己的权威。

不过，以苏联批判斯大林为界，为了保卫中国革命的成果，认为有必要让中国独立独行的毛泽东，在过花甲之年后，再次开展大规模的斗争。这就是中苏论战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以不动的一点为中心，像逐渐扩大的圆圈那样在逐步扩大自己行动的毛泽东，首先与党内的对立者相遇，超过对立者；继而与党外的蒋介石相遇，超过蒋介石；进而又与共产主义圈的苏联相遇，超过苏联；现在又直接遇到了正和自己相对敌人，未曾遇到过的对立者——美国。

在战后的世界中，中国的独立和发展显然具有巨大的意义，这是通过毛泽东的存在而完成的。

1.“长征”

带病“长征”

“长征”开始了。这是寻求新的根据地的长达一年的大行军。虽然那是因为失败而做的转移，但结果变成取得新胜利的行军。1934年（昭和九年）10月18日再过两个月就到41岁的毛泽东，从江西省雩都出发，加入那个队列。一出雩都的大街，便听到大河的流水声。伴随着薄暮，冷风吹到穿着夏服的毛泽东身上。

他的行李很少。只有两条混纺毛毯，一床薄被，一块防水布，一把雨伞和一些书。这些行李大概是他自己背，还有一些是让身边唯一的随员钟福昌少年用扁担挑吧。钟是17岁的少年，身背红十字标记的书包，证明他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医生。

毛泽东在“长征”开始的前一个月，因患疟疾而发烧。大概为了养病，去了雩都。他谢绝党的事务处长说给他配一名医生的建议，说有一名医生助手就可以了。然而，在雩都又发烧了，以前在福建省长汀住院时的院长傅连璋，骑马赶来。雩都离党中央政治局所在的梅坑有90公里，即使让马跑，也要一昼夜。听说毛泽东消瘦得厉害。这时，傅连璋寸步不离地护理他10天。不久“长征”开始。

毛泽东去雩都的理由只是为了养病吗？一种看法认为与受到留苏派的攻击有关，毛泽东处于一种被软禁的状态，这种看法还可以成立。据傅连璋讲，当时毛泽东的身边，只有一名秘书、一名卫兵，再加上医生助手钟福昌。作为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无论如何是太寂寞了。与留苏派的关系，大概逐渐进

入微妙的阶段。也许卫兵是监视他的吧。

因而 是否“长征”如果“长征”目的地选在哪儿 毛泽东没有参加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行李也只是限于自己能挑的范围之内。而且，与其他人一样，万没想到这次行军用了一年时间。

留下女人和孩子

工农红军出发时，所有孩子和大部分女人都留下了。在孩子当中，大概毛泽东的孩子也包括在内吧（如果能送到江西苏区……，再加上伤病员）。其中，还有毛泽覃和瞿秋白。为了进一步开展游击战，陈毅和项英也留下了。虽说留下，那是留在敌占区。这是没有再会把握的离别。

由于工农红军分散在各地，“长征”的出发点不是瑞金一个地方。另外，整个工农红军也并非一起到达。提到作为主力部队的红一方面军，他们是从 1934 年 10 月到翌年 10 月用一年时间。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到达是在那一年之后。走最远距离的士兵用中国里计算是踏破二万五千里——一万二千五百公里。如果连成直线，自北京向西走，横断亚洲大陆、欧洲大陆，即使到伦敦，也达不到这个距离。而且，这是边战斗边行军。

当然 正因为如此 牺牲也很大。红一方面军自江西省出发时 兵力号称十万、八万 可是到达陕西省保安的吴起镇时 只有七八千人。不过，也有人说，实际只有四千人左右。

红一方面军出发后一个月，在湖南省和广西省交界处附近，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在这里，必须冒着敌人的进攻渡过湘江，因此兵力损失过半 伤亡惨重。党的中央机关和行政机关带着大量物资，编成长达 5 公里的队伍 工农红军的士兵们为保卫他们付出了劳苦和牺牲。“长征”开始时，目的地被定在湖南省西

北部的苏区，但国民党军设有坚固的阵地，挡住去路。毛泽东强烈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在那里打胜仗之后休息。因为多数赞成，所以工农红军改变方向，首先占领黎平，接着强行渡过乌江，占领遵义。

在遵义休息 12 天时，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占领遵义是在 1935 年 1 月 8 日 召开扩大会议是在同月 15~17 日。

向共产国际领导挑战

遵义会议的详细经过尚未公开发表，毫无疑问这是带有党内激烈斗争性质的会议。

听说首先建议召开会议的是毛泽东，这不正常。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他，根本没有召开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权限，也没有建议召开会议的权限。至于要求自己参加扩大会议，那越权太多。中央政治局按照他的这个要求召开会议 这是向毛泽东的妥协 认输。

毛泽东并非突然提出要求。他为了召开这次会议，好像到处鼓动工农红军各军团的政委和军长。他滔滔不绝地说，“长征”的原因是在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时 中央政治局——留苏派采取的战术错了。在工农红军中，对中央政治局的怨气未消。反围剿时的拙劣战术 自不必说 即使“长征”开始后 也对不尊重士兵生命的做法感到愤慨 对“长征”的前途感到不安。毛泽东把那种不平不满集中起来，制造应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舆论 在此基础上提出要求。

一种说法是 他首先把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拉到自己一边 让召开扩大会议。或许是那样。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让工农红军的指挥官和政委三、四十人出席会议。这也有可能。因为只是毛泽东参加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毛泽东肯定失败。

这样把会议定为扩大会议 让自己的意见胜利的做法也是毛泽东在很久以后的 1966 年（昭和四十一年）8 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采取的。当时，让不是中共委员的革命教师和学生（不久后作为红卫兵登场）出席 而在党内排在第二位的刘少奇被排挤到第八位。

“长征”时期 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 是总书记秦邦宪和军委主席周恩来，还有军事顾问李德这三人掌握着实权。他们的背后有共产国际 谁若不小心反对他们 定会受到共产国际的斥责和处罚。因而 毛泽东必须让这次会议合法化 而且一定要胜利。

据传 会议一开始 毛泽东就猛烈攻击说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是错误的。大概是那种情况吧。留苏派从上海到瑞金以来，尽管毛泽东每每受到排斥，但是他只能以最大的忍耐力来对待。只允许他做有节制地反驳。必须维护共产国际的权威和中国共产党的铁的纪律的这种自制和虽然自己正确但却受到排斥的这种愤慨 在他内心中已怀恨多年 达到白热化。他不堪忍受自己的矛盾和烦闷 日益消瘦 几次病倒。

然而现在，在维护共产国际的权威和中国共产党的铁的纪律的框架内，与他们斗争的时机到了。而且，他们指挥的失败，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在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决不会不攻击应该攻击的人。“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这是后来毛泽东的话，但恐怕也是他当时的心境吧。

与职位发生逆转的周恩来的关系

上井冈山后他一直注重培养教育工农红军的指挥官、政委和士兵，所以他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其结果，带来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胜利。

与此相反 秦邦宪等人没有自己培养教育的士兵。而且，一想到士兵的不满和前途的困难，自然只有将一定程度的权限给予有威力的毛泽东。

毛泽东胜利了。朱德和周恩来成为军委副主席，朱德兼任红军总司令 周恩来处理日常业务。至此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地位发生逆转。不 如果考虑到以前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 实际上是超过了逆转。

周恩来比毛泽东小 5 岁，出生于浙江省绍兴。他与开创中国近代文学的鲁迅的真名周树人是同姓，据说这二人有血缘关系。从面部感觉看 似乎很像。绍兴自古以来 有许多人称作师爷 作为县知事等的秘书 处理审判和文件。这样的实干家 叫师爷 这是绍兴人的评价。不过 他们被称作幕客 躲在幕后 不公开露面。周恩来始终树立毛泽东，不能不说是继承了绍兴的这种政治传统。

他曾于 1917（大正六年）10 月至 1919 年（大正八年）5 月留学日本。住在东京的牛込山吹町，在法政大学开设的中国留学生预科班学习。他仰慕河上肇 想考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 去京都 不久 在北京发生了五月四日示威游行。他听到报道后 急忙回国 在天津 作为学生运动领导人 很活跃 接着去巴黎 在那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

遵义会议的结果，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地位发生逆转，那么，他怀有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不清楚。有的回忆录描绘出周恩来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在应该工作的范围内为毛泽东处理业务的姿态。另外，别的回忆录也记载了作为出色的侍者跟随毛泽东慰问伤员的周恩来。

从结果上说 正如今天所看到的 毛泽东——周恩来的搭档 已形成，而他的能力确实超过了他想维护的谨慎的立场。他按

照他的判断维持着那种搭档。

不过 如果重复说的话 这次遵义会议是一种中央领导权的更换。这种最高干部的人事变动，需要事前经共产国际同意。毛泽东敢于突破那种限制。就是说，这种转换是对着共产国际的。

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若探寻遵义会议后的工农红军动向，可以说是打圈战。这是毛泽东上井冈山时讲给士兵们听的战术。渐渐毛泽东发挥了本领。

毛泽东扔掉重物，把非战斗人员分散编入各部队，提高了部队的机动能力。而且在娄山关、土城场、茅台来回来去转 以再次占领遵义的军事行动，歼敌几个师。茅台是著名茅台酒的产地，士兵们没收地主仓库里堆积如山的酒缸。不会喝酒的士兵，就用它洗脚，以解行军疲劳。

红一方面军从遵义出发 折回 再渡乌江 进入云南省 做出攻打昆明的样子——就是说 让敌兵力集中于昆明 我方奔向金沙江。河岸只有 6 只小船，但四天后全军渡河完毕。甩开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

1935 年 5 月，强渡大渡河。这里是太平天国英雄石达开失败的地点，一部分工农红军要过这条河，另一部分前往泸定桥。

所谓泸定桥，就是在三百米宽的河面上架起 9 条铁索 在其上面铺满木板，左右以两条铁索为扶手的吊桥。国民党军把这些板子全部烧光，只剩下铁索。首先，12 名（也有说法是 22 名）士兵冒着敌人的火力，攀缘铁索前进，工农红军渡过了大渡河。大渡河流速为每秒四、五米。

6 月，要翻越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夹金山。如果翻越夹金山，

那么从四川省苏区来的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在等他们。红一方面军的士兵，高声唱歌前进。只穿着夏服的士兵，得到当地居民的忠告 喝点酒、吃点辣椒之后再爬山。可是 酒和辣椒都买不到，仅靠一根临时做的拐杖开始爬山。

伴随着爬山 雪一个劲儿地下 氧气不足 呼吸感到困难 但士兵们互相帮助，用四、五个小时终于翻越过山。有的部队，也有由于太疲劳了，相互拥抱着就坐下去，再也站不起来的士兵。军队驻扎在山脚。这是红四方面军。

从瑞金出发半年后 即 1935 年（昭和十年）6 月 毛泽东等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在懋功，同从四川省北部苏区逃脱而来的张国焘、陈昌浩等人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红四方面军从他们苏区出发后，并没怎么苦战。据说在途中的北川，成立了西北联邦政府，这大概在补给方面发挥了作用，士兵们的脸色也很好。

此时，红四方面军的兵力约 4.5 万人 步枪 2 万余支 而红一方面军的兵力仅有 1 万人。林彪的第一军团有 3.5 千人 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有 3 千人 董振堂的第五军团不足两千人 罗炳辉的第九军团有几百人，再加上党中央直属部队若干。虽然步枪的数量不明，但如果说一支步枪平均只有 5 发子弹 那么其火力大致可以想象。

与张国焘的对立

这种兵力和武器的不同，一定会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双方出现微妙的空气。据朱德讲，张国焘相当露骨地显示出优越感。在懋功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和张国焘表现出最初的对立。

毛泽东建议把目的地设在宁夏省。在离瑞金之前，收到共产国际发来的电报，指示说，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这成

为毛泽东以及支持他的人的根据。毛泽东发言说，请求苏联供给大炮和飞机 与蒋介石决战 挽回名誉。

对此 张国焘建议暂时在四川省的偏僻地方开创苏区 休养生息。

会议没有得出结论就到了午饭时间，根据会议主席毛泽东的建议 散会。而且在当天下午 由于毛泽东反复做工作 得到政治局常委的同意，让张国焘承认重编工农红军和北上。然而，即使在下一个驻地毛儿盖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关系也没有好转。

工农红军不久将不得不通过吞下连人带马的无底的沼泽地——草地 兵分两路 约定在草地的对面会合。

先出发的毛泽东与后出发的张国焘之间，不幸走了两叉。后来 张国焘在草地遇上大雨 因河水上涨 过不去 为了让士兵休息，他主张返回。据与毛泽东一起行动的某人回忆录称，等了一周的毛泽东，尽管打了催促的电报，可张国焘对此采取无视态度。与张国焘一起行动的朱德，后来对史沫特莱作证说，是河水上涨了，但没有讲为什么不等到河水退下来。

掉转方向南下的张国焘，在卓克基召开会议，做出决议要与毛泽东等人分开，成立另一个临时党中央。而且，张国焘成为书记。按照以前的主张，在西康省建立了苏区。一年后，贺龙的红二方面军到达，被贺龙说服的张国焘，与贺龙一起北上，在陕西省同毛泽东会合——不过 即使在那时 他还命令一部分部下继续北进宁夏省。执行命令的他们，遭到回族骑兵队的袭击，几乎遭全歼。

1937年 张国焘受到批判。翌年夏 他逃到汉口 发表了脱党声明。毛泽东把他留在延安的妻子送到他身旁，新中国成立后，允许他儿子在新中国的大学里学习。这是普通人毛泽东的

一面。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见解，张国焘是作为反党反中央分子来对待的。然而，据张国焘讲，毛泽东在通过沼泽地之后，事先不与就在附近的张国焘的先遣队徐向前等人商讨，就以先遣队的名义继续前进，所以首先应该受指责的是毛泽东的分裂行为。而且，他提出质疑，说由于毛泽东重新改名为陕甘支队，使国民党军误认为后续的张国焘等人才是主力部队，企图转移攻击的方向。

确实，毛泽东肯定在草地的对面等了一周时间，但即使再等他一两周也无妨。

但是，也许毛泽东看透了，即使那样做，迟早要和张国焘针锋相对，在想撇下张国焘，下决心出发时，他大概考虑张国焘会因此而如何出发呢？自然等了一段时间。

政治的，且又是人类的戏剧性事件

在出现这种分裂时，朱德为了避免自己的部下和张国焘的部下之间发生战斗，不得已协助了张国焘。然而，自那以来，他一天也不刮胡子，以此证明等待与毛泽东再会的诚意。

据张国焘讲，他后来继续用电报与毛泽东联系，电文已经具有相互安慰处于困难境地的对方的调子。

“长征”是军事的戏剧、政治的戏剧 同时也是人类的戏剧。

“长征”是无论怎么赞美 也赞美不完的伟业。然而 为了不美化革命，应该指出虽然造成了这种程度的损失，但中央政治局的成员没有一个人掉队这样一个事实。

他们骑马（听说朱德把自己的马让给伤员，徐特立一次马也没骑，一直走到底），当疲劳得连马也不能骑时，就被抬到担架上。——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被抬到担架上。虽然病了，但是

……。抬担架的，自然是士兵。士兵们对自己的伙伴渐渐倒下去，可是不予理睬，被迫给大人物抬担架怀有不满。然而命令者朱德，没有改变这个方针。他不会不了解士兵的心。但是，他有自己的考虑，只要保存好领导人，到达目的地后，再增强工农红军是很容易的，他忠实地遵从这种考虑。

到达延安的女性有三十几个人，听说普通士兵的妻子不允许同行。

在不让孩子同行这一点上，领导人和士兵都是平等的。途中诞生的婴儿，被委托农民看管。——就是说被遗弃了。

……所以“长征”这个事实本身是很令我们感动的。

2. 延安

走向连接舞台的通道

1935年(昭和十年)10月,毛泽东率领北上先遣队——陕甘支队,好不容易摸索走到中国最北边。到达的小镇,是因战国时代名将吴起而命名的吴起镇。在其背后的很远处,有连绵起伏的黄褐色山脉,在山峰的连线之间修筑了万里长城。城墙虽然几乎倒塌,但它明确地标示着:对于修筑长城的人们来说,认为对面是野蛮的匈奴的土地,古代中华帝国北边的疆界就在这里。

自古以来这一带是以出盗贼而著名。明朝末年出现13个首领。此外,米脂出了个李自成,延安出了个张献忠,这两个人都是山区推出,举行暴乱,流了许多血。由于他们很活跃,加速了明朝灭亡。他们当时虽然被称为盗贼,但实际上是流浪者集团,只不过是出于饥饿和残酷的政治造成农民起义。工农红军决定把根据地建在陕北,这在某些方面与历史保持默默的一致,但在国民党的高官眼里,似乎是不祥之兆。

那里是中国的边界,但靠近北京(当时叫北平)天津。占领中国东北,并建立傀儡国家“满洲国”(1932年,即昭和七年)的日本,进而又越过万里长城,把手伸向北平、天津一带。中国的舆论很激愤,日本与中国站在是战争还是和平解决的重大的歧路上。从这点来说,下一个世界史的舞台,是中国的北部,幕布正在拉开。而且,正是中国共产党出现在连接舞台的通道上。

毛泽东在进入陕西省之前,在甘肃省翻越了六盘山。六盘山虽然不那么高,但上下有30公里,山顶附近只长一些枯草,是个难爬的山。这是“长征”的险峻难行的地方。

他在这里填了如下的词。其高雅的格调似乎显示出他已充分预感到不久将要开始的历史。

清平乐·六盘山
一九三五年十月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清平乐〕词牌名。

〔南飞雁〕在汉武帝时 苏武被匈奴抓走 命令他在现在的西伯利亚牧羊。他把信拴在向南飞的大雁腿上，告诉祖国的人自己还活着。毛泽东看到向南飞的大雁，又想起了苏武的故事，大概他想起留在南方继续战斗的同志了吧。

〔好汉〕据说汉武帝屡征匈奴，故匈奴惧怕汉兵，称其为好汉。好汉一词便由此而来。在《水浒传》里出现的一百零八名男子相互称“英雄”、“好汉”。毛泽东在其他地方也多次使用“英雄”、“好汉”。

〔长缨〕捉拿敌人的粗绳。

〔苍龙〕古代被看作是最凶恶的太岁神 这里指国民党军。

——一两朵白云轻轻地飘在万里晴空中。凝视着成行的大雁向南飞去，直到看不见。不到达长城中途掉队的人，那可不是堂堂的男子汉啊！话虽如此，扳着手指计算，已经走了两万里了！

看！六盘山上高高的山顶，红旗被猛烈的西风吹得哗啦啦响。古代武将降服敌人时使用的长缨已掌握在我们手中。捆住那个凶恶的苍龙，以大大改变历史，并不是那么遥远的未来。

国共合作的成立

对工农红军即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北京立刻表示出敏感的反应。在毛泽东到达吴起镇的两个个月后，举行了连小学生都参加了的学生示威游行。这是北京、天津一带反对建立日本傀儡政权的示威游行 同时 从对日妥协的国民政府来看 又是反政府的示威游行 从三年前已对日宣战的毛泽东等人来看 这又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示威游行。停止内战、挽救民族危亡这一中国共产党的鼓动，从此以后迅速扩大，形成中国民众一致的舆论。

1937 年（昭和十二年）7 月 7 日，在北平郊外发生卢沟桥事变 日军以此为契机 发动侵华战争。日本称为“事变”不叫“战争”最终也没有宣战 但这是战争这一点是谁也无法否定的事实。国民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由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 昨天的敌人变成今天的朋友。

根据国共合作的决定，工农红军将在陕西省的部队改为八路军 将在长江流域的部队改为新四军。停止使用苏区、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名称 决定叫边区、抗日根据地 或者解放区。土地改革也变得相当灵活，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

从 1937 年 1 月 13 日起，中国共产党进入延安。从此以后到 1947 年为止的十年间，延安成为表现中国进步的象征。

大大敞开的通往权力之路

毛泽东在延安的生活总算有了着落。在四周被高原形状的

平坦山脉包围的小盆地有延河流过，隔着河有延安城。毛泽东专门住在郊外的窑窟式住所（汉语叫做窑洞）这一带的农民全是这种住所，但毛泽东住下大概有防空的意思吧。

虽说是窑洞，但并不是说寒冷的岩石外露，水滴往下落。从戈壁沙滩用几万年时间通过风运来的细砂，形成厚达百米多深的地层，即所谓黄土层。窑洞就是在黄土层上挖掘的横穴。大开入口处，在那里贴上墙板，安上窗户和门。室内明亮，如果窗下放张桌子，可以读书写字，窑洞冬暖夏凉。由于这个地方雨水少，不担心山崩。厕所是在屋外小院子的墙角外建个小屋。这个地方因树木少，所以木材贵重。这种造房子方法很简便，而且这又是最合适的住所。如果顺着高度交错进行的话，在黄土层的任何一阶都能挖横穴，所以一到晚上点灯时，简直同高层公寓的夜景没有什么两样。

在延安，毛泽东解决了几个课题。每解决一个课题，他都才识高人一等，从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变成全中国的毛泽东，渐渐被人们承认。这是他的力量，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非常幸运。

最初的而且也是最大的幸运，是“长征”途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承认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因此，各国共产党在选出其最高领导人时，不需要一一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即使关于内部纠纷，共产国际也不再介入。所以，毛泽东在这次共产国际大会召开的半年之前，举行了遵义会议，迫使总书记辞职，对这一点他不再担心受到共产国际的斥责。

在遵义会议上被剥夺部分权力的留苏派，虽然想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卷土重来，但其梦想已被共产国际给打消了。像江西苏维埃时那样，仰仗共产国际的权威排斥毛泽东，已变得完全不可能。对于毛泽东来说，通往权力的道路已大大打开。

然而，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提出另一个新的方针——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的策略。这是指在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因为得势的法西斯主义是战争的原因，所以反对战争的势力全部结成一个战线，想联合打倒法西斯主义。而且能够结成一个战线的共同基础是民族。这对于以前只搞一种阶级斗争的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来说是划时代的新方针。

终于登上掌握党和军队最高权力的宝座

在共产国际的新方针提出之前，中国共产党从同样的立场出发，开始号召结成统一战线，这在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共产党自然接受了共产国际这个新方针。而且在舆论的支持下，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

不过，虽说建立了国共合作，但国民党的性质和内容并没有彻底改变，所以如何建立合作关系便成为问题。毛泽东提倡“既团结又批评”、“共产党保持独立自主”的方针。这也许是指勿忘今天的朋友就是昨天的敌人。毛泽东写到，与其从外国和书籍中吸取教训，不如首先学习许多同志流血的教训更重要。

与此相反，1937年（昭和十二年）末，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提倡“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方针。这无非意味着应该无条件服从国民党和国民党支配的国民政府的指挥命令。

王明从1931年开始，一直在莫斯科生活。各国共产党让出席共产国际大会的代表驻在莫斯科，王明的资格是受中国共产党派遣的代表。他还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做了报告。

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和出席共产国际大会的代表，基本上都是处在各国共产党最高地位的人物。意大利的陶里亚蒂、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德国的皮克，而且王明去苏联时的

头衔又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在中国是代理总书记。如果以共产国际为标准 那王明的地位要比他们高得多。

项英赞成已回国的王明的主张，长江流域的共产党和新四军开始通过项英执行王明的方针。没有参加“长征”，留在江西苏区迎接国共合作的项英，原来是与留苏派有密切的人际关系的人物。

如果国民党方面采取响应王明方针的政策，或许说王明提出的统一战线理论是正确的。但是，国民党并没有那样做。他们命令正在实施王明方针的新四军转移 结果途中被包围 受到近乎全歼的损失。在被杀者中还有项英。

对留苏派的打击还在继续。1943年5月 曾是他们后盾的共产国际解散，结束了长达约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

在那后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将毛泽东作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现在，毛泽东无论是在权威上，还是在制度上，都掌握着党和军队的最高权力。当时他年满 51 岁 从遵义会议算起 正好是第 10 个年头。

在整风运动中有效利用 中国历史、风土和民众

对于他登上权力的宝座，虽然外界的变化这种好运帮助了他，但是如果他本身不成为原动力的话，恐怕局势也发展不了。特别是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前他开展的整风运动，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体质，成为他的权力赖以支撑的基础。这是一场自我检查、反省和接受他人的批评 以及像受到他人批评那样自己批评自己的运动。

作为政治机能 这变成苏联开展的肃反。毛泽东说，整风运

动的目的是“治病救人”禁止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感到痛苦。毛泽东认为，如果滥用马克思主义的公式，采取在大会上多数人表决通过，继而靠惩罚吓唬不服从决议者的做法，中国的革命不会胜利。既然中国革命以中国人为对象，以中国人为主体来进行，那就需要采取与中国的历史、风土和民众相一致的做法。

他想造就受群众爱戴、现实中能学、又能以身作则的党员。其结果肯定是以共产国际为靠山、仰仗共产国际的权势的人们不能再次在党内掌权。

正如《论语》上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不讳疾忌医”那样反省和自我矫正是儒教的精神，能这样做的人才受人尊敬，不被蔑视。自我批评对本人来说，是既害羞又痛苦的事情，但如果越过它，反而会受到信任和敬佩。

毛泽东在上井冈山之前编出“三大纪律”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前研究出整风运动。从后来看，整风运动是为了经受住共产国际解散的冲击，使中国共产党独立的最适合的准备工作。

不过，毛泽东事先并非知道共产国际的解散。

与江青结婚

毛泽东起初住在杨家岭。三个窑洞并排，正中间的屋子有入口处，那儿与西侧毛泽东的屋子和东侧卫兵的屋子相通。

接着住在枣园。成为地名的枣的树木少，而梨树多。到了春天，由于花同时开放，即使在延安，也是风景优美的地方。窑洞并排有 5 眼，土墙把窑洞前面的院子围起来。左边的窑洞里住着周恩来，紧挨着的是刘少奇。

毛泽东迁到枣园是 1939 年昭和十四年的事，大概是与现夫人江青结婚之后为组建新家庭而迁到这里住的。

江青是在上海很活跃的电影演员。当时的上海电影界，制作了几部号召抵抗日本的爱国作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暂定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也是那些作品中博得好评的主题歌。这些电影的制作 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

江青还在重庆国民党宣传部直属的电影公司里演电影，但那些电影在内容上是号召抗日的。这些拍摄结束后，她就去了延安。国共合作一成立 进步的知识分子、学生和艺术家就把延安当作目标 江青也是那当中的一人。

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让年轻的学生和艺术家入学 对他们实施再教育 毛泽东还经常在那儿讲课。据说进鲁迅艺术学院的江青 在热心地听毛泽东讲课 将誊清的笔记交给毛泽东的过程中结下情缘。

她当电影演员时，曾用蓝苹这个艺名，但其真名叫李云鹤，也叫过李青云。在旧中国 像日本那样 户籍并非在原籍 因此改名很自由。年幼时，由于父亲去世，是在母亲的娘家长大的，所以姓李这一母姓。

在延安之后改名江青 起这个名字的 大概是毛泽东。这是取自唐代八世纪的诗人钱起的著名诗词中的一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钱起的这首诗 是歌颂毛泽东在长沙时期经常游泳的湘江的神 即湘君和湘夫人的。古代传说 尧帝有二女 姐姐叫娥皇 妹妹叫女英 二人同嫁舜帝。舜南游死于苍梧 即葬其地。二妃寻舜至湘江 姐妹二人跳入湘江殉死。而且 变成湘江的神。1961 年（昭和三十六年）毛泽东作的一首诗《答友人》中也可以看到这个神话。

江青大概是在 1915 年（大正四年）前后出生 因此同毛泽东结婚时 恐怕比毛泽东小二十一、二岁 是 24 岁。在延安几乎不公开露面。

新中国成立后，江青在文化方面很活跃。她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对电影题材中的典型人物进行实地调查，又去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传达毛泽东的见解。她的那种活跃之所以长久不为人所知道，是因为她使用了李进这一笔名。在1961年毛泽东所作的诗里，加上“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这个序，而那个李进同志也就是她。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她几乎看了京剧等的所有演出，给毛泽东提供了基础资料。1966年（昭和四十一年）当文化大革命终于开始时，她作为文化大革命小组的一员很活跃，经常给红卫兵讲话。一般认为红卫兵活动的相当一部分是由她领导的，这与毛泽东并非无关。

爱吃辣椒的湖南人

毛泽东与江青之间有一个女儿，叫李讷，1940年（昭和十五年）前后出生。在新中国，子女可姓父母任何一方的姓。李讷在北京大学学历史，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率工作组去母校北京大学调查。这时，用萧力这个笔名，在人民解放军的机关报《解放军报》中工作，非常活跃，终于让深受林彪信任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和该报副总编退下阵来。当时，萧力的名字曾上升到解放军方面人员的第14位。

据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时，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对江青说，党交给你一项光荣任务，照顾好毛主席。由于得到理想的佳人，毛泽东渐渐胖了。与埋头于同军阀和国民党军无休止的战斗的江西苏区不同，在延安的十年间，他好不容易享受到像家庭那样的氛围。

在枣园的新居，他把一个窑洞作为办公地点。内有一张桌子，一把木制的带有圆靠背的椅子，两条长凳子，一个茶几，两个

书架。

他是夜晚工作型，把办公时间安排在夜深人静时。一到晚上十点 就开始在油灯下工作，一直埋头工作到早晨六点。整个工作期间 只喝一杯牛奶 什么也不吃。主食是米饭，有时是白面馒头 最多的还是二米饭 菜有两三种。

在杨家岭时，一发现能吃的野草 就叫来士兵 让他们转告周炊事员用油炒一下 而且让其减少菜量。另外 姓黄的炊事员还给煮过猪蹄。饭后 毛泽东叫住他 问道 今晚的菜很好吃 什么原因呢？这样伙食费不是超规定了吗？炊事员答道：是想办法用了点便宜料 毛泽东听后表扬了炊事员 并说要遵守伙食费规定。他喜欢湖南人不可缺少的辣椒，吃饭时一定要让放辣椒。而且开玩笑说，喜欢吃辣椒的人是革命型的。

他虽然不浪费食物 但常吸烟，一天吸 80 支。不久以后 派驻重庆的周恩来 把在那儿得到的英国烟送到延安 这几乎成了他的一项工作。毛泽东是个好吸烟的人 这一点很有名，“长征”时 因缺烟很痛苦 与同样是好吸烟的李德一起 尝试着吸各种各样的杂草。

桌子上放着一支红兰两用铅笔，一瓶墨汁，一支毛笔。这是他办公用品的全部。

寝室里没放表。因为嘀嗒嘀嗒声影响安眠。

工作一结束，他常打麻将和打扑克。但不赌钱。还有时跳交际舞。他连续跳好几首曲子，直到出汗为止。解散时他说今天充分运动了。

总之 与其说革命生活 不如说他的日常生活开始了。

与江青相识之前 毛泽东就与贺子珍不和 已经离婚。

听说贺子珍有五个还是两个小孩。还听说其中一个孩子与

贺子珍一起生活叫李敏。李敏在文革时，似乎在国防科委中活跃。

女性史沫特莱说 作为在延安见到他时的印象 感到他精神上孤独。毛泽东曾说让自己孤立，把自己封闭起来。他虽然那样教导说要向群众学习 但作为他个人来说 是使自己保持一种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上一直尊重的孤傲这一处世态度。他在第一师范时期 周日外出一回来 虽然在食堂吃晚饭 但他不加入乱糟糟的说无聊话的伙伴中 而是一个人悄悄吃饭，一吃完就埋头学习。听说掌权之后 特别讨厌阿谀奉承。

白天睡觉 夜里起床 这大概也是限制他与外界接触 保持孤独的一种障碍。

3. 孤独的革命家

人民解放的旗帜进入北平

1945年（昭和二十年）8月15日清晨 秘书拿着紧急电报来到毛泽东住处。然而 毛泽东刚入睡。很有礼貌的秘书，一直等到他起床。他中午时分起床 看到电报后大喊：“我们胜利了！”

那是一份通知日本已向盟军投降的电报。毛泽东立刻给朱德打电话。不一会儿，朱德来了。当天便向协助日军的各地傀儡军发布命令 要求他们向人民军队投降 交出武器。

当天夜晚 延安有接连不断地举着火把的游行队伍 锣鼓喧天。毛泽东的窑洞 彻夜通明。

然而，还不能说因此中国就和平了。毛泽东在当月飞往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但未能避免与国民党的内战。

发动进攻的国民党军，开始时占有优势。毛泽东采取擅长的首先退却的战术，撤离了延安。不过，他没离开陕北一步，与周恩来等少数成员一起迂回式地转移。当发起反攻时，便将侵入陕西省的国民党军一个旅一个旅地各个击破。

在过去日本建立傀儡国家“满洲国”的东北，到处都是由美国飞机运来的国民党军，但人民解放军控制着东北。越过万里长城，进入天津、北京（当时的名称是北平），进而像巨浪一样去攻打南方。在四分之一世纪前，国民革命军以广州为起点，开始了打倒北洋军阀的“北伐”，是从南向北的进攻，而这次与那次相反，人民解放的旗帜是由北向南前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10月1日，新的国家诞生了。这一天，毛泽东面对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30万人民解放军、市民和学生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30万人对此报以热烈掌声。接着，他在54门大炮分别打出28发礼炮中，升起新制作的国旗——五星红旗，宣读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其内容是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政府委员正式就职一事，署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随后，朱德传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命令，并举行阅兵式，以此结束开国大典。毛泽东时年55岁。

开国大典两个月后，毛泽东访问苏联。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到达莫斯科后，当天就会见斯大林。

对于斯大林来说，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斯大林1945年对美国大使哈里曼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是人造奶油共产主义者。也就是说，那是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大会上，名副其实地当

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那一年。

斯大林又在 1945 年作了如下忠告：

——在中国 即使中国共产党采取军事行动 也无胜利的希望。应该与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签订协定 加入国民政府 成为一员。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默默地听着 尔后回国 从此开始着手国共内战的准备。在国民政府受到人民解放军的攻击逃离南京时，各国大使处于绝望之中，仅有一名苏联大使跟随去了广州。这是斯大林约见毛泽东仅八个月前的事。

对于毛泽东来说，斯大林是革命的导师，这一点不能否定。但是 他的个人秘书、听说还代笔为他写文章的陈伯达 在祝贺斯大林 70 岁生日的文章中说，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成员没有机会系统地研究斯大林写的关于中国革命方面的论著。接着写到“毛泽东也是如此”但后来删掉了。这是事实。

不过 当时对于毛泽东和斯大林来说 两国的同盟双方受益都很大。根据这个同盟建立的密切关系，一直继续到 1956 年（昭和三十一年）苏联共产党批判斯大林时为止。

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

宣告国家成立的毛泽东，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传统上看，不会与政治无关。而且，政治行为的最高表现首先是建立国家。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但从其教养看，与知识分子的体系相关连。对于将农民和知识分子兼于一身的人物来说，再没有比开国的业绩更大的了。可以说，他充分利用了生在中国的机缘。

如果用近代以前的话来说，他是开创新王朝的皇帝。

而且 在社会主义圈这一超过一个国家的范围内 当与苏联

的斯大林握手时，他具备过去中国任何皇帝都没有的权威。继而在同苏联展开论战时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继承者而出现。也就是说他即使在具有人类普遍真理的世界上地位也是最高的。

可以说只要能扩大自己的形象就让它扩大。

不过尽管如此也不能说毛泽东没有缺点是一个完人。

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发生了梁漱溟事件。梁漱溟是提倡采取自治办法建设农村，以此为基础谋求中国社会改革的哲学家。实际上他曾到过农村去实践自己的想法。但是，其活动资金是从军阀和国民政府那里领取的。

在北京召开相当于日本国会的政治协商会议全体委员会议时梁漱溟指出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差别太大。休息片刻后会议再次开始时担任主席的周恩来立刻站起来说梁漱溟的发言是阴谋破坏工农联盟。梁漱溟请求发言，正当他刚讲一两句的时候毛泽东把桌上的麦克风拉到跟前斥责道你大概认为自己比漂亮的西施和杨贵妃还美吧，然而你是臭气熏天。据说毛泽东的讲话声特别高，嗓音又尖，恐怕这个时候也是那种声音吧。他又说大概台湾夸你是硬汉子有勇气吧可是你有臭气，你的骨头都是臭的。

为了声援毛泽东，从参加会议者中——据说那开始是来自梁漱溟所属的民主同盟发出‘反动分子从讲台上下去！’这种声音不久整个会场齐声斥责。

夫人江青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对红卫兵说主席对毛泽东的称呼平时话不多。从江西苏区时开始就有传闻说冷静、沉默寡言，有时与客人交往时说些幽默的话的他，一旦发怒，就以猛烈的气势，口出粗话。

在谋求调整人民公社的1959年(昭和三十四年)7月的庐

山会议上 彭德怀提出意见书 当说毛泽东的做法是患了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时 毛泽东用约 40 分钟反驳彭德怀 在那之后 又把用粗话骂彭德怀的信寄给诗刊杂志的编辑部，说明自作诗的意图。那封信到底也没有登在杂志上。

回应来自内外的挑战

对于毛泽东来说，1956 年（昭和三十一年）是一个转机之年。如前所述，苏联开展对斯大林的批判，毛泽东眼见自己建立的绝对权威在渐渐崩溃。而且，在中国，也同样必须面对开始出现的向自己权威挑战的动向。在批判斯大林半年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大会上，通过了让毛泽东权力逐渐减弱的新党章。而且，在那个党章里，还设了名誉主席这个位置。如果引退，这就是给他的有名无实的位置。

毛泽东当时 63 岁。

或许他当时打算引退。不过，苏联的动向对于他来说是个危险信号。他认为首先应该断绝与苏联之间的密切关系，1960 年以后，显露出与苏联的对立，开始了所谓的中苏论战。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攻击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赫鲁晓夫第一书记兼总理，赫鲁晓夫在 1964 年被中央政治局的年轻成员免职。在莫斯科正式发表这条新闻的当天，中国在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这是最初的核实验。由于在中苏关系决裂中，还纠缠着拥有核武器的苏联向中国的贷款问题，因此感到这完全带有对赫鲁晓夫下台表示祝福之意。

这样，中国与苏联完全不同这件事给国内外以清晰的印象。在默默中确立了这种想法：即使在苏联开展对斯大林的批判，在中国也可以不开展对毛泽东的批判。

接着，毛泽东将矛头一转，对着国内的反对派——刘少奇、

邓小平、彭真等人。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以后 毛泽东不再理睬苏共中央。尽管他自认为对苏联已经取得胜利，但这个巧妙的方向转变使人想到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有驱逐中国共产党内反对派的意图 作为其事先准备 不是攻击了苏共中央吗？

毛泽东在攻击刘少奇等人时 扣上“修正主义”帽子 而所谓修正主义 是毛泽东给苏共中央扣的帽子 是中国民众这两三年多次从报纸上看到、从广播中听到的。而且，即使是刘少奇等人 他也向民众大声喊道 那是坏人 必须打倒 他给他们戴上易懂又能立刻引起民众憎恶的帽子。假如当时毛泽东没想批判刘少奇 但批判苏联共产党的修正主义一事 从结果上看 在批判刘少奇方面形成了极为有效的准备。

毛泽东在第一次核实验的一个半月前，在党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 然后 他离开北京去杭州，着手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因如他后来自己所说的那样 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中国共产党致苏联共产党的公开信和批判文章，是毛泽东与陈伯达等人共同执笔，或毛泽东负责校阅的。但这次是他以夫人江青和秘书陈伯达为中心，汇集年轻的哲学研究者和文艺评论家（其中之一的文艺评论家姚文元，于 1965 年（昭和四十年）11 月，首先利用文章开始攻击。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也是经过毛泽东校阅和修改的，这可以从后来由他们署名的某篇文章的一部分是作为毛泽东的语录发表的这一点看出。

为了确保发表文章的舞台，陈伯达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的办公楼 夺走编辑权。于是 发表的文章收到了效果。不过，仅靠文章，党的机关不会解体。新中国成立 2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位于中国政治体制的顶点。对此加以

攻击的就是反革命这一观念已完全深入民众中。

支持红卫兵

在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已牢固确立的中国，要想让这个共产党解体该如何做好呢？这是个难题。他想动员中学以上的学生，但深知权力斗争需要武装力量，因此便通过林彪国防部长，动员人民解放军，作为学生的指挥及后盾。学生改名为红卫兵，从1966年（昭和四十一年）8月起，展开街头活动。毛泽东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八次检阅红卫兵，共计多达1500万人。

红卫兵逮捕反对派的重要成员，像过去起义农民对待地主那样给他们戴高帽游街，还在成千上万的百姓面前批斗。

后来，当红卫兵虐待俘虏时，毛泽东似乎流露出不满。严厉地批评说：过去工农红军的士兵是不准侮辱俘虏的。因此，大概在这里使用过俘虏这个词。

然而，假如红卫兵不采取这种直接行动，那么反毛泽东派的党干部恐怕不会丧失权力，他们掌握的党的机关和团体也不会解体。

毛泽东与斯大林不同，他在有生之年面临着企图削弱自己的权威的挑战，但他战胜了。与斯大林不同，在树立自己权威方面终于成功。开除了刘少奇，其后又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大会歌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功绩，还通过了新党章。那是1969年4月的事。他当时75岁。

单纯而勤奋的知识分子形象

尽管他经历这么大的变动，而且又是自己一手发动的，但他的个人生活没怎么变化。如果脱离外部的政治生活，只看他这个人的话，那么他只不过是一位单纯而勤奋的知识分子。

在北京，他和刘少奇等人一起住在中南海。位于天安门的左边，是过去皇宫的一部分，建筑物仍保持原样。现在他住的，与延安的如同农民式的窑洞住处完全相反，是贵族式的住宅。

即使在这儿，他依然继续着夜间工作的生活方式。平时没有在 11 点之前起过床。起床后，首先在住宅内的游泳池里游泳。游泳池的水温随季节增减，秘书也一起游。因为他边游泳边聊天，秘书成为他的陪伴。有时卫兵也一起游。

中午吃早饭，午饭是下午 6 点。晚饭是不到深更半夜不吃。而且喜欢吃湖南饭菜，必有辣椒。晚 10 点到次日凌晨两点是他繁忙的办公时间。会见外宾、批阅文件、找高级干部谈话，也是这个时间。

抽烟比延安时期减少了，他喜欢抽在中国属于最高级的印有熊猫的香烟。每年夏天去秦皇岛、庐山，冬天去上海、杭州。经常在全国各地视察。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时，他在北京的中南海家中迎接总统。出现在电视中的他的书斋，只见中国的古书堆得高高的，简直像学者的书斋。据说他在北京西郊还有自己的图书室。

他写字的速度相当快，即便使用带格的便笺，他也会突破格子的界线，像龙飞凤舞一样地书写。他与朱德的很工整的温和的笔迹形成鲜明对照。他的雄劲字体在新中国成立后流行起来，其他的人也模仿他的字体书写，还出现了把这个叫作毛体的新词儿。他的私生活，归根结底是书斋人的生活。

他依旧经常游泳。1964 年（昭和三十九年）他和刘少奇一起在北京郊外的十三陵水库这一人造湖上游泳，又在长江游过几次。

他喜欢游泳甚至带有政治意义，1966 年 7 月 16 日，72 岁的他在长江游泳，此事连同照片一起被报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开始的信号。关于这张照片，还有事后的谈论。这就是不久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另外的人物问题。有人批判说这张照片是《人民日报》社社长熊复给合成的。这虽然是间接的，但大概承认了毛泽东畅流长江的这幅照片是合成的。

在朝鲜战场牺牲的长子

据说‘长征’时被寄养在农民家，下落不明的（或者是在上海失踪的）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孩子，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被从延安来到武汉的周恩来找到了，他们被送到延安，不久又被派往苏联。

长子毛岸英，以成人的姿态出现在延安是 1944 年（昭和十九年），毛泽东对他说：“去上‘农业大学’”，他让毛岸英住在附近的作为劳动模范受到表彰的农民家里，让他参加劳动。似乎后来还找机会让他劳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作为俄文翻译从军，一个月后，遭遇美空军飞机轰炸而牺牲。因此，他的墓在朝鲜。

据说毛泽东对前来安慰的人这样讲：我们明白。许多老百姓的儿子和女儿，都为革命流血牺牲了。他们更需要慰问。应该照料他们。

次子毛岸青，沉默寡言，据说喜欢哲学研究。1949 年从苏联回国，在北京的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工作。他确实与别人共同翻译过斯大林的语言学文章，但听说他脑子有慢性病，经常需要静养。

即使在前面提到的庐山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也说：“自己没有后代。一个儿子牺牲了，一个精神不正常。”

个人崇拜的烦恼

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12月，77岁的毛泽东与斯诺谈话长达五个小时，其中轻描淡写地欢迎尼克松访华一句话，在两年后实现了——当时，斯诺与毛泽东谈了文化大革命中急剧升温的毛泽东个人崇拜问题。

斯诺在那五年前访问了中国，并且对毛泽东个人崇拜问题写了批判性报道。因此，在那之后一段时间，曾被拒绝进入中国。不过，毛泽东告诉斯诺，拒绝他入境的官员已受到批评，并且已下台。他说个人崇拜是事实，写也无妨。还说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被加上四个形容词，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但将会只保留“教师”这个头衔。

在汉语中，讲伟大的教师时的教师被写成“导师”，而学校的教师一般称为“老师”，所以他说保留教师的头衔时，会担心毛泽东用哪个词呢？毫无疑问，他最终想把自己描绘成“教员”。他没有对斯诺否认有个人崇拜。

对于他来说，政治就是确立某个人的权威。不伴随确立权威的权力，是很难想象的。

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具有彻底搞政治的人的眼力。他对于自己认可、自己制造的对个人的崇拜，无法永远陶醉。

1967年10月1日——国庆节时，他与来到中国的斯诺一起站到天安门上，毛泽东向他表示祝贺的游行队伍挥手致意。斯诺问是什么心情，毛泽东愁眉苦脸地摇着头，只回答一句：不满意。他只感到烦恼。

孤独无法者

毛泽东教导说“为群众服务”，但他没有想隐瞒这样一点，即

作为服务对象的群众，决非用一般的手段应付得了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和群众高呼毛泽东万岁，热心地摇动着旗子。但对于这种人，他认为有三种，第一种是真心实意的 第二种是随大流的 第三种是假的。……

对于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来说，群众经常被分成这三种。而且，属于第一群体的人，要比第二和第三加起来还多，这是他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即使那里有真心实意的人，但他知道在冲自己喊万岁的人当中，随大流和假的是很多。尽管知道这样，还得回应万岁。再没有比这更孤独的了。

1965 年（昭和四十年 8 月，毛泽东会见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时说：“我很孤独”。

传说他又在 1970 年，会见完斯诺送到大门时说，——自己并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是一个单纯的人，只不过是用一只手打着一把破伞的独行僧罢了。

不过，他对斯诺讲的上述话，实际上也许是指湖南农民经常说的笑话“和尚打伞”。和尚没有头发 再一打伞 连天空也看不见了。因此下一句接着就是“无发无天”。这个“发”暗示同音字“法”就是说 只讲“和尚打伞”就明白是指“无发无天”的意思。

或许毛泽东用农民的话说自己只不过是一介无法者，以此和斯诺道别吧，然而令人感到那里有孤独的反应。

末 章 平凡而伟大的教师

1976年9月9日，下午五点的北京广播宣告毛泽东于当日凌晨零时十分北京时间因病在北京逝世。

当天四点多，正在研究室的我，从某人那里得到北京广播电台预告五点播放重要新闻，我急忙返回家中，对好电台，等待五点钟到来。

我内心很不平静。如果说重要广播，其内容只能有一个。虽然想该来的还是来了，但另一方面又一直在嘴里嘟囔着：决不会 决不会。想做记录 但不知什么原因 连一张纸片也找不到。正想利用从哪儿出来的一张明信片的空白处时，北京时间四点的报时响了，之后没有前奏曲，播音员突然以沉闷的口气开始讲。似乎在朗读原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啊！果然是那个吗？空中状态不好，后来听不清了，但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最高机关联名向全国民众发出号召。我明白那意味着什么。

——敬爱的伟大领袖……

我停止了记录。

不久，电视在画面的下部开始播送新闻。我的脑子开始混乱，思绪也集中不起来。太早了。不希望他死。是 82 岁呀！日本的政治家不是还精力充沛地在干吗？年轻时，他又那么爱锻炼身体 可是……。还是因为革命损坏了身体吧？.....

后来一整理，我似乎才零零碎碎地想起那些事情。当恢复平静时，才意识到一个时代结束了。而且认为一个时代结束了这种想法一定会萦绕在中国民众的心中。

具有阴阳的一个宇宙

毛泽东的人生，并不平坦。似乎可以说他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过来的。

某个时期，看上去他像是转变了。但是仔细一看，只不过是让在那之前他所持思想发展而已。他没有全部放弃过去的东西而走另外方向。也就是说，没有转变方向。我以前曾经写过，是以不动的一点为中心，将同心圆的圈逐渐扩大，并多次重复这样一种成长的方式。直到今天，我也不认为这种看法有误。

的确，他有非常极端的摇摆性格。在这种意义上讲，他是个复杂的人。与结成牢固同盟的苏联决裂，同时沉重打击被指定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将其开除出党。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他自己的头脑中有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二分世界概念的阴与阳。

在有阴与阳这一点上，恐怕他也是一个宇宙吧。在阴与阳之间摆动，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政治。

在摆动这一点上，也许他变了。不过，作为具有那种阴与阳的宇宙的他并没有变。

在延安，他发起整风运动，但这种党员教育，早已表现在上井冈山时制定“三大纪律”的做法里。而且，那又在长沙的新民

学会时期 在他与朋友互相鼓励 开展自我教育和开办夜校时有了萌芽。

新中国成立后反复开展的思想批判运动，可以认为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延续。当给自己委以重任的世界不断扩大时，虽然他加以相应的修正，但其做法本身没有变化。

既然是以不动的一点为中心，把圈扩大，那么对于他来说，不动的一点是指什么呢？

“干劲”和“主观能动性”

我曾在 1960 年见到过毛泽东。若详细点说，是在 6 月 21 日晚 地点是原来的法国俱乐部的建筑物（现在的名称不详）

当时，他对完成创造性工作的条件阐述如下：

“世界上大多数事情 都是年轻的、比较不出名的、地位比较低的、财富比较少的人做出来的。比如，英国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就是工人出身。你们总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对全世界近三百年来搞发明创造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做过调查，整理出来的结果表明，这些人百分之七十都是不出名的、年轻的、地位比较低的、比较穷的。”

现在，当得知毛泽东去世，就痛苦地想起他对年轻人寄与的期望。

在当时的会见结束时他还说：因为出名了，我的创造性就少了。这也就是自然规律。因为上年纪了。

从他讲“自然规律”之后 已经过去 16 年 在这中间 他重视生与死 但超越个人的生死 他更关心作为阶级、民族、国家或作为人类能够继承的东西。

在当今的社会，特别是在中国的旧社会，上了年纪能得到社会的评价 那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如果说“老成”那是对青少年

的赞赏。

那样的社会评价 又是以身份、头衔、财产为标准的。认为那一切妨碍创造性工作的毛泽东，对人有一种冷静而彻底的看法。

他高度评价那些年龄、名声、地位、财产等什么都没有的人。尽管如此 他没有说人应该具备的‘自觉的能动性’或‘主观能动性’即使没有也可以。所谓‘自觉的能动性’‘主观能动性’简单地说 就是“干劲”。作为唯物论者的他 清楚地知道 围绕人的事和物是有规律的，那种规律是不能靠人的力量随意改变的 尽管如此 他说首先作为一个人 是否有‘干劲’是带有决定性的。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入门书 专门讲规律的客观性 把强调个人意志看作是唯心论，有敬而远之的倾向。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 有‘干劲’固然重要 但也不能说光靠‘干劲’就万事大吉，这也是事实。毛泽东在 1958 年‘大跃进’时，也大力宣传‘主观能动性’但结果不尽人意。后来 又遇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引起粮食不足。

不过 毕竟没有‘干劲’的人是不可能干成什么事业的 这也是不言而喻的。首先要有“干劲”。“干”失败，再“干”再失败，再“干”……直到最后成功。——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述这种被乐观主义人生观所证实了的唯物论哲学。而且在《矛盾论》中还讲述事和物具有的规律性。

一万年太久

在他诗集的最后一首词，即 1963 年（昭和三十三年）写作的《满江红》里 看到如下句子：

一万年太久，
只有朝夕。

这是到达北京的尼克松在寒暄时引用的。意思是：即使用一万年，也没什么可怕的，但那样用的时间太多，作为我们，只好争取一天半天的。

在这之后接着写道：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

这是四海沸腾，云水发怒，五大洲陷入大动乱这一革命运动的预告。虽然预告了这种激烈的斗争，但毛泽东另一方面又拿出一万年这个长长的时间尺度。这是充裕的历史眺望法。尽管如此，也要注意朝夕这一短时间。

这样，在一万年和一天半天的时间单位之间，畅通无阻地上升下降的精神是道教的东西。这种超越的气质也支配着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

儒教是中国思想之表，而道教则是中国思想之里。如果采用极端的说法，就是中国有两个。一个是儒教的中国，另一个是道教的中国。如果认为儒教是统治者的，那么可以说道教就是民众的。

道教也有教义和经典，可以把支配民众生活的超越气质看作是道教的。不拘泥于小事，期盼悠然和空余时间便是这种气质。

作为表的儒教是严格的，是教育者式的。毛泽东首先继承了这个表的传统。正如在儒教中有集中孔子语言的《论语》那样毛泽东也有《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是现代的《论语》，毛泽东是现代的孔子。

不过 他另一方面有超越的地方。

作为民众的教师

近代中国百年史 是被侵略、苦于内乱和内战的历史。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留下了创建独立的中国、统一的中国的功绩，然而 他不是与中国革命之父孙文在临终时留下的‘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这句名言完全抱有同感吗？

他没有盲从共产国际，而且敢于把中国共产党几乎解体。就是说，是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的革命者。如果他再长寿的话 也许还要搞两三次文化大革命。

在这个意义上讲 他是非凡的。他在中国农民中 发现了革命的动力 把他们组织起来 作为建立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动力 也可以说他是革命的天才。

不过，他反对把马克思和列宁看作天才。他曾回顾前半生，说当小学教员是他的人生目的。

他虽然是教师 但没有把自己看作是非凡的人物 也没说向自己学习。用好挑剔的话讲，他也不是那种让学生和听众“感动”的教师。他是用平凡的语言教导人们做平凡事的。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不。——他曾在延安这样讲过。

我想确实如此。而且 对能客观地讲述这样的‘真理’的毛泽东深感敬畏。

最重要的是当群众的学生。——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员的教导。似乎谁都能做到 但并不容易做到。

他在创建工农红军时，首先教不许拿群众一根针，一个红薯 借东西要还。而没有教要勇敢杀敌。

教这些事情的教师是平凡的教师。虽然是平凡的教师，却是非凡的。

他在十几年前就说不久将会见上帝。他还说过上天去见马克思。虽然那样说 但他还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指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和批判《水浒传》运动。他在归天之前 也没有脱离中国的民众和革命。

当然 无论他是平凡的人 还是革命的天才 都不能说他没有失败，没犯过错误。大概在今后的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史中 他也会受到严格的评价吧。

然而我想，不久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冲刷掉对他的过度赞赏和批评 历史将会确定他的功过。由于他的逝世 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 作为一名平凡而伟大的教师 他将永远活在中国民众的心中。

毛 泽 东

竹 内 实 著
张会才 译

目 录

序 天安门上的毛泽东	(183)
一、毛泽东的原点	
1. 毛泽东的出生地	(187)
2. 宗族的统治	(197)
二、湖南的学风	
1. 与杨昌济结识	(200)
2. 曾国藩、杨昌济、毛泽东	(207)
三、革命与诗	
1. 毛泽东与《共产党宣言》	(211)
2. 诗人毛泽东	(220)
3. 作为最高权力者	(225)
四、国家建设的蓝图	
1. 十大关系与人民内部矛盾	(231)
2. “人民公社好”	(238)
五、思想改造	
1. 开展整风运动	(247)
2. 《文艺讲话》与整风运动的意图	(251)
3. 思想改造的反复	(255)
六、批判斯大林与反右斗争	
1. 批判斯大林的冲击	(259)

2. 反右斗争与中苏对抗	(265)
七、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上)	
1.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272)
2. 发动文革	(279)
八、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下)	
1. 刘少奇的下台与死	(283)
2.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批判与斗争哲学	(290)
九、晚年毛泽东	
1. 毛泽东的失败	(298)
2. 毛泽东之死	(303)
3. 毛泽东的性格	(305)
后记	(309)
毛泽东年表	(311)

序 天安门上的毛泽东

登天安门城楼

1988年9月一个晴朗的日子，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因为实行了开放政策，只要买票谁都可以上去参观。每张票30元，但中国人10元。

走过金水桥，穿过天安门城楼正中央的门洞，来到后面。上城楼的入口处的楼梯口是个漫坡。我边拾级而上，边环顾四周，在天安门基座内好像安装有专供要人用的电梯，基座上面是白玉石阶，出乎意料地宽大。

面向广场的宫殿式城楼前面，形如走廊，那里游客很多。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空处，倚靠在白玉栏杆上，俯视广场。与从下面仰望时的距离感截然不同，好像用望远镜头拉过来似的，景色近在咫尺。

远处尽头的正阳门一带笼罩在一片烟雾中，而眼前却清晰可见金水桥上和桥畔那些兴致勃勃的游客面孔。好像只要一伸手，就能把他们捞上来似的。因为距离太近了，甚至产生了一种快感。

正面是宽阔的广场，广场右侧是人民大会堂，左侧是中国历史博物馆。远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排成一直线。正位于以背后故宫（紫禁城）为中心的南北轴心线的延长线上，再远处广场的尽头是正阳门。

每年 10 月 1 日国庆节，都在广场上举行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祝活动，还有盛装游行。但从 1971 年起，这项惯例被取消了，原因是当年发生了林彪暗杀毛泽东未遂事件。

盛装游行队伍由东向西通过天安门前的东西长安街。面对长安街 修有观礼台 是用来招待宾客的 我也曾两次站在那里。

最初的时候，新中国诞生只有几年。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热情高涨。四五十列队伍一走近天安门，便动作一致地将头转向右看，同时高呼口号。由人组成的方阵一个接一个地行进着，不知何时走完，实在令人为之慑服。

尽管不是北京，但对于在这片大陆的一处乡村出生并度过少年时代的我来说，中国一直令我怀念。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访问北京时，我的一片怀念之情并没有被接受。那接连不断的口号声，好像将这份感情拒之门外。我的面孔渐渐失去血色。中国的翻译对我说：“您脸色不大好啊”（1956 年）。

第二次，我比较从容地观看了游行队伍。游行一结束，站在天安门上的要人们都走到城楼这一侧，挥手致意。观礼台上的贵宾也都转过身去，发出欢呼声。

虽然看不清面孔，但从体形可以推测出毛泽东。毛泽东的身后是朱德（1958 年）。

当时，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能上天安门城楼。

城楼内部分隔成几个房间。为游客开放了中间的几间。里面摆放着毛泽东曾休息过的沙发，但是用绳子围着，禁止入内。另外，还有些休息室，但在文革时期，各休息室如同敌国一样对

立着互不来往。

能进出毛泽东休息室的人很有限，据说是受到后来被称为“四人帮”一伙人的监视。纪念品柜台出售英文的登城楼证明书，上面有负责人署名栏。听说日本首相买这份证明书时，是北京市长签的名。

城楼背面无人去，由此可眺望西面的中南海，但只见槐树成荫，枝叶繁茂，连屋顶都看不到。现在那里已成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故居。

天安门上的诏书

天安门是明、清皇帝皇城的正门，从环绕着皇城的红色城墙凸出来的基座上，并列着五个拱型洞窟式门洞，基座前面的金水河上也同样架设有五座白玉石桥。唯有皇帝才能走中间的那座桥及中央门洞。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就悬挂在中央门洞的上方。

基座上有城楼，那巨大的屋顶给人一种强有力的印象。由地表到屋顶上缘高为 33.7 米，上面镶嵌着国徽。

城楼的规模 面宽 9 间 进深 5 间 柱与柱的间隔为 1 间。

这 9、5 之数 源于《易经》。

乾☰卦由下数的第五个一，此爻为阳，而阳谓九；此九与第五之五，合称九、五。

“九五，飞龙在天 利见大人”。

天空中飞龙的出现，象征着天子。再由下数的第二个阳一，此九二之爻为田龙，意即龙出现在大地上，象征着人臣，恰与天子相互对应。

城楼柱子为朱红色 栏杆上雕有金黄色的龙 屋顶铺着金黄色的琉璃瓦。数字、色彩、图案均显示皇帝的绝对权力。

清朝的皇帝将诏书由天安门上吊放下来，文官们跪在地上，向上仰视，静悄悄地等待诏书徐徐降临。衔在黄金制凤凰嘴中的诏书，落在文官恭恭敬敬地捧在手上的云状盆中。然后加以印刷、散发。

“个人崇拜是必要的”

毛泽东选择天安门作为宣告新国家成立的场所，面对满广场的民众 他在天安门上做了宣告。

从此以后 每年国庆节 他都从城楼上俯视连绵不断的游行队伍 向喊着‘万岁’的人们挥手致意。前面我曾说过 从天安门城楼上俯视广场，令人产生快感。但中国的领导人不是游客。即便具有谦虚精神的人 性格不是也会变的吗？

1970 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个人崇拜是必要的”。又补充一句 赫鲁晓夫所以下台 就是因为没有搞个人崇拜。

面对着庆祝的游行队伍 他皱着眉头 说自己并不喜欢这些东西。之后附加限定说：“要有一点”同前面一样给予肯定。

一、毛泽东的原点

1. 毛泽东的出生地

韶山村

我总算能访问盼望已久的湖南省韶山了。从上海乘飞机到长沙，再从长沙坐约两个半小时的汽车到韶山。道路两旁梧桐树枝叶繁茂 未经任何修剪 保持着自然的姿态。

沿途的田园风光有水田、旱田 还有池塘、沼泽。旱田里种着红薯、芋头、冬瓜、茄子、辣椒、棉花 还有开着黄花的丝瓜的棚架。池沼里有荷叶。还可以看到水牛、猪和鸡。

穿过城镇 看见用红砖垒砌成圆筒形的砖窑 它附近的地面被挖得坑坑洼洼。湘潭是个小城。

突然间 来到被商店和餐厅包围的广场 这就是韶山冲。车子并没有走原先我在地图上看到的路线。

车子从广场出发 作 U 形迴转之后 沿另一条路逆行 毛泽东的出生地就在那里。路变得宽阔起来，这里也是一个小广场。

毛泽东的出生地是从这儿往右。我向左边走去，眺望了一

会儿景致。

韶山冲的“冲”据说是指洪水冲刷形成的河谷。不过当地人只叫它“韶山”。从地图上看韶山冲由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五公里，宽约三公里。

实际的地形并非像想象的那样狭窄。远近丘陵之间夹着一大片水田，空间很大。远处丘陵的山腰上有一块平地，在农家的墙壁上用红字写有标语，虽然已经褪色，但能念出是“毛主席万岁”这五个字。

水田夹在丘陵之间，越向东延伸越宽，眼前的韶河，是一条只能称之为“小溪”的可怜小河。岸边杨柳迎风摇摆。

丘陵上有一片繁茂的树林，有松树、竹林、樟树。我记起毛泽东诗中的一句——郁郁葱葱。

不知为什么，这景色仿佛见过，细想起来，我父母出生的知多半岛（日本爱知县）大致也是这样。

访问故居

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有毛泽东的故居。它建在一处稍高的地方。

沿着道路向上走，有个池塘。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在那里游泳。一条小路把池塘一分为二。他曾和粗暴的父亲在那条小路上大声争吵。荷叶几乎盖住池面。之所以把湖南省称作“芙蓉国”就是水芙蓉即荷花多的缘故。

令人吃惊的是，在池塘周围摆有许多卖土特产的小摊，简直像是个庙会。还有餐厅。一位中年妇女站在小店前，同每个经过的人说着同样的话。韶山导游小册子上附有一张照片，是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与村民交谈时的照片。照片中，这位中年妇女抱着小孩站在边上。我请她在空白处用红色圆珠笔签了

名：汤瑞仁。小孩叫毛命军。摄影日期是 1959 年 6 月 26 日。毛家饭店。她就是池塘对面一家餐厅的女主人，这家餐厅正好与毛泽东故居相对。

毛泽东故居背靠长着茂密松林和竹林的后山。这一带，农家各自分散而不集中。既没有篱笆，也没有围墙。

房子朝北，门口两侧有房子凸出来。左侧是毛泽东的家，屋顶铺瓦。右侧是邻居家，住草房。一栋之内住着两家，邻居也姓毛。墙是土坯子垒成的。

门口很窄。一进门就是“堂屋”也可以说是客厅 用来办理红白喜事。邻居也可以使用。

正面嵌有黑色的像木架之类的东西，称为“神龛”、神架、或是佛龛。中文的“神”包括祖宗、道教的神 还有像关羽那样招财进宝的祚（财神）妖魔鬼怪等等。毛泽东的母亲信奉观音菩萨，每逢初一、十五都特别虔诚地膜拜，毛泽东帮忙打点。

据说 1959 年毛泽东回家探亲时看到这个神龛颇为感慨地说：“这里是我每月的一号和十五号劳动的地方”。

堂屋后面叫“退堂屋”是工作间。沿着南墙，地面被挖下去一些，水可以经由底部的石盘流过来，供洗衣用，他们不用盆子洗衣服。阳光从正上方的天窗照射进来。神龛墙壁后面，是炉灶，上有一口大锅，用来蒸煮家畜的饲料。隔壁是厨房，有两间房子大。有炉灶和炕炉，炕炉上有吊钩垂下来。导游从架子上取下水壶，挂在吊钩上。

穿过隔壁的饭厅兼起居室的横屋，就是毛泽东父母的卧室。摆着一张带有床帮的四角箱型大床。父母卧室的内侧，是毛泽东的卧室。床与他父母的床一样，卧室有可以通往院子的出入口。

与此排房屋平行的，是长方形的院子。再过去的一排房屋

是磨房、谷仓、牛棚、柴屋、小弟毛泽覃的卧室。院子北面是农具室 南面是猪圈 连接着两排房屋 结果是四排房屋把院子包围起来。

穿过院子的过道 有二弟泽民的卧室 略小一些。双亲及毛泽东的卧室均为六张‘榻榻咪’(日本式房间里的草垫,一张约为180公分×85公分)大小吧。

围绕院子的四排房屋中 北、南、东三排房屋是后来加盖的。记得说明上说是1919年加盖的。毛泽东的父亲是1920年1月,50岁时去世的,母亲是在前一年的10月,52岁时去世的。因此 在这栋新房子里生活的时间很短。

父母与弟弟

父母卧室的墙壁上挂着照片。父亲毛顺生,长得很像曾国藩。短短的八字胡,紧皱着眉头,样子多少有些悲伤。这张照片可能是从他妻子(也就是毛泽东母亲)去世时照的照片翻拍下来的,所以如此吧。

父亲的体格健壮,个子高大(毛泽东也很高),性格固执,常常训斥孩子。从祖父那一辈开始在韶山定居。顺生很能干,渐渐积蓄了不少财产,甚至被别人说成是韶山的首富。

据说他年轻时当过兵,但已很难证实。一直传说祖父穷,但也有不穷的说法。毛泽东出生时,他23岁。

母亲的娘家在越过一座山的湘潭县唐家坵。“坵”是水窪之意(现名棠佳阁),大约相隔七、八公里。文家的祖坟在韶山,为了来扫墓时休息方便,所以定下了这门亲事。那时她13岁。到18岁出嫁。她比丈夫大3岁。

毛泽东生于1893年12月26日。按当时的历法,是光绪19年癸巳11月19日早晨。这一年是蛇年。当时,太阳正从东方

的山头升起。

中国有小孩出生时起名的习惯，那叫乳名。譬如体重七斤（一斤为 500 克 就叫“七斤”脸黑就叫“小黑”等等。毛泽东的乳名是“石三”。

唐家坳有一个被称为“石观音”的巨石，它集中了近邻的信仰。母亲抱着婴儿跑到这块岩石处许愿，并发誓从此吃素。

在她生毛泽东之前，曾生过两个男孩，但还没断奶就都死去了。此次是为了第三个儿子向石观音许愿，所以取乳名“石三”。

毛泽东出生第三天，父亲大摆宴席庆贺。宴席开始时，就为毛泽东取名字。给取名字的人是村子里有学问的人。一般上私塾时，由私塾先生取名字。与乳名不同，选字慎重。这是真名，正式名字。别人称呼时，要用字。毛泽东名泽东，字润之。

石三很聪明，四岁时竟能讲出道理将大人说服。到六岁，父亲就让下地里干活。毛泽东那不知疲倦的学习和工作态度，也许就是这个时候由他父亲调教出来的。八岁，上私塾。十三岁，停学，当一名普通农民。从此以后，他四处借书阅读。

墙上父母照片的旁边，挂着一盏煤油灯。灯壶中注入灯油，浸湿灯芯，而后点燃。灯火是裸火。听说毛泽东夜晚也很热衷于读书，不过这灯光未免暗了些吧。

毛泽东十六岁离家，弟弟们也先后离家。

小弟泽覃在 1918 年（十三岁时）跟毛泽东到了长沙，进入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高等科读书。农活由留在家里的二弟泽民承担。1921 年泽民也来到长沙，成为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办事员，管理食堂。

1925 年 2 月，毛泽东回到家乡，在毛氏宗祠办了所夜校。

他的卧室内有小阁楼，利用活动梯子上下。在这个阁楼上，曾秘密举行过由他介绍的四名党员的入党仪式，并成立中国共

产党韶山支部。

1927年1月他再度回到家乡，在省内各地实地考察了迅猛发展的农协运动，并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其后三十二年间未曾回乡，一直到1959年才回乡扫墓。他父母的坟墓现在还存在，位于一座小山上，与他家隔着池塘相望。

母亲的信仰

看了毛泽东的家，令我出乎意料的是那神龛，或叫佛龛。从他母亲的信仰来看，或许应叫佛龛吧。我知道毛泽东的母亲十分虔诚，而且有许多慈善之举。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去拜佛。

当毛泽东的父亲想买下亲戚的水田时，母亲说：“水田一没了，就当不成农民了。”因此加以反对。不过，当毛顺生买到手后，毛泽东的母亲经常接济那位亲戚一些米或钱，照顾他们的生活。

毛泽东十五岁时，母亲病了，他为祈祷母亲康复，跑到大约有五十公里外的衡山南岳大庙去参拜。一边走一边说：“南岳圣帝，阿弥陀佛……”每走十步，就要向南岳那个方向跪下磕头，这是一种许愿的方式。

这是后来的事。1934年由于国民党部队围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放弃首都瑞金，八万余红军士兵、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向西北转移。在江西省省界一带，遭到等待多时的国民党的猛烈攻击。好不容易才突围，但兵力骤减到原来的四分之一。在稍事休息时，毛泽东站在山丘上，仰天大叫：“阿弥陀佛！”

这段逸闻是电视连续剧中的一个场面。二、三年前，在中国放映了。我是从看过这部连续剧的一个青年那里听到的。于是，我做了种种揣测——毛泽东的本意是什么？大转移，即后来

称之为“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时的实际情况简直跟逃跑没什么两样。也许毛泽东是在自嘲的心情下才大声喊叫出来的。他当时被排除在领导层之外。

不过，当我看到他家中的佛龕时，一下子将逸闻与这佛龕联系在一起了。毛泽东九死一生之后，此刻的心境，又变成儿时的石三了。也许是他对慈母的虔诚信仰有一份感谢之情吧！

祭母文

母亲在 1919 年 10 月去世。毛泽东接到母亲病危的信后，带着已到长沙的小弟泽覃回到韶山。但是，母亲早已咽气，而且入棺两天了。

留在家中的二弟泽民说，母亲临终时不断呼唤孩子们的名字。毛泽东写了“挽联”和“祭母文”。今天这些都雕刻在石头上做成碑文，竖立在韶山。

所谓“挽联”即葬礼时挂的对联。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另一副“挽联”是

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长文《祭母文》虽稍难懂，但可窥其追慕之情，全文如下：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

三 即东民覃。其他不育 二女二男。育吾兄弟 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遭疾。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 原本真诚。不作诳言 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萃萃，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 三纲之末。有志未伸 有求不获。精神痛苦 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率，小大亲疏，均待报费。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必秉恻忱，则效不违。致于所恨 必补遗缺。念兹在兹 此心不越。养育深恩 春晖朝霏。报之何时 精禽大海。呜呼吾母 母终未死。躯壳虽隳 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 时则苦短。惟挈大端 置其粗浅。此时家奠 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尚飨！

民国八年八月十五日

其中“恨偏所在 三纲之末”的“三纲”是指儒教最为重视的君臣、父子、夫妇间的关系。也许毛泽东要说的是 父亲对母亲是如此地粗暴 令人觉得可怜又可叹。“青黄”即“青黄不接”，是指前面的收获吃光了，而后面的庄稼还没有收上来的青黄不接时期。此句是说 母亲留下的孩儿虽未成人 但不久就会长大的。“精禽”即精卫，传说中的鸟。精卫由西山衔来树枝和石

子欲将东海填平。借指母亲的恩德深如海 无以为报。

母亲死后第二年，父亲也死了。毛泽东忙于革命活动，未能还乡，也没有写追悼的文章。

滴水洞别墅

访问故居后，从韶山冲前向右（西）拐弯，沿着山路上独立峰。山峰犹如古代女子敞开的裙裾，山势缓和。顺溪谷而上，有一处不太宽的平地，周围是绝壁断崖和险峻的山峦。

毛泽东专用的别墅取名“滴水洞”是一栋灰色不起眼的平房。

走进正门，是一间会议室。里面摆着沙发，大概可以供四、五十人开会，十分宽敞。右边是办公室、卧室、浴室（兼洗手间），随行人员的浴室、休息室并列成一排；四周是走廊，参观者可从窗户看到室内。

我想走廊是卫兵 警卫人员 巡逻用的。

一旦遭到外部的袭击，卫兵可在此应战。后来，我又访问了北京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为林彪的旧居，其结构同样是双层墙壁。

办公室的桌子上砚台是菊花石。浴室的浴盆比一般的要大一圈，以适合毛泽东的体格。

在走廊转了一圈后，沿着直通后山的路走去，有一处核掩蔽所。地面潮湿，据说原先备有除湿器，真是名副其实的“滴水洞”。

1966年6月18至28日毛泽东在这里住过。当时核掩蔽所尚未竣工。他是由杭州来此地的。其后，又赴武汉，畅游长江。所谓“畅游”不过是漂在水面顺流而下罢了。

虎气

7月8日，他在武汉给夫人江青写了封信。

“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6月28日到白云黄鹤……”

武林是杭州的别称，“西方的山洞”无疑就是滴水洞。白云黄鹤即武昌的黄鹤楼。道士在酒楼墙上用桔子皮画了只鹤，客人一拍手，鹤就从墙上飞出，翩翩起舞。一日道士出现，乘鹤向白云深处飘然飞去。

接下来又写道：

“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别墅正面的山峰是龙蟠山，后面的山峰是虎踞山。虎踞山山顶，有毛泽东曾祖父的坟。传说地下有龙脉，在此处修坟，子孙定能立身出世，兴旺繁荣。正是基于这种民间信仰，才在此修造坟墓。不过，龙蟠山已被他人占据，也许只能在“虎”处忍气吞声了。

毛泽东在这里期间，走到前院回首仰望后山顶，能不意识到自己体内的虎气吗？小时候，他去姥姥家时，也许就是翻过这一带的山峰。他曾对访华的尼克松总统说：“我的性格一半是虎，一半是猴。”尼克松说，这正是毛泽东那毫无慈悲之心的虎的一面，和狂热的理想主义者的猴的一面的自我表白。是否言之有理呢？我认为是指与龙并称而有王者之尊的虎之气魄，和猴王孙悟空的无法无天。前者郁闷，后者急躁。二者的关系并非相互对抗、相互排斥，而是恰如油上点火，火上浇油一样，悲剧如此产生。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已表露出对林彪的怀疑。但江青并未接受告诫，反与林彪结为一伙。

在深山幽谷中的十日冥想，意味深长。一大群红卫兵的出现就是在两个月以后。尽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但决心更加彻底地发动文革，恐怕是在此冥思苦想的结果。

2. 宗族的统治

毛氏宗祠

回到刚来时的那个广场。这里是公共汽车总站，文革时想必一定很热闹。途中经过尚在修缮中的私塾。

由广场上坡，是韶山宾馆。1959年，毛泽东曾在这里下榻。广场南侧是毛主席故居陈列馆，再往南走，并排着两处毛氏宗祠。

宗祠内放置有毛氏家族的牌位，共同祭祀。进入正门，实际上是门的内侧，有个两层楼的演戏台。大概是从宗祠内的院子及正殿看戏吧。这一带毛姓最多，打开地图看，山里也有毛氏宗祠。

空荡荡的正殿内（已不供奉牌位）挂有一幅油画。上面画的是与家族长老激烈辩论的少年毛泽东。

宗祠内存有毛氏家族共有财产，包括备用的米。一旦发生饥荒，可较便宜地分售给族人。但当1910年4月以长沙为中心发生大饥荒时，有位长老却按时价卖给了湘潭的米铺。闻知此事，族中有一男子愤愤不平。长老召集家族人在宗祠审判他，欲加以处罚。毛泽东在族人面前追问长老，将米由湘潭收了回来。据说当时的毛泽东说得有条有理，令人折服。

父亲毛顺生向长老谢罪，好像是长老命令他不许再让毛泽东在村子里呆下去。于是，他命令儿子到湘潭的米铺去工作。

毛氏家族与毛泽东的关系很微妙 耐人寻味。

毛氏家族，有从祖先流传下来的族谱，据说正在研究之中，不能公开。毛家饭店的女主人，说不定也和毛泽东有亲戚关系。

这是后话了 经毛泽东介绍入党的四名党员 后来都被反动派杀害了。也许是族人出了告密者吧。

摆脱族权社会

关于统治中国社会的权力 毛泽东列举了政权、族权、神权三种。所谓“政权”可理解为政治权力。按照毛泽东的解释 从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于乡所组成的国家系统 就是“政权”。所谓“族权”是指家族中的权力 是从本家的祖先庙、分家的祖先庙到家长的同族体系。所谓“神权”，就是前面说过的供奉在神龛中的神、佛 包括阎王爷 村、县的守护神（城隍爷、土地爷）在内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大帝（道教的最高神）到各种神和精灵所组成的神仙系统——总称为鬼神系统。

至于女子，除受这三种权力的统治以外，还受男子的统治——即“夫权”。

“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 代表了整个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

在这狭小的地区内 据说毛氏宗祠竟有三座 确实有一种族权社会的氛围。

为了反抗父亲，他跑到姥姥家。毛泽东小时候多半是在姥姥家度过的，姥姥家的亲戚们都很同情毛泽东，于是有人到韶山说服了他父亲。父亲同意让毛泽东到湘潭的小学去读书。毛泽东用扁担挑着被褥和父亲给他的学杂费一千四百枚铜钱，独自去了湘潭。那是一条 25 公里长的山路。

由小学到中学，由革命军士兵到复学，而后去图书馆自学，他的境遇每半年都有变化。他还不断地向各类学校提出入学申请。

上小学时他 16 岁。也许是比同班同学年龄大的缘故，念了半年就不念了。中学是湘乡县人设立的，对他这个湘潭县人来说，大概无法适应。最后，他好不容易才在师范学校落脚。时间是 1913 年，民国二年。这年年底，他 20 周岁。

二、湖南的学风

1. 与杨昌济结识

长沙暴动

1910 年秋，毛泽东离开韶山。当年 4 月，长沙发生了大暴动。

“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他这样对埃德加·斯诺说。斯诺的《西行漫记》虽然是根据毛泽东口述的自传改编而成 却是一部经典著作（1937 年第一版）

暴动之时 美、英、日、法等国的炮舰十余艘在长沙港外示威 协助镇压 可想而知其规模之大。

暴动缘于洞庭湖水泛滥。沿岸各县被大水淹没，而未遭洪水的县、乡又相继发生干旱和虫灾 邻省湖北也是洪水成灾。到了秋天 谷物的价钱贵得惊人。

湖南省素有“全国粮仓”之称。对于投机商来说 这无疑是一次绝好的时机。商人由省外涌进来。在长沙开有分号的外国资本家也纷纷加入投机行列。

长沙南门外有处适合饮用的泉水，叫白沙井。一个姓黄的男子打井水卖钱，好不容易才攒下八十文钱，让妻子去米铺买一升米。不幸夹杂有几文劣币，米铺因此拒不出售。妻子从邻居借钱又去米铺时，一升米由八十文涨到八十五文。央求半天，仍是不卖。最后哀求说那怕是五合（半升）也好，而米铺却挂出“售完”的牌子，关门了事。于是，妻子投湘江自杀了，而黄姓男子也带着小孩投江而亡。

此事迅速传遍市内，群众涌向米铺，叫骂着要将米铺老板拖出来。士兵赶到，枪杀十多人。群众都是因饥荒而流亡的灾民。

群众要向省里长官——巡抚请愿，涌到正在大摆宴席的酒楼，而巡抚却只是一味破口大骂。于是群众火烧衙门，在那儿又有二十多人被枪杀。

暴动开始了。十几万民众涌向海关、领事馆、外国人经营的公司和办事处、教堂、商店、停泊中的货船，以及当地有钱人经营的医院、学校等地，放火破坏。米铺、谷物批发商的商号、仓库等都遭到袭击。灾民们抢了粮，终于填饱了饥肠。

清政府派出两个团的兵力，大肆逮捕和屠杀。

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说：他在韶山曾目睹了由长沙逃出来的灾民。

吃大户

每逢饥荒，饥饿的人们都会袭击地主和商店。吃有钱人家，称为“吃大户”。毛顺生的米也在搬运途中被“吃大户”了。最近中国出版的毛泽东传记中，记载有他家被“吃大户”的情况。但毛泽东未曾说起过此事。

到他家“吃大户”的人，同是韶山村的村民。他父亲大发雷霆。毛泽东虽未对父亲表示同情，但也不认为村民的做法正确。

在宗祠里，他追回被族长以黑市价格卖出的米，而今自己的父亲也被“吃大户”这对他来说，一定是个不小的打击。这恐怕也是他决心离家出走的一个原因吧！

后来他上了井冈山，开展游击战。袭击地主乡绅们的宅邸，没收仓库中的稻米、杂谷和金钱，分给村民。尽管受到了上海党中央的批评，他却毫不介意。

中国共产党有了根据地以后，首先进行的是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同时也进行严格的“阶级”划分。

地主 / 富农 / 中农 / 贫农 / 雇农。

最下层的贫农、雇农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富农以上是敌人。中农是中间派，使之中立，这种划分也是一种策略。后来又把中农分为上中农、下中农，以下中农为友。

按此划分，父亲毛顺生是富农。在村里收购稻米后运到湘潭县城高价出售，向村民放高利贷，并雇有长工等等。只是因为他自己也干农活，才没有划为地主。

后来，中国共产党对富农采取了宽大政策，想必是毛泽东一再回忆起父亲干农活时的情景。

第一师范

毛泽东在湘乡的小学才知道，慈禧太后（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两年前死于北京，由年仅 5 岁的溥仪继位。

在这所小学的图书馆，他读了一首据说是西乡隆盛所作的诗，恐怕也知道他是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吧，所以很快将诗抄下来，托表兄转给父母，还请表兄念给他们听，因为父母都不识字。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将原诗的“男儿”改为“孩儿”大概想说我是父母的儿子吧。

该诗实际上是僧人月照之作。小学入学考试时的作文题目是“言志”毛泽东的文章令校长感到佩服。这首诗真可以说是他的最佳写照。在小学里，他剪了辫子。并和跟他一起剪辫子的同学两人一起将班上十多个人的辫子都剪掉了。

前面说过，从此以后，他的境遇一再变迁，最后终于在长沙的师范学校落脚。

长沙城

湖南省省会长沙，座落在湘江的东岸，城墙环绕。毛泽东离开湘潭之后，便搭船到长沙。

长沙人口 50 万，在毛泽东来长沙的六年前开港，首任海关关长是美国人。传教士和日本侨民各约 40 人。日本、英国在此设有领事馆。

1904 年 7 月至 12 月，开港后的半年内，入港的船舶共有英国船 35 艘，日本船 38 艘，中国船 45 艘。出港的船各为 70 艘、76 艘、91 艘。进出港的旅客，外国人 125 人，中国人 16,237 人。

长沙较上海的开港时间晚 61 年。开港的两年多前，日本人涩泽荣一、安田善次郎、大仓喜八郎等创办湖南汽船公司。早在开港的四个月前，他们就开通了湘江号和沅江号（均为 930 吨）在汉口——长沙——湘潭间的定期航线。

中文叫怡和洋行的英国商社（Jardine, Matheson & Co., Ltd）也开辟了航线。

湖南省出现新的气象。“向日本明治维新学习”、“湖南要成为明治维新时走在前头的鹿儿岛”等呼声渐高。

教育热也很高涨。全省划分为三大学区，每一学区各设有师范学校。毛泽东以第一名成绩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后来由于该校与第一师范合并，他成了第一师范的毕业生。该校不收学杂费而且一律住校。当时的学生有四百多人（后来为二百人左右）。

到长沙后他才知道，世上还有想推翻清朝的“革命党”。革命党人在街头散发传单，也给他一张。读完后他很激动，随即将自己的政见用毛笔写在纸上，贴在县立中学的校门旁。

“推翻腐败的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
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做新政府的总统。
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此一政见混乱，孙中山（中山是号，名文）以打倒清朝为口号，反对康梁倡导的拥护清朝的君主立宪制。

杨昌济的教诲

在第一师范，毛泽东与杨昌济先生邂逅。杨昌济讲授“修身”和“教育学”课程。所谓“修身”即道德教育，以前日本的中小学也有这门课程。“修身”就是现在的“伦理学”。

杨昌济6岁时入私塾。因为父亲在自己家里开设私塾，所以他的启蒙老师就是他父亲。父亲不仅让儿子读儒家经典，还让儿子读朱子、王阳明、曾国藩全集。

杨昌济先后在日本、英国留学，也在德国逗留过一段时间。学习的课程有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西方哲学史等。1913年回国。他拒绝了湖南省教育局长的职位，而在第一师范等执起教鞭。

他的讲义 是古今中外名著的荟萃 列出了他认为重要的德行条目。其中引用了许多曾国藩的名言。

“士要转移世风 为重两义 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上面是曾国藩日记的摘抄。杨昌济在讲课时做了如下说明：

“(不行架空之事)

就是要扎扎实实做事，像日本人福泽谕吉办庆应大学那样，以教育为天职 不图名、不图利。

(不谈过高之理)

就是明明知道行不通的理论，说出来不过是为了哗众取宠，那就不如不说。”

记录这样讲课内容的是毛泽东。

杨昌济重视日记。读书记录、摘抄、和朋友的讨论、对周围人物和事物的观察、新闻报道、日常生活中的反省等 都要一一记下。他从朋友处借来曾国藩日记书翰集四十册，那天的日记这样写道：

“文正日记亦有间断之时，断而复续，要愈于断而不续者。余亦欲从今日为始 以后至少必写日记一则 决不间断。”

第二天的日记是这样的：

“观文正之所以自克者 如多言、好名、忿怒等 余幸无之 又如好谐谑 亦非余之习惯。”

杨昌济在上课时，经常念自己的日记给学生听。

被杨昌济感化的毛泽东甚至说 在近代的人物中 唯独尊敬曾国藩一人。

杨昌济与毛泽东

在杨昌济的日记中，有一段关于毛泽东的记述：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三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这是 1915 年 4 月 5 日日记中的一节。

写日记的前一天是星期日。毛泽东利用星期日来拜访了杨昌济，提到社会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他想去解决它们，所以打算退学。

杨昌济开导说：“首先应打好基础。问题不要独自一人去解决，要找朋友。重要的是要发挥大家的力量。”

不久市内的几所学校里贴出了“征友”广告，这是毛泽东张贴的。虽然只有五个人前来应征，但他们还是经常开展讨论。

新民学会

三年以后的 1918 年组成“新民学会”，再三年后的 1921 年发表《会务报告》第一号，起草人是毛泽东。

“这个会，因为参加者想改造自己品性，学问得到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还有一个，参加者几乎都是杨怀中先生的学生。”

接“接下来又写道：

“有杨怀中先生的绪论，形成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新

民学会在此诞生。”

“绪论”为“启蒙”之意见《庄子·渔父篇》。

此处的杨怀中先生之称，是杨昌济赴日留学前新取的名字——身在异国，心怀中土（中国的土地），回国后又使用“昌济”名字。

新民学会成立之初，其会员有 21 人。其中 20 人是第一师范的学生，剩下的一个人——罗章龙是第一联合中学的学生。他是在看到“征友”广告后，前来应征的。

在毛泽东作此报告的半年前，杨昌济在北京病逝。

1918 年杨昌济受聘于北京大学，教授伦理学和伦理学史。1920 年去世，享年 48 岁。主办葬礼的是毛泽东。他的最初妻子是杨昌济的女儿开慧。

杨昌济住院期间写信给章士钊，向他推荐毛泽东和正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信中说：“欲意救国，可重用两君”。

章士钊比杨昌济小 11 岁。当时他虽然反对新文化运动，但是却常在暗中援助毛泽东等人。新中国成立后，位居高官。他与杨昌济同是长沙人，杨昌济赴英国巴丁大学留学，就是靠先期抵达该校的留学生章士钊的协助。他是北京大学校长、教授，也是政治家。

2. 曾国藩、杨昌济、毛泽东

曾国藩与儒教

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农民造反是太平天国（1850—1864 年）。平定它的曾国藩没有得到正式的肯定评价。曾国藩死于 1872 年（61 岁），距今已过一百多年。尽管如此，在湖南各地仍

然有人在谈论他 并引为自豪。

曾国藩提倡“尊孔读经”即尊敬孔子 读儒教的古典。他提倡的儒教范围很宽 不拘泥于朱子学和阳明学之争 而是一起采纳朱熹、王阳明等 也不否定与儒教对立的诸子百家。他综合各家学说 归纳成人生训、处世训、家宪等 以便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实行。例如 在给儿子的手记中 就提到家风是“八字”“三不信”。所谓“八字”即早、扫、考、宝、书、蔬、鱼、猪。早是早起。扫是扫除。考是祭祀祖先。宝是与亲戚、乡里不断绝交往 贺喜悼丧，问疾救灾，若有来访，热情接待。书是读书。蔬是种菜。鱼、猪是养鱼喂猪。“三不信”是不信地仙、医药、僧巫。

杨昌济的父亲十分信奉这些家训，并让儿子也去效仿。

曾国藩还从宋明理学中提出“诚”的观念 并以“诚”为中心 谈论伦理道德，但并不标榜泛泛的抽象的道德项目。

湖南本地的学风，原本如此。第一师范的前身是城南书院，为宋代学者张栻所创。张栻与朱熹齐名。而朱熹在长沙以西，湘江对面的岳麓山上创办了“岳麓书院”。书院不光是讲学 还开展活跃的讨论，是个教育与研究之所。

杨昌济母亲的曾祖父是国子监学录，相当于现在的国立大学教授。他热心研读宋明理学，并注重实践。湖南一直有这样的传统精神 而使之发扬光大的 似乎可以说是曾国藩。

曾国藩与毛泽东

不能否认曾国藩很反动，但是“有些思想和主张曾给予近代一些进步思想家和革命家 包括黄兴、蔡锷、杨昌济 乃至后来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以不同程度的影响”。

上述评价 见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毛泽东曾说过他独尊曾国藩一人。原文如下：

“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太平天国，洪秀全和杨秀清，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黎锦熙曾在第一师范教授历史，毛泽东常去拜访他。1915年黎锦熙转到北京师范大学之后，钻研语言学。其《国语语法》一书，堪称在汉语研究领域中具有开拓意义的杰作。

首次引用该信内容的是李锐《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该书是《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的修订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

信中的“本源”即“大本大源”，曾国藩尤为重视。

探究本源

毛泽东的最高原则是“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

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受到阶级的压迫，为了反抗才有这一概念。而是他对曾国藩的“大本大源”产生了共鸣，不断探索“大本大源”的结果，他走上马克思主义，进而又不断探索“大本大源”，终于悟出“阶级斗争”，并且认定这是最终的“大本大源”——“本源”。也可以说是先有“神龛”这一“本源”，而后迎来“阶级斗争”这个神明。

他对曾国藩本人的言行大概也非常关心。

曾国藩所作的歌中有“爱民歌”、“得胜歌”、“解散歌”、“保守平安歌”等。毛泽东所作的歌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些军歌，教士兵练唱。

毛泽东又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提出整顿作风、文风和学风。学风的口号是“实事求是”即根据实际追求真理，这也与湖南传统的学风不无关系。写日记，不断反思等湖南的学风，成了整风运动时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型。

毛泽东认为所有存在着的问题都是矛盾。这种态度，正是源于曾国藩立家训的精神——将家庭内的琐事毫无遗漏地列举出来。

三、革命与诗

1. 毛泽东与《共产党宣言》

赞成建“党”

经过在省立第一师范五年多（包括在第四师范时的学习时间）的学习，毛泽东大体完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可以说是“世界观”或“人生观”或“哲学”。毕业后，他又在这个基础上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毕业前后组织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决定了协助在北京发起的“勤工俭学”运动的方针，即在法国边劳动边学习。

赴法的会员召开会议，将“改造中国与世界”定为学会的方针，但在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这一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有人主张用教育的手段为全体人民谋幸福、谋利益。这是温和的改革方案。但也有人主张用无产阶级专政战胜资本主义，为此必须组织具有先锋队作用的共产党，以发动并宣传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制定作战策略。持后一种主张的是蔡和森等人。蔡和森写信将不同的意见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回信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

赞同。时间是 1920 年 12 月。

在此之前 毛泽东于同年 9 月在湖南省的报纸上，就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发表如下看法：

“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 洗刷上中阶级 有主义 布尔失委克斯姆) 有时机 (俄国战败) 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 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 全在这些处所。”

(《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长沙《大公报》，1920 年 9 月 5 日)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下一步，是向效仿建设列宁的党迈进。

五四运动的波澜

让我们来看看毛泽东毕业后的活动吧！对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当时的政府也很热心。作为窗口是吴稚晖（他是接收留学生的里昂大学校长）和蔡元培（1915 年，在法国提倡这一运动。回国后自 1917 年起任北京大学校长。对新旧思想采取兼容并蓄态度）等人。新民学会也积极响应，毛泽东作为联系人于 1918 年 9 月至翌年 4 月 在北京奔走。

1919 年 4 月，毛泽东经上海回到长沙。当年 12 月，为驱逐湖南都督张敬尧向中华民国总统陈情，再赴北京。在北京召开大会，游行至总统府后，他在新华门前发表演讲。总统是徐世昌，与张敬尧同是军阀，只不过派系不同而已。毛泽东设立平民通信社发布消息，一直在北京活动到第二年 4 月。返回途中，顺便去上海。6 月张敬尧被免职，后战败逃亡。

在毛泽东前后两次滞留北京的间隔里，1919 年 5 月，北京

发生了重大事件。

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时，就已遭到来自各界的反对和声讨。而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竟然决定签约承认日本在中国所拥有的既得权益。这些权益是德国从中国取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德宣战，向中国出兵并打败了德国，因此想要继承德国的权益。

承认二十一条要求的这一个屈辱的日子——5月7日被定为“国耻纪念日”。北京的学生则提前在5月4日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废除二十一条要求”、“拒绝签署巴黎和约”、“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游行示威的学生们，涌到签署二十一条要求的外交部次长曹汝霖的宅邸，捣毁房舍。

北京的事件迅速扩展到全国。被称之为“五四”运动的这种动向，伴随着接受国外新思想的文化运动，打破了沉闷的社会空气。五月四日毛泽东在长沙积极响应新的运动潮流，而且还到北京直接接受新思想的洗礼。

《共产党宣言》

根据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北京寻找并阅读了译成中文的共产主义方面的书籍。翻译过来的不多，但有三本书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

考茨基的《阶级斗争》

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

举出这些书名后又说道：“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对使毛泽东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三本书，我一直都抱着很大的兴趣。不过，在日本只能找到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铃木茂三郎先生藏书。现为法政大学大原文库所藏）。该书于1920年10月出版。

幸好在1988年夏访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时，我不但亲眼见到了这三本书，还得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十六年间，一直负责管理毛泽东藏书的研究室副主任、党史研究会副会长逢先知的赐教。

在打开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上盖有“毛泽东”这一同笔迹一样的橡皮戳。据说这是延安时代的藏书。

根据讲解在1920年夏天是不可能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因为现存最早的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只是再版本是1920年9月再版的，译者是陈佛突，与初版译者陈望道是同一人。而毛泽东是否读过初版本，则不得而知。

另外，《阶级斗争》出版于1921年1月，《社会主义史》的出版也可以确认在1920年。上述说明只是淡漠的，但我很感动。

后来我又得知当时在上海发行的《民国日报》上登载有这样的短文：

“来信问‘陈译马格斯共产党宣言’的买处 因为问的人多，没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问的话：

一、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

二、这本书底内容，《新青年》、《国民》——北京大学出版——《晨报》都零零碎碎译出过几章或几节的。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经陈独秀、李汉俊两

先生校对。可惜还有些错误的地方，好在初版已经快售完了，再版的时候，我很希望陈望道先生亲自校勘一遍！”

这是一份伪装巧妙的出版广告，登载于 1920 年 9 月 30 日。第一版有人说是 4 月也有人说是 8 月 如果是 4 月就出版的话，那么这份广告未免太迟了。

一般的说法是，陈望道于 1920 年 3 月至 4 月 在其家乡浙江省义乌分水塘的茅舍里将此书译出，5 月持译稿到上海 经陈独秀和李汉俊的认真核对后出版发行的。又新印刷厂印刷。该印刷厂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维经斯基出资设立的。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出版。第二种是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1920 年 9 月出版。1920 年 7 月 毛泽东回长沙，创办了普及传播新思想的报纸、杂志、书籍的文化书社。在第二年 3 月的营业报告中，上述三种书籍也在销售之列。

毛泽东与陈独秀

与其说是 1920 年夏天，不如说毛泽东是在秋天或冬天才读到《共产党宣言》更为自然。不过在 1920 年秋天以前，也不是不可能读到该书。5 月 5 日毛泽东由北京到达上海后，马上去拜访了陈独秀。

那时，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应该在陈独秀手上。即使不在那里，也可能成为话题吧！当时，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读书会，广泛收集有关共产主义的中文书籍，包括印刷出版前的原稿。因此陈望道的译稿在印刷之前，可能在会员之间传阅，或者已经油印成册。总之，我们可以推测，毛泽东可能读了《共产党宣言》的原稿或油印版。

毛泽东曾对斯诺说，当时正逢他一生中的转折点，陈独秀对共产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坚定信念，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陈独秀

对青年毛泽东想必也寄予期望了吧。文化书社之所以能够免付押金从上海的新青年社、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等处采购图书，也是依靠陈独秀的介绍。

毛泽东对湖南省教育会做工作，想请陈独秀到长沙讲学，但由于陈独秀太忙，未能实现。另外，还邀请陈独秀出席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但也未能实现。毛泽东两次请陈独秀去长沙，可见他对陈独秀的倾倒程度。

毛泽东也许看过油印版的《共产党宣言》，也许连油印版也没看过。无论如何，毛泽东一定是透过与陈独秀的接触，又聆听了陈独秀的解说共产主义而获得启示，进而受到陈独秀的人格感召之后，才决定了自己今后所要走的路。对于毛泽东来说，陈独秀就是能说话的活着的《共产党宣言》。

亢慕义斋

在去上海之前，他也并不是没有可能在北京读到《共产党宣言》。北京当时有家叫“亢慕义斋”的小小图书馆（称图书室更妥当一些），据罗章龙回忆说，他曾看到过毛泽东认真地读着放在图书馆里的油印版的《共产党宣言》。“亢慕义”是“Communism（共产主义）”（由 Commun - 的音译与 ism 的意译合成的）。“斋”即书斋之意。按照罗章龙的说法，它是由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创立的。

但也有人说是李大钊创办的，李大钊创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设立了附属研究会的图书馆，命名为“亢慕义斋”。地点在景山东街马神庙西口北京大学第二院。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将“马克思”的中文表记依前例写为“马尔格士”而不使用通常的“马克思”的写法。因为这样一来即使是受到官宪的镇压，也可以强辩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研究

会。这是李大钊想出来的主意。从在汉字字面上下功夫的手法来看，“亢慕义斋”也很像是李大钊的提议。该研究会秘密成立于 1920 年 3 月。

所谓油印版的《共产党宣言》，可能就是在前面的《民国日报》的记载中曾提到过的版本吧！北京的杂志《每周评论》于 1919 年 4 月，转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十条纲领及前后段落。译者在其序言中说：“这个宣言是 Marx 和 Engels 最早、最重要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斗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十六号，4 月 6 日）杂志《国民》于同年 10 月，转载了第一章。

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别的地方也谈到这三本书。并说他是从这些书中知道了“阶级斗争”。

“记得我在 1920 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陈独秀。

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向斯诺讲述他的一生之后，五年后的 1941 年 9 月，他在延安发表了《关于农村调查》的演讲，上文是讲稿的一部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年 21—22 页。由于该书的出版，一般人才能看到这份讲稿。毛泽东说他从这三本书中，只取出了‘阶级斗争’四个字。这

真可以说是实话实说。

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大概是以《社会民主党纲领解说》的英译本为底本的。考茨基虽承认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重要性，但主张社会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合并，建立政党并通过议会进行改革。

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广泛地展望了欧洲的社会主义历史，但俄国革命仅占其中的一章，他认为俄国革命的意义在于年轻人热情的行动，但另一方面又说缺乏忍耐。主张“社会主义必须将博爱、同胞、互助、和平这些基督教的特色，融于其道德之中”而且否定违背法律的革命运动反对《共产党宣言》。此外，蔡元培为中译本写了序言，他认为中国古代思想中就已经存在社会主义的思想。

因而，如果是这两本书的忠实读者，就不会选择共产主义者的道路。对考茨基也好，对柯卡普也好，毛泽东都做了随意的理解。而对《共产党宣言》大概也是同样吧！

作为中共党员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由此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参加了这次大会，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首先留下了一页辉煌的历史。中央局书记是陈独秀。中央局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

毛泽东与同样代表湖南省出席会议的何叔衡一起组织了中共湖南支部。翌年，成立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这时他28岁。

当时他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专心组织工人搞罢工运动，发动安源煤矿（靠近湖南）在江西省内的工人，于1922年9月罢工。

1924 年以后，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当时两党处于合作关系。毛泽东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在上海一带从事活动。他渐渐对农民运动寄与关心。1924 年 10 月，为了养病返回长沙。在家乡韶山一带组织许多农民协会，让他们加入共产党。入党仪式就在他卧室的小阁楼上举行（1925 年 6 月）。

湖南军阀发出逮捕令，于是他离开韶山（1925 年 8 月），在广州国民党开设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讲习生里就有他弟弟泽民（1926 年 5—10 月）。

其后再赴湖南 视察韶山一带的农民运动 并向党中央递交一份报告，对这些农民运动做了全面的评价。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 年 1 月）。

武装农民

在这份报告中，虽然还没有强调农民武装起义，但几乎处于其前夜。对事态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对共产党的镇压。镇压波及全国各地，造成工会、农会、学生等众多牺牲者（1927 年 1 月）。

因此，中国共产党下定决心对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毛泽东在江西省西部集合国民革命军的士兵、安源煤矿的工人和农民自卫军，发起暴动，失败后率残兵南下，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建立根据地（1927 年 10 月）伺机向平原地带出击 袭击大地主的宅邸。

毛泽东实行实物供给制，凡是得到的金钱、粮食，都平均分配。在军队内部严格禁止上级打骂下级。

在南昌反叛蒋介石（1927 年 8 月）的国民革命军之一部到达井冈山 与毛泽东会合。命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

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1928 年 4 月)。第四军两次向福建省西部出击,开辟了由江西省东南部到福建省西部一带的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此为基础,1931 年 11 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设在江西省瑞金。中央政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国家主席,是毛泽东。直到 1937 年 9 月,与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之时为止,他在重要文献上的签名,一直都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头衔。

毛泽东的革命目标,不是城市工人,而是以农村农民为中心;不是罢工,而是武装斗争即依靠内战。从此以后,他坚持这一革命路线,因而受到以在城市夺取政权为目标的上海党中央的严厉批评,他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险些被开除党籍(1934 年 9 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终于在第五次“围剿”中反击未果,放弃瑞金。在突围时,有大量牺牲者,而且转移的目的地含糊不清,因而引起红军士兵的不满。毛泽东要求开会,于是在贵州省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做了正式总结,认为领导层在反“围剿”中有错误(1935 年 1 月)。

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又恢复了发言权。在长征后期,进而在到达陕北之后的各种活动中,他在政治上也扩大了发言权。

在延安,他终于确保了党内的最高地位。

然而,我们也应该研究一下毛泽东作为诗人的侧面。

2. 诗人毛泽东

与蒋介石会谈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毛泽东的诗作有 50 篇。其中“词”有

34篇，由此可以看出他很喜欢这种形式。词是由长短不一的句子构成，最早是配合音乐咏唱的歌谣曲，逐渐地只有歌词变成创作对象，即原谱换词的歌。

1945年8月，毛泽东由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委员长蒋介石会谈。日本战败后，国共两党间内战的气氛不断升高，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在进行为期43天的会谈之后，于10月10日签订了协定。第二天毛泽东返回延安。

毛泽东在重庆逗留期间，常去访问老朋友柳亚子。20年前当时国共两党尚处合作阶段，柳亚子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大会，并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相识。柳亚子是文学结社——南社的主持人。

毛泽东在重庆时，在柳亚子拿出来的纪念册上题了一首自己填的词。在毛泽东返回延安之后，柳亚子希望将毛泽东的词与自己的唱和之作，一并刊登在重庆发行的中国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上，而《新华日报》只登载了柳亚子的作品。

读了唱和之作之后，继而想要读原作，这原本是人之常情。

三天后，《新民报》以特讯形式登出原作。这是一家只有晚报的报社。四天后，《大公报》将两首同时刊出。这是一家在重庆发行的具有权威性的全国性报纸。又过几天，大公报连续三天登载主编王芸生所写的评论。

由延安的窑洞飞往抗战之都重庆的毛泽东，依旧是谜一样的人物。尽管他签订了和平协定，但他的本意是什么？这个人物运用传统的文学手法，留下了他的作品便飘然而去。人们狂热地读着。然后是经常对政府口诛笔伐的大记者王芸生所写的评论，自然更引起人们的强烈关心。王芸生的评论很长，笔锋极为辛辣，全市为之沸腾。

帝王思想

“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 严格讲来 皆是统治人民 杀人流血 根本与人民的意见不相干。胜利了的 为秦皇汉武 为唐宗宋祖 失败了的 为项羽。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 他们也一样高据皇位 凌驾万民 发号施令 作威作福 或者更甚。”

王芸生评论的全篇主旨是 此词中有帝王思想 我们必须反对这一复古倾向。

毛泽东的“词”

赞同与否定的意见纷然而起，唱和之作争相披露于报端。毛泽东的词填于 1936 年 2 月 原文如下：

沁园春·雪

一九三六年二月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作者自注“原”指高原 即秦晋高原 是吟咏横跨陕西、山西两省的黄土高原。

黄土高原海拔一千至一千五百米，地势平坦，无一草一木。裂谷深壑 穿凿于其中的洞窟即为人的住房 称为“窑洞”。

春天的季风卷起高原的砂粒 在天空中形成厚厚的沙尘 大

地马上暗如黄昏。冬季气温降至零下二、三十度，连黄河也会结冰。无数巨大的冰块顺流而下，气势磅礴，水花四溅，澎湃之声，至远不绝，撼人肺腑。

高原居民常言道：老天爷一日十八变，下雪时，狂风将雪花高高地卷向云空，恰似无数乱舞的银蛇。大雪停时，阳光初照，高原上下起伏，如同奔走的白色大象。在阳光的点缀下，宛如女人的艳装一般。

词的上半阙，是在描绘风景。这种从正面赞美中华风光，虽仅限于北方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尚不多见。

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工农红军在放弃瑞金一年以后，好不容易才到达陕北的小镇——吴起镇。兵员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骤减到只有七、八千人，也有人说仅有四千人。与在这一地区活动多时的红第十五军汇合后，成立“红一方面军”。兵力一万余人。依据毛泽东的主张，红一方面军再向东进，在山西省西部、黄河东岸一带，展开作战。

战斗开始于 1936 年 2 月，《沁园春·雪》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历史的回顾

正是词的下半阙，引起王芸生的非难。

毛泽东列举了一般在回顾中国历史时，必定谈及的人物，并断言他们都已成为过去的人物。

秦始皇统一天下，汉武帝带来王朝的兴盛，但在发展文化上尚嫌不足。

各自建立起唐、宋王朝的唐太宗、宋太祖也没什么文采。

至于一代天之骄子成吉思汗，虽然东征西讨，纵横一时，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但他仅是凭仗武力的英雄，被喻为

举弓的射手 尽管能射落巨鹰 但射手毕竟只是射手而已。

“俱往矣”。

那么 理想的英雄 那些‘风流人物’又在哪里呢？数“一下的话，就在历史发生巨变的今天。——“还看今朝”。

于是 产生一个疑问 这位‘风流人物’到底是谁 不单是王芸生，很多人也都认为这无疑就是填词者本人。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下半阙开头的那一句——“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所谓‘江山’即大自然。然而又不单是河山 而是志在留名青史的人物 在眺望眼前的山河时 所呼唤出来的‘江山’。“江山”必须去平定 而平定的那一刻 就可以称之为‘打下’——光荣地‘打下江山’。

山河颇具诱惑力，它对那些无名无位、贫困无力的年轻人小声说：“你要当皇帝 因为这山河是为你而存在的。”

大陆是摆放山河的大舞台，它宽容地听凭那些做帝王梦的人们横行无阻。不管有多少王朝兴盛衰亡，但舞台依然牢不可摧。

在这舞台上登台献技的人物数量无法知晓，但主角却是建立起王朝的人。想要概括历史，必须把他们叫出来。而如此的呼叫方式，无疑也是一种演技。人们认为在这里演戏的人就是毛泽东，这一看法也绝对不过分。

作者也知道这首词受到了王芸生等人的非议。他将最早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带在身边，在书中该词上面的空白处做了如下的自注：

“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 只能如是 须知这是写诗啊 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一些人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指无产阶级。”

毛泽东在自注中并没有记载，日本战败后斯大林曾私下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应取得合法地位，和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 将工农红军改编成国防军等。

对此，毛泽东已下定决心——哪怕是一支枪，也绝不交出。斯大林所提的改编，无非是将指挥权委托给国民党。既然不那样 内战在所难免。毛泽东在柳亚子的纪念册上挥笔题词《沁园春·雪》时 肯定是更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3. 作为最高权力者

元首·国家主席

1949 年 10 月 在宣告新中国成立时 毛泽东已身兼数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他从 1945 年起，就已占有了上述地位。

在 1954 年的第一部宪法中，设有国家主席。不过在此之前的庆祝典礼上，毛泽东就已经作为元首行事了。1949 年 9 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在 1975 年的宪法中 没有设国家主席 直到 1982 年的宪法才重新设置国家主席。在这期间，中国是个没有元首的国家。也许毛泽东认为有党主席就足够了，而党的主席就是毛泽东。

然而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刘少奇下台后 位居第二的林彪期望得到这个位置。1970 年 在审议宪法修改草案时 原毛泽东秘书 也是文革中的干将 陈伯达 充当林彪的代言人 图谋在审议中的宪法修改草案中设立国家主席。当即遭到毛泽东的反

对，陈伯达随之倒台。而林彪也陷入失望的境地，以至于策划暗杀毛泽东。

毛泽东大概已判断出，林彪不是当元首的料，更何况除了他自己以外，他决不容许任何人坐上元首的位置。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毛泽东来说，“元首”极为重要。

1942 至 1943 年间的决定

一般认为毛泽东是在 1945 年 4 至 6 月召开的第七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才确立了党的最高权力者的地位的。不过，在此之前，他已获得相当大的权力。他的权力不但是党的正式决定，在制度上也得到了保证。

1942 年至 1943 年间，中国共产党大致做出如下决定：

(1)各根据地的党、政府、军队、民众团体 必须服从各级党委员会的领导。下级党委服从上级党委。军事政策与军事行动的大政方针，须交党委讨论，但具体军事行动由司令员政治委员（即党委书记）决定之。

(2)在党中央机关 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主席。同时，对于在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有最终决定权。

(1)项与当时要将抗日根据地划为几大区域，设置各自的统率机关有关。

譬如，华北地区的根据地在天津设有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是刘少奇。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在重庆设有南方局，书记是周恩来。

战争期间 为了临机应变 必须组织好兵员、粮食、武器弹药、运输系统、后勤支援等工作，故采取了党委一元化的领导措施。

原先党委书记个人的权力仅限于军事行动上，但是不久之后，在军事行动以外，党委书记也可以发挥其个人的权力，于是书记的独断独行渐渐成了惯例。

(2)项措施是(1)项措施必然导致的结果。

最初，中央政治局每月要召开两次例会。书记处接受政治局的决定，并加以实施。但是，战争期间，无法定期举行会议。于是1943年3月起，只要是在政治局的方针范围内，书记处可以做出决定。同时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

刘少奇为就任该职务，从天津返回延安。

任弼时十六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苏联留学四年。曾活跃在江西苏区，并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山西省打游击战时被调回延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人都都是湖南出身，而且刘、任均被视为毛泽东的心腹。毛泽东是三人书记处的“主席”，又是书记处上级机关政治局的“主席”。因此，不难想象中央书记处是如何开展工作的。此时，毛泽东四十九岁，刘少奇四十五岁，任弼时三十九岁。任四十九岁去世。文革时，带头批邓批周的迟群，就是任的遗孤。当时，他是四人帮的心腹，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十分活跃。

以上(1)、(2)两项，尽管是在战争的特殊条件下做出的决定，但是党、政、军权集中于特定的个人身上难免会滋生独断独行的弊病。于是，1948年又做出(3)健全党的委员会，采取集体领导制这一决定。但不论是党中央，还是毛泽东个人，对此都没有充分重视。

载有上述各项决定的党的文献，列举如下：

(1)《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

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2)《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关的调整及简化之决定》(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3)《关于健全党委制》(1948年9月20日党中央决定)

与共产国际诀别

在毛泽东担任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的两个月后，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发生了历史性事件。这就是共产国际宣布解散(1943年5月15日)。

中国共产党接到通知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支持解散的“决定”。政治局的反应如此迅速，完全是政治局主席毛泽东反应迅速的结果。

在此之前，刘少奇仿照俄国共产党内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对立，将毛泽东的思想喻为前者，而将陈独秀的托洛茨基主义、李立三路线、内战期间的左倾机会主义(指王明)喻为后者。虽尚未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但文章意图十分明显(《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7月6日)。

最早使用“毛泽东思想”提法的是王稼祥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之路》，发表时间比刘少奇晚两天。

1937年，王稼祥以派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身份，被派往莫斯科，一年后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意向。其中之一就是：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应以毛泽东为首实行统一的领导，并应拥有团结、亲密之气氛。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积极支持毛泽东，由此可以想象，他在莫斯科时就中共内部事情做了怎样的报告。

刘少奇和王稼祥的文章，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月1日)而发表的。另外，秦邦宪(博古)、张平化等人也发表了文章。

使用的词语均是“毛泽东的旗帜”或“毛泽东同志的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类的表现方法。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前后，毛泽东不但身兼两项主席职务，又组成了书记处，而且在纪念建党成立的文章中提出“毛泽东思想”。因此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有两个飞跃的年份。

四项主席

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了确认毛泽东的地位和权威的大会。

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及中央书记处主席。在会后不到两个月成立的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上，他又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党代表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是修改“党章”。新“党章”上，关于“毛泽东思想”做了如下规定：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偏向。”

此项与两年前刘少奇的文章宗旨完全一致是不言而喻的。作修改党章报告的也是刘少奇。他在报告中说毛泽东是“天才的、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

宣布大会开幕的是大会秘书长任弼时，他在简短的致词中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的思想抓住了人民群众，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旗帜。

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书记处就是为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做准备的。

毛泽东自1945年7月至1976年9月9日逝世，一天也没有

离开中央委员会主席这个职位。为了表示敬意，不再直呼他的名字 而代之以“毛主席 ”或简称“主席 ”。

“主席 ”一词 通常是指议长。然而由于毛泽东长年高居此位，就渐渐演变成了具有特殊名誉的称呼。现在作为党的机关，只在中央军事委员会保留着这一称呼，并为邓小平所享有。但称呼“主席 ”不是指邓小平 因为作为国家机关还有“国家主席 ”。

四、国家建设的蓝图

1. 十大关系与人民内部矛盾

未来的国家

毛泽东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首”当时，在管理建设这个国家之际，他有什么样的构想？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在新国家诞生前，他是怎样描绘未来新国家的。

1930年1月，他以下面优美的文笔，讴歌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当时，他开展游击战，好不容易才在江西省东部建立起称之为“根据地”的支配区。不过，已出现将遭到国民党讨伐的动向。上述引文虽然充满了信心，但令人觉得有些茫然。

翌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省瑞金成立，他成为这个共和国的中央政府主席。但是，包括宪法在内的政策及法律，则是从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制订之后送过来。

1937年8月——

“中国共产党……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这时，中国共产党向南京的国民政府提出了一致抗日的要求。因为日本军队已在北京近郊的卢沟桥发动攻击，而这个“新中国”并没有将国民党排除在外。

接着，1949年6月——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

又经过三个半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诞生了。与国民党作战，取得了胜利。

乌托邦的原型

在现实中，国家一旦成立，就不能像以往描述的那样是个空想的社会。

毛泽东在谈到国家时，其基本点里有空想。那就是他主张人应该兼工人、农民和士兵。

他曾向领导人民解放军的林彪下达过如下指示。该指示发

表于 5 月 7 日 故称为‘五·七指示’(1966 年)：

“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

接着又说 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学文化”意指识字及学习一般常识)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 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又能从事群众工作 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正在进行中)文化革命斗争(不久即将开始)“这样 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

另一方面 工人虽然从事工业生产 但也要学军事、政治、文化 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学生、商业、服务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同样应兼顾多项。

对毛泽东来说，国家无非是可以称之为人类聚集的组织。尽管职业分工不同 但不能只保持分工状态 人必须集多种功能于一身才行。这样的人的集合体，才是真正的国家。这就是上面引文的宗旨。

我刚才说这些都是空想，但对毛泽东来说，这是应该做的，而且也是做得到的。这个设想的直接来源，大概可以追溯到 1871 年巴黎公社发表的纲领。

这就是毛泽东的乌托邦的原型。

1918 年，他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时，听到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 年)的“新村”运动 于是说服了朋友 也曾想在岳麓山上建设“新村”。农民当然不可能听他们这些身穿学生服的人的游说 既没有人提供土地 也没有人去参加 这次试验一天即告结束。

《论十大关系》

新国家的素描，以《论十大关系》为人所知。这是毛泽东在 1956 年 4 月发表的一篇讲话。

从 1954 年 6 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也能看到国家蓝图。但是，如果要研究管理经营方面的构想，而不是国家的基本框架，那还是这篇讲话。

新国家诞生之际，没有马上发表这篇讲话，好像迟了。但是需要时间来治愈战争的创伤，恢复经济。而且，那期间又赶上长达三年的朝鲜战争。停战协定是在 1953 年签订的，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已开始实施。

该“计划”于 1956 年完成，比预定时间提前一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进行方式很不正规，在立案的同时开始实施，然后边实施边调整计划。整个计划在 1955 年定案，也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前一年。

1956 年宣布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但需要总结的问题堆积如山。

先是由刘少奇做总结，稍后毛泽东开始逐一总结。仅仅一个半月内就听取 34 个部所做的汇报，热情高涨。这也是建国以来他第一次广泛听取汇报。在中央政治局的讨论会上，毛泽东将汇报中的问题加以整理，归纳成十项，做了这次讲话——《论十大关系》。各项目都有对立的两方面，故称之为“关系”。其实叫“矛盾”或“问题”也一样。

下面就是十个项目的内容。

在对立的甲、乙两项中，划线的一项表示应该受到重视。

而实际上，甲也重要，乙也值得重视。因此，没有划线的一项，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它的重要性。

- (1) 重工业 ↔ 农业 · 轻工业
- (2) 内地工业 ↔ 沿海工业
- (3) 国防建设 ↔ 经济建设
- (4) 国家 · 生产单位 ↔ 个人
- (5) 中央 ↔ 地方
- (6) 汉族 ↔ 少数民族
- (7) 党 (中国共产党) ↔ 非党 (民主党派)
- (8) 革命 ↔ 反革命
- (9) 是 ↔ 非 (犯错误者)
- (10) 中国 ↔ 外国

当时的口号是“学习苏联”。

一般的定式是 提到苏联 就是社会主义 提到社会主义 就是五年计划，五年计划的目标，就是实现工业化，而其中重工业得到优先重视。中国实施的五年计划也正是基于这一定式。

而毛泽东主张不能轻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虽说如此，也并不是否定对重工业的重视。他的这个主张不彻底，带有妥协性。想必在一般人们对苏联模式深信不疑之时，大概毛泽东也不打算否定这种模式吧！

然而，他提出要重视农业、轻工业的主张，确实见识高。

根据在经济落后的内地也要建立工业基地的方针，内蒙、西北等地相继出现新兴的工业城市。对此，毛泽东提议要活用沿海地区的工业，由于沿海地区的工业设施占全国的 70% 因此毛泽东的提议很切合实际。在国防建设上，他又指出经济建设的发展就是最好的国防。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往往有国家优先，生产单位优先的倾向，对此他主张不能忽视个人的利益。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必须赋予地方以权限，使地方能发挥其积极性，在科学技术和企

业管理上，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但是并非否定中央的统一领导，以及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必要性（以上（1）~（5）、（10）项）。

又指出在取缔反革命分子时，以及处理犯过错误的人重回社会的事件时 应采取稳定宽大政策（8）、（9））。

要尊重少数民族；尊重中国共产党以外的政党（民主党派）（（6）、（7））。

这次讲话，对当时视为绝对的苏联模式——重工业优先政策提出了异议（虽然仍具有妥协性）。在这一点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尚不具独自的国家建设之构想，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 1956 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十年总结》，1960 年）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再次发表长篇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一步详细论述了这些关系（问题矛盾）《论十大关系》是在他逝世后才正式发表的。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较早，是毛泽东的代表作之

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内容 由十二章组成。为便于与《论十大关系》比较 在此也将每一章定为一项。由于省略了第一章和第十章，因此数字和原来的章数略有不同，标题也不同于原文。各章不分甲乙对立两项。划线处为新论点，是《论十大关系》中所没有的。内容如下：

（1）肃反问题

（2）农业合作化问题

- (3)工商业者问题
- (4)知识分子问题
- (5)少数民族问题
- (6)统筹兼顾 适当安排
- (7)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 (8)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
- (9)关于节约
- (10)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在上述各项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0)‘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至此 我们感觉终于看出毛泽东构想的‘国家’的轮廓。工业化这一现代化目标 虽然是一般常识 但是这个未来的蓝图应该让百姓知道才行。此章内容大致如下：

——国家建设的目标在于现代化。

——现代化即工业化。关键是重工业，钢铁产量的目标是年产 2,000 万吨。如果速度快的话，可望在 1968 年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完成。

——为发展重工业，必须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农业不仅能提供原料 还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 并能提供资金。

——随着农业的现代化 还可加速机械、化肥、水利、电力、运输、燃料、建筑材料等部门的发展。

这里提到的“钢铁产量年产 2000 万吨”的目标 在 1971 年达到 晚了几年。如果中途没有受到‘大跃进’运动的影响 大概在预定时间内完成。(顺便提一下 日本的钢产量 在 1955 年是 940 万吨，1960 年是 2113 万吨。)

当然，这并非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倡工业化。早在 1949 年 3 月 当全国胜利在望时他就已经预测到在新形势下 党的工作重点将由农村转向城市，认定把中国由农业国改造成工业国是一

个正确的方针。

另外，在总结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整个方针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就包括有“国家的工业化”这一内容。后来也列入了第一部“宪法”之中（1954年）。

然而，列举钢铁生产量的数字作为工业化的指标，显然与单纯地提倡工业化意思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工业化的基础在于农业和轻工业。

2.“人民公社好”

农业的集体化

前面已经说明 贯穿《论十大关系》、《人民内部矛盾》两次讲话的核心 是要重视农业 要发展农业的主张。

那么 如何发展农业 就是通过“集体化”并使全国农民都加入生产合作社。

农民加入合作社 并不是事先就已经有合作社 而是农民将各自的耕地、农机具、家畜等拿出来一起出资 组成合作社 共同从事生产。每天的劳动用“工分”来记录 待秋收后从收入中扣除合作社的基金和用于福利事业的基金之后 再按“工分”分配。

合作社分初级社和高级社。前者对于向合作社提供的耕地、农具、耕畜也进行分配 而后者只对劳动进行分配。对耕地等进行分配 就等于承认剥削——这是毛泽东的理解。因而，高级合作社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使之在全国实现 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化。

党内的一致意见是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实施年度内 也就是1968年底 或再延长一段时间 实现农业合作化。

但是毛泽东对此不满，认为太浪费时间，因而大加非难。

刘少奇对此非难反驳说：

“他们嫌‘太慢’了，是要破坏与农民的同盟。”（1954年）

这里没有说明“他们”到底是指谁，不过毛泽东回敬了一句：

“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

1955年上半年，刘少奇和邓子恢采取措施，解散约三分之一的合作社。进而规定在今后五年内，参加初级合作社的农民不得超过全国总户数的三分之一（1955年7月）。

这项规定纳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该计划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

毛泽东的冒进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毛泽东得意地召集全国的省、市、区党委书记开会，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其中就包括前面引用的“小脚女人”那一节。会议赞成并通过了这项报告（1955年7月）。

参加会议的党委书记回到各自负责的地区，为贯彻毛泽东的意图而奋斗。

次年，全国各地的党委书记的报告176篇汇编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出版了。毛泽东不仅为该书作序，而且还给其中的104篇加了“按语”。

对各地的党委书记来说，这是得到中央——特别是毛泽东赏识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的湖南省湘潭县委书记华国锋也写了报告，并被收录。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就在湘潭县内。华国锋也因这份报告而得到提拔，并在毛泽东逝世后，成为党主席。

毛泽东的这种激进主义，一般是用“急躁情绪”或“冒进”等

词表现。1953 年，中共中央下达指示要求必须纠正冒进倾向，然而毛泽东对这一党内文件毫不在意。当他无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1955 年）编制该计划的周恩来恐怕大为困惑吧！

令人惊讶的是 制订五年计划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根本就没有指责或批评扰乱国家计划，而党内也没有任何批评。不仅如此 在召开省委书记会议的三个月后 召开中央扩大会议 追认了毛泽东的方针（1955 年 10 月 七届六中全会）

当事者刘少奇（他对毛泽东的方针持消极或反对态度）在第二年 1956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用平淡的口吻说了下面一段话。话中所谓的“党内的右倾保守思想”其实是指刘少奇本人。

“从 1955 年下半年以后，像大家所知道的，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纠正了党内抑制农民的合作化积极性的右倾保守思想 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了特别迅速的发展。”

中国农村的实情

从实际情况看应该合作化这一大前提，应慎重讨论。

根据 1949 年的一项统计，中国农民的实际情况如下：

△每百户

耕畜（牛、马、水牛、驴）	64 头
犁（传统的旧式的）	50 台
脚踏水车	9.7 台
大板车	6.6 辆

在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地主制度下，地主只一味地收取地租，几乎不做灌溉、施肥、耕地改良等工作，结果农业只是向土地掠夺 导致土地贫瘠 产量低下。

而近代百年来，又有外国的侵略、内战、政府无能、疫病流

行、饥馑、天灾等灾难。

新国家的农业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其状况可想而知。据统计，1953年至1978年的二十六年间，生产条件虽得到极大改善，但生产水平几乎没有提高。

△生产条件

农用机械马力	(增加了)	638 倍
农用电力	(增加了)	505 倍
化肥使用量	(增加了)	112.3 倍
灌溉面积	(增加了)	1.25 倍

△生产水平

农业总产量	(增加了)	1.3 倍
粮食产量	(增加了)	82.6%
棉花产量	(增加了)	84%
食用油产量	(增加了)	35%
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	(增加了)	70元 每年增加 2.7 元)

进而还要考虑到农民教育水平低，交通、通信不便等事项。当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对农民的看法如下：

“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农民一定可以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必须肯定的。因为他是劳动人民，他不剥削别人，也不甘心受别人的剥削。他是靠自己的劳动为生，互助合作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只要和他们讲清楚，他们是会赞成的”。但是，“农民本身又存在着落后性、散漫性与狭隘性”。农民又是小私有者，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他们习惯于单独经营，有个人自私心理，一听到社会主义，他们就很自然地联系到‘均产’思想。误认为‘一拉平’就是社会主义。

如果农民对社会主义一开始就没有怀疑、没有动摇、没有误解 那才是不可理解的”。

(1954 年，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

邓子恢的想法是，与其集体从事农业生产，不如采取生产责任制。亦即定下生产份额，让农民包耕。根据农活和农作物的性质，可以由作业组，也可以由农民包耕下来。期限可以用季节做单位，也可以定为一年、几年、或几十年。包耕时，定下生产份额，超过定额的部分，全部或部分归农民所有。他曾多次向党、向毛泽东提出此建议。

邓子恢的建议，终于在三十多年后得到承认。其实施效果就是我们今天亲眼看到的情况。

毛泽东排除了刘少奇和邓子恢为代表的谨慎论，号召农业合作化，并加以实现。1956 年底，全国农户总数的 87.8% 加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加上已加入初级合作社的农户，合计有 96.3%。

农业合作社本来应该在 1968 年实现的，却提前十二年。

不仅如此，合作化的发展势如破竹，两年后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农村公社——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

1958 年夏，人民公社突然出现在中国大陆上。这一年 12 月农村人口的 99%，一亿二千万户加入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英译为“People's Commune”。与合作社性质相同，不单是生产方面的组织，而且还是个行政组织。一个人民公社大致相当于行政单位“乡”的规模。“乡”的党委会搬过来成为人民公社的党委会；“乡”的人民政府成为人民公社的社务委

员会。

原来的高级生产合作社，几个合并后成为一个人民公社。一开始就带有大型化的倾向，全国范围内有两万四千个人民公社占建国初期全国‘乡’的十分之一。乡的合并也齐头并进，呈现出数乡一公社的局面。后来，规模缩小，总数成为七万四千余社（1963年）。

一个公社大约有两千户左右，分成几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大队的规模相当于以前的合作社。大队又分成几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有二十至三十户，农民直接隶属于生产队。一个生产队的劳动力为一百至一百五十名。

人民公社成立之初流行的话是“吃饭不要钱”。公社设有几个食堂，一日三餐都吃食堂，人们说是妇女从锅台上解放出来了。

不能从事重劳动的老人和小孩也在食堂免费用餐，由此可见在这方面社会福利保障做得很彻底。不是不能说实现了共产主义（按需分配）。

劳动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劳动。每天清晨，按钟声集合，到指定地点去干农活。休息时间也有规定。

组织扩大后，有些人被动员去参加修路、修水渠、建水库等。而中学、医院、商店、工厂等经营单位的人员，也都来自这些公社。

人民公社是一个小小的国家，但也是军队式的组织。信的地址一般是“……省……人民公社……大队……队□□□同志收”。……的部分多为地名，也有“红旗”“卫星”之类的名称。个人也是从上到下都被组织起来，只不过是军队的一员而已。

“人民公社”创办当初，并没有完整的蓝图。在前一年冬天，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灌溉工程建设，水渠贯通了几个合作社。但有些合作社提供了水渠用地，却得不到灌溉，而一个合作社无

力承担的大工程，合并为公社后则增加了许多可以动员的农民。由此可知，几个有联系的合作社合并后，可以解决各合作社之间的纠纷也便于调节劳动力。

当初叫“合作社联合”或“扩大合作社”。

据说最先使用“人民公社”这一名称的，是河南省遂平县的卫星人民公社，但众说纷纭，难下定论。不过，至少可以确定是毛泽东加以推广的。1958年8月，他去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听完各种汇报后说了句“人民公社好”。

随行的新华社记者马上记录下来，第二天报纸的头版便醒目地刊登出“人民公社好”这五个大字。

于是，全国迅速开展合并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人民公社运动。中央政治局在避暑地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不仅承认人民公社这一组织，而且还通过决议要大力推广。

人民公社的特色，与农业社会中常常幻想的“乌托邦”颇具相似之处。“人民公社”对年轻时曾在湖南省尝试建设“新村”而失败的毛泽东而言，正是具有国家规模的“新村”之体现。全国出现了两万四千个“新村”，各“新村”的人们为农业生产和炼钢运动投入了极大热情，无疑也引起了毛泽东强烈的共鸣。

1958年

1958年笼罩在一片狂热的气氛之中，炼铁、生产飞跃般增加，以及道路扩建等各方面齐头并进。所谓“炼铁”即农民用砖头建造高炉，而后投入矿石和煤，用来冶炼矿石制成铁。炉子顶多有两人的两倍高，因此必须摆上几十个炉子才行。为提炼焦炭，将煤铺展在地面上燃烧。

在农业生产方面，则鼓励小麦和水稻密植。一区域内，密密麻麻地种着结满稻穗的水稻，小孩可以坐在上面。旱田的土如

一座座小山，斜坡处满是密植着的红薯。

单位面积产量被夸大宣传，报纸上每天都要登出新的记录。恰好那时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于是新记录的出现，被形容为“放卫星”也被誉为生产大跃进。

三面红旗

1958年全中国随处可见的光景是“三面红旗”。当时中国共产党正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目标政策，“三面红旗”正指这三大目标政策。而中国各地到处都有“社会主义总路线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大跃进万岁”这样的巨幅标语。

“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内容，不外乎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人民内部矛盾》两次讲话中所阐述过的论点。

1953年曾提出过“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目标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大致完成。它的内容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总路线”一词成为固定用语，而“过渡时期”结束之后接下来就是“社会主义”，所以又提出“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社会主义总路线”是句口号，其内容又进一步口号化。翻译成日语稍长，而汉字的表现则简洁有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确，1958年的中国真可谓干劲十足，正好在这一年秋，我得到了去四川、湖北、河南等地旅游参观的机会。在湖北省麻城县参观了密植田，稻子密密地种在稻田里，小孩爬到上面，也不会掉下来，像层厚厚的地毯。

回想一下，在这么长的参观旅行中，应该觉察到为什么只有这一块稻田没有收割。讲解中说收割已经结束，确实每块田也

都收割完了。那么也就是说，参观的那块密植田是特意为我们保留下来的。现在每当我回想起这件事，就觉得对不起当地的农民。

五、思想改造

1. 开展整风运动

毛泽东的谈话

与国家建设并行，毛泽东又着手提高人们觉悟的事业。也可以说是人的革命 或意识的变革。

这被称之为“思想改造”。如字面意思 改造思想 就像动手改造旧房子 使之焕然一新 便于居住一样。这种改造运用到人身上 就能使人面貌一新。这就是毛泽东的人类观。

我曾见过毛泽东。

当我被引进敞开着大门的屋子里时，毛泽东像一座建筑物一样站立着。握手时 他的手柔软 有点像葵蜜饯 令人感到意外。我本以为他在农村闹革命 手应该很粗糙的。不过 同时又觉得他是不是刚才还在书斋里埋头读书，四周的气氛冷清幽静而深邃。

在一间像是会议室的地方，他跟我们谈话。话题是讲他自己的生涯，说自己本来打算当小学教员的。我所做的笔记是这

样的：

“我当时一则没有钱进大学，二则也读不下去了。我读的师范学校，是准备当教员的。我做过小学教员，也做过校长。那时一心想当教员，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员。”

我是在上海租界中一栋叫作“法兰西俱乐部”的建筑物里，聆听毛泽东这番谈话的。时间是 1960 年。

小学教员

后来我经常想起毛泽东那时说他自己本打算当小学教员的那段话。这不正是说明他对“教育”有着特殊的感情吗？“思想改造”就是以党员为对象所进行的一种教育，也称“整风运动”。

“整风”的“风”指常见的一般现象，即风俗、风潮、歪风的“风”。“整”也称“整顿”，即检查、矫正，含有教育、说服之意，也指检举揭发错误及不法行为，意即刷新。

“思想改造”具有“学习”运动的一面，同时也是一种启蒙运动。他在延安开始搞整风时，曾在讲话中提到“必须进行启蒙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也有“整风”运动。“学习”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反复进行，几乎没有间断过。虽然名称各异，但宗旨并不怎么变。结果还是毛泽东教育士兵、党员和一般民众。他任何时候都是位小学教员。

整风运动的原型

延安整风运动于 1942 年开始，1945 年结束。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动的整风（工农红军中也搞过类似的活动）成了“整风”运动的原型。

1941 年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5 月 19 日）这篇讲

话预示着运动的开始。

1942年，他又连续发表多次讲话，吹响了整风运动开始的号角。

《整顿党的作风》（2月1日）

《反对党八股》（2月8日）

口号要整顿中国共产党工作中的歪风。他称调查研究的方式为学风，称党内及党内外关系中的做法为党风，党文献中的文体为文风。并指出，学风中存在着主观主义，党风中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文风则枯燥无味。他的观点是：

学风中的主观主义表现在只知背诵马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对中国历史及中国革命一点不懂。

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闹独立性。在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上只顾个人，对别部、别地、别人漠不关心。这就是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党风”中的表现。

文风中存在着党八股现象。清朝以前的官吏选考中，答案形式呆板，采取称之为“八股文”的文体。这种形式的文体在党内很流行，称之为党八股。空话连篇，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而且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内容枯燥无味。因为模仿西方，所以也叫洋八股。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毒物。

以上是三篇讲话的要点。

延安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实际上分为下面几个阶段：

首先是阅读指定文献，记笔记，写感想阶段。即所谓学习。

其次是对照文献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写个人检查，在众人面前发言。即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以个人、小组形式进行。

进而 在前面两个阶段的基础上 对党的历史、党内斗争历史进行新认识。这也谓学习。

最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三个阶段的是延安的中央党校。在这所学校学习的人都是预定出席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也就是说 参加此次大会的人 从 1942 年 2 月起 在这所学校里接受三年零两个月的教育。

前面说过，在党的七大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具有绝对权力。因此，这次整风运动更大的目的，不仅仅是整顿三风 而是通过整顿三风 让所有党员（就目前而言 是指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都要接受毛泽东的教育。

整风的开始阶段，是学习指定文献，指定的文献有二十二篇。除了前面列举的毛泽东的三篇讲话外，还有毛泽东、陈云、刘少奇、刘子久的讲话及书信 党的决议 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讲话和文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论’部分等。

后来又补充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刘少奇和刘子久的文章、书信，党的决议等。据说经过这次整风运动，党内风气为之一新。

指定文献的主要部分，后来在日本翻译出版，日文编译者这样说：

“凡接触过中共党员及中共政府要人的国内外人士，都异口同声地夸奖他们的清廉无私，而且有时甚至表现得过于认真。（中略）我自己在战中战后的中共解放区的生活过程中，也接触了许多中共干部（干部是活动家）每个人都很谦虚、质朴 不禁使我想起日本的一首俳句‘越是果实累累的稻穗，越是低垂着头’。

这些中共干部和党员，都是经过‘整风运动’的党内教育运动而磨炼出良好的品性。”

（小林信译《毛泽东、刘少奇整风文献——中共的人间革命》
五月书房，1951年译者前言）

2. 《文艺讲话》与整风运动的意图

《文艺讲话》

在整风运动过程中 作为其一环就是召集文学家、演员、音乐家及有关人士举行座谈会。毛泽东在座谈会开始与结束时分别做了讲话 这两次讲话被记录下来 题目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文艺讲话》。时间是 1942 年 5 月。

这是继前面三篇讲话之后为整风所做的另一次讲话，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的语调变得严厉起来。在这里出现了带有指责意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词。

在中国 中学毕业以上的都是“知识分子”。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不认为有知识分子这种阶级，所以只能是“分子”。他们大都是出身于中小地主、商店主、职员家庭，故而也称“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时而是革命的 站在工农一边；时而又因革命形势逆转，而倒向资本家及反动军人一边。即缺乏无产阶级觉悟。

《文艺讲话》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 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 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 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 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的工作 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 说‘同志’们 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 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 依了你们 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

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

接着又说：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

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斗争”这一党内用语包含着很严厉的内容。整风开始时，那些由苏联回国的人，动辄高喊且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这种做法，毛泽东很反感。他讲明整风的目的在于“治病救人”。不过又补充说，敌人及敌对思想已渗入党内，因而对此需要给予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阴郁的空气

整风运动开始一年多之后，就因为引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作法，致使延安开始充满阴郁的空气。

每个党员在进入个别审查阶段，都多了一项任务——必须揭发潜伏在党内的国民党特务。在所申报的经历中如有不明之处，马上就派调查员前往有关地点去调查。但又不可能所有的事都一一调查清楚，因此强迫人们进行坦白，坦白内容被视为证据。坦白后则拉去游街，强迫在大庭广众面前交待自己的罪状。

和毛泽东结婚的女演员蓝苹（婚后改名江青）也受到审查，十分苦恼。她自己申报说是 1932 年入党，但审查机关不予承认，硬说是 1935 年。江青向丈夫诉苦，而毛泽东说不能特别照顾，于是两人发生口角。毛泽东大声吼叫：“滚出去！”江青边哭

边跑到周恩来住的窑洞。毛泽东的警卫目睹了经过。

从早上到中午，江青向周恩来倾吐了自己的委曲，而后神情愉快地回来。十多年后，这个警卫偶然在天津遇到江青所说的活证人（江青只知道姓）向他打听当时的情况。知道江青的话里没有掺假（警卫李银桥的回忆录，有两种版本。书名各是《走向神坛的毛泽东》和《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内容大同小异。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后者的作者是笔录者权延赤）。

从这段插曲我们也可以想象，当时的冤罪不少。

毛泽东发现弊病后，让负责审查工作的康生立即停止。据说在召开七大之际，在某个集会上脱帽九十度鞠躬向受害者谢罪。

康生曾在苏联留学，后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成了江青等人的文革小组的顾问。延安整风时，担任负责整个运动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康生当时还兼任社会部（秘密警察）部长和情报部部长。

批判王明

在整风第三阶段——路线学习中，目标是要批判王明。

王明在中共党史中留下了“王明路线”一词。1931年1月，王明由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回国，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他指示要以城市为中心推动革命，这与当时在农村开展游击活动的毛泽东对立。所以王明极力排斥毛泽东。

1931年11月起，王明成为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派驻莫斯科，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1937年11月以后，一直在延安。王明凭藉共产国际权威的保护，在理论上与毛泽东对立。

“反对主观主义”这一整风运动的口号，实际上就包含着批

判王明之意。王明才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洋八股（共产国际文献的翻版）作者，这种评价在党员中传播开来。

批判王明的最高潮，是党的七大之前的中央扩大全会，即1945年4月的六届七中全会。在长达九天的全体会议上，发言者一个接一个地批判王明。不少人主张解除王明的中央委员职务并要求开除党籍。

支持王明的发言受到的质问（该说是“起哄”或“追问”吧！）接连不断，使得发言者在台上进退两难。王明未出席，但听说他夫人出席了，她上台发言，并叫嚷着说：“毛主席，请看看我的心”台下的听众更加群起而攻之。

此次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所经历的历史问题做了评价，而王明的现在及过去也被批判得体无完肤。

现实的理由

在延安之所以能够开展严厉的整风运动，恐怕可以认为有其现实的理由吧。延安是革命圣地，所以有许多向往革命的青年男女从国民党地区来到这里。而且，他们是大学生，或高中毕业、初中毕业这类有知识的人。可以想象他们在延安亲身体验的生活，和他们的憧憬有很大的出入。不但要压抑他们内心的不满，还要把他们培养成为中国共产党活动的人材。而他们本来就都是向往革命的人，所以能自己说服自己，接受整风运动，更何况他们几乎不可能逃出延安。

由此可见 在封闭的世界里才能成功地开展整风运动 鼓励自我批评以打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尊心 告诉他们 只要坦白 就能解除心理上的负担 即所谓的‘脱裤子’、‘放下包

袱”。而儒家的教诲“过 勿惮改”也使这些知识分子认为 坦白过错就是“善”。

3. 思想改造的反复

由土地改革到三反五反

毛泽东一面致力于国家建设，一面对人进行思想改造。

延安的整风运动定“型”了 不过整风的对象是“党”本身。不仅是整风，毛泽东还反复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一般群众开展学习运动，思想改造运动等。一有机会，他就策划，反复开展这些运动，还有批判运动的形式。反复开展的最后结果，就是文化大革命。

下面，让我们大致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形吧！

令人吃惊的是，毛泽东参与了所有的运动。

首先，土地改革运动开始。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1950年）在过去的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土地改革 没收地主的土地、农具，分给农民。并且让文学家和大学教授也参加这项运动，见习一部分“阶级斗争”。接着 又派遣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 同时在国内掀起抗美援朝运动。一面振奋爱国精神，一面让知识分子反省他们惯有的崇拜欧美的思想，而且还派他们去前线。

次年（1951年）大力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鼓励人们揭发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和特务，公开审判和公开处决，并让知识分子，文学家去参观学习。同一年，还对与意识形态有直接关系的电影开展批判运动。《人民日报》社论严厉批判那些赞赏描写清末教育家武训的传记电影的人，认为他们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 笔者就是毛泽东。

在北京、天津的大学教授中还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以符合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用语及概念来说话的需要及要求。接着又在 1951 年至 1952 年间，开展改造他们自身思想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让知识分子见习与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等，实际上就是为了发动这次运动所做的准备。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心得体会。通过这场运动，接受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人，被评价为“进步了”。

1952 年开始揭发党员、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不正之风，以及使他们腐败的不法资本家。这被称为“三反·五反”运动。

1953 年，没有开展全国性的运动。虽然号召批判官僚主义，但仅限于机关内部。

从批判胡风到反右斗争

1954 年至 1955 年，开展了一连串的批判运动。多年从事清代长篇小说《红楼梦》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俞平伯，其研究方法被批判为没有“阶级观点”。因为他采取的方法是实用主义，而实用主义作为帝国主义的哲学受到了批判，继而二十年代接受它的学者胡适（当时居住美国）也遭到批判。

进而，批判还波及到对俞平伯持消极态度的文艺理论杂志主编冯雪峰，编辑部被改组。指示要注意研究方法的批判，并提出问题的是毛泽东。

文艺评论家胡风，在这些批判运动中逐渐活跃起来，甚至攻击党的文艺政策负责人。胡风一直就不赞成把《文艺讲话》视为金科玉律的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

党的方面反击开始了，将胡风过去的私人信件一并公布出来。这些信是胡风的文学伙伴交给党的。胡风写了自我批评，

并提出申诉。但《人民日报》将其自我批评连同过去的私人信件都刊登了出来。私人信件还附加注释，说明他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私人信件分两次登载，均附有按语。虽未署名，但都是毛泽东写的，一部分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文艺界全都批判胡风，要求判定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并要求检察机关审理。胡风从社会上消失了。当时正在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批判胡风又与这场运动结合起来。

到 1956 年 形势逆转 又开始奖励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研究活动自由。口号是“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第二年 1957 年 整风运动开始。延安是第一次 这是第二次。鼓励人们对党“大鸣大放”多提意见和批评 亦称“鸣放运动”。

“鸣放”运动的势头出乎意料 许多人纷纷发表激烈的言论，致使党内的一部分人产生了动摇。于是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 称那些说出批评言论的人是“右派”对他们开展斗争 即“反右斗争”。时间为 1957 年 7 月。

在被打成右派的人当中 有些人被逮捕入狱 而多数人则在其后的二十多年岁月里被剥夺了公民权。作家丁玲就是其中之一。她是忠实的党员，就因为当时的言论而遭殃被下放到黑龙江省的农场。学者、文学家、知识分子没有被打成右派的人不多。

走向文化大革命之路

批判右派的斗争封杀了人们的言论。其后，又掀起大跃进运动和全国性的人民公社化。由于进展得不顺利，加以调整。粮食不足，出现了饿死者。为恢复经济，采取了若干自由化措施。这些措施获得效果后 毛泽东对此又产生了危机感 指出要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必须搞阶级斗争。

1962 年，在全国农村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名为教育，其实际内容不外乎是斗争。此次运动一直持续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干部、仓库、劳动工分记录等成为检查的对象。尽管允许私人养鸡养猪，也允许自由买卖，但如果养的鸡和猪吃了人民公社田里掉落的稻穗，就被认为是侵害公共财产，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思想改造以“运动”形式反复进行，而且日趋严酷。

在这些反复不断进行的运动中，受到批判的知名人物有文学家胡风、丁玲。其他还有人口论学者马寅初，曾献身于农村运动的哲学家梁漱溟等人。然而，与胡风有关的其他文学家、评论家也受到批判。甚至连仅仅是热心读者的学生，有时也被当作胡风分子进行批判，受牵连的人相当多。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那些总是站在批判别人立场上的人，也未能逃过被批判的命运。

六、批判斯大林和反右斗争

1. 批判斯大林的冲击

批判斯大林

除了国家建设和思想改造以外，毛泽东还必须应付在苏联发生的批判斯大林运动。

《论十大关系》讲话发表两个月前，苏联共产党于 1956 年 2 月在莫斯科召开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

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他的报告中，否定了战争不可避免论，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并暗示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多样的。在大会上，虽有否定个人崇拜的发言，但是在大会结束后的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向大会代表揭露斯大林的肃反工作如何如何的残酷。即所谓的批判斯大林。

一直将斯大林视为‘神’的各国共产党，其根基不可能不被撼动。

波兰的工业城市波兹南发生了暴动。受波兰的刺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也发生了十万人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拉倒巨

大的斯大林像，基座上只留下了长靴，并且还袭击了公共建筑。秘密警察向游行队伍开了枪，驻扎在匈牙利的苏联军队也出动了。

当时群情激昂，军队也与游行队伍同一步调，不仅对秘密警察，对一般党员也施以恐怖，尸体被倒吊在街头。曾一度撤走的苏军再次介入，不到半天时间，就平息了布达佩斯等地的暴动。

毛泽东在 1956 年发生的事件中受到的冲击，可以从《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两篇讲话中窥视到，但是不充分。另外，认为毛泽东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看法，也不妥当。这个时期，毛泽东发表了很多讲话。

(1956 年)

4 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论十大关系》为题发表讲话 (第一次) (4 月 25 日)

4 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推测为 4 月 28 日)

5 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论十大关系》为题发表讲话 (第二次) (5 月 2 日)

8 月——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负责人的谈话

8 月——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发言

9 月——第八次党代表大会 (正式名称为“全国代表大会”)

11 月——在中央委员会全会 (八届二中全会) 上的讲话

(1957 年)

1 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1 月 21 日)

1 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1 月 27 日)

2 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

3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总结讲话

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如前所述，《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做了两次。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內容大概不同。第一次讲话后，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以在第二次讲话中或许又添加了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內容。但今天能看到的是第一次和第二次讲话的整理综合稿。据说另有一篇只把第二次讲话改成文章体，于1965年在党内分发，不过我们没有看到。

之所以对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不同如此关心，是因为一般都认为毛泽东与党的上层机关相处得未必圆满。如果比较一下第一、二次讲话的內容的话，自然就能了解到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哪些意见。

我怀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毛泽东的主意，而是中央政治局毛泽东以外的人制定的与毛泽东不同的政策。中央政治局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正面接受批判斯大林，并应采取接受其宗旨的政策，那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

毛泽东虽然也提倡这一政策，而且最后还发出号召，但开始是消极的，好像不是他主动提出的。

不妨回顾一下1956年4月至5月召开的会议。

4月25日，他做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可以想象当时的讲话担心学术研究僵化，因此话题转到学术研究的自由，也出现了一些大胆的提案，还有人说应该写进党的方针里。毛泽东被拒于议论之外。

4月28日，据推测讨论了学术研究的指导方针。毛泽东说：“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

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还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的方针”想必只是那样说说而已。

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讲话（第二次）。会上他说：“春天不是来了吗？让百花一起怒放吧！只让五、六种花开放或限制五、六种花不能开放都不是好现象，应该要百花齐放才好。

百家争鸣是指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有许多学说并存，能自由讨论。现在需要这种风气。在宪法范围内，不管是对是错，要让各种学说发表出来，而不要加以干涉。”

毛泽东想必不喜欢被排除在讨论之外，故而含蓄地谈到中国的思想史。不过，后来改写成文章时删去了这段话。大概是认为自由也有个限度吧！（此时的讲话，收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改版）》中（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次公开出来）

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比较性急，马上就宣布这是党的政策（5月26日）。毛泽东如果将这时的讲话原原本本地发表的话，就等于是声援陆定一。毛泽东避开了这种结果，因为他对赞同批判斯大林的陆定一等人是不满的。

关于冒进

以上终究是我个人的推测。不过，证明这一点的是毛泽东和政治局毛泽东以外的人之间围绕《人民日报》社论稿的问题发生了冲突。社论稿（大概是最后的校样）传阅到毛泽东处，毛泽东批了句“不看”给退了回去。

中国共产党上层部门，需要有批示的文件都一一传阅。文

件上并列着批示人的名字（兼具收件人的作用），先用圆圈圈好自己的名字，再划上一道线至空白处，空白处写上自己的意见。这叫“批”或“批示”，一般多用铅笔。

“不看”——老子不看，在“批示”上用这种口气不妥。也许是读了一遍后大动肝火，也许是一看标题就知道了内容。引发事端的这篇社论的标题是《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后来毛泽东说：

“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论的反击，当时鲜为人知。而且人们也无法知道，社论的主笔是王宗一，而胡乔木、陆定一做了补充，经刘少奇审查后，社论才刊登出来的。似乎可以看出当时在意识形态方面，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下面，胡乔木和邓拓等人正推动着一股新的潮流。

党内的其他潮流

党内的另外一股潮流，包括前面所说的陆定一讲话内容和《人民日报》社论，其主要情况如下：

（1956年）

4月——《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编辑部

5月——《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话 陆定一（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6月——《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9月——第八次党代表大会

12月——《再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人民日报编辑部

4月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首先赞扬了苏联共产党批判斯大林是“勇敢的自我批评”。不过又承认个人的作用 说在历史的斗争中 需要领袖人物。认为斯大林尽管在晚年犯了错误，但整个一生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评价为“七分成绩 三分错误”。对于错误也应从历史背景上去分析 而不能把错误归到斯大林个人身上。

社论做了上述论述后 又警告说 领导人如果置身于党和群众之上，那么对国家大事将丧失全面的洞察力。该社论从历史观点加以分析，颇具说服力。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地肯定这篇社论。

毛不言及自由

但是 毛泽东终究不赞成批判斯大林。在《论十大关系》中，有下面一段话：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 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 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

12月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虽然表示支持匈牙利共产党，但在第八届党大会后的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 毛泽东又说：

“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 斯大林这把刀子 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 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 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

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 自食其果 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陆定一的讲话从与此完全不同的见解出发，他提倡的是在“文学艺术活动和科学研究领域 范围内的自由。

“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的自由、辩论的自由、创作和批评的自由 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

这些自由 虽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由不同 但把‘自由’一词用在肯定面上，这一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毛泽东虽倡导“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但未这样说明过自由 而且不言及自由。

2. 反右斗争和中苏对抗

牛鬼蛇神的解放

“反右斗争”是在提倡“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后 急转直下采取的措施。那些响应“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号召 毫不隐瞒地说出自己见解的人 那些向党提出改进意见的人 都遭到严厉的反击。人们私下议论道：“这是引蛇出洞。”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牛鬼蛇神“有一点也可以”。后来一有什么动静 他就会很得意地说 这是为了先让人们看看牛鬼蛇神的真面目，然后再让人们进行批判。还说这不是阴谋，“是阳谋”。

不过 当时他的意见充满宽大精神 对前程很乐观 很难看出其中隐藏什么意图。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他的讲话，是经过后来修改过的 为适应后来的形势 内容多少有些变化 不能把所有的内容都当作当时的资料来分析。但无论如何，在毛泽

东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次讲话以后，社会上言论变得活跃起来，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事实。因此，可以认为当时毛泽东的意图，主要在于开放言论。

下面，看一看其经过情形。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进一步发展为“大鸣大放”对共产党及党的领导人可以进行任何的批评，而这种做法在平常是禁止的。进而归为一个字：“放”。与此相对的是“收”。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极力主张“放”。他说：“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

当时，新的政策给戏剧方面带来了效果。一直被认为是有害的而禁止上演的一些亡灵、怪物、牛鬼蛇神的节目也在各地搬上舞台。对此有人挑剔，主张禁止上演。毛泽东一如既往压住了这些强硬派。

“(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接着又特别强调说：“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整个基调很宽大也很乐观《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

接着又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社论题为《继续大胆地贯彻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4月10日）。

社论虽未署名，但内部消息说是毛泽东写的。戏剧界、文学界也不断出现新的倾向。

这个时候流行鲁迅式的讽刺性专栏和杂文。《文艺讲话》中曾以不应讽刺人民为由 禁止这类杂文 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又允许杂文创作了。

转为反右斗争

整风意在刷新党风 这已为人们所熟知。何况《人民日报》社论更提出要“大胆地”于是以前一直受到的压抑得到解放 对党的批评意见爆发出来。“以前还有几位非党副总理 可是现在一个也没有 这是党天下”——要求政治民主化，也表明了批评毛泽东的见解。

北京大学里有“自由论坛”，谁都可以登台演说。甚至附近大学的学生也来演说，演说中也对共产党的领导本身提出疑问。

农村的农民也开始流露出对党的农业政策的不满。

中国共产党突然改变方针，《人民日报》登了一篇以《这是为什么》为题的社论 开始对这些言论展开反击。之后 接二连三地刊登社论，都提出了具有决定性的方向。这几篇社论都是毛泽东写的 从 6月 8 日到 12 日连日不断，其后各篇稍有间隔。到 7月 1 日为止 共发了八篇社论。

那些响应“大鸣大放”的方针，批评中国共产党的人，作为“右派分子”成了报纸杂志每日攻击、谩骂、嘲笑的对象。连那些只说两三句不平话的平民百姓也受到批判。“大鸣大放”仅进行一个多月就结束了。

“右派分子”这顶帽子不是骂骂而已 如果谁被戴上 那么不仅本人的社会活动受到限制，还被剥夺“公民权”，更要株连家庭。周围的人也都给以白眼，断绝往来。这就是新社会制造出来的歧视。

1959年底 摘掉一部分人的“右派”帽子 后来又摘掉了一

部分。这些人被称为“被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那些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被下放到偏僻的农村，有的甚至二十多年都无法重返社会。

重复地说，毛泽东不满党内与自己不同的派别，于是号召“鸣放”而将爆发出来的言论投向这些派别，动摇他们的地位，使其陷入绝境，自己伺机恢复领导权。

对党不信任

毛泽东虽未反对第八次党代表大会（1956年9月），但他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转向反右斗争，进而乘反右斗争之势，又获得了他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失去的东西。

党的八大加进了苏联共产党批判斯大林和批判个人崇拜的内容。党章删去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用语。中央书记处新设总书记（总书记是邓小平），即便是党主席也必须经过书记处这一关。党章中还新设了“名誉主席”的位置。可以说是暗中敦促毛泽东引退。

不过，继批判斯大林之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已消声匿迹，再也没有人要求毛泽东引退了。

一年零八个月以后，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1958年5月）重新提出八大一次会议中宣布已经获得解决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没有人反对了。同时，曾一度遭到批评的“冒进”又得到了肯定，对曾经批评过的事物又进行了反批评（内容见刘少奇《政治报告》）。

1956年5月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1957年4月的第二次整风，都是党内其他流派提出来的。毛泽东巧妙地将二者合而为一。他借助由整风发展而成的“反右斗争”，一举击溃

了中国国内准备开展的批判斯大林运动。

毛泽东的想法成功了。但是群众和知识分子却对党产生了失望和不信任。

1957年，对于那些信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们来说，告一段落了。

与苏联诀别

通过反右斗争否定右派，也就是否定中共八大的新潮流。否定中共八大，就是否定苏共二十大的新潮流。而苏共二十大由于开展了对斯大林的批判 所以具有划时代意义。因此 否定批判斯大林和否定进行对斯大林批判的赫鲁晓夫，必然成为反右斗争的下一个课题。

自1960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始对苏联共产党进行批判。中国共产党发表文章，借称赞列宁而暗中攻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此做出的反击措施是，突然撤走派驻中国的所有技术人员一千三百名。阿尔巴尼亚公开反对苏联后，中国马上就与阿尔巴尼亚友好起来。

1963年，在来往频繁的书信中，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共产党提出二十五条建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据说是毛泽东和陈伯达等人起草的。对此 苏联共产党向该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发表了公开信，于是中国共产党马上发表了批判的公开文章。从《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 到《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 共九篇 发表时间是1963年9月到次年7月。（署名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 但也可以看成是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展开了多方面的批判，但其主张加以

整理后即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继续革命”。依这些想法发展下去，毛泽东就不得不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

毛泽东在批判苏联共产党时，引用了马克思下面这样一段话。这也是开展文化大革命时，深深印刻在他脑海中的一段话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加重点为原文的黑体字。）

毛泽东以马克思的这段话为依据，对曾经夸耀说在二十年之内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赫鲁晓夫进行了批判，说他是骗人的，批判他所说的共产主义是美国式生活方式的共产主义，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变种。并且抨击苏联社会中的特权阶层是由蜕化变质的领导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还特别攻击他们享受高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

毛泽东不仅否定苏联共产党的理论，而且也否定了现存的苏联社会。曾把苏联视为社会主义乐园而感叹不已，并介绍给民众的毛泽东，终于与苏联彻底诀别。

集让人厌恶的苏联共产党及其理论（毛泽东定为“现代修正主义”）于一身的人是第一书记兼总理赫鲁晓夫。中文译名“赫鲁晓夫”暗含着毛泽东的嘲讽。“赫”——显著；“鲁”——愚鲁，“晓”——觉悟，“夫”——男子。将愚鲁昭著于天下后，才觉悟过来的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再度罗列这些文字，“中国的赫鲁晓夫”。

两个赫鲁晓夫

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线索，可以联想到毛泽东是把刘少奇放在了心上，而后才展开对赫鲁晓夫的批判。

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三面红旗”政策做了批判性的总结报告。发言人是邓小平和刘少奇，特别是刘少奇的发言内容是想把“三面红旗”政策做为“历史教训”来总结。毛泽东也出席了此次会议。他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并让人批评。”这可以当作是毛泽东所做的自我批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月30日）。

这次会议以出席人数命名为“七千人大会”。

最先反对“三面红旗”的彭德怀已于1959年下台。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还说明可以恢复彭德怀等人的名誉。

毛泽东虽然做了自我批评，但对刘少奇等人并未心服。他分析这些人的思想根源，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思想与赫鲁晓夫一脉相承。中苏决裂，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内其他流派的决裂。

毛泽东意气高昂，竟然不惜与社会主义大本营决裂。他的意气变成自信和自负。下一个目标就要转向国内，要发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进一步发起文化大革命。

这个时候毛泽东大概已察觉到自己性格中的“虎气”。中国的谚语中有一句“骑虎难下”。说的是老虎一旦跑起来，是不知道停下来的。毛泽东就是要骑到老虎倒下来为止。

七、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上）

1.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红卫兵的登场

文化大革命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红卫兵的登场。也可以说，红卫兵的登场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红卫兵”即左臂佩戴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的中学、高中和大学学生们。其中有些红卫兵的臂章印着自己命名的队名。毛泽东的字迹是黄色的。

红卫兵的登场是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时第一次出现。他们不分男女，都身着绿军装、佩戴红袖章，右手高举小红本子《毛主席语录》，边挥动边呼喊口号。

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人们挥手致意。

一个女中学生红卫兵跑上去，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当毛泽东得知这个女学生姓宋，名字是形容君子的“文质彬彬的”“彬彬”时就告诉她“也需要武啊！”于是这个女学生马上改名字叫“要武”。

这之后至 11 月止 毛泽东共八次接见 称检阅 红卫兵 人数合计达一千多万人。

第三天的 8 月 20 日 北京的繁华街道王府井出现了一群红卫兵 他们用眼角扫过在星期六晚上逛夜市的人群 而后架起梯子，挥舞着铁锤，开始砸商店的招牌。

橱窗上到处贴满标语和大字报。红卫兵闯进商店，将经营者和负责人拉出来批斗。在破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破旧立新”的口号下 要求传统老店铺改名。

他们还高喊‘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 警告那些梳着流行发式、穿着高跟鞋、身着时髦服装的来往行人。有时甚至把人撞到一边去。

接着 举着毛泽东巨大画像的红卫兵又涌到苏联大使馆 包围长达 36 个小时。并且封锁了为外国外交官开设的商店和邮局。

人们对红卫兵的行为很纳闷：“他们要干什么？”为了打消人们的疑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马上发表了“好得很！”“做得对 做得好！”等赞扬红卫兵行为的社论（8 月 23 日）。

上海、杭州、广州、南京、武汉、长沙、郑州、合肥、济南、呼和浩特、乌鲁木齐、银川等所有大小城市（只要有中学、大学的地方 都出现了红卫兵 他们大肆破坏。

辽阔的中国大陆，成了红卫兵的天下。这是自 8 月 20 日起 仅仅 10 天内发生的激烈变化。

“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脱红卫兵锐利的眼睛。”《人民日报》社论写出如此的‘豪言壮语’（8 月 29 日）。

第二次检阅时，毛泽东和林彪等人一起乘车检阅了淹没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先导车后面的第一辆车，中央是毛泽东，左右站着贺龙和林彪，后排是谢富治、杨成武、关锋。可谓英姿飒

爽 8月 31日)

第二辆是周恩来、江青等人 第三辆是邓小平、刘少奇等人，第四辆是朱德、陈云等人 第五辆是叶剑英、张春桥等人。

第一辆车内的贺龙虽党内排名第十五位，却颇受毛泽东信任 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元帅。林彪也是元帅。

公安部长谢富治负责毛泽东的安全。杨成武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是军队文革小组副组长。后来，贺龙受到林彪的迫害，死得很惨。而杨成武也因莫须有的事件受到林彪、江青的迫害。只有谢富治一个，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仍然很活跃，病死于 1972年。1980年 其罪行受到审判 并被开除党籍。

最初的红卫兵

红卫兵是如何兴起的？5月在清华大学附中，发生批斗党委书记兼校长的事件，一个多月下来仍未平息。他们把大字报和信送给毛泽东 得到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的回信。

另一种说法是，北京的“八一”中学是红卫兵的发祥地。正像用解放军的光辉节日“八月一日”而命名的校名那样，学生家长都是革命功臣，位居党军政的高级地位。

红卫兵迅速波及各地，北京的各大学、各学校都出现了红卫兵

他们的袖章是红底黄字，是由国旗的红色和五星的黄色衍生而来的。他们似乎认为父辈们打下的江山，自己要继承下来。而这种袖章也正夸耀着他们的出身。

他们先成立革命委员会。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是贺龙之子贺鹏飞，副主任是刘少奇之女刘涛。

最初似关系好的伙伴凑在一起。各自设有总部，入口处按民间习俗贴有对联。左右一对写些吉利话，正上方是总括之句。

上联 老子反动儿混蛋

下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

横批 基本如此

另外，还有些格言式的对联。如：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儿子能打洞

不久 红卫兵的资格放宽 凡是“红五类”出身的人都可以参加。“红五类”指父母是工人、农民（贫农、下中农）、军人（革命军人）、公务员或职员（参加革命者）以及为革命而失去双亲的孤儿这五类。

造反有理

红卫兵的行动称为“造反”较之“革命”一词 老百姓更容易明白。平民百姓叛乱、儿子不听老子的话等 都叫“造反”。中国近代文学名著、鲁迅的《阿 Q 正传》中那位被赶出来的阿 Q 决心革命时就到处喊“造反、造反”。红卫兵高喊“造反有理”即叛乱有道理 与此相呼应的是“革命无罪”的口号。

红卫兵享有特权：

△革命大串联时 乘火车和坐船不要钱。所到之处 当地的党委提供住处和食物。

△提供办公地点和经费，可以编辑发行报纸。还借给汽车

△可以逮捕、审讯、批斗任何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可以发出废除旧单位、成立革命机关的指令。

△各组织自行选举自己的领导人。

由于享有这些特权 全国的在校青少年一下子都变成“红卫兵”。小学六年级学生也可以当“红卫兵”六年级以下叫“红小兵”。

所谓“红五类”，根本就没有进行资格审查的部门。如果找不到关系，就自己当红卫兵。不过有一点很清楚——没有红袖章就当不成红卫兵。红袖章，街头就有卖的，谁都可以买。涂有红色的一人高的棍棒是必带的，街头也能买到。

红色孙悟空迅速蔓延到全国。年龄不够当红卫兵的毛头孩子在街头大声吆喝 卖红卫兵小报 赚些零用钱 很是得意。

不论城市或农村，红卫兵在所有的墙壁上写标语和口号，大字报也随处可见。不仅如此，他们还闯进他们认为是“无产阶级的敌人”的人家中 翻箱倒柜 将家具、书籍、日记全都翻出来 找出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没收或毁掉。刘少奇的孩子们最初也参加了这种行动，刘少奇在家中听到孩子们兴致勃勃地谈历时，训斥了他们。

红卫兵还把住在屋里的人揪出来，给他们戴上白色三角帽，在肩、背上涂上浆糊 贴上大字报 然后把他们的手反绑在身后，强迫游街。

红卫兵手册

每个红卫兵都有一本如何行动的红卫兵手册——《破旧立新一百例》。其中的若干内容如下：

一、居民委员会负责在各街道设立《毛主席语录》语录牌。每家都要悬挂毛主席像和张贴毛主席语录。

五、《毛主席语录》要做到人手一册，随身携带。有机会就学，一切按毛主席教导去做。

七、自行车、三轮车要挂毛主席语录牌。公共汽车、火车要

挂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

二十四、解放后仍一直骑在人民头上，吸人民血的房产主们，我们命令你们这些王八蛋，立刻将房产献给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不容许你们这些吸血鬼存在。

五十五、资产阶级老王八蛋，命令你们，立刻将在解放前剥削来的金钱交给政府。你们这些吸血鬼，今后不许花钱。

六十五、打破家长制 小孩可以批判大人。

残酷的人身迫害

红卫兵按照手册上所说的行动。行动时，他们声称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这本手册可以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手册，也是革命指南。

红卫兵的街头行动，外国驻北京记者向海外做了报道。然而，在记者看不到的地方，正进行着残酷的人身迫害。

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就是其中一例。他被监禁在校园里，遭到鞭打。还让他背诵《毛主席语录》唱“我是牛鬼蛇神 我有罪 我有罪”的歌 写自我批判稿。这样的场面 每天都在继续。

文化界主要人物都被集中到北京北面祭祀孔子的文庙院子里，受到鞭抽、殴打。文学家老舍也在文庙遭受凌辱，浮尸于湖面。有人说是自杀，也有人说是他杀。即使他是自杀，那么自杀的又何止老舍一人。

马思聪偷偷离开北京 逃到美国 并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亲身体验(1967年6月)。文化界人士决意逃亡而获成功的几乎他是唯一的一例。

红卫兵的斗争对象进一步扩大，被认定为稍有财产的人，马上就抄家，没收所有金钱、家产。一旦被定为“黑五类”分子——原地主、原富农、原资本家、反革命分子 坏人 就被强行由

城市下放到农村 从事劳动。

根据当时红卫兵的大字报的说法，中共中央就运动开始后两个月内的成果做了报告，其内容如下：

逮捕原地主、反动分子 17263 人，由城市强行下放的原地主、原富农、原资本家 40 万人，揭发的反革命现行犯 1788 件，其他政治事件 2368 起。

没收的财产 金子 19 万 8 千两、银子 30 万 6 千两、银圆 978 万 9 千枚 美金 355 万 8 千元 其他外币 373 万 9 千元 是否换算成了人民币 不明) 现金及债券 4820 亿元。

枪炮类 口径六〇毫米迫击炮 85 门 机枪 20 挺 手枪 13 700 只 手榴弹 26700 颗 炸药 21 吨、小型弹药 13 万 6 千 8 百英镑。

红卫兵不断涌进北京。当时北京的人口为 470 万，平均每天有 250 万人(更多时有 300 多万人)在北京滞留。

到了十二月，红卫兵逮捕监禁了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为首的市委所有主要成员。数天后，把这些人拉到工人体育馆进行批斗。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等，也成了批斗的对象。每个人胸前挂着写有名字的牌子，两个红卫兵分左右站在每个人的两侧，一手按着他们的头，一手将他们的手扭向后上方，强迫他们跪下，样子颇像喷气式飞机，还被拍照下来，登在大字报上。

接着又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刘少奇、邓小平的集会。两人虽未被带进会场，但被定罪为党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的最终目标，就在于打倒这两个人，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刘少奇。

2. 发动文革

文革小组的成立

毛泽东想要发动一场大运动。而在此之前，他先促使党的两次正式会议分别通过《五一六通知》和党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前者是 1966 年 5 月 16 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者是同年 8 月 8 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前者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和采取专政，并决定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下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后来，这个文革小组的成员很活跃。

后者提出要动员人民群众推动文化大革命。而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已远远超出这个决定的范围，变得很残酷。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有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及姚文元等人。

陈伯达是党的理论杂志《红旗》的主编。三十年代曾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延安时期曾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顾问康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关于他的一些经历，前面已介绍过。

江青在文革开始以前，未抛头露面过。她和毛泽东在延安结婚时，据说党中央要她宣誓“不参加政治活动”。

姚文元是上海的文艺评论家，每有批判运动，他都马上发表毫不留情的批判文章，因而有名。前一年，他曾发表批判吴晗历史剧的文章，使得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视他为危险人物。

除此以外，还有张春桥（上海市委书记，陆定一下台后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王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关锋（哲学研究学者）、戚本禹（历史研究学者）、穆欣（《光明日报》主编）等人。

北京大学的骚动

文革小组的陈伯达等人，在北京大学发表讲话，进行煽动。中国的大学是寄宿制，虽没有枪炮，但和士兵在军营里待机而动没有什么两样。已笼罩在骚动气氛中的北京大学，骚动更加激化。

大学里有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党委第一书记由上级党组织委派。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是由北京市委派来的。

党委在校内有办公室。党委第一书记或其他书记，比校长和教授更具权威和权力。教授和学生的出身、经历、行动和思想倾向等都一一加以记录，保存在办公室里。这种人事记录（称“档案”）极为机密，本人也无法看到。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发生学生冲进党委办公室，烧毁人事记录档案的事件。这种“档案”向来很令人反感。党的书记的权威之所以很高，就是因为掌握着这些秘密档案的缘故。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的学生餐厅里突然贴出了大字报，其中聂元梓等七人署名的大字报尤为引人注目。

这张大字报点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的名，说他采取消极态度抵抗文革。副书记兼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成员彭珮云以及她的上司——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的名字也上了大字报。

聂元梓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也是该系讲师，是党员，也是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素与陆平不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出席大学的会议，常表示支持陆平，使聂元梓丢尽了面子。其余五名也是哲学系毕业生，而且是该系助教，只有一名是学生。

在大字报贴出三小时之后，一些教授和学生根据陆平指示，

在校内散布言论，说聂元梓是“反党大阴谋家”。于是反党、反革命、叛徒等谩骂聂元梓的大字报也纷纷张贴出来。

接着聂元梓召开有工人、贫农、下中农参加的哲学系集会。陆平的指示要把其中两个发起人（也是大字报的署名者）监禁起来，不许他们参加集会，并封锁会场出入口，将参加者关在里面，呼吁人们“不要上聂元梓的当”。对想要发言的参加者，用暴力加以干涉。这件事发生在《五一六通知》发出九天后的5月25日。

到了深夜，还对支持聂元梓的学生施加压力，让他们承认错误。第二天，又指示要让他们到农村，但没有学生听从。陆平还指示要召开班级讨论会，讨论的题目是“从哲学系的老太婆那里，得到什么样的教训？”老太婆当然是指聂元梓。连日来对聂元梓等人进行各式各样的打击。

事后才明白，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暗中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而文章内容也是文革小组指示的。

6月1日，新华社向全国发表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内容。当天电台向全国广播。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形势急转直下。

北京市委不得不免去陆平的职务。

派与撤工作组

文革小组的策略就是在大学里制造混乱，使党支部和党委的工作瘫痪，并免去校长与党委书记的职务。6月至9月，全国范围内，几乎所有的大学和中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都被打倒了。

刘少奇从北京打电话到杭州。毛泽东外出期间，委托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呆在风光明媚的西湖湖畔的别墅里，没有给予任何明确的指示，就挂上了电话。刘少奇、邓小

平飞抵杭州，请毛泽东回京亲临指导。但毛泽东回答说暂不回京，叫他们自行适当处理。刘少奇回到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派工作组到各大学、中学代替已陷入瘫痪的党委，使事态平静下来。这是6月初的事情。过去一旦有什么情况发生，中国共产党也都会派工作组去解决。

派工作组有了效果，校园又恢复了平静。

但在一个半月后的7月18日返回北京的毛泽东大骂刘少奇是‘镇压学生 与过去的反动军阀没有什么两样’。

决定派工作组时，刘少奇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了，当时，毛泽东应该同意了。

方针修改之后，进驻各大学的工作组成了有名无实。北京大学不断召开超过万人的学生集会，谴责工作组，要求他们撤走。

最后，各大学、各学校的学生代表集会在人民大会堂。当着学生的面，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对派工作组一事做了自我批评，并表示马上撤出工作组。这一天是7月29日。从派工作组到这一天为止共55天。

集会快要结束时，毛泽东出现在讲坛上。会场爆发出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而后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和有节奏的掌声中，毛泽东退出会场。他一定是很悠然吧！

刘少奇颇为丢脸。在人民大会堂的大会议厅，当着学生的面自我批评。国家元首和党的副主席的权威，荡然无存了。

八、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下）

1. 刘少奇的下台与死

清华大学的攻防

对于学生来说，命令撤销工作组的毛泽东成了他们的救世主，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工作组对学生采取镇压手段。在北京大学 工作组让纠察队封锁校门 并在校园内巡逻。禁止各班级之间或各系之间串连，禁止张贴大字报以及游行集会。在清华大学，工作组要求所有教职员提交参加秘密组织的人员名单（即告密），由于采取上述措施 校园才平静下来。

但是 学生们也进行了反击。

各大学、学校里出现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 工作组号召集会，学生们不但不屑一顾，还把前党委书记陆平等 60 多名党活动分子揪出来批斗。

学生们给这些人戴上三角帽 脸上涂上墨汁 肩、背糊上浆糊 贴上大字报。还揪住头发 撕破衣服 拳打脚踢迫使他们跪下。并拉着他们在校园里游街。

刘少奇的女儿平平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也出现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

刘少奇召集该大学的文革委员会（推进文化大革命）的成员要求他们慎重行动，还说右派分子贴出了大字报。

对工作组最为反感的是清华大学。带头的人是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他高呼口号：“把工作组赶出去！”与此相反，校内也发生拥护工作组的游行，他们喊着“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口号。在工作组里，有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据说是王光美指示游行的，并认定蒯大富是反革命分子。

刘少奇于7月3日做出如下指示：

“要把蒯大富当作活靶子来打。只有批判，才能加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对我们采取民主，我们也不对他们采取民主。”

清华大学两次召开批斗蒯大富的集会，其中一次就是王光美直接指挥，命令刘涛揪斗蒯大富。

清华大学的这些活动，得到了接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的支持。刘少奇对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等人的抗议进行了激烈的反驳。

后来，打假电话将王光美诋到清华大学进行批斗，并在该大学30万人的集会上对王光美进行审问，都是蒯大富打头阵的。对蒯大富而言，他有深仇大恨。

工作组成了激烈的驱逐运动的目标，对此工作组以“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的逻辑认定反工作组的学生和教师是右派及反革命分子。在北京，被打成右派的学生有一万多名，被打成反革命的教师达数千人。

刘少奇陷入窘境

就在这种时候，毛泽东从杭州返回北京（7月18日）

听说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消息，刘少奇马上前往毛泽东的住处，打算就派工作组的成果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住在中南海。中南海位于紫禁城（现在的故宫）西侧，在北海、中海、南海这三个南北相接的大湖中，恰好环绕着中海和南海。

中南海是紫禁城的一部分，里面林立着美丽的庭榭楼阁。清朝时，禁止民众入内。中华民国时，曾向一般民众开放过。但现在只开放毛泽东的故居，而且仅限于中国人可以参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都在这里居住。党的总部（即中央委员会）内务（即国务院）也设在这里。

令刘少奇颇感意外的是，毛泽东的警卫说：“主席累了，已经睡了。”而拒绝传话。然而，周围却停放着数辆高级轿车，从窗外可以看到屋内灯火通明。

排除刘少奇正在召开会议之外。那是得意洋洋的举动。大概刘少奇也察觉到自己陷入了窘境。

深夜的会见

7月29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做了自我批评。5个半月后，即过了年没多久，刘少奇得到了与毛泽东单独谈话的机会。毛泽东的秘书前来接他，大概是刘少奇提出会见的请求吧。

那是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里等着他。

刘少奇这样说：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 广大干部是好的 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二、辞掉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对此请求，毛泽东“沉吟不语，只是不住地吸着烟。过了一会儿 他才建议爸爸认真读几本书。”这是刘少奇的遗孤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联名写的回忆录中的一段话。

这天夜里，毛泽东在迎接刘少奇时，问道：“平平的腿好了吗？”刘少奇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 是个骗局。”原来清华大学的学生曾散布谣言，骗刘少奇夫妇二人说，平平发生车祸，腿受伤了。他们赶到医院一看，才知道上当了。开始时二人的谈话，都是些极普通的家常话。

分别时，毛泽东也跟迎接时一样，态度十分热情、亲切。不过我们很想知道，在听完刘少奇请求后的那段沉思默想的时间里，毛泽东到底想了些什么呢？

“我们全家焦急、热切地等待着爸爸从毛主席那里回来。爸爸回来后说：

——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 很客气 叮咛我认真学习 保重身体。

我们听了，感到悬在心中的石头一下子落了下来，心中暗想情况也许会好转起来的。”

临别时，毛泽东举出两本书名，劝刘少奇读一读。这大概也是使他们全家感到放心的一个证据。这两本书，一本是海格罗的《机械唯物主义》 另一本是狄德罗的《机械人》。

然而，情况并没有好转。

刘少奇的悲惨命运

刘少奇在党内的位置被林彪夺去，排名从第二降到第八位（1966年8月12日）。

开始时提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国的赫鲁晓夫”等，到1967年4月就公然宣告实际上是指刘少奇，其后又对他公开点名批判。

尽管是住在中南海这个特别住宅区里，但还是被闯进来的人（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施以凌辱及肉体上的虐待。最后，刘少奇和王光美被分别监禁，不准与孩子们见面。

1967年8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上召开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百万人集会。与此同时，在三个人的中南海的住宅内，也分头进行批斗。批斗刘少奇时，还命令他的三个小孩也要参加。他最小的孩子——六岁的小小看到父母所受的残酷虐待，害怕之极，大声哭起来，爬着要向外跑。但是批斗的人们不允许她退场。这天，刘少奇回到监禁自己的办公室，叫他的秘书来，然后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个人遇到什么都没关系。但是，我必须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

而后又向毛泽东提出辞呈，抗议给他戴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并写道：“我失去自由了。”

不久，孩子们被赶出中南海，王光美则被逮捕入狱。

刘少奇一人被拘留在中南海里，对他的虐待变本加厉。他的身体衰弱下去，连步行都很困难。

七十岁生日那天，他被开除党籍，得到消息之后，他浑身颤抖继而呕吐、发高烧，血压上升到260/130（1968年11月24日）。

第二年10月，他被脱光衣服抬到担架上，鼻孔里塞着橡皮

管，喉咙里插着吸痰器，打着生理食盐水点滴，被用飞机运到开封的一所医院。过了 27 天他就死了（1969 年 11 月 12 日）。

据说向医院移送，住院病房、死后火化等都是在森严戒备中极其秘密地进行的。火化完后，一直监视刘少奇的特别随从小组，威胁与火化有关的人说，一切都不得泄漏。并还摆了酒宴。

《机械人》

刘少奇的死是不是毛泽东下的命令？中国的党史研究者说没有这样的命令。

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与毛泽东见最后一面的那天夜里，毛泽东劝他读两本书，也许在书中含有毛泽东的寓意。

海格尔是动物学及哲学学者，是信奉机械唯物论的人物。毛泽东所举的《机械唯物主义》一书，不见于其著作中。毛泽东的藏书中有他的《宇宙自然史》、《宇宙之谜》、《自然创造史》。其中《宇宙之谜》又有三十年代的旧译本和五十年代的新译本两种。另一本德·拉·麦托里的《机械人》是论述人的精神来自大脑这一物质的运动的一部著作。刘少奇遗孤们写的回忆录，记错了《机械人》的作者。我在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逢先知的指教下参照毛泽东的藏书情况才知道该书为德·拉·麦托里所著。

综合考虑，毛泽东推荐的这两本书，不外乎是唯物论的浅易入门书，难以认为是作为死期预告而推荐给刘少奇。如果毛泽东想到了书中的一段而推荐给刘少奇的话，倒不如说毛泽东的目的在于激励刘少奇。

“人体自身是一个上紧发条的机器，是永久运动的活标本。食物补充热所消耗的东西，如果没有食物，灵魂就要衰竭，就要跳跃，就要力尽而亡。就如蜡烛行将熄灭，反而增大火苗一样。

反之 要给肉体以营养 要向喉咙里灌人力量的汁液、强烈的烧酒，这样，灵魂就如酒一样变得强壮充实，为伟大的勇气所武装。（《“机械人” 杉捷夫译 日本岩波书店，52 页）

我说这是在激励刘少奇，但毛泽东究竟对事态认识到什么程度 依然是个谜。

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据说当时林彪要求处死王光美 而毛泽东则说“刀下留人”。王光美免于死刑，遗孤们写的回忆录充满对毛泽东的感激。

由此可以想象 是毛泽东命令监禁刘少奇夫妇 并由林彪负责执行。将刘少奇带出中南海就违反了命令，当然刘少奇的死也不能让毛泽东知道。所以一切都是在极端秘密中进行的。

文化大革命 到底是什么样的“革命”？刘少奇猜不出。

在做自我批评 表明要撤走工作组时 刘少奇这样说：

“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你们不大清楚 不大知道 你们问我们怎么革 我老实回答你们 我也不晓得 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1966 年 7 月 29 日）

在此之前，《五一六通知》警告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就要夺取政权。”并指出“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 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 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 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1966 年）

难道刘少奇当时没有察觉到所谓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是在指责自己吗？

就在两年前，毛泽东贬斥过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是假共产主义者。

2.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批判与斗争哲学

对知识分子的批判

毛泽东并不是不承认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但是他的理解是，由于怀才不遇才转而接近革命的。文化大革命的两年前，他曾经说：

“现在的知识分子 穿得好、吃得好、住得好 受到无微不至的优待。身体病了 思想也病了。必须参加阶级斗争。”

依他的判断，生活一旦好起来，就会变成资产阶级，因而思想也必然资产阶级化。

他曾反复说，知识分子自以为很有知识，其实是最无知的。工人、农民要比他们更有知识。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的格言“卑贱者最聪明 高贵者最愚蠢”就是他的创造。

可以说，这是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们所说的知识人）的一种蔑视。也是前面说的思想改造运动的暗流。

毛泽东与梁漱溟

有人指出，毛泽东年轻时在北京的短暂体验，使他对知识分子产生了不信任和憎恶。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的那天，他来到北京。自 1918 年 9 月至次年 4 月，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月薪八元，而教授的月薪是一百至二百元。

毛泽东寄宿在师范学校时代的恩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昌济的家中。晚上，有客人来时，他要去开门，请客人进来。

当时，梁漱溟每天晚上都会来访。当时梁漱溟已是北京大学的讲师，同属哲学系。杨昌济多次向梁漱溟赞赏过毛泽东，但梁漱溟连名字都没有记住，也许根本就不在意。梁漱溟与毛泽东同龄 都是 25 岁。不过梁漱溟比毛泽东大 70 来天。

20年后，梁漱溟赴延安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 我们见过面啊 民国七年，北京大学，你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馆员。你常到豆腐池胡同的杨怀中先生家来聊天，每次总是我开门。后来杨先生病逝，我就成了杨家的女婿。”

梁漱溟诚惶诚恐地 只一个劲儿地点头 不断重复说：“对，有那件事。”

1953年9月，在政府会议上，毛泽东对梁漱溟的发言十分恼怒 大声嚷道：

“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 比王昭君还美 还比得上杨贵妃 依我看 你是又臭又脏。”

接着又不断地申斥“臭不可闻”。

毛泽东的讲话 收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之中。但上面那些痛骂被删掉了。收在《毛选》五卷里的讲话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 那你梁漱溟在那一天之上呢 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 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多嘛！”

俩人相隔 20 多年后在延安重逢，也许是令人怀念的。然而，在这种场合下如此激动，也正道出了延安时的回忆并非令人愉快吧！

北京时期的遭遇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北京大学有大名鼎鼎的教授利用《新青年》杂志发起了新文化运动。

毛泽东来北京的前一年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用的是笔名“二十八画生”。

杂志的其他撰稿人对“二十八画生”并没有产生任何兴趣，教授们对这位 25 岁、湖南口音极重的年轻人也不曾特别打过招呼。

校长蔡元培、文学系主任陈独秀、提倡文学革命的教授胡适、已使用“鲁迅”这一笔名并任特别讲师的周树人等人都应该利用过图书馆。而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可谓独具慧眼，介绍他加入了青年的自发组织——少年中国学会。

放臭屁

前面谈到红卫兵的革命手册。他们按照手册活动，特别是对所谓“黑五类”进行的惩罚称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知识分子更是他们的眼中钉，被蔑称为“臭老九”。

所以是“老九”，是因为他们排在坏人名单中的第九位。第一是叛徒，其次是特务，接下去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恶棍、右派分子，最后是知识分子。这种解释登在 1968 年 10 月 4 日的《人民日报》上，是从《四川日报》上转载的。

元朝把人分成十等，当时的知识分子——儒生就排在第九等。第一等是高级官僚（所谓“官”），其次是下级官吏（吏），僧侣（佛教），道士（道教的僧侣），医师、工匠、猎人、娼妓或“民”）接下去是儒生，最下等是乞丐。

老九这一顺序，暗含“排在娼妓的后面”这一意思。并且用“臭”这一字眼来形容与毛泽东怀着憎恶与轻蔑的“臭不可闻”这句骂人话同出一辙。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知识是一种罪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最低，“九”是数字的穷极。

共产主义生活

毛泽东头脑里有乌托邦式的、思想上的、幸福的社会。那就是谁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即实物供给的社会。他认为支付工资，并把工资分成几等，是资产阶级的做法，而实物供给才是共产主义生活（《对实物供给制的意见》1958年）。

设有食堂并免费供应三餐的人民公社广泛成立时，毛泽东在党的决议中添了一句：

“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然而这带来了粮食的浪费。又由于推行“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使农业生产不振，发生了饥荒。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时间，情况严重。

不久前，一位中国留学生来到我的研究室，一看到摊在桌子上的《人民日报》，马上就手指着说：“老师，不能相信那些报道”。当时，他是该报的记者，去过农村采访。一上路，看到的是饿死人的尸体。那是长江中游的农村。他送给报社的是违反事实的报道。

使这种情况得以好转，是在采取了调整政策以后。毛泽东是政策的制定者。刘少奇推进这一政策，后来他主张在农村允许实行包产到户化。

对此，毛泽东指责说：“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并主张：“整

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均为 1962 年)。

阶级斗争的哲学

毛泽东有原理原则。最高原理是阶级斗争。

正确的思想来自实践,而实践就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 年)。

他认为知识分子虽然有从科学实验中得到的知识,但来自生产斗争及阶级斗争的知识等于零。这成了发动思想改造运动的根据。“投入到火一样的斗争中去”、“参加生产”等号召由此而来。

然而,斗争是对敌人采取的手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尽管有以前残存下来的敌人,但除此之外存在着敌人之说,不合乎道理。

于是,他又想出“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

他在延安的讲稿《矛盾论》的结尾处引用了列宁的话:“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

毛泽东将列宁的“对抗”改为对抗性矛盾,将“矛盾”改为非对抗性矛盾。并加以说明——在社会主义下,虽然对抗性矛盾没有了,所有的“矛盾”都是非对抗性矛盾,但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也有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要解决对抗性矛盾,必须采取严厉的手段。只有斗争。

动员中学生、大学生,有时甚至小学生,是为了让他们参加阶级斗争,使他们掌握正确的思想。

文化大革命前,在农村掀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推动农村的阶级斗争。那是自 1962 年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一直在搞。

乌托邦的矛盾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这个容器、乌托邦的外箱基本满意。他对容器内的人却不能满意。人因为有思想才是人，而思想必须正确。想要具有正确的思想，就必须进行思想改造。思想改造是一种斗争，这一斗争必须反复多次地发动与实行。

“文化大革命不是搞一两次 还要搞多次。”（《对八三四一部队战士的讲话》，1967年）

这就是毛泽东的原则。

在乌托邦中生活，但又要开展斗争，这是一种矛盾。但在毛泽东看来，因为有矛盾所以才必须斗争。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文化大革命的信号是姚文元批判历史剧的文章。而写历史剧脚本的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市长彭真是刘少奇的心腹，所以这一批判在刘少奇的阵营中打进了一个楔子（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

毛泽东进而为了行使实力，动员红卫兵。为使之更加强有力 动用人民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1967年1月），红卫兵一扫过去的党组织，并且首先在上海成立“上海公社”（2月），但毛泽东未予承认。不久，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4月以后）。

革命委员会中也有解放军代表参加，但对林彪及文革小组抱有反感的军队元老、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不少，终于爆发武汉事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动员号称“百万雄师”的工人组织袭击拘禁了来到武汉的谢富治和王力，特别是王力还受到殴打。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武汉事件 7月），在此之前，军队元老异口同声极力谴责文革小组。毛泽东接到报告后大为恼怒，

从而演出了红卫兵揪斗元老的一幕（二月逆流，1967年2月）。

不久，毛泽东对红卫兵绝望了。先从清华大学开始，继而北京的所有大学都在排除（1968年7~8月）。通过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才大致结束（1969年4月）。然而，江青夫人等左右一帮人即所谓“四人帮”的活动不减。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等说服华国锋逮捕了江青等人，文革才算结束（19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的空白

文化大革命持续了十年（1966年5月~1976年10月）。在这期间，在政治上被扣上不当的帽子而遭迫害的人不计其数。仅就正式发表的结果看，党和国家领导人38名，其他的党、政、军、共产党以外的政党、各界知名人士382名，公务员、职员、民间人士70余万名，死者34,000名，被冤枉、误解、诬告而受到迫害者以及受到株连者计有一亿人以上（《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

仅刘少奇冤案就有26,000余例，株连进去的人有28,000余名（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

受到迫害而健康受损、缩短寿命者也很多。

由于陷入内乱、内战状态，使本应获得的国民收入大大减少。其总额约有5,000亿人民币，相当于自1949年建国至文化大革命前国民收入的总和。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自小学到大学全部停课。第二年9月，尽管指示复课，但又提倡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而教育内容十分贫乏。大学在五年之内没有采取任何招生措施。1972年终于恢复招生，但采取的却是推荐制，入学人员仅限于从事过两年以上劳动和兵役的工人、农民和士兵。

废除推荐制，正式恢复入学考试是在1977年。这11年中，

大学教育呈空白状态。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损失中，可谓最大。

如果以 1965 年全国大学的招生人数是 164,000 人 高中毕业生是 36 万人为基础计算，那么大学毕业程度者 164 万人 高中毕业程度者 360 万人 合计 524 万个人才则丧失了接受培养的机会，或者仅能接受不完整的培养。

根据 1982 年的全国人口调查，文盲或半文盲有两亿三千万人，我认为实际上要比这一数字多。

整个社会充满了对他人的戒心和不信任，特别是对政治的不信任很难恢复。

毛泽东逝世后，如何评价这一场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

继任党主席的华国锋，想借着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建立自己的威信，但不久就下台了。1981 年 6 月 中国共产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后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做出了评价。认为后者即文化大革命是毫无可取之处的错误，毛泽东对此负有主要责任，但全部责任不该由他一人来承担。

九、晚年毛泽东

1. 毛泽东的失败

林彪之死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30分许，一架中国军用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机上9人全部死亡，其中包括林彪在内。

红卫兵右手挥动的《毛主席语录》，是林彪为解放军战士编的，红卫兵穿的衣服是解放军的军装。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实际上指导和管理红卫兵的正是解放军，而统率解放军的是林彪。

在1969年通过的《党章》中写进了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的名字。

虽然没有公开宣布，但实际上当时正计划修改宪法。在拟定的《宪法草案》中已写明：“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1970年）

林彪的地位被确定了下来。可是，毛泽东反对把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写进这个《宪法草案》中。林彪似乎对只给了他中国共

产党副主席这个名誉而没有给什么实权表示不满，于是指使陈伯达策划设“国家主席”。

然而毛泽东否定了这种意见，批评了陈伯达。毛泽东知道在陈的后面有林彪，林彪也清楚毛泽东发现了自己的企图。由于受到这样坐下来恐怕要挨整这种无路可走的心情的支配，他制定了暗杀毛泽东的计划，但是未能得逞，便逃亡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林彪说：所以能够发动这场革命，“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威望，二是靠解放军的力量”（1967年《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回过头来冷静地想一想，林彪的意思是说，毛泽东光靠毛泽东思想和他的威望，不足以发动文化大革命，还要利用我来动员军队。

这是一个计算巧妙的如意算盘，是在说：你总得给我好处吧！这里丝毫也没有对毛泽东思想的狂热。

林彪18岁入党，历任师长、军长。日本投降后把军队开到东北，那以后他就未曾露面。在彭德怀下台后，他接任国防部长，令人感到意外。

林彪的秘书在回忆录中写道：林彪爱出汗。因为这个，他谢绝会客，闭门不出。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日译本《林彪秘书回忆录》德冈仁译，苍苍社。

据说坐汽车也要在室内上车，车库与室内相通，上车坐好后才让打开车库的铁帘式铁门，汽车驶出。

有人说林彪患有麻醉药中毒症。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出汗，可能是犯瘾症状或是注射药剂后呈现出的症状吧。也许是在战争中负伤打止痛针，使他上了瘾。我觉得他那消瘦的脸和身体，好像证实了传闻。受到毛泽东宠受的他的所做所

为就是抹杀那些同自己对立的人，以及同自己竞争的对手。

据说在得到林彪乘飞机逃跑的报告之后，毛泽东说了句：“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随他去吧。”

举荐刘少奇 接着又把他清洗掉 对自己亲手提拔的林彪的下场丝毫不动感情的毛泽东，又想着手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孜孜不倦工作的周恩来进行批判了。

毛泽东与周恩来

确实，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个搭档。这也表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到以后，同时它又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周恩来在 1976 年 1 月逝世的时候，群众深切地怀念他。虽然没有公开灵车行走的路线和时间，可是群众却早已等候在马路两旁为他送行。

按照民间的习俗，“清明节”这一天是扫墓的日子。那是周恩来逝世三个月之后的事，人们纷纷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悼念的花圈。在纪念碑四周摆满了花圈，到处挂着白花。还贴有讽刺的诗，人们在那里高声地朗读讽刺诗词。

讽刺的对象，是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

清明节的深夜，花圈都被撤走了。翌日，来到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提出抗议，而且发生了骚乱。群众遭到镇压，流了血（4 月 5 日）

这就是所谓的“天安门事件”。

党中央政治局立即开会，邓小平被免职。然而，这件事成了毛泽东逝世后他的亲信集团“四人帮”被逮捕的前兆。“四人帮”是指毛泽东夫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1981 年 1 月，他们同林彪集团一起被审判。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第三年，把死刑减成无期徒刑。

解放前的毛与周

毛泽东达到位极人臣的地位，是在延安时期。他在党的主要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设置主席职务，自己独占主席，而且拥有最后决定权。

毛泽东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但是这种做法，不是他的发明。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兼任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主席职务（1928年），后者在后来变成中央书记处（1934年）。

说到最后决定权，以前周恩来曾经掌握过这种权力。

遵义会议是在放弃江西省瑞金之后，第一次进行充裕休息的遵义城召开的。虽然承认了毛泽东的作战方针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地位还仅限于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在军事上，依然由朱德和周恩来指挥。一般公认这两个人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而且做出决定：受党内委托，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有最后下决心的权力。

遵义会议之后，在行军途中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它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还设置了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

有人回忆说，指挥实际作战的，是周恩来，也有人回忆说是毛泽东。到达陕北后不久，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1936年11月）。

从实际所起的作用来看，这个委员会是中央军事委员会。

“长征”开始前，在党内不得志的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再一次崭露头角，通过指挥实际的战斗，以明确的形式确立了自己的权力。与此相反，周恩来逐渐甘愿扮演辅佐毛泽东的角色。

瑞金时期怀才不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 1931 年以江西省瑞金为首都宣告成立。毛泽东虽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但是他仍遭冷遇。

据说毛泽东有时同朋友饮酒发感叹：“我三次被中央机关清洗，八次受严重警告处分，这又来一次处分。”

因而，放弃瑞金以后，行军路上周恩来的内心也许动摇了。人们认为他是故意把实权让给毛泽东的。

在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以后，周恩来就作为中共代表常驻武汉。随着国民党政府向内地转移，也跟着转到重庆，担任中央南方局的书记。

延安整风开始后，周恩来为了参加这场运动，从重庆回到延安（1943 年）。他分析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与自己的关系，又分析了青年时代从欧洲回国以后自己的革命活动。他认为：“毛泽东的方向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宰相型权力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的攻击目标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刘少奇在党内的顺序降到第八位时，周恩来是第三位，在林彪之下。可是，根本没有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把自己的真心话讲给周恩来的迹象。在人民大会堂工作的周恩来，曾被红卫兵围困一个昼夜（1967 年）。

林彪暗害毛泽东失败，企图逃往国外的时候，妥善处理这件事的是周恩来。可是从那以后的第三年，在批判林彪的同时，又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是指桑骂槐针对周恩来）（1973

年以后)

最卖力地推动这场运动的是江青和姚文元。在那以后，他们又开展了批判《水浒传》中的人物宋江的投降主义（1975 年以后）

这是对 1973 年恢复工作 代替 1975 年后住院的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的指桑骂槐的批判。但是也把周恩来当作瞄准方向。

毛泽东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夫人江青和姚文元的意图？这是个谜。不过，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谈话内容都限于工作，没有一次谈及属于个人感情上的事（原毛泽东警卫员的证词）。

在中美接近，尼克松访华，同日本邦交正常化等工作中，周恩来的作用是突出的。但是他掌握的权力是“宰相型权力”，一旦毛泽东行使“皇帝型权力”周恩来就显得十分脆弱了。

2. 毛泽东之死

看书靠人读

毛泽东在滴水洞冥想的时候，可能在追寻自己的“本源”。那时他显得十分孤独，尽管如此，在 72 岁时，他身上的虎气犹存。

10 年后，他逝世了。那是 1976 年 9 月 9 日零时 10 分。再过三个月就将迎来他 83 岁的生日。

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他已开始为老年性疾病所困扰。在视力减退之后，专门配一个女秘书为他朗读。当这位女秘书自报姓名时，毛泽东立即背诵了她名字的典故——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他能准确地指定要朗读的地方，当她读错时，毛泽东一一

给予纠正 女秘书卢荻的回忆是口述的 见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这位女秘书亲眼见到护士把贺龙遗孀的报告读给他听之后 毛泽东把报告放在胸前 仰望着天花板 流出了眼泪。

读了这段回忆文章，我不禁想象出毛泽东的衰老姿态。从1974年恢复贺龙名誉这件事来看，毛泽东生前是采取了措施的。不管身体怎样衰老 但是头脑还是清醒的。

让护士读的那份报告，可能是贺龙夫人薛明的手记。她开始执笔是在林彪摔死之后不久，因为周恩来派人请她如实地写报告给党中央（1971年11月）。

因而 实际上在恢复贺龙名誉的问题上 恐怕周恩来起了推动作用。但是没有毛泽东的批准，那是实现不了的。

作为红卫兵而十分活跃的贺鹏飞 遭到江青夫人的迫害，一时陷入悲惨的境地。但是在贺龙恢复名誉之后，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最后一个春节

1976年春节，毛泽东的手已经不能动了。他的住处没有客人，家属也不在。负责在身边照顾他的人把祝贺新年的米饭和武昌鱼送到嘴边。他吞咽东西已经困难了，吃上二、三口就不吃了。饭后他在沙发上休息，当听到远处传来爆竹声时，用嘶哑的声音低声说，出去放鞭炮吧，年轻人过年应该热闹一些。于是，屋外开始响起劈里啪啦的爆竹声，他那消瘦的脸上泛起了一丝笑容。

3. 毛泽东的性格

同心圆的扩大

综观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他从未左右摇摆过。从“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到急转直下的“反右斗争”等，在政策上虽然有急剧的变化，但是这对于他来说，并不意味着改变了方向。他的一生宛如用圆规不断地画着圆圈。即使看上去向左摇摆，那也不过是同心圆的扩大而已。

新的圆比旧的圆要大些，可是中心点不变。借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中心点叫“本源”。他把“阶级斗争”放在圆心上。

圆规的脚逐渐在扩大，从长沙市内的工人运动扩大到农民运动、游击战、土地改革、苏区建设、整风运动、新中国建设、与苏联论战和决裂，最后到文化大革命，这个落脚点的针尖牢牢地扎在那里不动。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阶级斗争”就是运用“暴力”。从延安时代他就把中译本《共产党宣言》放在身边，爱不释手。在书的末尾，确实有“运用暴力消灭……”。一般译成日文是：“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如果强有力地废除旧的生产关系的话”。

运用暴力消灭也好，强有力地废除也好，作为实际上的措施恐怕都是一样的。然而，汉字的表现力比汉字表现在人们头脑中的内容，更能让人铭记在心。

毛泽东的不动不变的“本源”，在实践的世界中无限扩大。而支持产生这种扩大的是他那不愿休息的性格。他在写文章时，不写完不睡觉。好像进入一种兴奋状态而一发不可收拾一样。

毛泽东每天工作之后难于入睡，总要吃些安眠药才行。睡着后一旦被吵醒就再也睡不着了，所以人们知道他在睡觉时，总是特别注意，绝对不出任何声响。

有几句恰到好处地赞美毛泽东的诗：“我是海 我要大大到能够环抱世界 大到能够流贯永远。”

作者是胡风。

胡风大概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几年之后自己被批判的命运。这一段诗恰好是喜欢不断扩大的毛泽东的最好写照。

无法无天

毛泽东会见了美国记者斯诺，同他进行最后一次谈话（当时，毛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毛泽东在谈话结束后，边送客人边小声说：“我是‘和尚打伞’哟！”

这是湖南农民常说的一句歇后语。后半句他故意不讲出来，应该是“无法无天”。和尚是光头，撑起伞后见不到天空。“发”可以换成同音字“法”。“是不怕法、不怕天、无法无天的人”。

当时的翻译给译错了，所以“孤独的修行僧”形象传遍全世界。

北京机场的墙壁上，装饰着毛泽东的词作《沁园春·雪》的手迹。不过，文字布局作了调整，因为这首词在稿纸上随便写的。应该整面墙都是字，而不必加框。

无限制扩大的结果，是无约无束，无法收拾，顽固不化。话一出口，就不改变。他曾跳进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被巨浪冲回沙滩。在避暑地北戴河，他不管天气如何坏，说要游泳，警卫们只好前呼后拥，一起到海边去。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胡来的红卫兵气恼了的军队长老们，在

一次会议上痛斥了林彪和江青等人。

拍桌子大骂的叶剑英，右手掌骨震裂（1967年2月）。

长年同生死共患难的军队长老也只能间接地对毛泽东发发牢骚而得到的回答却是10万人集会批斗47位军队的长者们（同年3月）。

据延安时代就担任毛泽东警卫的人讲，甚至毛泽东的同事和上层人物在会见他之前都很紧张，不敢随便陈述自己的意见。

人们大概都了解毛泽东那种听不进别人劝告的性格。或许是对古典知识丰富，读过大量书籍的他表示尊敬。然而，他无法无天，可群众却遭殃了。受害也波及到作为同志一起创建共产党的人们。他们本来应该向毛泽东进言，可是，对晚年毛泽东，劝告已经不顶用了。

“残阳如血”革命过程中常伴有严酷的现实，毛泽东没有把这些放在眼里。后来又迎来了更加严酷的挑战，这里面丝毫也没有浪漫色彩。不过还可以说他曾有过超越感伤之情的浪漫主义。

毛泽东填过一首词叫《忆秦娥·娄山关》（1935年作）。

唐代诗人李白也曾填过《忆秦娥》之类的作品（据说实际上可能是无名作者之作）。李白站在女人的立场吟咏男女的离别之情，但是毛泽东吟咏的是紧张、激烈的战斗场面。

娄山关是贵州省北部的一个关口，它被宛如利剑般的三座山峰环绕着。进入四川的工农红军改变方向，原路返回经过此关。他们不穿越狭谷，攻击了山顶上的敌人，因此用了句“从头越”。

第二句仿造李白的“秦娥断梦秦楼月”一句，他不否认前途多难，于是咏出“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李白有“西风残照，汉家

陵阙”残照是指落日余晖。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虽然吟咏悲伤，但又不为悲伤所沉溺。

当占领南京时，他颂扬人民解放军穷追无处可逃的敌人，但在诗（七律）中也有“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句子（1949年作）

说起“残阳如血”实际上毛泽东怕见到真正的血。

毛泽东曾在北京西郊的避暑地香山小住过，当时南方还继续同国民党军队战斗。警卫人员为了消愁解闷，跑到山中打麻雀。一天，警卫员拎着打来的麻雀大声说笑着从林中出来。碰巧毛泽东从外面回来站在门口，他们报告干什么去了，并交出刚打来的麻雀。血还在滴着。毛泽东显得很害怕，向后退了半步，捂着脸喊叫起来：“快拿走！收起来！我不要看！”

然后他皱着眉头斥责他们说：“麻雀有什么错？麻雀也有生命，以后不许再打了。”

如果问毛泽东最怕什么，他的警卫员说第一怕眼泪，第二怕血。第二怕的例子就是这次打麻雀的故事。警卫员举了一些例子之后归结出：“他也是个情感丰富的人。意志坚如钢而心也善良，这两者都很鲜明，很强烈。”

后 记

在写写改改的过程中，终于完成了一本书。

八九年前，我去了一趟香港。在香港遇到一位年轻人，他从台湾逃到日本后想到大陆去，但因为没有护照不能入境。他说在日本他贪婪地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而其中最憎恶的就是拙著《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中公新书 中央公论社，1972 年）。

这本书又会遇到怎样卓越的读者呢？

岩波新书中，已经有同样书名的一本书《毛泽东传》。作者是贝塚茂树。1956 年出版，这本书长期以来读者很多。

该书出版那年，毛泽东还很健康。曾在长江大桥旁畅游。还请前陆军军人访华团转达他对天皇的问候。当年他 62 岁。后来又一直活跃 20 多年。

编辑部寻找适当人选撰写一本续集，内容着眼于毛泽东 62 岁以后的活动。

书名与贝塚先生的几乎完全相同，而且又都是为岩波新书执笔，确实有些冒昧。我一直想中断这个念头，但一想起贝塚先生生前的音容，就不禁涌起一股怀念之情。我想贝塚先生大概会原谅我吧！冲动促使我毛遂自荐。

贝塚先生的书，开头是描述他从空中眺望韶山的风光。我

也曾从降低高度的飞机机窗中看到过地面的风光。尽管空中小姐指给我看，但还是没有看清楚，那片风光一掠而过（1960年）。

贝塚先生是否已将韶山尽收眼底了呢？我想，下一次机会，我可能会看清韶山那特异的风姿。她很像富士山，但比富士山更优美，柔和地张开裙摆，形成辽阔的原野。访问故居，是打算从这里写起。总而言之，我前往韶山，由地面仰视了她。

以逢先知为团长的党史研究者代表团访问京都，成为我去中国的一个契机。在北京与结识的各位先生重逢，并受到他们有益的赐教，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动力源泉。

所有人的姓名不能一一列举，但谨此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逢先知、龚育之、金冲及、高勇、汪裕尧、冯蕙、杨增和、石仲泉、顾龙生、王玉璞、卢洁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沙健孙、廖盖隆、王淇、张会才等，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姜思毅、孙柏林、鲍世修、刘先廷、张杰、邓湘田等，湖南省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兴国，以及韶山管理局文辉抗、李德伟等各位先生、女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在北京还承蒙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的汪向荣、杨正光、颜锡雄等各位先生的关照。

另外，“探寻中国现代史原点之旅”的同行诸君也给予了友情和赐教，对此也表示感谢。本应一一记下姓名以略表寸意，但由于篇幅有限，敬请见谅。好在拙编《中国现代史三棱镜（探寻原点）》一书（苍苍社，1988年）中有同行诸君的健笔秀文。

当然，关于本书的内容，由我个人负责。

如把负责企划的林建朗先生周到的安排置于一侧，而把此书置于另一侧，那么天平的秤盘会倾向哪一方呢？但不论怎样，本书的对象毛泽东及其周围的人物，是永远也说不清道不完的吧！

1989年7月27日

竹内实

毛泽东年表

毛泽东生前的有关事项以及逝世后均有记载。〔 〕内为实际年龄。但生日为年底，请注意。

1850 洪秀全在广西省举兵。翌年，国号定为太平天国。

1853 太平天国攻陷南京，号“天京”，曾国藩组织湘军。次年，在湘潭打败太平天国军。

1862 在安庆设置兵工厂，兴起洋务运动。

1864 南京失陷，太平天国崩溃。

1880 李鸿章创办海军。

1893 光绪 19 年(明治 26 年)12 月 26 日(阴历癸巳,11 月 19 日)毛泽东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父毛顺生，母文七妹，弟泽民(1896 年—1943 年)、泽覃(1905—1935)。

1894〔1 岁〕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康有为反对与日本的媾和条约，组织 1300 余人签名请愿(〔公车上书〕)。

1900〔7 岁〕义和团事件。义和团进入北京。毛泽东从第二年起上私塾。杨昌济留学日本。

1904〔11 岁〕日俄战争爆发。长沙开港。

1906〔13岁〕私塾停学 从事农活。夜里帮助父亲记帐。

1910〔17岁〕长沙发生暴动。在毛氏宗祠与族长争辩。父亲的大米遭劫。离家赴湘乡上小学（东山高等小学堂）。

1911〔18岁〕赴长沙 上中学（湘乡中学）剪掉辫子。辛亥革命 应征革命军。

1912〔19岁〕离开军队 在高等商业、省立第一中学度过学生生活。其后，在图书馆自学。

1913〔20岁〕入长沙省立第四师范学习，该校与第一师范合并。第三学年起任校友会执行委员会书记。

1917〔24岁〕在《新青年》（三卷二期）上发表《体育之研究》 笔名为二十八画生 又以同名张贴“征友”广告。

1918〔25岁〕组织新民学会。从第一师范毕业。赴北京，寄宿于杨昌济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

1919〔26岁〕离北京经上海回长沙。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组织驱逐张敬尧运动。赴北京阅读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母亲去世，写《祭母文》。

1920〔27岁〕杨昌济去世。父去世。离北京赴上海，遇陈独秀。回长沙 开办文化书社。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际 在长沙举行游行。

1921〔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和杨开慧结婚，住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七号。成立中共湘区委员会，任书记。

1922〔29岁〕未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导安源煤矿工人罢工。

1923〔30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广州）担任《响导周报》执笔。

1924 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

1925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缺席。填词《沁园春·长沙》。

1926 [33岁]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出席湖南省农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1927 [34岁]视察湖南省的农民运动。返回韶山执笔《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镇压共产党。领导起义失败后上井冈山,颁布“三大纪律(后追加‘八项注意’)”,而后开展游击战,还向福建省出击(1929)。

1928 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未能参加)。

1930 [37岁]与朱德一起攻打南昌,未获成功。国民党军侵入苏区,遭第一次“围剿”。

1931 [38岁]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全会批评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任主席。

1932 [39岁]在宁都会议上受到批评。会议主持人是周恩来。

1934 [41岁]受到党中央“留党察看”的处分。中国共产党放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开始“长征”。

1935 [42岁]在贵州省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指挥娄山关战役。填词《忆秦娥·娄山关》。到达陕北。

1936 [43岁]在保安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填词《沁园春·雪》。

1937 [44岁]移至延安,讲授《实践论》、《矛盾论》。王明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加入中央书记处。

1938 [45岁]派遣任弼时赴莫斯科。

1939〔46岁〕在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发表演讲，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0〔47岁〕发表《新民主主义论》。

1941〔48岁〕在《农村调查》发刊之际写了序言和跋。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讲。

1942〔49岁〕作《整顿党的作风》演讲。整风运动开始。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3〔50岁〕康生发动“肃反”运动。确保最后决定权。（共产国际解散）

1945〔52岁〕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章中记入“毛泽东思想”。任中央委员会主席。

（日本战败 在重庆的报纸上刊登词《沁园春·雪》。

1947〔54岁〕前一年开始与国民党进行内战。撤离延安。人民解放军发表向国民党军进行总反攻宣言。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8〔55岁〕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占领四平街。抵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1949〔56岁〕进入北京。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0月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月赴莫斯科。

1950〔57岁〕12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有效期30年）回国。10月人民解放军入西藏。10月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

1951〔58岁〕5月开始批判电影《武训传》。思想改造运动开始。

1953〔60岁〕3月 在斯大林逝世之际 写悼文。对梁漱溟的发言大为恼怒，加以反驳。

1954〔61岁〕9月 任国家主席。10月开始批判《红楼梦》的研究方法。

1955〔62岁〕6月 开始批判胡风。7月开始搞农业合作化。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956年1月出版）9月，授与朱德等人元帅军衔。

1956〔63岁〕2月，苏联开始批判斯大林 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9月 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 匈牙利发生暴乱）

1957〔64岁〕2月 演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5月，第二次整风开始。6月 发动反右斗争。11月 赴莫斯科 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

1958〔65岁〕8月，肯定人民公社。大跃进开始。5月 在中共第八届二次会议演讲时，谈到秦始皇。

1959〔66岁〕4月，再选国家主席时，辞职。刘少奇任国家主席。7月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批评人民公社。免去彭的国防部长职务，起用林彪。

1960〔67岁〕6月 评价日本的反对“安保”斗争。7月 苏联撤走在中国的技术人员。

1961〔68岁〕举办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读书会 并对其进行批判（见1961—1962年的笔记）

1962〔69岁〕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做自我批评。8月《人民日报》再次登载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修订版）

1963〔70岁〕5月，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出指示，强调阶级斗争。6月 致苏联共产党公开信 开始公开论战。

1964〔71岁〕1月元旦之际全国主要城市发行诗集《毛泽东诗词》。发表讲话——《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伟大的爱国斗争》。

1965〔72岁〕1月，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关，规定使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语。9月，《人民日报》刊出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11月，刊登姚文元批吴晗的文章。12月，《论十大关系》传达到党内的县团级以上。

1966〔73岁〕5月发出《五七指示》、《五一六通知》。6月，回韶山，隐居滴水洞。6月，刘少奇向各大学派工作组，次月撤出。7月从武汉致信江青夫人。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写《炮打司令部》大字报。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7〔74岁〕与刘少奇谈话（最后见面）将人民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传达到基层单位。2月，不承认“上海公社”。军队长老谴责文革（二月逆流）4月，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5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

1968〔75岁〕7月指示红卫兵领袖“停止武斗”。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8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将红卫兵从北京各大学排除。9月在全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969〔76岁〕3月，中苏两军在珍宝岛发生冲突。4月，召开第九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党章中明确规定林彪为接班人。11月刘少奇逝世。

1970〔77岁〕4月，《人民日报》发表共同署名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8月反击陈伯达的《天才论》。10月，与埃德加·斯诺谈话说“我是‘和尚打伞’哟”。

1971〔78岁〕9月林彪在蒙古坠机身亡。

1972〔79岁〕2月，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9月与田中

角荣首相会谈。日中邦交正常化。

1973〔80岁〕3月，重新起用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7月指示‘批孔’要与‘批林’相结合。8月主持第十次党代表大会。12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总参谋长。

1974〔81岁〕1月会见大平正芳外务大臣 赠《怀素自叙帖真迹》（拓本）2月，正式开展批林批孔运动。3月毛泽东指出江青有野心。夏，周恩来住院。

1975〔82岁〕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代理住院的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9月开始批判《水浒传》中的山寨首领宋江。11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 1月周恩来逝世。4月为悼念周恩来 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发生骚动。解除邓小平职务，华国锋升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及国务院总理。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逝世。享年82岁。10月，华国锋逮捕江青等人，出任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977 7月邓小平复出。

1978 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张抬头。8月，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提出党的工作重点是现代化建设。

1979 3月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第四项是“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981 1月审判江青等人（江青、张春桥被判死刑）5月，出版《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6月，胡耀邦升任党的主席。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华国锋降为副主席。

1982 9 月，召开第十二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废除党主席。在中央书记处设总书记（胡耀邦）。主席的称号只保留在中央军事委员会里（邓小平就任）。12 月，出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1983 1 月 江青、张春桥被减为无期徒刑。12 月 出版《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书信手迹选》、《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1984 8 月 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12 月 出版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7 1 月，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赵紫阳继任。10 月 召开第十三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赵紫阳做《政治报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8 3 月 出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

1989 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 解除赵紫阳总书记职务 江泽民继任。